

ISSN 1003-0751

#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5/01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二〇二五年第一期(总第三三七期)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 学者风采

**刘跃进** 男，1958年生，吉林白城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学院院长等，兼任《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努力追求三个目标：一是强化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和对学术研究的敏锐度。二是认真阅读原典，细致处理材料，做好文献工作。三是强化综合能力，做好深度研究，体现时代特色。在秦汉文学研究方面，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徐公持先生合作完成《秦汉文学史》。此外出版《秦汉文学编年史》和《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两部代表性成果，后者荣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独立出版论著《中古文学文献学》《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整理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相关重要资料，提出自己的研究设想。二是以“竟陵八友”为核心，系统考察齐梁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诗歌创作、文学思潮的变迁，首次对永明诗体进行详细研究。三是首次对《玉台新咏》作系统研究，提出一系列学术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古籍整理方面，编纂完成《〈文选〉旧注辑存》，该书荣获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2021年）。与人合作主编《楚辞大典》《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杜集珍本文献集成》等。

另出版论著《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等，学术论文集《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文选〉学丛稿》《文学史的张力》，随笔序跋集《跛予望之》《潮平两岸阔》，讲演集《开窗放入大江来》，散文集《从师记》等。



#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5/1

##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奎 邓伟志 刘国光 李君如 吴敬琏  
冷 溶 迟福林 张首映 袁行霈 葛剑雄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承哲

副主任 李同新 王玲杰

##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万银峰 王建国 王承哲 王玲杰 闫德亮  
阮金泉 李同新 吴宏亮 余 丽 谷建全 完世伟  
张 昆 张宝明 张宝锋 张富禄 陈宝良 苗连营  
徐正英 高卫星 曹 明

主编 王承哲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 政治与党建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专题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 王炳林 刘志亮 / 5
-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思考 欧阳奇 / 14

## 经济理论与实践

-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 杨玉珍 / 24
- 高质量发展阶段壮大耐心资本的逻辑依据、关键问题与实践进路 刘朝晖 / 32

### “三农”问题聚焦

- 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建构及优化策略 崔宁波 / 40
-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问题研究 刘灵辉 / 49

## 法学研究

- 新形势下可持续贸易理论面临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谢孟祥 / 57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及行动框架 张世贵 / 65
-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范式的建构 童敏 / 74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极限思维的理论寻绎及当代价值 韩隽 张山杉 / 82

## 伦理与道德

- 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科技伦理治理 孙春晨 / 88
-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及其优化路径 肖祥 / 96

## 哲学研究

存身与救世的两难及其克服

——《庄子·人间世》的生存论意蕴

郭美华 / 108

## 历史与文化

儒贾商士:明代的商贾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陈宝良 / 119

从上博简《武王践阼》看两周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变迁

邓国军 / 129

## 文学与艺术研究

祖莹、祖珽父子的为人与为文

刘跃进 / 137

试论魏晋文化的总体潮流精神

宁稼雨 / 144

## 新闻与传播

### “国际传播新视角”专题

出海的网红:面向 Z 世代的内容生产、情感共同体建构与跨文化传播

吕 鹏 / 158

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生态竞争优势与进化策略

严怡宁 / 167

《中州学刊》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 176

· 本刊声明 ·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在以上数据库中被收录,或不同意在本刊微信号中被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 MAIN CONTENTS

-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Chinese Communists ..... *Wang Binglin, Liu Zhiliang*(5)
-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uided by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 *Ouyang Qi*(14)
-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to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 *Yang Yuzhen*(24)
- The Logical Basis, Key Issu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Strengthening Patient Capital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Liu Zhaohui*(32)
-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Three-chain Synergy" in the Grain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 *Cui Ningbo*(40)
- A Study on th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Institutions  
..... *Liu Linghui*(49)
- The Dilemmas Faced by Sustainable Trade Theory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 *Xie Mengxiang*(57)
- The Value Implic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the Coupl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 *Zhang Shigui*(65)
- The Governing Paradigm of Chinese Society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 *Tong Min*(74)
- Promoting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 *Sun Chunchen*(88)
-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Basi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Optimization Path ..... *Xiao Xiang*(96)
- The Dilemma and the Overcoming Dilemma of Self-survival and World-saving  
—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of *Ren Jian Shi* in *Zhuangzi* ..... *Guo Meihua*(108)
- The Confucian Businessman and Scholar-offici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rchants; The Business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Knowledge World in the Ming Dynasty ..... *Chen Baoliang*(119)
-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 of Zu Ying and Zu Ting ..... *Liu Yuejin*(137)
-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Trend and Spirit of Wei-Jin Culture ..... *Ning Jiayu*(144)
- Wanghong Going Global: The Content Gen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Generation Z ..... *Lv Peng*(158)
-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icro-drama: Ecologic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volution Strategy  
..... *Yan Yining*(167)

#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

王炳林 刘志亮

**摘要:**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尽管各种精神都有鲜明具体的坐标和内涵,但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是连贯的。理想信念是政治灵魂,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牺牲奉献是崇高品格,艰苦奋斗是优良作风,忠诚热爱是真挚情感,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开拓创新是政治勇气,独立自主是根本立足点,团结统一是制胜法宝,胸怀天下是宽广境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十大要素,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崇高品格,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思想内核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05-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sup>[1]</sup>7 第一批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46 种精神,贯穿了党的历史的四个时期,内涵丰富多样,涉及领域方方面面,但同时又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接续生成、相互作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谱系,把握其思想内核是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十大要素体现了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

## 一、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2]</sup>15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每种精神都有各自的特定内涵,而贯穿其

中的灵魂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来自科学理论认知。近代中国屈辱的境况让有良知的先进分子不断寻求救国真理,但以西方为师的学习之路屡遭挫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3]</sup>1471 在新文化运动的译介大潮中,“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sup>[4]</sup>。真理越辩越明,在主题分别涉及问题与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以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指导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更加深刻明白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求解放的科学理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汁当作红糖而浑然不知。这份信仰的甘甜就是饱经磨难、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人找到救国真理后的欣喜和陶醉。“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

收稿日期:2024-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伟大建党精神及其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关系研究”(21&ZD024)。

作者简介:王炳林,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南京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刘志亮,男,南京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馆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 210016)。

灭。”<sup>[5]</sup>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粒种子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对雷锋个人成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雷锋精神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孕育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石油大会战“是从‘两论’起家的”<sup>[6]</sup>,会战开始就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孕育的特区精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孕育的。

第二,远大理想犹如灯塔。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而“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sup>[7]</sup><sup>298-299</sup>。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远大理想。“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8]</sup>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针,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sup>[9]</sup><sup>1</sup>,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但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并无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而更强调主观因素的激励作用。“革命理想高于天”<sup>[10]</sup><sup>34</sup>,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以共同理想信念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sup>[2]</sup><sup>23</sup>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第三,坚定信念是成功之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征路上面对敌人围堵和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党和红军以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谱写了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和长征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林县人民以最原始的工具,历经近10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凿出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铸就了红旗渠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西方技术封锁和白手起家的现状,科研人员不畏艰险,昼夜攻关,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培育了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sup>[1]</sup><sup>127</sup>,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锻造了脱贫攻坚精神。这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伟大奇迹,“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的光芒”<sup>[11]</sup>。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sup>[2]</sup><sup>15</sup>。理想信念坚定,中国共产党人就能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中国共产党就能百折不挠,“锻造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sup>[12]</sup>。

## 二、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7]</sup><sup>411</sup>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人民革命,这决定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10]</sup><sup>40</sup>,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要素。

第一,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观诞生之前,英雄史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的作用被无视或抹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这一不合理的认识颠倒过来,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sup>[13]</sup>抗战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都是党在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生成的革命精神。

第二,一心践行为民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14]</sup><sup>1</sup>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毛泽东在参加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时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他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sup>[15]</sup><sup>1004</sup>不久,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

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sup>[16]</sup>援藏干部孕育、传承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为藏族人民鞠躬尽瘁。孔繁森曾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sup>[17]</sup>

第三,自觉拜人民为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实践伟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活水源泉。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开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河;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争创一流,推动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造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这都是人民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重申:“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sup>[15]791-792</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sup>[10]296</sup>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等以重大事件为载体的精神中,都能看到党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党的二大确定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sup>[9]162</sup>。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到现在党员总数达到9918.5万,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做“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sup>[14]137</sup>井冈山时期,面对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军民的食盐奇缺,朱德称“我们红军与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sup>[18]</sup>,坚持要通讯员为缺盐导致走路摇晃的老乡送去硝盐。20世纪30年代初,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坚决支持。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更是生动展现了党、军队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谊和血肉联系。

### 三、牺牲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sup>[19]</sup>甘于

牺牲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键要素。一大批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等,以绝对忠诚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词。

第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0世纪50年代,康藏公路西段施工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面对雪域天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第155团2连筑路官兵庄严地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在如刀砍斧削的百米峭壁成功修出公路。共产党人一贯是不怕牺牲的,夏明翰就义前挥笔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千古绝唱;湘江战役中陈树湘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身负重伤被俘,苏醒后用尽最后力气“断肠明志”,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sup>[20]</sup>。大别山区人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和22年革命武装斗争不间断的传奇,近百万人为此献出宝贵生命。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曾深刻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sup>[21]</sup>党的百年历史就是无数先贤英烈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奋斗担当史,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1965年,王杰在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时突发意外,危急关头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了自己23岁的年轻生命。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共产党员李振波等15名空降兵不惧死亡危险“惊天一跳”,以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血脉中传承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

第二,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sup>[22]522</sup>集体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追求,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的觉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是党章对党员的刚性要求。共产党员不是个人主义的“奴仆”,而是克己奉公的典范。“将军农民”甘祖昌解甲归田带领乡亲建设家乡,焦裕禄“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谷文昌“不沾公家的一点油”,彭德怀同志说“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sup>[23]</sup>。二是在平凡中孕育伟大的心态。雷锋同志在日记中写下“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sup>[24]</sup>。伟大出于平凡,中国女排天天坚持训练,苦练技战术,才有竞技场问鼎冠军的荣誉。英雄来

自人民,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敬业奉献,汇聚起了创造美好生活的磅礴伟力。从“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赵占魁到“铁人”王进喜,从“蓝领专家”孔祥瑞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各个时期各条战线英雄辈出,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铸就了以淡泊名利、敬业奉献等为核心内涵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三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境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一大批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长期甘当无名英雄,在极度艰难条件下创造了伟大奇迹,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同样,几代航天人接续努力,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sup>[25]</sup>,书写了攻坚克难、九天揽月的壮丽凯歌。

#### 四、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是在内忧外患中诞生、成长的,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艰苦奋斗是党的光荣传统,融入党的血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第一,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7]</sup><sup>136</sup>实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sup>[26]</sup><sup>1688</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塞罕坝一片荒芜,“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为阻隔黄沙对北京的侵袭,1962年原林业部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向荒原沙地进军。历经三代人50多年的努力,从一粒种子、一棵树到“一片海”,“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sup>[10]</sup><sup>397</sup>,铸就了塞罕坝精神。“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sup>[27]</sup>,“两弹一星”“北斗卫星”……所有的中国奇迹都源于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艰苦与奋斗紧密相连,但根本点和落脚点在于奋斗,在于一代又一代地接续奋斗、永久奋斗。

第二,攻坚克难、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要奋斗就要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力量,艰苦奋斗也是一种斗争精神,即面对艰苦条件、困难挑战,敢于攻坚克难、顽强拼搏。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杨靖宇牺牲时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在川藏、青藏公路以及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畏高山峡谷、激流险滩

和沼泽等天险,顶着地震滑坡、泥石流、雪崩等频发的自然灾害,在高寒、缺氧、冻土不化等恶劣的施工条件下,创造了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铸就了“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生活日益改善,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sup>[26]</sup><sup>1274</sup>,而是要大力弘扬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拼搏进取精神。

第三,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sup>[28]</sup>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的生动体现。延安时期,斯诺看到毛泽东居住的简陋窑洞、周恩来睡的土炕、彭德怀穿的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等,盛赞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巨大反差,让“到延安去”成为无数青年的心灵呼唤。以俭修身,以俭兴业,革命胜利前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都是为了让共产党人保持革命意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 五、忠诚热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挚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念就是“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sup>[29]</sup>。“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内在要求就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

第一,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sup>[14]</sup><sup>505</sup>。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雨花台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殉难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雨花台烈士大多经历了狱中、法庭、刑场等严峻考验,但他们宁愿以死明志也绝不叛党。邓中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党组织写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sup>[30]</sup>江竹筠等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宁死不屈、以死明志。“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sup>[31]</sup>,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还要爱党、信党,永远跟党走。长征

时红军将士相信党、忠诚党,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掉队离队,邓小平在回答女儿问他参加长征感受时称“跟着走”<sup>[32]</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党中央“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相配合”<sup>[33]</sup>的指示,1956年,6000多名交通大学的师生在党委的领导下,毅然从黄浦江畔奔赴渭河之滨,铸就了西迁精神。

第二,舍家为国,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流淌在民族血脉之中。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sup>[34]</sup>。无论是民族危亡中救国、一穷二白中兴国,还是改革开放中富国、新时代中强国,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舍家为国,自觉担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巍巍太行,莽莽吕梁,民族危难之际,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开辟敌后根据地,凝聚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大力量,铸就了太行精神(吕梁精神)。1941年,新四军战士孙晓梅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sup>[35]</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锻造出抗美援朝精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每一个英雄名字的背后都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一切的忠诚信念。

第三,敬业奉献,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恒的根本价值追求,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立足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sup>[36]</sup>。广大科学工作者发挥科学家精神,爱国奉献,矢志创新,为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贡献科技力量;广大企业家在合法经营、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sup>[37]</sup>。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以每个劳动者的平凡力量汇聚成国家发展的磅礴伟力。

## 六、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sup>[15]801</sup>实事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始终坚守的根本原则。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从客观实际出发,要求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并根据客观条件变化不断改变主观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革命胜利前夕,敌我力量发生根本性变化,党中央审时度势,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sup>[3]1427</sup>。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sup>[1]526</sup>。从客观实际出发,以联系发展的眼光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以是否符合实际作为落脚点,形成实事求是的完整逻辑闭环。

第二,求真务实,尊重规律。求真务实首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探求事物发展规律,调查研究是“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sup>[38]</sup>的基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有效推动了分粮、土改等工作顺利进行,使照金精神发扬光大。新时代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遇事虚怀观一是”<sup>[39]</sup>的心态和谦虚谨慎的态度,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sup>[40]</sup>。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科学扶贫,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了脱贫攻坚精神。

第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要求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探索发展真理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不断贴近真理的过程。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路上的巨大牺牲和前四次反“围剿”胜利情况的鲜明对比,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错误,从通道至遵义,一系列重要会议相继召开,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果断纠错力,铸就了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螺旋式上升的。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无论是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在不断修

正错误的过程中找到真理、发展真理。

## 七、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

坚持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开拓创新的典范。党的百年历史也证明,开拓创新是党和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活力所在。

第一,解放思想,敢闯新路。客观实际运动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一定阶段内和一定条件下的思想认识总是有限的,因而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包产到户、创办经济特区、建设自贸区和自由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走在改革路上,奋勇向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孕育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警醒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41]</sup><sup>143</sup>

第二,锐意进取,敢于担当。天下之事,非新无以为进。开拓创新必然要打破阻碍前行的条条框框。“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sup>[42]</sup><sup>372</sup>面对“重新安排林县河山”<sup>[43]</sup>的重大工程,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精神和科学态度,毅然“向大自然进军”,创造了在太行山上建成“人工天河”的奇迹。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一代代共产党人锐意进取,“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sup>[44]</sup>,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三,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sup>[2]</sup><sup>51</sup>开拓创新是一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进取性思维,需要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心态。2013年,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后,针对嫦娥四号的技术方案,科研人员产生了分歧,一种声音是复制嫦娥三号落月任务,另一种声音是不做翻版,要在月球背面着陆。显然,后者科学价

值更大,但风险也高,且没有国家尝试过。经过反复论证,科研人员最终决定要勇闯无人区,挑战去月球背面。正是这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中国才有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壮举,铸就了伟大的探月精神。

第四,善于打开新局面。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开拓创新的内在要求。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形势变化,主动放弃辎重,采取机动作战,领导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sup>[45]</sup>,在变化中取得战略主动,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逃避问题,而是善于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打开新局面,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 八、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足点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sup>[46]</sup>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只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遗产、时代要求等紧密结合,而这决定了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足点。

第一,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事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sup>[47]</sup><sup>13</sup>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一度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为此党和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sup>[48]</sup>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阶段。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放弃城市革命道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42]</sup><sup>197</sup>,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遵义会议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都蕴含着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sup>[49]</sup>

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独立自主不是孤立封闭,而是强调要把国家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必然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包围以及自然灾害,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进行了大生产运动。1941 年春,三五九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 26 万多亩,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东北地区,几代拓荒人挥洒青春,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铸就北大荒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经济封锁,国家迫切需要石油。王进喜常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没油是最主要矛盾。”<sup>[50]</sup>1960 年,党中央决定打响石油大会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世界石油勘探开发史上的奇迹,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铸就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 九、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无产阶级“富于组织性纪律性”<sup>[22]</sup><sup>644</sup>,党的性质决定了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之源。

第一,顾全大局,紧密团结。讲大局、顾大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求必要时局部要服从全局、个体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革命战争时期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sup>[51]</sup>。赣南 13 个苏区县约 240 万人口中有 50 万青壮年,而先后参加红军的达 33 万余人,支前的

达 60 多万人,牺牲的达 20 余万人。沂蒙山老区人民是“最后一斤粮食交军粮,最后一块棉布做军装,最后一床被子盖在伤员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郎也要送他上战场”。改革开放以来,受地理位置等多重因素制约,老区发展较为缓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sup>[52]</sup>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达地区以老区精神反哺老区,创新性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奔小康之路。顾全大局本身也决定要紧密团结。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嫦娥五号任务,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涉及科学领域广泛,参与单位人员众多,每次技术突破、每步工程跨越都是全国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的结果。

第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sup>[41]</sup><sup>337</sup>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能带领人民凝心聚力、众志成城,无论是面对地震或洪水等灾害,还是进行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员发动,党员冲锋在前,带动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势不可挡的强大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14 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sup>[53]</sup>

第三,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sup>[47]</sup><sup>18</sup>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再到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是党凝聚力量、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1950 年,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在进军途中及之后破山修路、开荒生产、平叛和民主改革中,驻藏部队官兵和进藏工作干部严守民族团结政策,与藏族人民共命运、心连心;在西藏后续的开发建设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共产党员克服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等困难,与西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发展奇迹,铸就了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总值从 1951 年的 1.29 亿元跃至 2023 年的 2400 亿元。西藏是民族团结的一个代表,在脱贫攻坚战中党中央

“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sup>[54]</sup>,广大共产党人上下同心、尽锐出战,“输血”“造血”并重,实现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民族地区现行标准下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 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境界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是中国人一直崇尚的价值理念。共产党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伟大政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庄严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7]435</sup>。“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追求、崇高情怀和宽广境界。

第一,互学互鉴、合作共赢。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和自信心态。世界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sup>[10]41</sup>。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sup>[55]</sup>。在航天航空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等原则,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探月工程主动开放部分资源,帮助多个国家搭载科学仪器设备,并将获得的原始探测数据向全世界开放,铸就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中国北斗工程建设之初,就坚持“开放、兼容”原则,将发展目标定位为为全球用户提供连续、稳定、可靠的服务,目前北斗系统已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以中国技术助力全球联通,孕育了开放融合的新时代北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sup>[55]</sup>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高举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走在互学互鉴路上。

第二,开放包容、命运与共。开放包容、命运与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格局和天下担当。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

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7]669</sup>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国情条件等因素影响下,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中国人自古主张和而不同、世界大同,共产党人也有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为中国革命献身;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坚持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塞罕坝林场为代表的中国绿化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sup>[14]5</sup>。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sup>[14]232</sup>,让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进步。命运与共才能共建美好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努力“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55]</sup>。

上述十大要素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思想内核,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精神密码。当然,这些核心要素并非等量均匀地体现在第一批46种伟大精神的每一种具体精神中,而是相对普遍地同时存在于多种精神中,这也显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符合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真实性特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崇高品格,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6.
- [5]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9.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4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7.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 [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1]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 [1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3(9):4-14.
- [13] 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N].学习时报,2010-03-08(1).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吴志菲.焦裕禄的最后时光[N].人民政协报,2017-04-13(9).
- [17] 孔繁森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 [18] 黄宏.井冈山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8.
- [19]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81.
- [20]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八——一九四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3.
- [21]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2.
- [2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3] 坚守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93.
- [24] 雷锋日记选(1959—196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5.
- [25] 习近平致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祝贺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N].人民日报,2020-12-17(1).
- [26]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7]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4).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245.
- [29]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 [30] 邓中夏全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11.
- [31] 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N].人民日报,2021-03-02(1).
- [32] 钟文,鹿海啸.百年小平: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0.
- [3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7.
- [34]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11.
- [35]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英烈家书[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127.
- [36] 陈广生,崔家骏.雷锋的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2.
- [37]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 [38]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32.
-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615.
- [40]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10.
- [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3] 郑雄.中国红旗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36.
- [44]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40.
- [45]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54.
- [4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
- [4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4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 [49]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 [50] 王进喜.铁人诗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0.
- [5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5.
- [52]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
- [53]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3-01-01(1).
- [54] 总书记的两会声音[N].人民日报,2015-03-15(5).
- [55]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3-10-19(3).

##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Chinese Communists

Wang Binglin     Liu Zhiliang

**Abstract:**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PC with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as the source is an organic system with rich connotation. Although various spirits have distinct and specific coordinates and connotations,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spiritual spectrum is coherent. Ideals and beliefs are the political soul,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is the fundamental stance, sacrificing and dedicating oneself is a noble character, hard work is a fine style, loyalty and love are sincere emotion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is political courage,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is the fundamental foothold, unity and solidarity are the winning weapons, and embracing the world is a broad realm. The ten elements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PC people show the value pursuit and lofty character of the CPC people, and are a powerful spiritual power to encourage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rive tirelessly.

**Key words:** CPC; spiritual lineage; core idea

责任编辑:思 齐

#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思考

欧阳奇

**摘要:**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深入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路径,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在一百多年党史发展中,伟大建党精神的谱写和传承,引领各族人民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伟大祖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同。新时代新征程依然要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引领各族人民汇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中,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和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化研究阐释,拓展宣传主体,丰富教育形式。

**关键词:** 伟大建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14-10

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sup>[1]</sup>,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sup>[2]327</sup>,“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sup>[2]327</sup>。显然,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传承红色基因、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也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坚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增进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需要在深化实践路径中更好发挥伟大建党精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作用。

## 一、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影响

“认同”作为名词引入心理学界最初用以表示个体对自我及其与社会和他人关系估量的结果,20世纪进入我国后主要作为动词兼有对内“求同”与对外“识别”之义<sup>[3]</sup>,意蕴着基于个人或群体与社会关系的心理归属、情感寄托、价值趋同、身份依附等,也是衡量共同体建设状况的具体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推进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sup>[4]</sup>。各族人民五个方面认同的深化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在体现,而这五个方面认同的形成与伟大建党精神的铸就及弘扬密不可分。萌发于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伟大

收稿日期:2024-1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024JZDZ028)。

作者简介:欧阳奇,女,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建党精神,在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实践中丰富发展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引领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逐步凝聚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认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铸就了坚如磐石的同胞情谊。

### 1.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自然而然的事实共同体,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以历史、地理、语言和环境等原材料为基础。”<sup>[5]</sup>中华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sup>[6]</sup>社会实体,是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而串联在一起形成的自在的、取得大一统格局的民族实体,而且,“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sup>[6]35-36</sup>。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经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源于中国人民在外敌进犯时生死与共的民族觉悟的萌发,也缘于中国共产党唤醒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系列努力,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发展在此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引领作用。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坚守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才能在历经各种风险考验中铸牢伟大建党精神,而这些努力也向当时的中国人民阐明了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团结的必要以及复兴的路径,激发了各族人民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并肩奋斗的的决心和信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明了消除剥削和压迫才能更好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sup>[7]</sup>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本国实际进一步提出:“解放的精神,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sup>[8]283</sup>“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sup>[8]284</sup>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向各族人民客观描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面貌:“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

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sup>[9]622</sup>中国共产党不仅鼓励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内在压迫,而且明确了携手同心抗击外敌之必要。面对帝国主义加剧侵略、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破坏统一战线、推行“以华制华”、图谋“分而治之”等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各族人民坚定一致对外的决心,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sup>[10]</sup>,指出“为了中华民族,国共两党只应团结,不应分裂,团结越好,中华民族也愈加强盛,反之,分裂则将招致民族的大祸”<sup>[11]</sup>,展现出其坚持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中国人民福祉至上的实践哲学,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团结中发挥了引领和脊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不仅结合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特殊国情,向人民大众指明了要解决旧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能采取“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sup>[12]</sup>,并以血可流、头可断而主义不可抛、理想不能丢的牺牲精神深深影响着各族人民,他们至死不渝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sup>[13]</sup>的坚定信念深深鼓舞着后继者。毛泽东曾感叹:“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sup>[9]703</sup>这一评论道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之于中国的深刻影响,也使我们得以管窥伟大建党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觉醒乃至崛起的巨大意义。

### 2.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便以全新的武器和全新的姿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摆开阵势向着入侵外敌、腐朽制度、落后生产等革命对象展开英勇的进攻。在这一过程中铸就并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在各族人民心中全面树立了正确的党、光荣的党、伟大的党、人民的党等多维政党形象。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本色,因而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在充分结合本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共同体,也有别于西方理论所探讨的想象共同体。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向共产主义的真正共同体建设方向前进,用正确的发展航向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各族人民的正

确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有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品格,因而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价值遵循,面对各种艰难险阻都初衷不改。在实践中兼顾革命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结合,致力于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变革,用改天换地和惊天动地的宏伟发展成就诠释了伟大政党的情怀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因而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自立自强、守正创新,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辉煌成就诠释了光荣政党的魅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因而能自觉从党和国家需要出发,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政党传奇,秉承为了群众、重视群众、服务群众的立场,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来自并代表人民的底蕴和优势。

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年代的坚持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也使各族人民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sup>[14]</sup>,各族人民以参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行动呈现了这种思想上的认同,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如壮族青年韦拔群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在澎湃、陈延年等的影响下决心跟党走。他被中央农民部委派回家乡肩负起广西民族地区农民运动的重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东兰县建立了70多个农民协会,发展了2万多名会员,使农民运动高涨起来,被毛泽东称赞为“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sup>[15]</sup>。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曾同毛泽东、邓中夏等共同起草了《劳动法案大纲》,参与领导了北方区12个省的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翻身而全力奋斗,倾情关爱着工人兄弟们,也被工人兄弟们诚挚热爱着。听闻他在山海关被捕,赶来的工人们“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令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sup>[16]</sup><sup>69</sup>。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亲自到少数民族青年比较集中的蒙藏学校演讲,指出各族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对敌才能推翻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大大提升了乌兰夫、吉雅泰等青年的觉悟,也激励着这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吉雅泰后来回忆说:

“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非常浅显,然而在当时给我们多么大的启发和鼓舞!”<sup>[17]</sup>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染下,不同阶级和阶层人士、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民众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建设的时代洪流中。

### 3.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中华文化的构成,既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滋养,其中也内嵌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力量;伟大建党精神的发展,促进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孕育,成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人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也体现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及影响中。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基础,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中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催生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接续发展和璀璨多彩,从而为中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建设美好中华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柱。

对于任何民族来说,文化都是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诠释着创造理念和奋斗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斗争精神和坚韧意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至德,莫大乎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重民思想和报国志向;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瓦氏夫人抗倭、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动人故事和团结事迹。从具体内涵看,伟大建党精神在对这些文化底蕴的汲取和传承中,增进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认同和弘扬。

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革命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催生了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塞罕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

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探月精神、丝路精神等。这些精神的谱就,守护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重视使命担当、敢于英勇斗争、永葆忠诚本色的精神密码,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发展主体早已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拓展至全国各族人民,弘扬领域早已从党建领域拓展至社会各个层面,秉承范围早已从国内拓展至国外,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贯彻铺垫了有利基础,有效增进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认同。

#### 4.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人民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sup>[18]</sup>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的奋斗中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sup>[19]</sup>。他们在早期的浴血奋战中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迫切任务,并随着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各族人民多元诉求认识的深化中构建起奋斗的清晰蓝图,丰富着既破又立的革命任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秉承中鼓舞着各族人民不断前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强调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sup>[20]</sup><sup>12</sup>。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宣告胜利后的努力方向:“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sup>[21]</sup>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成就,是各族人民共同期盼、为之奋斗的历史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实现飞跃、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中华儿女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地站立起来了,各族人民更幸福地生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中。“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旧社会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新中国的鲜明对

比,彰显着伟大建党精神的伟力,也极大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忱。如来自云南省的国庆观礼团曾将象征封建土司世袭权力的金伞献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借以表达“解放了的西双版纳,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sup>[22]</sup><sup>73</sup>的信念,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滇西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历史见证。海外华侨也因“五千年来的‘睡狮’今天真正翻身了”<sup>[23]</sup>而欢欣,自己今后可以抬起头来,不再被当作“化外之民”而被外国人肆意宰割。从此,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真正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海内外华人华侨也更能以龙的传人自信自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建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实,“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是人类历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因为“民族平等是件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事”<sup>[6]</sup><sup>3</sup>,在感怀民族平等大家庭构建的深远意义之时更能感受到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引领。

#### 5.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保障。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铺垫并推进的进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阔实践支撑并丰富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是以各族人民的认同为桥梁的,也诠释着一个客观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sup>[24]</sup><sup>150</sup>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生成有着宏厚的历史底蕴,也离不开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但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8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但并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其他诸多阶级人士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失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但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中国共产党人在抵制照搬照抄式的教条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探索就说明

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更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同时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成功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诠释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承载的独特实践的依托和政治优势的支撑。如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的写就,映现了共产党人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等必要因素,也根植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上下同心、同舟共济的显著优势。党和人民在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创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迎来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也迎来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与时俱进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各族人民在坚守伟大建党精神中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

## 二、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

共同体意识呈现了共同体成员对于自己身份和归属的清晰认知,从而成为成员自觉参与、深化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动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伟大建党精神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作用,体现在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地弘扬而带来的社会共享性发展让各族人民产生更强的凝聚力,更在于通过带动各族人民全面学习贯彻而更好汇聚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造就的,“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的伟大梦想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sup>[2]233</sup>,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从自觉走向自为。

### 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引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梦想精神

无数革命先烈之所以能展现出“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赤胆忠心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百折不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将照亮人类探索历史规律、探求自身解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并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

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之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法宝。深谙这一重要性的毛泽东曾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sup>[20]51</sup>邓小平在领导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强调:“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sup>[25]</sup>习近平在阐释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时代要求时也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26]</sup>

正是在对真理的坚持、对理想的坚守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找到了以推翻国内外压迫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以实现各族人民大联合来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sup>[24]223</sup>。当前,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有梦、善于追梦的优良传统,激发各族人民深度汇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精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是人民的理论;是为人类求解放而创立的学说,也是在引领人民群众认识并改造世界中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学说。共产主义将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是能满足中华民族实现大同社会夙愿的最有力载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以伟大建党精神汇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精神,就是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持之以恒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稳步朝着共产主义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建设目标迈进。

###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引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向来有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进取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有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sup>[27]</sup>的自觉担当。诚如毛泽东所言:“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

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sup>[28]</sup>如果革命者囿于书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基本要求;如果有志者流于空谈,就无异于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束之高阁。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有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特质,无愧于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光荣身份,因而能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无惧个人生死,勇立时代潮流,敢于冲破束缚,锐意变革进取,带领人民群众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付诸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接续奋斗中,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逐步实现中,丰富并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

以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实践之道引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创造精神,就是要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担当的魄力和开拓创新的能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长期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人展示出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为人类解放、同胞福祉而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为国家强大、社会进步而勇闯新路的求索风采。如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中所蕴含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思维,南泥湾精神中军民协同、战天斗地的生产新模式,“两弹一星”精神中自力更生、勇于攀登的科技新突破,企业家精神中注重创新、善于创业的发展新态势等,无不蕴含着中华民族敢想敢干、善作善为的探索理念。进一步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非凡的创造精神,对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都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引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奋斗精神

任何远大理想要变成美好现实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这一中间环节,要实现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沉沦社会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文明兴盛的现代中国转型更是如此,一百多年间发展奇迹写就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的支撑和传承。回望历史,不能不由衷地感叹“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sup>[29]</sup>,也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带领如此庞大的人口摆脱奴役、剥削、贫困等

沉重苦难,全方位构建公平、友爱、富足的美好社会。“多难兴邦”的历史故事背后是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是各族人民的迎难而上。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中,播撒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征途上,贯穿在“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搏里,还蕴含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执着中。无数革命先烈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也鼓舞着人民群众前赴后继、血战到底。如从1933年2月到1934年9月这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为2414272的中央苏区,有331242人参加红军,占总人数的13.7%,革命烈士有108182人;全县人口约23万的兴国县有约5.5万人参加红军,24%的兴国人参加了红军<sup>[30]</sup>。足见党和人民在革命年代的奋斗之艰、意志之坚、牺牲之大、奉献之巨。

革命先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起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和平和繁荣,各族人民也早已远离了战争年代炮火的硝烟,但是依然需要在全社会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毕竟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远不是“土豆烧牛肉”那般容易到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绝不是靠敲锣打鼓就能轻松实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有直面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挑战的勇往直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有攻克娄山关、腊子口险阻的坚韧不拔;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有“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群策群力;在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的英雄气概;在“人到半山路更险”的境遇中突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定律,需要有防范歇脚停步、自我懈怠的锐意进取;在全球化冲击、社会流动加剧的情况下防范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侵蚀,需要有态度鲜明、毫不含糊的斗争意识,而这些目标的达成,都需要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深度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奋斗精神。

###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引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团结精神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犹如理论之光,是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梦想精神的思想引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强调担当之道,是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精神的价值引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凸显意志之力,是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奋斗精神的实践引领;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则是品格之基,是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精神的方向引领。对党忠诚是大德,也是规范,共产党员对于我们党必须绝对忠诚。“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sup>[31]</sup>;不负人民是公德,也是要求,共产党人应该高尚而博爱,“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sup>[32]</sup>。如为党和人民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萧楚女,曾以蜡烛自喻,努力让有限的人生多发光发热,更好“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孤军奋战心有党、勇于开拓为人民的邓恩铭,深以党员身份为荣,并以战斗到人生最后一刻践行“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sup>[16]</sup><sup>143</sup>的政治誓言。当下学习践行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引领各族群众坚定铁心跟党走信念,坚守倾情为民造福的决心,将对革命英雄为党的事业奋进而百折不挠、为人民利益奋斗而九死不悔的景仰化作在党的领导下同舟共济致力发展的团结精神。

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作为来自人民、根植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它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谋求人民利益而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也是同世界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的梦,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也是到达大同世界的正确航向。因而,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对铸就伟大建党精神的革命英烈的最好缅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梦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的有力展望。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始终坚持以世界胸怀来推进社会进步,始终坚持以团结精神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引的科学理念——“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sup>[33]</sup>，“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sup>[34]</sup>。

### 三、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种引领作用通过多维双向互动而实现。如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建设精神来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使各族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性的认知;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少数民族深化与汉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引领汉族深化与少数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各族群众既主动铸牢自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积极帮助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主动铸牢和被动铸牢的合力。而无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业中要达成哪一种铸牢,都离不开以下路径的助力。

#### 1. 深化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阐释

着重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影响。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需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之上特别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关联,侧重讲透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发展对于民族进步和国家昌盛的举足轻重效应,从而使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并自觉弘扬其核心价值 and 光荣传统。如西方记者斯诺以“大渡河英雄”为题叙述红军长征事迹时特别提及,“桀骜不驯的彝族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人征服过,同化过”<sup>[35]</sup><sup>188</sup>，“汉人军队经过他们境内很少有遭到惨重损失或全面歼灭的”,蒋介石本来指望红军会因此而长期滞留甚或削弱,可结果是“红军不仅迅速地而且安然无事地高高兴兴地过了境。好几百个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一起到大渡河去打共同的敌人。这些彝族人中有一些还一直走到了西北”<sup>[35]</sup><sup>189</sup>。这一生动记述的历史细节形象地展现了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红军将士们具有信念坚定、勇于开拓、不怕艰险、人民至上等精神特质,这一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团结、造福少数民族的价值遵循。要立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结合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来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践行,与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内在关联。

系统阐释各族人民对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发展的支撑作用。伟大建党精神孕育时虽然主要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先驱的精神品质,但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拥护并支持的社会土壤。伟大建党精神的后续发展,有先进党员的模范作用,更有各族人民的积极践行,如苏区精神、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无不呈现着各族人民在其中的奋斗身影。重视阐释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对于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发展的历史贡献,无疑能增进各族人民对于民族平等来之不易、红色政权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直观认识。如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顺利渡过金沙江,与云南多民族船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受当时红军政策的感召和精神的鼓舞,来自金沙江岸的汉族、彝族、傣族、纳西族船工37人,自愿打破“夜不渡皎平”的习俗,用6艘木船以不分昼夜摆渡的方式帮助2万多红军顺利渡江<sup>[22]</sup><sup>15</sup>,书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深度阐释各族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遵循。时代早已变迁,但红色精神永恒,要向各族人民与时俱进地阐明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要求。如从不同领域来看,要有针对性地阐明各族人民怎样在传承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中铸牢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就不同层面来说,要切合当前实际回答各族人民如何更好地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共促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问题。对不同主体而言,要具有区分度地明晰各地区群众如何在学习革命先烈、英雄模范、先锋人物中,将信念力量、担当意识、斗争精神、奉献精神有效转化为实际行动。

## 2. 拓展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主体

发扬党员干部在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领导地位和先锋角色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社会发展;而党员干部同时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学习弘扬的首要对象,他们在工作实际中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全面践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路径。此外,在宣传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工程中,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程领导的直接体现。据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共产党员人数已达到9918.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为759.2万名,占全国党员人数的7.7%。职业涵盖工人、农牧渔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其他职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等,这些党员对于促进各自领域

不同民族成员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自身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在全党全社会更能产生风向标效应,再加上他们有着参与制定党和国家具体方针政策来保障红色文化适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资源和工作便利,其作用不容低估。具有语言优势、场域便利的少数民族干部,对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无可替代。

发掘各地群众在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突出作用。在一个具有14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看到党领导各族人民增强认同之必要,也要看到各地群众发挥主体作用互促铸牢工程之可行。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同国家的共识性任务,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国家形象彰显的基础工程。人们的认同是会动态变动的。新时代我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总体结构为橄榄型,亦即自觉坚定认同社会主义祖国的为相对少数、动摇甚或否定国家认同的是极少数,介于两者之间“对国家认同问题缺乏充分考虑、认识肤浅而具有基本的国家认同”的人们则是绝大多数<sup>[36]</sup>。显然,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大有可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度,人民利益被重视,人民力量被看见,人民贡献鲜活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新时代发展史中,从革命年代“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当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民谣传颂,到战“疫”时刻“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sup>[37]</sup>的迅速集结,无不言说着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发展中的人民底色和人民作用。因而,动员各地群众结合伟大建党精神讲好自己的故事,深化自己的认知,实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隐性身份向显性角色的转化,促进宣传对象向传播主体的转换,不失为广泛增进各族人民认同的基本方式,也不失为深度凝聚不同阶层人士力量的必要方式。

发挥青年学子在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基础作用。青年学子是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也是以后社会的建设者和引领者。青年是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也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力军。新时代我国社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社会人群和代际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有所差异;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及

其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弱化更为明显。”<sup>[38]</sup>青年国家认同的弱化现象,与其成长于和平年代对全国人民生死与共的体会不深、对各族同胞团结奋斗的历史了解相对较浅、受到外来文化思潮冲击更大等多元因素不无关系。青年学子不仅要增进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了解,也完全可以成为以其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力量,在弘扬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中建功立业。20世纪30年代,“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sup>[39]</sup>。可见,伟大建党精神曾经鼓舞着无数青年学子踊跃加入革命队伍,也有待今天的青年群体在加深对它的宣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3. 丰富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形式

重视历史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sup>[40]</sup><sup>39</sup>“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sup>[40]</sup><sup>18</sup>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历史教育为依托,这样才能在古往今来的对比中深化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中华文化的一体性、伟大祖国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的认知,自觉遵循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与历史教育相比,实践教育更具直观性、丰富性、现代性,要重视引领各族人民在实地系统参访中触摸革命先烈的战斗痕迹,在全面感受今日中国的蓬勃发展中追思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在积极投身强国建设实际工作中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兼顾。国之本在家,家是最小国。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也是每位国民学习、工作之余的常态活动场所,注重家庭教育,重视家风建设,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在文化传承、国家认同中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对于以伟大建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不可或缺。而学校教育有着时间更集中、内容更系统、效果更持久等特质,是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要结合学校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契合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一体化的教育原则,在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中做好红色文化素材与凝心聚魂要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学生心中播早、播好、播牢。

深化传统教育与新型教育的协同。依然要重视传统教育方式,在社会层面及时推动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有效转化,加大对红色文化史料的发掘、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构建,综合运用文学、影视、音乐、绘画、展览、纪念、庆典等丰富元素,立体呈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演进、影响等,引领各族人民从中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认同,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育形式的守正创新同样必不可少,如公开表彰是一种极具仪式感和新颖度的教育方式,它能“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sup>[40]</sup><sup>189</sup>;占据好网络教育的新阵地更是迫在眉睫,网络对于便捷各民族之间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正面作用不可低估,同时“也为夸大民族矛盾、歪曲民族关系主流、宣传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点提供了平台”<sup>[41]</sup>,在网民数量已接近1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8.0%的中国,用好微信、微博、短剧、小视频、网页、App等新型传播渠道的教育潜能,无疑能在前沿阵地挤压灰色地带或黑色地带的空间,防范虚无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滋生,更好营造红色文化无处不在的思想环境、革命精神日用而不觉的社会氛围,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方位铸牢也就水到渠成了。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
- [2]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39.
- [4]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5]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0.
-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
- [8]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5.
- [1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75.
-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2.
- [13] 回忆李大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5.
-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

- 民日报,2021-07-02(1).
- [15]李资源.中国近现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245.
- [16]邵维正.谱系之源:伟大建党精神[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24.
- [17]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1919—1949)[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27.
-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1.
- [1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22]张晖.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与边疆少数民族百年故事[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21.
- [23]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529.
- [2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192.
- [2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
- [27]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276.
-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27.
- [2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23.
- [30]王炳林.跨越时空的精神伟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51.
- [3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97.
- [32]蒋巍,博琼扎巴.高于高原的精神坐标[N].人民日报,2024-12-09(18).
-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80.
- [3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 [35]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 [36]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3(9):5-15.
- [37]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4.
- [38]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18(4):132-150.
- [39]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5.
- [4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41]纳日碧力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170.

##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uided by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Ouyang Qi

**Abstract:**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s the source of the CPC and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ain line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Party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deeply inherit the red genes, and it is the rightful duty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ver ethnic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100 years of the Party's history, the writing and inheritance of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has l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form a deep identity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PC, Chinese culture, the great motherland,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we must still adhere to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and better promote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ghest ideal of communism by leading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gather the great dream spirit, great creativity spirit, great struggle spirit, and great unity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ided by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we should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eepen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expand the subject of propaganda, and enrich the forms of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d culture

责任编辑:思 齐

#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

杨玉珍

**摘要:** 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在相当长时期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推动了马克思生产力要素构成与效率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和载体理论的发展。基于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的守正和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与数字经济、数实融合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和机制,大力弘扬科技企业家精神,升级各类科技园、产业园,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优生态。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24-08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融入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并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改革生产关系,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首创的,是基于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和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具有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性质<sup>[1]32</sup>。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刻解

释,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是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经济学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成果。推动新质生产力系统化、学理化发展,需要从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

## 一、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基本要点

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生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新性地提出了全面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是划分经济时代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sup>[1]210</sup>。首先,生产力是社

收稿日期:2024-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融合与新发展格局战略联动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1&ZD084)。

作者简介:杨玉珍,女,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新乡 453007)。

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发展是由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起着决定性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sup>[2]597</sup>其次,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应该把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最后,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们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对人的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会推动生产力发展<sup>[3]223</sup>。

###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辩证统一性

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sup>[1]8</sup>。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方式既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前者称为生产力,后者称为生产关系。马克思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结合生产力进行生产关系的研究,其研究的生产关系均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生产关系。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中分别阐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对应的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在研究逻辑层面,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创造的巨大成绩,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挥过的革命性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4]</sup>正是由于生产力实现了发展,而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两个“决不会”。“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2]592</sup>由此,马克思得出了生产力理论的基本结论,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

### (三) 生产力是具体的、继承性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生产力主要是指“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具体的生产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具体劳动创造的生产力。“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sup>[1]55</sup>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生产力是具体的。如封建社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继承性的生产力指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是既往积累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sup>[5]43</sup>

### (四) 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及生产力的多重决定因素

马克思将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sup>[1]208</sup>,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sup>[1]53</sup>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是指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是指科技进步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状况,本质反映了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过程;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指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以及配置,反映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是指生产资料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以及蕴藏的生产能力,这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自然条件是指一国或地区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此外,马克思提出科学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sup>[6]</sup>

## 二、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的内涵、特征进行

定义,新质生产力对其进行判断和分析,并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完善、创新和发展。

**(一)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根本动力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强调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以及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强调并重视生产力的发展<sup>[7]</sup>。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sup>[8]</sup><sup>373</sup>。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成为判断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标准<sup>[8]</sup><sup>372</sup>。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昭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9]</sup><sup>4</sup>。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sup>[10]</sup>。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sup>[11]</sup>。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健推动力、支撑力<sup>[12]</sup>。我国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是社会进步根本动力这一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具有渐进性和继承性的理论**

马克思深刻论述了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与继承性<sup>[5]</sup><sup>42</sup>,后一个阶段的生产力脱胎于前一个阶段的生产力之中,是对前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否定之否定”,人们必须尊重现有的生产力基础,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开展活动,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意味着每个经济时代的新的生产力都有“新”的时代特征。世界范围内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产生的新的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和飞跃,都是新的生产力、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先进生产力质态,是生产力的新水准、新质态,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因此,新质生产力存在迭代升级问题,新质生产力既有现时代的,还有下一代的(见表1)。

表1 历次产业革命的生产力状况对比

阶段	时期	主要动力	特征	主要产业
第一次产业革命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	蒸汽(机械力)	蒸汽机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纺织业、采矿业、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
第二次产业革命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电力(机械力)	内燃机电气化大规模生产	电力产业、化工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
第三次产业革命	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	网力(信息技术+互联网)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	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产业
第四次产业革命	21世纪初至今	算力(高级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数据与算法驱动的算力革命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产业加速融合

**(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与要素效率理论**

**1.创新发展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新质态**

生产力的质量与构成要素有关,马克思提出劳动过程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sup>[13]</sup><sup>208</sup>。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上表现出先进质态的特点。

首先是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表现为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以及人才成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第一要素。新科技发展不仅会导致简单劳动岗位被替代,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复杂劳动岗位被替代。教育与技术赛跑,需要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力大军。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力大军具有数智化和高素质化特征,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科技知识、劳动技能、数字素养,了解网力、算力,具备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素养,能够运用网力算力赋能劳动手段,具有知识快速迭代的能力,能快速适应数智化机器设备,能够与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人和人机交互型机器人密切、安全协作。与数字化、智能化高度匹配的劳动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

劳动者的定义,形成劳动力的新形态<sup>[14]</sup>。

其次是劳动对象质态的跃升。劳动对象主要涉及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新质”体现在劳动对象高新科技化和虚拟化。既有新材料、新能源等物质态的劳动对象,也有复杂信息、海量数据等非物质态的新的劳动对象。新材料涉及仿生材料、碳纳米材料、光电子材料等,新能源涉及风能、氢能、核能、太阳能等,这些新材料和新能源克服传统能源材料的不可再生性,在实现降碳增效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海量信息和数据突破空间的限制,具有可持续、可重复、可共享使用的特征,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参与生产,经过采集、整理、分析、运用,数据和信息转化为获取收益、提高效益的重要工具。新质生产力突破了劳动对象的物质性,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新型的劳动对象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拓宽产业边界,促进产业多元发展。劳动对象的跃升引发新能源革命,推动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同时,有利于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

最后是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数字化平台、智能化工具将作为劳动资料广泛应用。6G网络、云计算、智能终端、机器人、无人机等新工具将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劳动资料将进一步数智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呈现抽象性、智能性和交互性的特征,克服了机械化生产的重复性和被动性。比如,基于万物互联和万物发声的智能设备将作为劳动资料出现在劳动场景中。

## 2.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要素构成及其配置理论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提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sup>[15]</sup>。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指扣除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数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后的余值,这个余值包含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体制改革等对产出的贡献。在要素数量投入既定的条件下,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商业模式、组织制度创新,智能化程度增加,科技进步等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突破要素供给数量的约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赋予生产力新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取决于“技术”因素,即科技的进步程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即体制、制度、机制的调整能力。按照马克思

的理论,科技进步属于生产力范畴,制度因素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制度创新(生产关系)对技术创新(生产力)形成激励和保障作用,两者共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sup>[1]216</sup>。

## (四)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在生产力中的作用理论

马克思指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sup>[1]325</sup>。一旦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就会转化成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sup>[16]</sup>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sup>[17]</sup>。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需依靠科技创新<sup>[18]</sup>。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关注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要求科技创新的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再到数字经济、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这些是对马克思的科学是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 (五)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生产力理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13]998</sup>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主要集中在过度放牧和开采。工业革命之后,环境遭到化学和诸多不可降解物质的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一度恶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sup>[9]209</sup>。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十多年来,我国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取得了实质

性的效果,用较短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路。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和新能源的关系,提出要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sup>[19]</sup>,要求从新能源以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不同维度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双碳目标。

### (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的理论

马克思着重从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以及构成生产力的要素角度研究生产力发展动力相关问题,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科学总结。2023年9月,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sup>[20]</sup>。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了三点: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三是针对江苏省发展现状,提出要突出重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sup>[21]</sup>。新质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提供根本动力,也是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首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传统产业

意义重大<sup>[22]</sup>。传统产业不等同于低端产业,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而不是停留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产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改造要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其次,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内容,发展新质生产力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处理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创新;围绕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技术进行创新;依靠碳中和技术发展绿色经济类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推动发展与之紧密相关的生物能源产业、生物制造产业、现代农业、环保产业、大健康产业。最后,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围绕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具体包括类脑智能、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氢能与储能、深海空天开发等。新科技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而未来产业形成的必要过程是前沿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发展未来产业的初衷一定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产业在当前可能仍处于萌芽阶段或产业化初期阶段,具有通用技术创新的颠覆性特征、需求的引领与创造性特征、影响的变革性和深远性特征、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广泛涉及人类自身生命健康的生命探寻和维护,时间空间等多空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大数据及海量信息的创造获取和利用等领域(见表2)。

表2 未来产业的主要领域及代表性技术

主要领域	实现目标	代表性技术
自身域:未来健康	延长生命的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	合成生物、脑机接口、再生医学、类脑智能、基因技术等
信息域:未来智能	数字要素利用更高效、信息获取与传播速度更快、虚拟现实体验更丰富	量子计算、量子通信、智能计算、通用AI、6G技术、元宇宙、数字孪生、VR/AR、触觉视觉听觉融合产品等
物质域:未来材料	满足其他产业硬件和基础支撑的新材料的发现、制造和使用	高端膜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第三代半导体材料、3D打印材料等
能量域:未来能源	清洁、高效的新能源的发现、开采和使用	氢能、先进核能、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等
时空域:未来时空	对物理生存空间的利用更广阔、更深远	深海探采、深地探索、空天探索等

## 三、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而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者的相互作用提出,生产关系决定

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sup>[3]4</sup>。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历史能向前发展正是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sup>[2]5</sup>。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关系既可以成为新

技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催生婆”和“加速器”，也可能成为“桎梏”和“抑制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源于关键技术的变革和突破，推动形成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同步形成和快速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sup>[12]</sup>。同时，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024年7月15—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sup>[23]</sup>。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发展与阐释。

### （一）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方面的创新与实践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中国数据资源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22年国内数据产量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的10.5%，具体达8.1ZB，同比增长22.7%。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数据存储量达724.5EB，同比增长21.1%，全球占比达14.4%。《2022—2023全球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指出，算力指数会极大地影响一国的数字经济和GDP的增长，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点，国家的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6‰和1.7‰，直到2026年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IT投入对制造业全球排名前30%的企业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IT每投入1美元，可以拉动45美元的营收额产出，6美元利润产出。而当前我国劳资领域、金融领域、产权制度、财税政策和企业治理模式等诸多具体的生产关系、内在机制和制度模式，主要是适应于传统产业、普通产品、一般性技术和管理等发展的需要。这些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并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甚至对各类新型经济业态、新兴产业生产力、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起到不利影响。这就要求要进一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的改革，围绕可能的堵点卡点打通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优化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顺畅地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sup>[12]</sup>。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发挥生产关系切实有效的激励和引领作用，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

一方面，要建立与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突出表现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要基于数据要素强化市场基

础性制度，建立健全数据要素产权保护制度，加强数据产权保护以及共享经济中数据要素的使用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区域互联互通机制，使得数据能够顺利进入市场，逐步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大市场。完善数据要素价格机制、流通和交易制度。要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展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克服互联网平台垄断，保障信息安全。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利用数字技术高效精准地甄别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真伪，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另一方面，要发挥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相较于传统产业更离不开有为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应发挥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的作用。科技创新活动存在前期投入大、风险不可控、收益滞后等特点，导致普通企业、私营企业难以在新领域、新产业、新战略中主动进行重大技术创新，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政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的关键性技术研发和攻关。政府应发挥多重作用，在国内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及时补位，进行宏观调控，支持资助企业创新，赋予产业创新的活力，推动形成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巩固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在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在“共轭环流”型国际产业链分工结构中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枢纽作用。

### （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方面的创新与实践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设的不仅是科技创新高地、产业创新高地，而且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高地，最终实现创新高地、创业高地、人才高地的融合。

首先，要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和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深化产学研合作，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协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而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应是企业<sup>[20]</sup>。在应用项目攻关上，要把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联系起来，企业产生了需求，就通过“赛马”机制公开招标解决方案，科研院所、高校围绕企业的需求开展研究，企业的问题就是科研院所、高校应用研究的课题。企业应成为科研院所经费的主要来源，对经费管理要突出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由

传统的政府布局变为企业的需求引导布局科研项目,由企业来评判、验收科研成果。要改革科研经费使用制度,由过去侧重于过程审核变为结果、效果审核。要改革用人体制,着力破“四唯”,要看实绩、创新和市场效果。基础研究也要以产业创新为关键核心技术导向。要建立科研创新平台,以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创新要素共享,促进科学、技术与产业有效融合,打通科技创新堵点,连接科技创新的断点,进而联动产业创新。

其次,要弘扬科技企业家精神。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战略基点应放在我国拥有的1.81亿户经营主体上。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企业创新能力决定了创新设计70%的有效发明专利、80%的科研平台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85%的创新研发投入是由企业贡献,这充分说明必须对企业、企业家,尤其是科技型企业给予高度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家是创新的组织者、推动者<sup>[24]</sup>。科技企业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着引领作用,需要特别突出科技企业家的作用,大力发现、培育科技型企业。科技企业家既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具有科学家的科技视野;既是风险投资者,也是技术研发、孵化者,还具有创新思维,能洞察市场需求。同时,科技企业家具有科学家素质,并能够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的先进性及其市场价值,因此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要升级各类科技园、产业园。要实现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协同和转化,缩短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距离,就必须以企业为主导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科技园、产业园作为科技和产业融合的创新高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区域。当前,我国已布局3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分别是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布局了4个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分别是怀柔、张江、合肥、大湾区,这些区域应成为我国培育、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地。与此同时,要在这些区域创新中心、科技中心建设新的科技园、产业园来承载新一代新质生产力。这些新建的科技园、产业园要为各地培植、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抓手。对于已有的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各地要进行园区内涵的迭代升级,其具体做法是腾笼换鸟,把落后的旧质生产力项目和产业转移出去,引入下一代新质生产力项目,做强做大新质生产力项目和产业,推动新兴科技园和产业园发展<sup>[25]</sup>。

最后,要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优生态。一

方面,要完善市场化创新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的融资模式主要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银行以企业经营业绩和资产规模确定贷款的发放规模与形式,导致众多轻资产型优秀创新型企业,因为缺乏有形的高值抵押品而难以获得发展资金。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面向创新和创业,建立制度完善、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以更好地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分散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降低风险资本准入门槛,为市场发现企业的未来价值提供重要平台。另一方面,要进行有组织的产业创新安排。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依靠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攻坚克难,但也不能事事仰仗政府。地方政府应成为科技创新的积极参与者、主动服务者和有效组织者。政府应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科技进步规划;应围绕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重大项目科技攻关,推动企业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进行前沿、原创和应用基础研究;应围绕区域战略需求和现实重大问题建设区域性重点实验室;应围绕教学和科研需求,建设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重点实验室。打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着力把各级各类实验室打造成为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各类实验室的作用。此外,地方政府要以不同的出资方式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通过组建投资公司、直接投资、组建控股类的直投基金、参与高技术风险投资基金以及资产划拨转让等重组方式支持区域内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以上就是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守正和创新。守正体现在对马克思生产力基本特征、基本内涵的遵循和继承;创新体现在对新质生产力要素质态、要素构成、要素效率理论、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力理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以及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等生产动力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上,还体现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创新及实践发展中。这些理论创新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在实践中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2.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6.
-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3.
- [12]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1-5.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18.
- [15]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1-4.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6.
-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旗帜,2024(2):5-6.
- [18]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J].求是,2024(12):4-9.
- [19] 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03-02(1).
- [20]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光明日报,2023-09-10(1).
- [21]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7-08(1).
- [2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
- [2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24] 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J].求是,2014(3):5-7.
- [25] 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经济学动态,2024(1):3-11.

##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to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Yang Yuzhen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vided the basic guidanc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Turning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needs a new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adherence to and innov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nnov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whic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n the composition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vity factors, as well as his theory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carrier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ve platforms and mechanisms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the upgrading of vari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and industrial park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optimal ec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责任编辑:刘 一

## 高质量发展阶段壮大耐心资本的逻辑依据、关键问题与实践进路

刘朝晖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壮大耐心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符合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耐心资本的发展遵循资源配置逻辑、长期投资逻辑、风险平衡逻辑与市场培育逻辑,为相关新质生产力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稳定金融市场、完善市场规则和优化市场环境,进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力。受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的逐利性、风险评估体系的不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健全以及监管制度的滞后性等因素影响,耐心资本的发展面临着短期利益追求与长期投资目标的矛盾、高风险容忍特性与有限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与长期投资决策存在冲突、监管框架与创新投资模式不适应等难题。为此,要秉持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政策引导机制、主体培育机制、市场优化机制和统筹协调机制,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投融资市场,为耐心资本提供公平竞争、稳定可预期的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耐心资本;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长期投资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32-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1]</sup> 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重要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促进创新资本集聚、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新技术从诞生到投入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构建与其发展相匹配的资本市场体系。作为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耐心资本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更重视长期回报,通常不受市场短期波动干扰,是对资本回报有较长期限展望且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资本<sup>[2]</sup>。耐心资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支持原创、引领性科技创新<sup>[3]</sup>,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键要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动力。

从全球实践看,耐心资本主要源于“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包括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保险资本等”<sup>[2]</sup>。与投机资本相比,耐心资本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特征。通常认为,风险投资达到7年以上,直接投资达到10年以上的可视为“耐心资本”<sup>[4]</sup>,但并非所有长期投资资金都是耐心资本。耐心资本的独特属性在于价值投资、战略投资和责任投资,其与创业资本(直接投资)存在极强的关联,能够助力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开展前沿研究,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相关创新项目、前沿技术研发等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壮大耐心资本有助于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更高水平迈进,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收稿日期:2024-08-20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考验的动员机制及历史经验研究”(2021SJZDA003)。

作者简介:刘朝晖,男,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1167)。

##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壮大耐心资本的逻辑依据

耐心资本注重长期价值创造,有助于推动资源向绿色能源、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等领域流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稳定金融市场,完善市场规则,改善市场环境。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耐心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战略引导,以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1. 资源配置逻辑

耐心资本能够识别具有新质生产力潜力的领域和项目,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精准投入其中,避免资源的分散与低效利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以耐心资本助力创新领域拓展。耐心资本偏好流向前沿科技研发、新兴产业发展等具有创新潜力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是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地和汇聚地。耐心资本的注入能够有效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二是以耐心资本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耐心资本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资金支持,促使传统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耐心资本还能够引导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资源共享、技术渗透与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三是以耐心资本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由于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以及预期报酬具有不确定性,创新投资常常是短期的、偏好后端创新环节的投资<sup>[5]</sup>。据调查,我国具有新质生产力性质的科技企业在创新时期(1年内)的存活率为86.3%,在启动时期(2—3年)的存活率为60.5%,由于无法给予直接投融资理想的财务回报,超过一半的创业企业在5年内退出市场<sup>[6]</sup>。而耐心资本能够在科学评估企业的发展潜能和风险状况的基础上,为科技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并给予其战略规划、市场开拓、技术引进、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专业协助,帮助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四是以耐心资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耐心资本能够根据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有针对性地配置到欠发达地区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和产业转移承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广泛空间范围内的布局和

发展。

### 2. 长期投资逻辑

耐心资本以长期视野看待投资项目,陪伴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壮大提供持续的资金与资源支持,助力企业攻克长期发展中的难题,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一是价值创造具有长期性。耐心资本追求长期收益,青睐初创企业、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项目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项目,认可企业在长期运营中通过持续创新、优化管理、拓展市场等手段逐步实现价值的积累和增长。其注重的是投资项目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综合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涵盖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等。二是风险预期具有全面性。考虑到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等各类风险因素,耐心资本通常会从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全面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以便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三是资源配置具有战略性。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往往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行业动态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深入分析,具有战略性的资源配置特点,体现为能够将资金精准地投入到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和企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四是合作关系具有稳定性。在长期投资中,耐心资本与被投资企业是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耐心资本在企业治理、战略规划、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 3. 风险平衡逻辑

耐心资本在追求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高回报的同时,也会以合理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策略以及对投资项目的深入了解和专业判断平衡投资风险,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匹配,保障资本的安全和稳定增殖。一是耐心资本的风险评估具有长期视野。耐心资本关注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宏观经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以长远的视角审视投资项目的潜在风险,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把握风险的本质和演变方向。二是以多元资产配置方式分散风险。耐心资本在投资初创企业时,会通过分散投资、阶段性注资等方式平衡风险,使资金在不同领域、不同市场、不同资产类别之间合理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风险对冲。多元化资产配置为耐心资本提供了更可靠的资产保值和增殖保障方式。三是主动进行风险管理与干预。与被动接受风险不同,耐心资本不仅关注短期的财务回报,更注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

力。耐心资本往往伴随着技术、管理技能和实施能力<sup>[7]</sup>,而这通常依托于那些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判断能力的资本操盘手,能够在风险初现端倪时敏锐地察觉风险,并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专业的风险管理建议,协助建立健全风险控制体系。在必要时,投资人甚至会直接介入企业的决策过程,凭借其专业知识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以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四是注重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构建风险缓冲机制。耐心资本擅于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建立协同合作的关系,如与政府合作争取政策支持,与行业协会共同制定行业标准以规范市场,与被投资企业共同制定风险应对策略等。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智慧,推动跨领域的知识交流与资源共享,以构建风险缓冲机制,形成风险应对合力,提高企业经营方与资方利益共同体的抗风险能力。

#### 4. 市场培育逻辑

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投资,耐心资本能够培育新的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市场空间,推动相关市场规则和标准的建立与完善,促进市场竞争的有序开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是耐心资本以长期价值为导向。耐心资本注重挖掘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和可持续发展价值的项目,通过自身的投资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引领更多资本关注长期价值创造,而非短期的投机收益。二是耐心资本助力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耐心资本往往拥有广泛的投资网络和丰富的行业资源,有利于建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促进产学研合作,搭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为创新项目的孕育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耐心资本提供了高效、精准的算力和算法,增强了耐心资本对企业数据的信息挖掘能力,有助于耐心资本更好地参与企业的创新过程,促进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的繁荣<sup>[8]</sup>。三是耐心资本有利于加强教育宣传引导。要以发布研究报告、组织行业峰会等方式壮大耐心资本,积极传播长期投资、价值创造、风险平衡与生态构建的理念。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能力和投资素养,降低其系统性行为偏差,增强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减少盲目跟风和投机,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群体,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可针对性地提供企业发展规划制定和管理咨询服务,帮助企业理解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增强企业与耐心资本合作的意愿。四是耐心资本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一方面,明晰的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可以提高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

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耐心资本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投资机会和风险,增强其投资信心。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有助于引导资金合理流动,避免短期投机行为的过度泛滥,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长期、可持续的项目中,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壮大耐心资本面临的关键问题

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为耐心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的空间,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然而,如何完善资本产权保护和激励制度,抑制市场的短期逐利倾向?如何规范市场竞争环境,解决长期投资信心不足等难题?如何消除信息不对称,提升投资者的认识和风险承受能力?如何突破现有监管框架,降低投资领域的不确定性,减少投资风险与管理难度?这些都是当前发展耐心资本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 1. 短期利益追求与长期投资目标的矛盾

相比市场中常见的短期逐利资本,耐心资本的特殊性在于长期导向、高风险容忍以及对社会效益的偏好。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的对短期利益的强烈追求与耐心资本所秉持的长期投资目标形成冲突,市场主体受到短期业绩压力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往往难以坚守长期投资策略。在投资心态方面,多数投资者倾向于快速获取回报,难以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缺乏对长期投资的耐心和定力,容易被短期的市场波动和高收益诱惑所左右。在市场压力方面,激烈的竞争和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促使投资者为了尽快展现出色的业绩、满足资金流动的需求或者迎合市场热点,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短期投资项目中,以便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在信息传播方面,市场中短期投资成功的案例和信息往往被过度传播和渲染,营造出一种短期投资更易成功的错觉,而长期投资过程中的波动和风险也容易被放大解读,导致市场对长期投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产生疑虑,进而偏好追逐短期的确定性收益。

### 2. 高风险容忍特性与有限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平衡

耐心资本有对风险高度容忍的特性,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通常是有限的。在风险认知方面,耐心资本通常对市场风险有更为宏观和

长期的认知,而投资者往往以当前的风险状况与经济能力作为投资的判断依据。投资者既可能由于高估自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而盲目进行长期投资,也可能因为过度担忧风险而低估长期投资的潜在回报,导致资本投入不足。在资金期限配置方面,耐心资本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资本市场可能存在资金期限错配问题,如短期资金被用于长期投资项目等。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方面,由于缺乏对行业演变趋势、技术创新突破以及市场周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及精准预判能力,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时,可能会因为对潜在风险的过度担忧以及预期收益的不明确而谨慎投资或提前撤资,使得在长期投资中平衡风险与回报更加困难。此外,尽管理论上存在分散投资、套期保值、风险对冲等多样化的风险管理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受成本、有效性等因素的限制,多种风险管理方法在降低风险、稳定收益方面的预期作用通常难以充分发挥。

### 3. 信息不对称与长期投资决策存在冲突

在长期投资过程中,耐心资本基于市场信息对相关项目进行估值、定价,因此获取准确、全面和及时的信息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耐心资本投资周期长,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这给长期投资决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信息获取方面,由于市场状况瞬息万变以及企业发展不确定性较高,使得投资者难以对相关项目进行深入了解和持续跟踪,容易导致对市场风险的误判。与新质生产力相关联的创新性投资活动大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独特性,难以在市场上找到相同或类似的投资行为进行对比。在信息解读方面,投资者往往对新兴领域的信息敏感度不足,难以快速适应信息的动态变化,存在缺乏跨领域信息整合能力等问题。一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往往遵循“局部数字化—模块数字化—整体数字化”的渐进式路径,这会加大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的评估难度,需要投资者在积累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战略等有更加深入的理解<sup>[9]</sup>。在信息披露方面,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新兴加转轨”的关键时间窗口,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审计监督不到位、市场竞争压力大等原因,企业或项目方受利益驱动可能推迟披露、虚假记载、选择性披露信息,导致投资者接收到的信息不真实、不完整,从而影响了投资决策的正确性<sup>[10]</sup>。在信息更新方面,市场环境和经营状况瞬息万变,及时掌握关键信息是投资方全面评估投资

标的基本面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风险预判、调整投资策略的前提条件。

### 4. 监管框架与创新投资模式不适应

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平衡难题,需要在不断探索中构建既具有灵活性、前瞻性特征,又能维护市场稳定、激励投资者信心的监管框架体系。我国资本市场现有的监管框架主要针对传统的投资模式和市场行为设立,对于耐心资本所涉及的创新投资模式和长期投资策略,可能存在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的情况,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或抑制了耐心资本的发展活力。一是规则监管刻板化。传统监管框架依附于政府行政主导的监管体制,其规则制定往往基于既往的市场经验和投资模式,难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创新投资模式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现行的事前审批与准入的标准难以对新业态的发展起到有效规制作用<sup>[11]</sup>。僵化的“法条主义至上”理念、过于注重法律文字细节的做法,可能限制耐心资本的发展空间。二是原则监管模糊化。原则监管指在复杂多变且充满创新动因的市场环境中,通过制定宽泛的、具有指导性的监管原则,鼓励市场主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自主决策和创新发展。但原则的模糊性和弹性可能导致对其的多重解读,致使监管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影响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同时增加了耐心资本的合规成本和决策风险。三是技术监管滞后化。创新投资模式的构建往往依托于先进的技术手段,涉及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领域,而监管机构在技术认知、监管手段、政策制定等方面往往落后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无法对技术驱动的投资活动进行适时、恰当的规范和引导。

## 三、高质量发展阶段壮大耐心资本的实践进路

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sup>[12]</sup>,推动越来越多的产业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引导耐心资本更多地投向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领域,要进一步明确投资导向、完善激励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sup>[1]</sup>,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撑。

### 1. 强化政策引导,推动长期投入

耐心资本作为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形

式,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倾向性的政策支持,为耐心资本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市场预期,激发投资者进行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和信心。壮大耐心资本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稳定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金融风险、扩大实体经济份额、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进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一是明确政策导向。通过制定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向市场传递鼓励长期投资、发展耐心资本的明确信号。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sup>[1]</sup>,形成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投资文化,避免市场因短期资金的快进快出而陷入非理性波动,进而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抑制过度投机,引导资金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期价值投资,形成稳定的资金流。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防火墙,规范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基于充分准确的信息做出长期投资决策,引导资金流向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领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二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为长期投资的资本提供实际的经济激励,提升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在税收优惠方面,要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或减免股息税,提高长期投资的收益吸引力。对于投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且投资期限较长的资本,可实施税收递延政策。在财政补贴方面,按比例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资的资本进行补贴,同时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在长期投资中表现卓越,为实体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本给予表彰奖励,以此全方位激发长期投资资本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三是加强监管保障。通过多元监管手段和创新监管方案规范市场行为,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sup>[13]</sup>。灵活监管创业资本或处于初始阶段的创新项目,为其发展开拓更多的自由空间。因为规则监管对于新竞争者进入某行业是一种门槛,无形之中阻止了新竞争者的加入,从而对现存企业形成竞争红利。因此,当创新项目或企业进入规模发展阶段,由于规则监管的高成本和复杂性,不管是对公司还是投资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优势<sup>[14]</sup>,要建立明确而清晰的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使相关主体形成合理预期,提高合规水平。要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监管手段,健全实时、动态且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和精准度,为耐心资本的安全运行和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 2. 培育多元主体,增强科创耐心

耐心资本的目标在于长期价值创造,故而能够承受市场短期的波动和不确定性。科技创新往往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才能在长期的研发和实践中迎来突破和成功。同时,科创领域的发展会吸引更多的多元主体参与投资,为其投资带来正向激励。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得多元主体在科创耐心增加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而多元主体对科创领域的持续投入和支持又将推动耐心资本的蓬勃发展。

一是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吸引不同性质、规模和背景的投资主体参与,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丰富资本来源,形成互补优势,“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sup>[1]</sup>,统筹各类资本的投向布局以发展耐心资本。通过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风险共担体系,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促进资本间的协同合作与良性竞争。让各类资本成为“时间的朋友”,为科技创新提供多样的资源支持和投资策略。

二是促进专业能力提升。推动资方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通过参与科研项目的早期规划和过程跟踪,直观了解科技前沿动态和项目潜力,提升资方专业洞察力。鼓励相关投资主体建立内部研究团队,专注于行业技术趋势、市场竞争态势等研究,为投资决策提供坚实的专业依据。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市场需求、投资意向等信息的高效流通与对接。积极引导投资主体广泛汲取先进理念与前沿技术信息,通过加强自身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投资经验积累,提高对科创项目的评估和筛选能力,从而更精准地进行长期投资,增强耐心和信心。

三是完善合作协同机制。推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在部分领域试点以发行债务的形式对冲投资风险,如发行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与可转换债券等,以证券化形式分散企业、保险公司、政府、投资方的金融风险。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定期举办产学研用对接会、项目路演活动等,增进各方相互理解与信任,鼓励技术出资和知识产权出资,完善价值评估与权益保障机制,

促进知识、技术、资金等要素的高效流通与转化。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风险共担,共同应对科创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提升长期投资的成功率和效益。

四是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制定稳定且具前瞻性的产业、财政与金融政策,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同时强化政策连贯性,降低政策变动风险。鼓励多元主体通过耐心资本带动人才、技术等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共同参与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以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优质的创新创业服务以及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sup>[15]</sup>规避短期投机和违规操作行为,建立健全支持长期投资的生态环境。

### 3. 完善市场联动,优化市场结构

耐心资本往往深度嵌入市场体系并积极催化多元价值创造。不同市场之间的联动可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高效流动与配置,推动市场主体不断创新,实现市场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有助于引入更具长期视野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从而稳定市场,形成良好的投资氛围,进一步促进耐心资本的发展。同时,耐心资本的壮大又会推动一级、二级市场的繁荣,完善生态联动,吸引更多优质投资者进入市场,形成一个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

一是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等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功能。放宽外资准入限制,让更多海外的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耐心资本进入国内市场,学习其成熟的长期投资理念。健全场外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更灵活的融资途径。鼓励高净值、超高净值的私人资本汇聚为母基金,再通过不同策略、不同方向、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性子基金流入高科技企业,为科技创新注入充足的耐心资本<sup>[16]</sup>。

二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升对风险的识别能力、预警能力和把控能力。要充分利用量化手段,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将系统性风险分析与投资决策直接关联并贯穿投资的全过程,使风险分析与管理更加精准和及时。积极开发多元化的科技保险产品,强化长久期的保险资金与长周期的科技创新创业的协同匹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动能<sup>[17]</sup>。使耐心资本在承担合理风险的前提下,获得长期稳定且与风险相匹配的收

益,增强其投入的积极性。

三是规范资本行为,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sup>[18]</sup>。通过设置资本“红绿灯”,明确资本的运行边界和规则,规范资本运作,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增强各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吸引更多耐心资本的长期参与。

### 4. 统筹经济发展,助力关键环节

耐心资本通过长期布局、深度赋能、多元协同推动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资本向善。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sup>[19]</sup>,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引导耐心资本投向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在促进实体经济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同时,推动虚拟经济的创新发展,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投资布局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避免外部冲击引致的收益波动风险和投资者利益受损,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关键环节的发展将吸引更多耐心资本投入,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打通“科技—金融—产业”循环,搭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金融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产业的发展又为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落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长期投资行为,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转变为耐心资本,为科技、金融与产业的协同创新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

二是降低交易成本,推进产业协同集聚。在有条件的地区,促进新质生产力在空间上合理集聚,有效实现高端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金融业融合发展,鼓励更多的耐心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为耐心资本提供优质的投资项目。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推广,拓宽产业发展空间,催生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提高产业附加值与盈利能力,增强耐心资本对产业未来收益的预期,促使其持续投入。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树立

投资风向标。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的体制机制,提升政策落地实效。一方面,将相关国资和政府投资基金培育为耐心资本,推动其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sup>[1]</sup>,发挥其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以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入。另一方面,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共同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完善政策保障,给予参与的社会资本一定的政策优惠,提升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和长期投资意愿。

### 5. 加强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

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创设与长期产业规划紧密相连的专项基金,开发基于实体经济稳定现金流的结构化金融产品,提供聚焦于新兴产业成长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套餐等,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并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韧性。

一是聚焦长周期多元投资产品设计,推动金融产品创新。设计具有长期稳定回报预期、风险可控且与实体经济特定领域深度绑定的产品,能够吸引追求长期价值的耐心资本投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出期限较长的产业投资基金,使相关基金的回报与产业的长期成长挂钩,吸引耐心资本长期布局。

二是开拓结构化多元投资路径,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创新分级投资工具与可转换优先股等结构化金融工具,精细优化风险收益配比,精准匹配不同投资需求,拓展资金入市渠道与效能。一方面创新风险管理工具。对于持有长期债券的耐心资本,开发专门针对长期债券投资的利率互换工具,以帮助投资者实现风险转移。另一方面,针对新兴产业和长期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通过区块链技术打造智能债券,利用其不可篡改和分布式记账的特性,增强债券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简化交易流程,提高债券市场的效率 and 安全性。

三是构建全流程专业金融服务体系,驱动金融服务创新。优化金融服务,打造集投资咨询、风险管控、资产托管于一体的金融服务生态,以专业、高效、全流程服务赋能资金运作,降低投资成本并促进资本规模增长。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挖掘客户需求,精准提供个性化投资咨询服务。整合多方资源,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架构,搭建高效的投融资金融服务平台,从而有效链接资金供需双方,打破

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在金融市场中形成强大的服务网络枢纽,以金融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升级助力耐心资本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 结 语

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sup>[15]</sup>当前,我国资本总量不断增长、资本形态日益丰富、资本主体愈发多元,但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资源配置尚不均衡,融资结构不尽合理,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产业的投入不足,无法有效推动技术创新、保障产业安全、提升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在关乎民生福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资本的参与度也有待提高。亟须优化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引导投资机构强化逆周期布局,壮大耐心资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耐心资本提供了明确的战略导向和价值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发展阶段,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保障耐心资本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使耐心资本能够在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产业的迭代升级,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3).
- [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242.
- [3] 王铭磊,张钟文,张振华.大力培育耐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企业高质量发展[J].清华金融评论,2024(4):89-92.
- [4] 林毅夫,王燕.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J].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1):3-15.
- [5] 顾银宽,张红侠.创新驱动、研发投资短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6.
- [6]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N].中国工商报,2013-07-30(4).
- [7] 林毅夫,王燕.以耐心资本作为比较优势审视发展融资[J].金融博览,2018(8):30-32.
- [8] 姜中裕,吴福象.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21-133.
- [9] 丁亚楠,牛彪,王建新.数字化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定价:基于投资者信息解读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4(7):53-65.

- [10] 江兵,彭笑笑.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6(S1):337-344.
- [11] 杜传忠,陈维宣,胡俊.中国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监管思路[J].长白学刊,2018(4):92-98.
-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21.
- [14] 杨松,张永亮.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转换与中国选择[J].法学,2017(8):3-14.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 and 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人民日报,2022-05-01(1).
- [16] 孙刚锋,裘卉青.以母基金管理助力城市产业生态优化的杭州资本实践[J].上海国资,2024(5):89-92.
- [17] 周雷,殷凯丽,车旻昌.保险创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风险特征、实现路径与对策建议[J].西南金融,2024(6):94-106.
- [18]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08.
-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28.

## The Logical Basis, Key Issu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Strengthening Patient Capital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iu Zhaohui*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for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Strengthening patient capital, ser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patient capital follows the logic of resource allocation, long-term investment, risk balance and market cultivation, providing a long-term and stable funding source for releva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jects,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stabilizing financial markets, improving market rules and optimizing market environment, thereby injecting new vitality and providing new impetus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investment entities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imperfect risk assessment system, th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and the lagging regulatory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patient capita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hort-term interest pursuit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goals, the imbalance between high-risk tolerance and limited risk tolera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the unsuitability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innovative investment models. To this end, we must uphold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stablish and improve policy guidance mechanisms, subject cultivation mechanisms, market optimization mechanisms,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arket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ity, provide a fair competition, stable and predictable environment for patient capital,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patient capit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ong-term investment

责任编辑:刘 一

# 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建构及优化策略

崔宁波

**摘要:**“三链协同”是推动粮食产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面对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式发展,传统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难以深入论证其中机制,复杂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精准的分析视角。基于复杂系统视角,实现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必须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进而构建“节点—连边—整体”三维分析框架。对应到实践层面,当前“三链协同”仍存在资源错配现象突出、产业链条韧性不足、系统协作效率较低、内生动力有待激发等关键问题。为确保“三链协同”有序推进,应着重从资源整合逻辑、链条协同逻辑、系统演化逻辑入手,厘清“三链协同”系统的构建思路,在资源整合、激励约束、科技创新、协同治理等方面进行整体优化,以期推动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式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我国由粮食大国向粮食强国的迈进。

**关键词:**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复杂系统;高质量发展;策略优化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40-09

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粮强方能农强,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之举,更是加快建设粮食强国、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支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具体到粮食产业,大产业之“大”就是推动产加销等全环节一体化发展,形成从农田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条,提升全产业链价值,确保粮食稳产保供<sup>[1]</sup>。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流通能力、库存保障能力、市场调控能力显著增强<sup>[2]</sup>。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年我国粮食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但粮食产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全而不深的现象仍旧突出,存在增值增收产品不多、产业链卡阻不畅、区域协同发展不充分、效率效益有待提升等问题<sup>[3-4]</sup>。新时期以“三链协同”为抓手,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强

化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成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与必要前提。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并非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孤立的“自构”或简单加总,而是各链条集合交叉、耦合互动,多方资源整合将粮食产业发展由“链式思维”转向“系统思维”“网络思维”<sup>[5]</sup>。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三链协同”内涵、发展策略等领域的广泛探索。相较之前的“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协同”,“三链协同”概念发生了目标、内容、范围上的变化<sup>[6]</sup>,其核心要义是以产业范围拓展为主要内容,形成粮食新经济、新技术和新的表现形式,以带动产业资源重组分配<sup>[7]</sup>,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农民获得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形成“粮食兴—产业旺—经济强”的良性循环<sup>[8]</sup>。未来,应通过强化耕地等基础资源保障、加快粮食市场化、推动粮食产业链数据融合、应用粮食产业新模式等途径,全面实现粮食产业“三链协同”<sup>[9-10]</sup>。综

收稿日期:2024-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产业‘三链协同’高质量发展效果评估与政策优化研究”(23BJY18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地区粮食生产安全的耕地生态保障与对策研究”(20BJY149)。

作者简介:崔宁波,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上,诸多学者虽已对“三链协同”的必要性、紧迫性形成共识,但对如何系统化构建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进一步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缺乏深入探讨。构建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实现链与链间协同的内在逻辑关系仍不明确,“三链协同”系统的构建逻辑及其优化思路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有鉴于此,本文从复杂系统视角出发,探析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建构的逻辑框架、关键问题与优化策略,以期拓展粮食产业系统的研究范围,为加快粮食强国建设、深入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 一、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理论分析

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各链条协同推进粮食生产、收购、存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多主体、全区域深度融合,“三链协同”推动链间资源配置优化、链条优势互补、系统延伸拓展,最终实现粮食产业全面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 (一)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内涵

粮食产业是一个有机整体,“三链协同”本质上是指粮食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以协同为主线,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以创新、升级、增值为目标,由物质交换、组织合作、利益协同等关系形成的网链结构<sup>[11]</sup>。“三链协同”运行过程中,土地、资本等多种要素在系统中流动,并不断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社会活动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开放性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理论旨在探究系统各组件内部运行机理和彼此之间的协作互动关系,以及复杂系统整体的功能演进,为阐释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内涵及运行机制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精准的分析视角。

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呈现链式网络的结构形态,彼此关联紧密、相互作用。在内部运行中,粮食产业链涵盖粮食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以巩固增强产业发展动力、优化产业结构为主要目标,侧重环节间的高效链接;粮食价值链以增强整体竞争力、提高产业效益为主要目标,从各环节实现的价值创造与提升角度进行讨论;粮食供应链是产业主体整合形成的链式形态,以提高组织合作效率、确保顺畅运转为主要目标,聚焦于主体间的紧密协作与层级有序<sup>[12]</sup>。“三链”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在协同推进中,粮食产业“三链协

同”是在粮食产购储加销五大环节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链式协同发展,推动粮食产业整体转向高级有序方向,进而带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三链协同”是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和形态的统一,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而言,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与侧重点存在差异,“三链协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必要且需不断调整的阶段性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首先,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呈现动态性,产业内部主体为寻求利益最大化,在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过程中牵动了物质、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其次,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呈现开放性,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主体等方面的交换,实现对新技术、新市场、新产品的快速响应。再次,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呈现自组织性,“三链协同”运行是各主体、各环节、各区域基于自身需求目标,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形成的新的产业结构和模式,而非外部强制干预的结果。最后,“三链协同”是一个长期均衡渐变与短期间断突变相结合的非线性过程,具有复杂性特征。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静态结果而言,粮食产业“三链协同”意味着其具备单链发展所不具备的属性和功能,需要基于结果层面讨论“三链协同”的发展逻辑与优化思路。“三链协同”是粮食产业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通过适时调整产业协同发展内容与方式,推动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远景战略。从结果层面来看,粮食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通三大内容没有逻辑上的发展优先序,在某一链条发展的同时,持续涌现新要素、新技术、新主体,各链条、各环节间的协同联动逐渐加强,在自组织内部各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先进的协作模式,从而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带动粮食产业“三链”实现由初步协同到更高级有序协同状态的跃升。

### (二) 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理论框架

复杂系统为阐释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内在机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三链协同”通过整合粮食产业资源、完善粮食产业链条,进而带动系统实现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实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构建“立体式”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本文将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视为各关键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组成的复杂

网络<sup>[13]</sup>,构建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的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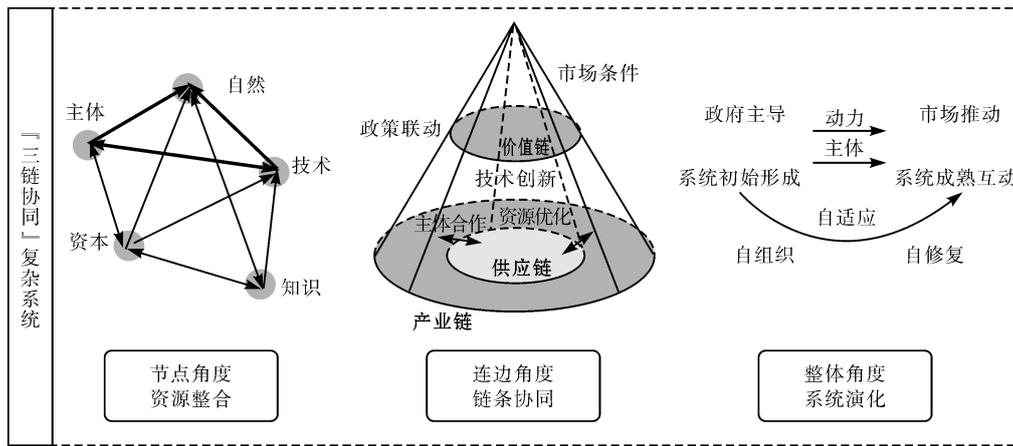


图1 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理论框架

首先,将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主要资源抽象为节点,具体有:第一,自然资源,指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水、气候等资源;第二,主体资源,包括参与粮食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的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以及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技术研发创新机构等;第三,技术资源,主要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包括旧技术与机械的改进,以及新兴技术与新型机械的应用;第四,资本资源,包括用于粮食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设备工具等物质资本,产业主体的经验、能力等人力资本,粮食市场、制度、社会网络等组织资本,以及流入粮食产业中的资金、贷款等金融资本<sup>[14]</sup>;第五,知识资源,指粮食产业发展中涉及的数据库、产权、学习能力等。多资源协同能够增创粮食产业发展优势,促进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的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形成。

其次,将粮食产业“三链协同”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抽象为连边,识别技术、资本、知识等资源的互动关联与流动路径。具体有:第一,资源优化配置,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要素对传统资源进行强渗透,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在不同环节、不同区域间流动并重新配置;第二,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订单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企业间的多方合作、政府部门的协作沟通、产学研深度融合等;第三,技术创新与扩散,伴随“三链协同”新模式的出现,粮食产业新技术通过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示范模仿等方式进行扩散;第四,市场条件推动,粮食市场化加快了资本在不同环节的流动与转化,推动市场供需关系动态变化;第五,政策联动,跨层级、跨区域、跨环节的粮食产业政策协作联动,放大传导效应。这些连边串联起粮食产业链条间的协作体系,不同类型的连边又形成不同协作模式,多链条、多模式的交互协作

推动粮食产业“三链协同”更加多维立体,实现系统化发展。

最后,将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中的所有节点与连边整体抽象为复杂系统。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复杂系统的形成与演化经历了初始形成、快速发展、成熟互动三个时期,是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的连续动态过程,表现为协同主体在内外环境变化下做出适应性决策与行为,以强反馈机制不断调整系统协同方向,改进协同动力,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

## 二、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面临的关键问题

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推动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内部资源的整合、提效,多链的互动、协作,以及系统整体效能的提升。然而,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资源错配、韧性不足、协作效率低、内生动力欠缺等关键问题。

### (一) 资源错配现象突出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资源错配现象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自然资源的空间错配和供需不对称使得本就趋紧的资源环境更加难以满足粮食产业的发展需求。耕地、水等粮食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在长期过度利用下已接近承载极限。以水资源为例,202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平均水资源消耗强度超过5%(见图2)。而粮食生产重心向北方转移使得北方主要产区的资源与环境承受了更大压力,水资源“北少南丰”与粮食生产“北增南减”的错配矛盾更为突出<sup>[15]</sup>。



表 1 2013—2022 年中国三大粮食功能区粮食加工企业数量(单位:家)

区域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主产区	11545	10770	10395	9589	13623	14465	14895	14629	18545	13864
主销区	4014	3149	2946	2932	1932	1888	1894	1834	2458	1947
产销平衡区	5376	4514	4174	3384	2683	2977	3091	2903	3968	2169
合计	20935	18433	17515	15905	18238	19330	19880	19366	24971	17980

数据来源:2019—2023 年《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年鉴》和 2014—2018 年《中国粮食年鉴》。

第三,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发展依靠外力推进,内嵌于固定资产的技术进步,内部科技驱动的动力机制尚不健全。虽然 2023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 63.2%,但粮食科技的前沿性与落地性不足,“三链协同”缺乏科技创新支撑。以粮食减损的技术支撑为例,《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2023》数据显示,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全产业链损失率分别为 26.2%、16.7% 和 18.1%,且收获、储藏、加工和消费环节损失率较高,其中水稻由于过度加工严重,损耗率高达 10.95%<sup>[19]</sup>。而 2020 年大米加工业的平均出米率仅为 64.5%,低于日本等技术发达国家 70% 的平均水平。

#### (四) 内生动力有待激发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演进是基于主体间紧密协作、层级有序的互动关系的动态过程,要求以主体竞合关系的不断调整推动“三链协同”系统开放有序结构的形成并稳定发展。

第一,粮食产业各环节中创新主体的精准性、被认同度较低。粮食产业全链条主体的创新行为多集中于单一环节,生产、加工等环节主体提出跨环节创新的需求能力不足。而科研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扶持,缺乏对实践情况的切身了解,导致粮食科技创新及转化的供需脱节、错位、过剩等问题。

第二,主体间存在无效博弈现象,导致经营主体承担的交易成本增高。就主体而言,与上下游环节的其他主体之间主要以合约、并购等方式进行纵向协同,与同环节主体之间主要通过持股、合作等方式进行横向协同。通过这种协作模式参与到粮食产业“三链协同”过程中,存在较高的门槛和难度。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主体难以将上下游的资源、信息、技术等整合到组织内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第三,在粮食消费市场中,逆向选择现象频繁发生,导致优质产品难以实现其应有的高价值。消费者依赖个人经验做出决策,缺乏科学合理的参照体系来区分产品类型和等级,使得能够生产高质量粮

食产品的优秀企业难以获得市场对其产品价值的充分认可。投资领域亦是如此<sup>[11]</sup>。

第四,在粮食逐渐呈现“金融化”的趋势下,国际粮商在跨国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具有雄厚的资源整合实力,对国内中小型粮食经营企业造成冲击,主体间关于粮食定价权的争夺成为粮食产业发展的重点所在。

### 三、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构建思路

针对当前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依循“节点—连边—系统”复杂系统分析框架,探究“三链协同”构建思路。其中,资源整合逻辑是“三链协同”复杂系统集成的内在动力,链条协同逻辑作为基本要求推动现代化和合理化的粮食产业结构升级,系统演化逻辑旨在实现粮食产业与复杂环境的动态演化,三大逻辑层层递进,不断深入,推动粮食产业创造最大价值。

#### (一) 节点角度:资源整合逻辑

##### 1. 空间资源整合

从空间协同来看,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明显差异。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主产区自然资源丰富,承担着维护全国口粮绝对安全的主体责任,即供应链上的稳产保供,但收、储、加、运、销等流通环节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生产环节,粮食经济发展缓慢。以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为代表的产销平衡区,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多样化种植来维护粮食供求缺口不扩大,但产销平衡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物流体系等各种条件均明显落后于主销区,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发展明显不足。以东部地区为代表的主销区区位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具备“三链协同”发展的优越市场条件。例如,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浙江省稻麦加工能力合计超过 36000 吨/日,已确定各级粮油监测点

300多个,培育“浙江好粮油”产品59个。然而,主销区耕地等粮食生产资源欠缺,近60%的粮食需要主产区供应<sup>[20]</sup>,本地粮食需求缺口较大。

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资源空间错配和供需不对称,使得粮食产业“三链协同”面临区域发展不匹配不平衡的短板难题。基于此,应在空间维度上实现整体系统协同,将主产区的生产优势、产销平衡区的产品多样化优势与主销区的渠道、物流、资金等资源交叉整合,通过空间上的横向协同增强“三链协同”系统的风险抵抗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变革能力,形成物质、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互补、资源互通,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市场响应程度,增强溢出效应,从而实现粮食产业“三链”协同。

## 2. 系统资源协同

“三链协同”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信息、主体等方面的交换。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社等主体间以利益协同为目标,通过物质交换与组织合作,促进“三链协同”系统与环境形成多向流动关系,并提高自然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等要素间的关联度,从而推动粮食产销环节的深度对接与有机组合,实现粮食产品由低端锁定向高端引领转变,助力粮食产业全面提质增效。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其突出的服务带动效应成为实现系统资源协同的主要承担者,涌现出一系列“服务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利益共享、价值共创的协同合作模式,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链长、以新型经营主体为主轴、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格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全国有超过107万个组织开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面积超过19.7亿亩次,服务小农户9100多万户。

### (二) 连边角度: 链条协同逻辑

#### 1. 多链条互动协作

多链条的互动协作关系体现在,粮食产业“三链”是围绕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销售五大环节展开的不同链条式关联关系与分布形态<sup>[21]</sup>。“三链协同”即推动粮食供应链韧性强劲和粮食产业链安全稳定,在保障粮食供需基本平衡的基础上,注重提升粮食产业增值与竞争能力,进而促进粮食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sup>[22]</sup>。其中,供应链是各环节实现价值增值的基础,对产业链具有强链、补链、固链、稳链作用。具体来看,粮食供应链各主体通过寻优决策调整业务关联、技术渗透等关系,以协作效率提升保障产业链整体高效运行,进而以分工优化

和技术创新提升产业一体化程度,通过产业链上增值环节增加和增值能力增强带动价值链发展,实现粮食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综上,将“三链协同”分为横向拓展、纵向延伸、竖向升级三种协作关系。横向拓展是指通过物质、主体、信息等方面的交换与协同提高组织化程度,聚焦粮食供应链的稳产保供问题,以生产效率提高推动产业效能提升。纵向协同是指通过产业链向产后环节延伸,以粮食产业各环节连点成线、由线成网提升产业运作效率,催生高效运作新模式,有效带动粮食产业整体价值增值和系统化发展。竖向升级是指以价值链上的需求为牵引,引导数字技术等现代化要素赋能,提高粮食产业整体增值能力和创新效率,实现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 2. 多模式交叉协作

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发展程度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三链协同”系统进一步建立在多模式交叉协作的基础上。首先,产业链主导模式以粮食产后环节为突破口,经营主体借助产后服务等外部力量,强化资源、技术、资金、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粮食精深加工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并通过集群化发展与优化升级,放大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累积效应,把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其次,价值链引领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引领,通过创新成果转化、生产经营智慧化等方式,提升粮油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加产后环节的附加值。最后,供应链驱动模式通过强化主体专业分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构建高效便捷的粮食供应网络,以生产、流通环节的高效率带动上下游的信息传导、资金循环、产品供需匹配,强化供应链的韧性与灵活性,从而保障粮食供应链体系自主且流畅运行<sup>[23]</sup>。

### (三) 整体角度: 系统演化逻辑

#### 1. 动力转变: 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发展

在以粮食保供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发展阶段,粮食增产主要依赖土地、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尤其是与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呈高度正相关。中国农作物单位面积农药和化肥施用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但有效利用率仅为40%左右,距离发达国家60%—70%的利用率水平还相差甚远<sup>[24]</sup>。同时,为追求种粮收益最大化,部分农户过度施用农药化肥,导致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减

弱、土壤板结、面源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粮食产业发展。2015年《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实施以来,粮食生产方式逐渐向绿色转型。2023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将产业发展重点聚焦于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强调将新要素融入生产函数以实现“质”的提升<sup>[25]</sup>。目前,粮食产业处于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产业技术体系,促进数据等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的优化匹配、协同集成,实现以科技创新发展为核心的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动力转换。

## 2. 主体转变:从小农户为主转向多主体协作促进提质增效

中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是粮食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2004年全面推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将粮食企业推向市场,但小农户的市场对接能力较弱,在成本和收益的双重挤压下,粮食增产不增收问题严重<sup>[26]</sup>,产业发展受限。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始成为小农户与市场对接的重要桥梁。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不是各主体的简单组合,而是累积协作而成的因果关系。其中,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与资金倾斜引导相关项目的投资开发、监督规范市场运作、塑造有利环境,以分层化、专业化的政策体系引导粮食产业系统化发展;企业等粮食市场主体不仅参与粮食收购、订单农业等市场价值创造活动,还通过价格风险控制、信息反馈等方式影响粮食产业链的价值传递和升级;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目标从剩余最大化转向利润最大化,更关注市场变化,引领带动小农户参与粮食产业“三链协同”。此外,科研机构一头与粮食企业联合研发,促进技术与市场的精准对接;另一头与规模生产主体合作,催化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

## 四、复杂系统视角下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优化策略

实现粮食产业“三链协同”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实践层面切实推动粮食产业“三链协同”,需整体推进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物质交换、利益协同、

功能整合发展,全方位制定高效可行的“三链协同”系统优化策略。

### (一) 以资源整合突破低效桎梏

资源整合是释放发展动能、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必须着力打通制约“三链协同”的堵点卡点,创新性配置技术、知识、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使其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一方面,在粮食生产资源整合中,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产销一体化”“收储企业+运输企业+加工企业”等模式,以多环节、多主体协同合作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共同应对市场风险。通过政策性贷款、社会资本投入等多渠道融资,增加资本投入,降低粮食产业整体融资成本,促进资金协调流转。加快粮食产业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为手段,共享种植技术、市场需求、物流运输等数据,提高粮食产业“三链协同”运作效率,有效促进合作创新,优化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资源整合中,全面加强粮食市场预警监测,及时掌握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动态变化,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灵活调节储备粮的投放与回收,减少粮食产品同质性,确保市场有效供给。打造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的立体网络,为粮食调控和流通提供保障。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吸引更具实力的参与者和更雄厚的资金投入到粮食产业。建设专门的粮食产业园区,集中建设粮食加工厂、贸易中心、物流中心,把区域优势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集群。组建专业的行业协会和商会,提供行业准则制定、咨询、调解、监管等服务,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 (二) 以激励约束提升链条韧性

“三链协同”涉及多环节、多主体、多区域,以价值分配产生凝聚力,进而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韧性,是维持系统协作运行的长效保障。价值分配包含激励和约束两方面的重点内容。

一方面,拓宽政策激励空间,激励多主体积极参与“三链协同”,共同分担粮食产业“三链协同”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健全全方位扶持政策体系,特别是确保农户基本收入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减轻农户经济压力的普惠性补贴政策 and 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的深覆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增强粮农抵御突发风险能力和市场应对能力。成立具备决策权和执行权的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机构,整合粮食生产、加工、储存等多环节的协同需求,实现粮食资源在地

区间、环节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跨省运营的大数据平台,整合各地区粮食产量、价格等关键数据,多渠道、多方式、精准化对主产区实行专项资金、专券抵扣、项目投资等补偿。

另一方面,以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约束粮食市场化运作,通过安全监管、质量评定等措施促进粮食市场良性运行,依据市场反馈信息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减少链条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强力主导的自给型粮食供需体系,弱化了市场在品种、品质等方面对供需关系的协调功能,对产业价值的释放造成阻滞。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粮食产业的调控而非主导作用,政策制定必须与市场需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 (三) 以科技创新驱动系统协作

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系统正逐渐由初步探索阶段向成熟互动阶段过渡,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是加速系统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

第一,加大对粮食产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并设立专门的资金支持和项目评审机构,鼓励粮食企业与智库主体开展多方位科技合作,以合作社为载体进行成果试验与推广,加速粮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第二,推动粮食产业科技高效率创新和扩散。降低农业科技创新的参与门槛,制定实施农民创新型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鼓励农民、企业等主体参与其中,着力构建产学研用高效协同的涉农涉粮科技创新体系。聚焦“三链协同”中生物育种、产品溯源等关键环节的现实需求,加大技术装备的创新研发和转化应用力度。通过云平台等线上渠道,加快数据要素对粮食产业的融合与渗透,构建需求主导、政府引导的省、市、县多级协作架构,推动不同地区技术资源的多级共享与均衡化发展。加大农业科技人才和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壮大粮食科技创新及应用推广的人才队伍。

第三,持续推进粮食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等举措支持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加快构建粮食产销一体化的大数据集成平台,聚焦防火墙等先进的基础设施保护措施,推动“三链”主体信息与服务“一网通”,共建共享粮食资讯、智慧物流、数字化服务等公共资源信息平台。

### (四) 以协同治理夯实产业根基

作为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政府、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彼此联系紧密,不断重组和优化组织管理方式,推动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复杂系统结构在维持功能完整的情况下向更高级别演化。

一方面,就新型经营主体的联结而言,通过“龙头企业+第三方物流+中小企业集群”“合作社+企业+现代农业服务业”等组织模式优化主体关系,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协同。其中,合作社与企业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三链协同”发展的关键,合作社通过企业提供的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手段以及农技咨询等服务,更好地协调粮食生产与销售,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效益;企业则以合作社提供的量大、质优粮食增强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就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而言,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商直播等现代化销售模式,鼓励小农户主动参与粮食线上销售等行为,广泛推广“电商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和“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消费者”等订单式直播电商模式。通过对小农户在智能手机、电脑网络等设备上的操作和基本信息化技能方面的培训,提高其对电商直播等方式的认知和实际操作能力,致力于培养既懂生产又懂市场的现代化粮农。同时,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产品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经营模式,促进小农户更好地融入粮食产业“三链协同”,并在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交通与信息条件良好的地区,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影响力的名特优粮食品牌,带动农户收入持续增长。

### 参考文献

- [1]孔祥智.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N].光明日报,2024-03-05(14).
- [2]罗光强.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行为逻辑与行动战略[J].中州学刊,2022(10):34-41.
- [3]程国强,朱满德.新发展阶段我国重要农产品保供稳价的调控思路与机制设计[J].农业经济问题,2022(11):18-24.
- [4]武舜臣,王兴华.推进粮食安全观有效转变:事实、成因和实践路径[J].农村经济,2023(2):33-39.
- [5]陈明星.粮食安全韧性:内在机理、重塑路径与提升策略[J].贵州社会科学,2023(11):120-128.
- [6]刘威,陈佳梦,郑雪丽,等.中国粮食产业“三链协同”的内涵阐释、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粮食科技与经济,2023(1):1-3.
- [7]姜长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J].经济纵横,2018(2):91-98.
- [8]魏后凯,贾小玲.中国粮食主产区萎缩态势及其福利损失[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5):65-79.
- [9]蒋和平,尧珏,蒋黎.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思路与政策建议[J].经济学家,2020(1):110-118.

- [10] 孙远太,王剑菊.数字赋能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生成机制与推进路径[J].中州学刊,2024(8):46-54.
- [11] 任杲,宋迎昌.中国农业全产业链优化的时代价值、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J].青海社会科学,2023(1):79-85.
- [12] 丁存振,徐宣国.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与应对研究[J].经济学家,2022(6):109-118.
- [13] 江成,聂丽君,张嘉诚.复杂系统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特征及内涵分析框架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1-7.
- [14] 高杨,张笑,吴蕾.资源基础、生态环境与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96-103.
- [15] 何可,宋洪远.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内涵、挑战与政策取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5-57.
- [16] 卢凤君,程华.农业产业链价值循环的影响因素及全产业链组织模式[J].学术交流,2022(11):115-126.
- [17] 李琪.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24(3):107-116.
- [18] 戴化勇,陈金波.新形势下粮食产销协作模式与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1(2):135-144.
- [19] 崔宁波,刘紫薇,董晋.智慧农业助力粮食生产减损的内在逻辑与长效机制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23(10):116-128.
- [20] 姚成胜,杨一单,殷伟.三大区域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角色定位与推进路径:基于中国省域口粮自给率差异视角[J].经济学家,2023(6):100-109.
- [21] 黄群慧,倪红福.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水平提升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0(5):11-21.
- [22] 倪国华,苏丹华.双循环战略布局下的粮食贸易新格局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59-171.
- [23] 王宣珂,高海伟.新时代中国式现代粮食供应链构建[J].中国流通经济,2023(7):40-47.
- [24] 张云华,彭超,张琛.氮元素施用与农户粮食生产效率: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4):109-119.
- [25] 范月圆,兰惠,崔宁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OL].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08)[2024-11-30].<https://doi.org/10.13240/j.cnki.cauijss.20241108.001>.
- [26] 司伟,陈哲.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多元目标、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J].中州学刊,2023(10):30-38.

##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Three-chain Synergy” in the Grain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Cui Ningbo

**Abstract:** The “three-chain synergy” is an important lev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ain industry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face of the “three-chain synerg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system theory analysis framework to deeply demonstrate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Complex system theory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analysis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to achieve the “three chain collaboration” of the grain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i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process and result, and then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ode edge whol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re are still key issues in the current “three-chain collaboration”, such as prominent resource mismatch, insufficient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low efficiency of system collaboration, and the need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powe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rderly promotion of the “three-chain synergy”, we should focus on starting from the logic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chain synergy and system evolution,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three-chain synergy”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overall aspect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in the “three-chain synergy” style and accelerate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major grain producing country to a strong grain producing country.

**Key words:** “three-chain synergy” in the grain industry; complex system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ptimization

责任编辑:澍文

# 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问题研究

刘灵辉

**摘要:**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可能面临承包地被收回以及二轮延包资格丧失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收入优渥导致其不再需要土地的保障性功能,且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遭受质疑。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属性和职业属性,且涉及的人员数量较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类人员的土地权益问题,不仅可能形成反向激励,损害其土地合法权益,还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城乡贫富人群之间的错配,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与稳定。故而,首先,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依法依规科学界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其次,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害;再次,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最后,完善土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关键词:**农村出身;体制内工作人员;承包地;二轮延包资格;集体成员资格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49-08

根据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可以将其划分为“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体制内单位是指产权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外单位则指产权属私人或集体所有的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或社会组织等<sup>[1]</sup>。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主要包括:第一,在高校毕业后,通过统一的招录考试、选调、人才引进等途径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农村籍大学生;第二,符合2024年9月1日起施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等相关规定,安排工作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农村籍退役军人。虽然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出生在农村、起初是农民,但如今他们已端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拥有国家财政支付的稳定且优渥的工资收入,并享受养老、医疗、失

业等全面的社会保障。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针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就有几个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第一,这些人员是否还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如果这些人员在二轮承包时分配获得了承包地,那么,他们已分得的承包地是应被收回还是继续保留?第三,随着2027年左右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高峰期临近,这些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第四,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凭借其身份地位以及收入待遇等很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进城,这会使其原所在农户成为进城农户,如何保障由此产生的进城农户的土地合法权益?

由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具有特殊的职业属性和身份特征,并且这些人员人数相对众多,据测算,在2020年,仅农村籍大学生就有564万人进

**收稿日期:** 2024-0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20BGL228);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川撂荒耕地空间格局及分类利用研究”(SCJJ23ND4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技术驱动与治理变革:区块链与农村土地规模化流转的结合创新研究”(2021FRJHZD002)。

**作者简介:**刘灵辉,男,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1731),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00)。

入国家机关等体制内单位工作<sup>[2]</sup>。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指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非常关注进城农户土地权益保护问题。

综合上述因素,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相关土地权益的处置需要更加谨慎,既要避免形成反向激励,出现“通过努力考取公务员或科技人员反而比未考取的社员更容易丧失产权”的不公局面,也要避免出现因收回这部分公职人员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可能造成土地制度不稳定的情况<sup>[3]</sup>。然而,如果不收回这些人员的承包地,甚至继续让这些人员享有二轮延包资格,又难免引发“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继续占有农村土地是现今社会的极大不公”等社会舆论争议,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故而,本文深入探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问题的表现形式,并深挖其背后的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 一、研究进展及限度

在学术界,部分学者意识到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着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存在瑕疵、承包地应收回还是保留以及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学术探讨。

首先,在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可通过村民表决的方式决定。鉴于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故而,在该意见出台后,考取公务员、事业编制或者取得城镇社会保障福利的集体成员,应当继续保留其成员资格<sup>[4]</sup>。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保障利益对于特定的自然人而言不应该重复享有<sup>[5]</sup>。因此,农村集体成员成为国家公务员,就已经成为国家所有制的组成部分,故而,应当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sup>[6]</sup>。同时,在现行法语境下,丧失集体成员资格的缘由之

一便是获得了可替代的生存保障,这部分群体可限制在收入来源于财政供给的国家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等人员<sup>[7]</sup>。

其次,在承包地保留与收回方面,有学者认为,虽然国家公职人员丧失了集体成员身份,但是其承包地的相关权益依法在原则上仍可以由其在本村组的其他家庭成员共享<sup>[3]</sup>。同时,虽然被录用为公务员等在外地工作的人员成为不再具有农业户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但是他们仍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由于法律政策规定在土地承包期内集体经济组织不允许收回相应权利<sup>[8]</sup>。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其他由国家财政负担其基础保障的群体都应当被认定为已经取得了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这将造成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的变更或消亡,致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行为退出<sup>[9]</sup>。故而,农村土地承包主体不含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成员<sup>[10]</sup>。因此,农村出身的公务员等群体,在拥有正规职业一定年限后,就应当无偿退回承包地<sup>[11]</sup>。

最后,在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方面,有学者认为,如果无地农民虽已经转为城镇户口,但未进入国家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那么,在二轮延包时,他们应当享有分地资格<sup>[12]</sup>。与之相对应,如果无地农民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在二轮延包时,即使其没有分到土地也丧失二轮延包资格。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在二轮延包时,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得到确认和价值增强,不能因为进城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户籍变更或者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等因素而失去该权利<sup>[2]</sup>。

综上,学术界意识到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承包地权益维护和二轮延包资格确认等方面会面临着一些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全面且系统的探究和论述,导致现有学术观点呈现零碎、分散的局面。因此,本文聚焦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全面、系统地探究其土地权益问题,并尝试提出破解之道,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 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问题的表现形式

农民凭借集体成员身份享有土地承包权,分得承包地,并在土地承包期内对承包地拥有占有、使

用、收益和部分处置的权利,以及在土地承包到期后享有延包资格,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他们起初凭借集体成员身份享有的土地权益可能面临着难以保障的局面。

### 1. 承包地被收回

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员占有更多的垄断性资源,拥有良好的社会声望,享有相对更高的收入以及工作稳定性<sup>[13]</sup>。因此,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家庭期望的影响<sup>[14]</sup>,在青年农民群体的职业规划中,进入政府、高校、银行等体制内单位工作是最理想的职业<sup>[15]</sup>。故而,在普通农民的观念里,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整体利益考量,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更应该积极利用自己的权力、人脉、信息等各类资源为家乡贡献智力、筹措资源、谋求发展,而不应当基于个人私利在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利益的同时还继续占据农村的土地资源。而且,如果继续保留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土地权益,难免会出现其城市福利与农村户口的隐性福利“两头占”“蚂蟥嘴巴两头吃”的不公平现象。

因此,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往往会自发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抵制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继续占有承包地,且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村庄(社区)内往往人数比例不占优势,那么,在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表决时,很可能会通过不利于保障其土地权益的决议,致使这类人员往往会因自己努力和家庭付出所取得的成就受到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权利方面的“惩罚”<sup>[16]</sup>。

### 2. 二轮延包资格丧失

农户分得承包地的重要途径就是土地发包,而土地发包是集体经济组织依据一定的发包规则和发包程序,将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综合考虑“好坏肥瘦、距离远近”等因素,按照农户内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的人数进行平均分配,以兑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人人有份”的原则。然而,农村土地发包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土地发包的法规政策的结果。同时,中央政府通过法规政策对每轮土地发包的启动节点、程序、承包期等内容都做出了规定。在每轮集体土地发包后,就进入到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为30年。那么,部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由于出生时间错过农村土地发包的时间点或当时放弃了土地承包等缘由,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他们就没有分到承包地。因此,农村出身的体制内

工作人员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就存在分到承包地和没有分到承包地两种情形,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时,他们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没有分得承包地,意味着他们属于无地农民。根据笔者在四川、湖北和重庆三省(市)对48名村庄(社区)干部的外业访谈来看,91.67%的受访村庄(社区)干部,不认同没有分得承包地的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享有二轮延包资格,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已经将户口转出,他们已经不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靠财政供养,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农业收入等。那么,虽然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无地农民,但是其在体制内单位工作后便可能丧失了二轮延包的资格。其次,即使是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分到了承包地,由于上述原因,他们也很可能会丧失二轮延包资格,意味着届时他们就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户内共同共有资格<sup>[17]</sup>,农户内的承包地在二轮延包后就没有其相应的份额了。

## 三、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问题的成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务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可见,国家立法明确保留因求学、务工、经商等进城农民的集体成员资格。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进城行为不是为了传统的求学、务工、经商等,他们的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会有财政支持,且职业稳定性强,这无疑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对其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丧失,也致使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遭受质疑,进而诱发其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

### 1. 收入优渥导致其不再需要土地的保障性功能

从2008—2023年我国城镇就业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2023年仍然保持着5400万人的庞大规模,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的32.99%(见表1)。相较于体制外单位,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是众多求职者梦寐以求的选择,这主要是由于在体制内单位取得编制的员工享有诸多优待,如工作稳定、福

利优厚(如良好的工资待遇、五险一金与年终奖励等)且社会地位高。

从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8—2023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从30278元持续增长至127672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07%;相较于城镇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同一时期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其1.78倍,近年来甚至接近1.9倍(见表1)。因此,农村集体成员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体制内单位并获得正式的编制,其工资收入来源于财政供养,优渥的工作待遇使他们已经获得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sup>[18]</sup>,可以不再依赖土地的基本生存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

表1 2008—2023年我国城镇就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年份	就业人数(万人)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元)		
	国有单位	城镇非私营单位	比值	国有单位	城镇私营单位	比值
2008	6447	12193	52.88%	30278	17071	1.77
2009	6420	12573	51.06%	34130	18199	1.88
2010	6516	13052	49.93%	38359	20759	1.85
2011	6704	14413	46.51%	43483	24556	1.77
2012	6839	15236	44.89%	48357	28752	1.68
2013	6365	18108	35.15%	52657	32706	1.61
2014	6312	18278	34.53%	57296	36390	1.57
2015	6208	18062	34.37%	65296	39589	1.65
2016	6170	17888	34.49%	72538	42833	1.69
2017	6064	17644	34.37%	81114	45761	1.77
2018	5740	17258	33.26%	89474	49575	1.80
2019	5473	17162	31.89%	98899	53604	1.84
2020	5563	17039	32.65%	108132	57727	1.87
2021	5633	17015	33.11%	115583	62884	1.83
2022	5612	16701	33.60%	123623	65237	1.89
2023	5400	16368	32.99%	127672	68340	1.87

数据来源:2009—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

## 2. 集体成员资格遭受质疑

在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在传统上是基于户籍所在地来认定的。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由于遵循单位规定或者为了购房、医疗、子女入学入托等原因,通常会将户口迁到工作单位所在地,这使得他们的集体成员资格经常遭受质疑。在笔者收集到的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湖南、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青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重庆、安徽、山东等21省(区、市)下辖市、县(市、区)、乡(镇)的94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界定的政策文件中,有71份文件直接规定:农村集体成员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成为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等正式在编人员的,自纳入体制内单位之日起,原有的集体成员资格丧失。

同时,2022年2月,农业农村部信访处在答复网民关于“公职人员是否能够确认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问题”这一询问时表示:“通常认为,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保障,并不依赖农村土地生产生活,其不应再享有基于成员身份的特殊保障。”<sup>[19]</sup>。根据2024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已经成为公务员(但是聘任制公务员除外)属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充分条件。虽然该法条并未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或者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工作时其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做出明确规定,然而,有学者认为,为实现社会保障的全面但不重复覆盖,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已经被纳入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障范围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应当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sup>[20]</sup>。

## 四、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权益的政策建议

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土地权益,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妥善应对。首先,遵循精细化治理原则,对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科学界定每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问题;其次,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害;再次,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最后,完善土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 1. 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依法依规科学界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

通过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收集到的福建、广东、广西等21省(区、市)下辖市、县(市、区)、乡(镇)的94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政策文件,涉及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界定存在如下几种特殊情况。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已经成为公务员”成为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法定事由之一,同时规定“但是聘任制

公务员除外”。那么,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或者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工作,其集体成员资格该如何界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第二,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因违法或违纪失去公职,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且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这些人员是否应当予以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退休后将户口迁回原籍,成为农村户口,以养老金等其他稳定性收入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这些回乡退养人员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应当予以确认,也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对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问题,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认定模式,而应依法依规在该群体进行精细分类的基础上予以科学界定。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一条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满足三个要件:①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③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那么,本文认为,农村集体成员成为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除外)后,虽然户籍曾经在集体经济组织,但是他们已经不以本集体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故而,应当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资格。然而,对于如下几种特殊情形应当予以重视。

第一,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等情形时其集体成员资格问题,应该严格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法律并没有要求必须剥夺这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也没有强制要求保留这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这主要是由于聘任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等单位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合同关系,签订的合同一般较短,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例如,聘任制公务员明确了服务期限,在合同期满后,聘任制公务员可能面临重新择业的境地。又如,高校教师普遍实行的“非升即走”聘任模式,使得现今高校教师岗位不仅不是“铁饭碗”,而且因为“内卷”严重而成为工作压力巨大的代名词。同时,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类型多样,收入来源差异巨大。故而,根据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在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

员属于聘任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等情形时,要么直接继续保留这类人员的集体成员资格,要么给各地自主探索留下空间<sup>[21]</sup>,交给地方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来抉择。

第二,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因违法或违纪失去公职且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依靠集体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并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则应依法认定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户籍的要求是“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在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就不应当过分强调这类人员的户籍应该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而且,应当将地方政府发布的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文件中的“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依法修改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避免陷入何谓“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认定困境,同时避免为了制造表象的“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而将户口“非转农”的投机行为,这难免会造成村干部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力交易、“寻租”等腐败行为。

第三,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退休后将户口迁回原籍,此时,他们成为以养老金等稳定性收入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回乡退养人员。由于他们有稳定的养老金等稳定性收入来源,不满足“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这一法律要件,故而,本文认为,不宜认定这类人员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时,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政策文件中,这类人员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是不予保留的。然而,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为吸引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激发回乡退养人员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也可以将其成员资格的界定问题交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表决确定,这在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江西省抚州市莱溪乡、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政策文件中也有所体现。同时,也可以将集体成员分为集体内成员和集体外成员,将回乡退养人员认定为集体外成员<sup>[17]</sup>,让他们基于身份资格参与集体的决策<sup>[22]</sup>,使其作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sup>[23]</sup>,基于回乡退养人员内在的家乡情结重建其与集体经济组织联系的纽带,将其个人的乡村休闲养老生活意愿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紧密

结合起来。

## 2. 保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期内的土地权益不被收回或侵害

第一,农村家庭成员进入体制内工作,是他们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因考取公务员、招聘进入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工作,就收回其承包地,这将导致农民“越勤奋、越努力、越有天赋,越容易失去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的尴尬局面,形成“奖懒罚勤”的不利后果,不符合正向激励的社会原则。尤其是在国家取消大学生包分配政策后,农村籍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以及求职费用等基本上都是家庭自理。即便他们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也只是凭借个人努力及其所接受的良好教育谋求了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而已,这和他们考入大学之前凭借集体成员身份所享有的集体财产权益不应发生关系<sup>[24]</sup>。农村籍退役军人转业安排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是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为国家和人民的国防事业奉献青春和力量所换来的保障待遇,如果既要让农村籍军人保家卫国、奉献青春,又要让他们面临着可能丧失原本依法享有的土地权益,这不仅会寒了农村籍参军人员的心,而且难免会引发舆论争议,甚至会影响到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同时,体制内单位工作并不是世袭罔替,且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改革,很多地区已经逐渐取消编制,强化绩效考核,完善人事退出机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不再是以前的“铁饭碗”,而且也需要依靠职工自己缴纳部分社会保险费用<sup>[25]</sup>。

第二,我国是以农户为单位对农村土地开展发包的,农户内的每个成员都基于其集体成员身份天然地享有承包地的相应权益。因此,如果农户中个别家庭成员成为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仅仅意味着这些个别成员在职业、户籍、收入来源、经常居住地等方面出现了变动,然而,这些个别成员的父母等直系亲属还健在。因此,作为土地承包主体的农户仍然存在,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家庭成员,可以视为“减人”,故而,不能因为个别户内家庭成员成为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就收回其承包地,毕竟农户内还可能因为婚娶、出生、收养等原因出现“增人”的现象。故而,如果遵循“增人无地可分,减人土地被收”的操作逻辑,会导致农户内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家庭成员越多,人地关系越失衡,从而沦为少地农户。与之同时,农户内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的

家庭成员越多,这类农户在求学、工作、购房等方面的投入就越大,承包地对其基本保障功能就越强。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应当保留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的承包地,不应当予以收回。

第三,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原所在农户内剩余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由于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已经将户籍迁往城镇,此时,应该参照“全迁户”(进城农户)的承包地处理方式来处理,而非将这类农户草率地认定为“消亡户”,并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其承包地<sup>[26]</sup>。毕竟在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消亡户”不能仅依据集体户口簿上的成员是否全部死亡来判定,还应当考虑原农户在城镇或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尚有直系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属于原农户的家庭成员,且有可能参与了土地承包并分得了承包地。那么,将这类农户认定为“消亡户”不仅会违背普通农民对“绝户”的传统认知,而且可能违背法律政策的初衷。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提出的“保持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既解决好当前矛盾又为未来留有空间”的原则,应当维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避免造成3000多万进城农户在助力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同时丧失承包地,否则,不仅影响地权稳定性,还可能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也应当保留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原所在农户的承包地,不应当予以收回。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将原所在农户内承包地委托给他人代耕,将土地流转出去以赚取流转收益,也可以选择将承包地交回集体经济组织。

## 3. 妥善认定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

第一,在原则上,如果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被取消集体成员资格,他们就不应被确定为二轮延包的对象。在二轮延包时,应以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原所在农户内剩余的享有集体成员资格的家庭成员作为二轮延包主体,与此同时,只要该农户不论为“消亡户”,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在二轮延包后,该农户内的承包地数量不会因存在着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有所增减。

第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那么,在二轮延包后,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是否还要再列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就成为关注焦点。根据对S省Q县的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X某的访谈资料可知,Q县在征询意见后,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去不去掉在体制内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原所在农户的承包地数量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时,兼顾考虑维护村庄的团结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稳定等因素,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列入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而据X某透露,其得知Q县相邻的T县则选择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删除。本文认为,不应将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删除,因为他们虽然可能不再拥有集体成员资格,但是仍然为法律所规定的“家庭成员”。

第三,在例外情况下,对于少部分因违法犯罪或者工作失误等缘故而丧失体制内工作人员身份的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应谨慎地确定其是否享有二轮延包资格。如果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因违法或违纪失去公职,那么他们已经恢复到普通城镇居民身份,也很可能被单位开除或解聘而处于失业状态,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或者已经被司法机关判刑,而处于牢狱状态,未来能否再找到工作并取得收入都异常困难。故而,承包地对这一群体的基本保障功能开始凸显,如果他们再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直接认定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续享有二轮延包资格;或者至少可以将这一群体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为“需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表决确定”的状态,如果经过村民自治组织认可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他们就应当继续享有二轮延包资格。

#### 4. 完善土地退出机制,鼓励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自愿有序退出承包地

2014年农业部启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改革试点,随后的多项文件均提到“在有条件的地方稳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同时,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与集体成员身份退出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前者是集体成员自愿有偿退出享有的土地权利,而后者是集体成员身份退出,同时,一并连带退出集体成员身份附带的一切权益。然而,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并非都想彻底割裂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他们还有家乡情结,还有回乡养老的诉求,故而,构建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土地退出机制,将他们退出的承包地优先配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无地少地农户,对于消弭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占有承包地所引致的社会非议,优化承包地在不同农户之间的配置,提高无地少地农民的农业收入来源,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等均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为此,应当完善土地退出机制,明确土地退出的前置条件、退出流程、补偿标准等。对于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可以采取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种策略:

第一,在物质激励方面,应根据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退出承包地的数量、质量、种植作物类型以及土地剩余承包年限等因素,合理评估退出承包地的经济价值,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土地退出补偿价格可以参照土地流转价格、土地征收补偿价格来确定,也即,可以参照土地流转价格采取收益还原法来测算土地退出补偿价格,或者参照土地征收补偿价格对其交易情况和交易日期等进行修正后得到土地退出补偿价格<sup>[12]</sup>。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实力较为薄弱,难以承担高昂的退地成本。因此,为鼓励国家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人员将承包地无偿退回给集体经济组织,政府可将其退出承包地每年赚取的种地收益或者年流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一项专项附加扣除,通过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对其退出承包地产生间接激励。

第二,在精神激励方面,对于自愿退出承包地的农村出身的体制内工作人员,在新闻媒体上,可以公开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工作单位内,可以予以公开表彰;在村庄(社区)内部,可以授予他们“荣誉村民”或“土地捐赠大使”等称号并发放荣誉证书<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 夏倩芳,仲野.网络圈子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吗?——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1(11):84-110.
- [2] 洪名勇,陈绍宥.调地抑或调利: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包的效率与公平探究[J].贵州社会科学,2024(6):161-168.
- [3] 杨遂全,耿敬杰.论农村集体成员身份和土地产权相对分离:以成员土地资格权的收回或转让及继承为视角[J].中国土地科学,2022(7):10-18.
- [4] 林广会,邹建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逻辑脉络及其展开[J].学术论坛,2024(3):23-35.
- [5] 韩松.农民集体成员的集体资产股份权[J].法学研究,2022(3):3-20.
- [6] 李玲玲,董千毓.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实践偏差与优

- 化路径[J].农村经济,2024(6):23-35.
- [7]孙凌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路径选择[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2):36-46.
- [8]邢伟.“农村所有权人集体”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20:139.
- [9]李长健,朱公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规范表达与法律构造[J].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5):30-44.
- [10]周星.基于共同富裕逻辑的土地制度改革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3(2):12-21.
- [11]姚志,郑志浩.二轮到期后进城落户农民群体的承包地:延包逻辑与方案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24(1):80-87.
- [12]刘灵辉,张迎新.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84-93.
- [13]刘志国,MA J.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与体制内就业优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4):85-95.
- [14]刘鑫,张玉娟.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的青年发展问题及其治理:基于 C 市 Q 区的调查分析[J].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89-98.
- [15]安永军.土地制度与农民市民化:征收入市和直接入市制度的比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58-66.
- [16]程雪阳.农村女性土地权益保护制度迷宫的破解及其规则再造[J].清华法学,2019(4):26-42.
- [17]刘灵辉,邱晓艳.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21(10):41-48.
- [18]赵元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认定标准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8(10):18-26.
- [19]农业农村部答复:公职人员是否能够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问题[EB/OL].(2021-09-16)[2024-12-09].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536056.
- [20]孙聪聪,耿卓.农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管理的改革困境与立法化解[J].农业经济问题,2023(9):124-134.
- [21]宋志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制度的体系解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6):22-39.
- [22]肖盼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培育“积极成员”的路径探索[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8-128.
- [23]曾祥明,王瑜.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乡贤治村的目标、难点与路径[J].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50-64.
- [24]黄延信.让农民民主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J].农村经营管理,2017(7):24-26.
- [25]吴昭军.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保护: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7 条为解释对象[J].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0(4):25-34.
- [26]刘灵辉.“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规范化处置研究[J].中州学刊,2023(11):41-49.
- [27]刘灵辉,张迎新.共同富裕愿景下农村土地捐赠问题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10-122.

## A Study on th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Institutions

Liu Linghui

**Abstract:**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institutions may face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contracted land being reclaimed and their eligibility for a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being lost.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high income of rural employees within the system, who no longer need the guarantee function of land, and their membership in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s questioned.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 institutions have distinct identities and occupational attributes, and involve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nel. If their land rights cannot be properly handled, it may not only create perverse incentives and damage their legal land entitlements but also lead to a mismatch of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 of land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ich and poor populations, thereby affec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refore, firstly, it is essential to scientifically and legally define the collective membership status of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 institutions based on a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Second, their land rights during the contract period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being reclaimed or infringed upon.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determine whether rural-origin employees in state institutions are eligible for a second round of contract extension. Final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land withdrawal mechanism and encourage rural workers within the system to voluntarily and orderly withdraw from contracted land.

**Key words:** rural origin; state-owned institution employees; contracted land; qualification for the second round of land contract extension; collective membership qualification

责任编辑:澍 文

# 新形势下可持续贸易理论面临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谢孟祥

**摘要:**当前,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居于主流地位的可持续贸易理论存在较大缺陷,它割裂了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忽视“当代人”是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未能反映国际贸易的互惠特性,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将“代际公平”放在比“代内公平”更为优先的地位,建成了一整套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制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需要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互惠理论进一步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形成理论体系融贯、内容公平合理、利益均衡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协调机制,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理论垄断与制度垄断。

**关键词:** 可持续贸易理论;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互惠式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D9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57-08

2022年6月22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条例提案的修正案,针对进入欧盟市场的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实施碳边境调节措施<sup>[1]</sup>,以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环保措施再次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代内不公平”问题成为可持续贸易的热点。在此之前,随着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中“代内不公平”现象的增多,世界各国围绕“可持续贸易”的议题展开探讨,提出并实践可持续贸易理论,如我国针对国内环境、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提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可持续贸易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子问题,本质是如何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可持续贸易)<sup>[2]</sup>。在可持续贸易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博弈”,将会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法制所维护的公平正义之价值<sup>[3]</sup>。然而,南北国家经济水平与环保意识的差异正制约着这一过程,二者愈发激烈的冲突与逆全球化趋势暗示着可持续贸易的理论缺陷正让全球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治理陷入困境。

## 一、新形势下可持续贸易理论面临的问题

可持续贸易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国际贸易与环境中的具体应用,与联合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可持续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强调国际贸易需要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形成伴随着人类对于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其基本内涵经历了由概念到目标、影响因素、制度框架的建构过程<sup>[4]</sup>。解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看到人类解决环境、能源与发展三组矛盾<sup>[5]</sup>的行为准则是坚持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的基本原则,权衡“当代人”的需要与“后代人”的需求。按照该定义,可持续贸易理论分为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要素<sup>[6]</sup>。为了处理这种新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后代人”的概念<sup>[7]</sup>,以保护后代人权利的名义向当代人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维系“代际

收稿日期:2024-09-13

作者简介:谢孟祥,男,法学博士,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法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1464)。

公平”与“代内公平”平衡的基础上保护后代人的“权利”是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应有之义。然而,正是可持续贸易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密切关系,导致可持续贸易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 1. 整体主义视角和个体主义视角的矛盾

首先,可持续贸易理论中“代际公平”与“种际公平”的法理基础存在瑕疵。“代际公平”与“种际公平”是权利主体扩张理论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中的具体应用,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代内公平”,将“代际公平”从“代内公平”中单列出来并赋予其优先于“代内公平”的地位,缺乏法理依据。权利存在的前提是个体主义,其法律构造要求权利主体具有主动性和权利功能具有内向性,从主体主动性与功能内在性的角度审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如环境权不是环境享有的权利而是人类对环境权利<sup>[8]</sup>,将“后代人”与“其他物种”扩张为权利主体超出了权利主体扩展理论的必要限度。具言之,“后代人”与“其他物种”始终是“当代人”想象中的“权利主体”,不具有主动行使权利的能力,需要“当代人”代其主张利益。同时,他们对“当代人”提出的可持续贸易的要求(或“后代人”对“当代人”的权利)不限于“后代人”自身的利益,而是全人类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必备条件,不具有功能的内向性。即如果某一行为以权利主体所在的共同体为最终目的,即使从表面上看是个体行使权利的行为,但其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权利行为了,而是对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行为<sup>[9]</sup>。因此,后代人并非权利扩展的适格主体,其享有的“权利”也不具有功能的内向性。可持续贸易理论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当代人”内部的权属关系——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言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其次,可持续贸易理论以“当代人”为解决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基本单位是不合理的。实际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缔约方”并非整体主义概念,而是将立场迥异的国家、民族视为自愿共担成本和共享收益的整体。具言之,“后代人”和“其他物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争议发生在“当代人”内部,而非“当代人与后代人”或“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部分缔约方以保护“后代人”与“其他物种”的名义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其真实目的是存疑的<sup>[10]</sup>。当环境需求与摆脱贫困的贸易需求产生冲突时,可持续贸易理论张力不足的缺陷将被放大,据此建立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制度会成为滋

生代内不公平的制度根源。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要求缔约方成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该委员会是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组织结构上的区别。委员会具有三项基本职能和三项非基本职能,其中基本职能是统一缔约方SPS协定的理解、促进互认SPS措施、加强信息交流;非基本职能是建设缔约方的技术合作项目、公开争议细节、提供重大环境事项的预磋商平台,强化技术援助、争端解决、沟通交流。委员会对于形成环境治理的共识、分配治理责任具有正面作用,有助于提升合作层次。但我们也要看到委员会存在民主性不足、公平性缺失的风险,预磋商机制可能沦为“绿屋谈判”,成为极少数发达国家以“后代人”名义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法理依据。

### 2. 忽视“当代人”是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可持续贸易理论最初由发达国家提出,缺失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带有不注重代内公平的理论特征<sup>[11]</sup>,存在“种际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失衡的理论缺陷。国际社会关于“各国与各民族的环境分配正义”与“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sup>①</sup>,存在“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何者优先、谁为基础的多种论调。以“整体主义”<sup>[12]</sup>为切入视角的可持续贸易理论将“当代人”视为整体,协调“当代人与自然环境”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忽视当代人是实际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客观事实,违背“代内公平”作为可持续贸易的理论前提。可见,以“代际公平”优先为导向的可持续贸易理论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内不公平”为代价的。为了回应可持续贸易理论的缺陷,学界发展出了诸多概念<sup>②</sup>,在一定程度上可填补可持续贸易理论忽视“代内公平”的理论漏洞,然而,新形成的概念或延续着“代内公平”问题,或不能含摄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包容性发展(增长)”和“绿色发展”即其中两例。

可持续贸易理论忽视“当代人”是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反映在制度建构层面,就是依据可持续贸易理论形成的环境规则呈现代内不公平的现象。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离不开制度保障,制度保障又以相关基础理论明确缔约方权利与义务为前提。可以说,理论决定制度,而制度又影响着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效果。如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资金机制的实施效果不佳,可部分归因于可持续贸易

理论。资金机制是在缔约方之间分配资金募集、资金分配及资金利用权利义务的制度,该制度的高质量实施需要理论明确缔约方(当代人)的权利义务。然而,带有重“代际公平”与“种际公平”特征的可持续贸易理论难以诠释当代人内部的权责关系,造成发达缔约方与发展中缔约方在资金募集、资金分配及资金利用的过程中权责不清,致使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割裂。据估计,全球环境基金募集的资金不及所需的2%<sup>[13]</sup>,这意味着缺少理论的指引,无论是制度建构还是实施都将面临困难。和国际层面的理论、制度缺失相比,缔约方在国内实践中进一步阐释可持续贸易理论,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sup>[14]</sup>,实施效果大不相同。如中国处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时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弥补现有理论的缺陷,建立配套制度<sup>③</sup>,保证绿色转型的同时,也照顾到受损者的利益。从中国与古巴处理不同地区环境与发展矛盾的经验来看,具体制度的构建和高质量实施需要理论内容明确和权利义务分配公平的指引。同理,该结论也适用于国际层面可持续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

### 3. 可持续贸易理论不能反映国际贸易的“互惠”特性

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入,国际社会遇到自然资源快速消耗、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等一系列同环境相关的问题<sup>[15]</sup>,出现了现代贸易理论与可持续贸易理论融合的需求,然而可持续贸易理论却未体现国际贸易“互惠”的特性。“互惠”是国际贸易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贸易理论的重要部分,通常用于描述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状态:对于友善的人,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帮助他们;对于刻薄的人,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去惩罚他们<sup>[16]</sup>。具体到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国际博弈中,“互惠”的主体是参与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国家、民族,内容则指向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互惠”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有利”是“互惠”的物质基础,对于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的参与主体而言,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应当满足参与方的环境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其二,“成本共担”是“互惠”对博弈各方提出的更高要求,即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成本、收益应在缔约方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分配。

然而,在可持续贸易理论指引下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制度却未反映“互惠”的特征,发达国家试图以

保护后代人利益的名义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精炼与常规汽油标准案、美国对某些虾及虾制品的进口限制案和中国原材料案是美国作为申诉方与被申诉方的争议,关于“可用尽自然资源”应如何认定、保护以及利用的问题,美国前后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汽油标准案”中,美国将“可用尽自然资源”解读为涵盖因不合理使用可能消耗殆尽的可更新自然资源<sup>[17]</sup>;“海虾海龟案”中,美方不顾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的意见,也未考虑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筹备大会上对20条(g)项的初衷,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承认“可用尽自然资源”涵盖争议措施指向的生物资源。而在作为申诉方的一系列原材料案中,美方却抛弃了养护可用尽自然资源的立场,连同欧盟、墨西哥指责中国养护可用尽自然资源的措施违反了加入WTO时的承诺,限制中国援引GATT1994第20条(g)项证成争议措施的合理性<sup>[18]</sup>。这些争议表明,保护“后代人”和其他物种正成为少数发达缔约方强迫发展中缔约方承担更多责任的理由,这让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分配逐渐偏离对各方有利的方向。

为此,一些区域性经贸协定(如RCEP和CPTPP)在可持续贸易理论与WTO基础上优化争端解决机制,期望在个案中处理发展中缔约方与发达缔约方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的“代内公平”问题。CPTPP按照分歧程度将争议分为3类,规定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该类争议的时间节点。风险分析条款在GATT/WTO时期屡发争议,修订幅度也较大,故CPTPP规定协定生效两年后缔约方才能将有关风险分析的争议提交争端解决机制。然而,CPTPP从程序层面给予缔约方更多磋商时间的尝试,只能延缓代内不公平产生的争议被提交争端解决机制的时间节点,却不能改变理论层面无法协调缔约方立场差别过大的公平问题。

综上所述,公平分配南北国家权利义务是可持续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目标,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出现上述矛盾和错位问题,来源于可持续贸易理论无法满足在南北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权利义务的需求。其中最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可持续贸易理论的整体主义视角和国际贸易与环境个体主义的矛盾、可持续贸易理论没有正视国际贸易与环境由“当代人”参与的客观事实以及没有反映国际贸易的“互惠”特性。互惠理论以人类互相依赖及合作关系中产生的互惠制度为研究对象,强调在制度的

驱动下可以实现南北国家的正义、公平等互惠关系,因而可以作为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的抓手。

## 二、采用互惠理论优化 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可行性

互惠理论是以人类互相依赖关系和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提供新思路。为证成利用互惠理论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可行性,下文将从互惠理论的基本内涵与理论优势两方面展开。

### 1. 互惠理论的基本内涵

从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角度,中国学者以国内环境问题为导向,聚焦绿色发展理论的诠释和绿色发展治理体系建设,形成了众多有价值的成果<sup>④</sup>。然而,这些成果未能将视野放到国际层面、给予不同族群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责任分配问题足够重视。虽有学者将族群这一变量纳入环境与发展问题,尝试突破现有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却不能改变理论研究重“代际公平”而轻“代内公平”的局限。因此,优化国际贸易与环境理论不能限于国内视角,也不能限于规则的制定、解释及适用层面,而要从规则切入、从 RCEP 和 CPTPP 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务实做法着手,回归价值层面,归纳产生代内不公平现象的理论根源,改变既有的整体主义视角、正视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的主体是利益诉求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的客观事实,形成公平的可持续贸易理论。

互惠理论是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切入点。该理论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将参与博弈的各方描述为具有社会性、个人感情与道德的个体,回应可持续贸易将当代人视为整体概念的问题。以此作为研究人类相互依赖性和合作关系的逻辑起点,剖析个人出于利益以外的东西与地位不同的群体发生不等价的交换行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互惠关系与交易行为归纳为各方地位、各方目的及付出与回报时间存有差异的“交换”行为,又反映了国家贸易与环境实践中南北国家地位、目的的差异。总的来说,该理论有助于解决国际经贸规则中的权利义务失衡问题<sup>[19]</sup>。

### 2. 互惠理论的理论优势

首先,互惠理论可以填补“包容性增长”无法覆盖“当代人”的空白。“包容性增长”注重机会平等,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共享政治与经济权利,避免社会

歧视、制度障碍与权利缺失。这种增长是“对穷人友善的增长”,针对的是收入差距过大等的社会正义问题。“包容性增长”与“代内公平”问题的规制对象有所交叉,但在保障对象与受保护权利等方面却有差异。具言之,“包容性增长”保护“当代人”中的贫困人口,“代内公平”保护所有“当代人”,即不论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发展和文化均有权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的环境<sup>[20]</sup>。“包容性增长”要求分配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时不得歧视“贫困人口”,“代内公平”则禁止依据国籍、种族、性别、发展和文化因素分配环境保护的成果和环境保护的责任。因此,“包容性增长”带有“益贫”的问题导向,未指向全体“当代人”,以“发展包容性”帮助贫困人口的做法并不足以涵摄国际贸易与环境中的“代内公平”问题。互惠理论则以存在交换关系的群体为研究对象,不论双方的地位是否平等、交换关系是否牢固、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制度,均可作为制度分析的范式。

其次,互惠理论可以扭转“绿色贸易”理论忽视“代内公平”的问题。“绿色贸易”理论从“绿色”切入提出了解决方案,通过引入资源承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考因素,诠释“绿色化”与“可持续”,意在实现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资源承载力的增殖,满足全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其中,资源承载力是人类选择发展速度、发展方式的客观因素,如何实现贸易方式“绿色化”和贸易速率“可持续”是绿色贸易面临的理论难题和实现路径,全人类和大自然日趋和谐、资源承载力的增殖是绿色发展的直接目标,不断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是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可以说,绿色贸易与可持续贸易一脉互通<sup>[21]</sup>,属于变革传统贸易方式的产物。但也意味着,可持续贸易理论“代内公平”的缺陷也延续到了“绿色贸易”理论。而互惠理论以互惠双方的地位差异为前提,指出物质利益并非人们追求的唯一结果,人们会且应当在追求非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帮助友善的人抑或惩罚刻薄的人。与强调“种际公平”和“代际公平”优先的观点相比,互惠理论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承认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当代人是利益各异的个体,即立场不同的国家、民族,改变了可持续贸易理论的整体主义视角,有助于增强可持续贸易理论权衡国家、民族间“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关系的作用。从一系列原材料案的实践来看,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亟待互惠理论的优化,这些优化有助于可持续贸易理论改善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抛开中国能否以

一般例外条款豁免实体性问题不谈,争端解决机构以“谨慎的均衡”拒绝中国援引一般例外条款的程序性做法,就暗示着依托可持续贸易理念构建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制度引发了国家、民族间的代内不公平问题。互惠理论考虑国际贸易的“互惠”特征,补足了现有理论“代内公平”的短板,也对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缔约方间因追求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或环境保护而发生的冲突,应以国际与国内双重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尊重其他缔约方经济发展或环境保护需求,不得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或环境保护需求,迫使其他缔约方不合理地改变经贸政策或环境政策。

最后,互惠理论可以回应“可持续贸易理论”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失衡的理论缺陷。互惠制度化是维系国际贸易与环境正常关系的有效途径,保证南北国家的互惠有助于维系稳定而公平的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按照魏伊丝教授“委托—受益”的后代人理论,各代人是“委托—受益”关系。如果受托人无法生存,受益人的利益自无法保证。因此,指引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的理论不应期待“当代人”放弃生存机会,使互惠关系走向当代人向后代人的单方施惠,这种关系显然是不理性且不稳定的。

### 三、互惠理论对可持续贸易理论的优化

#### 1. 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

可持续贸易理论存在上述缺陷,理论优化需围绕“当代人与后代人”和“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展开,即当代优先、参与者优先与互惠优先。

首先,改变整体主义视角,以“当代人”的内部公平为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处理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要回归自然界在人与人交往中的地位问题,即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其他物种与后代人的利益能否限制或禁止国际贸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当限制或禁止到何种程度。笔者认为,后代人权利具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当代人作为整体,应对后代人负责;后代人也需要容忍当代人的发展需求。而当视角回归当代人内部,则需聚焦如何在当代人内部公平分配权利义务的问題。环境问题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分离性,它们并非同等影响每一个人,正如发达国家过去的排放影响当代每一个国家。可以说,并非环境问题导致社会正义问题,而是社会正义问题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发展提供土壤,人类在与臭氧层耗尽、全球变暖以及

其他全球难题斗争时应优先解决社会正义缺失的问题。因此,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当代人内部的公平的问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参与方需要为利用自然资源公平地付费,而不是发达缔约方向发展中缔约方单向征收碳排放税或限制该缔约方货物的准入。

其次,从权利主体扩张趋势来看,不宜否认“后代人”的利益,也不能忽视“当代人”是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主要参与者的客观事实。检视 GATT/WTO 的争议案件,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实践中存在为保护后代人利益而妨害发展中国家行使发展权的情况,保护“后代人”和其他物种正成为发达国家与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NGO)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公正责任的法理依据。如“法庭之友”程序是争端解决机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抓手,借助其专业知识,有助于弄清国际贸易与环境争议的环境机理、行为事理与环境法理,准确适用规则<sup>[22]</sup>,对于平衡缔约方的环境需求与发展需求有重大意义<sup>[23]</sup>。然而,部分缔约方和 NGO 却打着保护后代人与其他物种的旗号,打击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者。因此,优化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需要坚持“当代人”是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主要参与者的事实基础,在不妨害当代人发展权的基础上保护后代人的利益。

最后,分配国际贸易与环境活动中权利义务时应秉承“互惠”优先原则。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的立法旨意是为了维系国际贸易正常秩序,防止缔约方以保护境内人、动物和植物采取不正当的贸易限制措施,因而在目的与手段上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目的不能是为了武断地歧视或变相限制某些缔约方,手段是为了保护人类、可用尽自然资源所必需或关联的,这些规则构成国际贸易与环境的一般禁止性规定。然而,在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或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一般禁止性规定正逐步演化为“潜在授权性措施”,从“一般禁止性规定”到“潜在授权性措施”的应激突变,显然意味着缔约方有更大的空间实施不互惠的国际贸易与环境行动。因此,优化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需要秉承“互惠”思维,保证缔约方维系国际贸易正常秩序,并在保护境内人、动物和植物行动中让各方平等获益。

#### 2. 优化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原则内容

利用“互惠性可持续贸易”处理当代人内部的权责关系,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借助

“互惠性可持续贸易”协调缔约方国民生存权、发展权及环境权之间的矛盾,需正视发展中缔约方、最不发达缔约方的发展问题,区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将相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机地融入可持续贸易。同发达国家相比,少数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处在温饱线以下。对于这些国家的国民而言,环境保护的价值低于发展的价值,要求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同等责任本质上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对于缔约方,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矛盾要避免“赢者通吃”,坚持“互惠共赢”的理念处理冲突,贯彻“相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也要防止缔约方滥用“相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首先,“互惠性可持续贸易”以“互惠”为国际贸易与环境交往的基础,应尊重国家的主权原则。主权原则表现为缔约方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环境事务管理权的尊重。尊重主权原则是“互惠”的最低水平,也是缔约方保护环境、养护自然资源、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提,不应被多边经贸协定限制,更不应被多边经贸协定剥夺。

其次,“互惠性可持续贸易”是新发展理念置于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理论延伸,应体现“共建共治共享”原则。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内政和外交工作的基本遵循。当前,这一理念已成为有效解决全球发展困境、安全困境和文明冲突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观。实现区域内共同繁荣、开放包容,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惠及欠发达国家、贫困人口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成为“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的应有之义。缔约方行使“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开发利用权”和“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安全与环境事务的管理权”,应秉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减小环境保护措施对缔约方的利益减损。

最后,“互惠性可持续贸易”在“当代人”内部分配发展权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应遵循比例原则,在满足缔约方环境或贸易的需求时,应减小对于缔约方对冲利益的减损。笔者认为,比例原则在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中表现为关联性原则和最小损害原则。缔约方行使“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开发利用

权”和“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安全与环境事务的管理权”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管辖事项同缔约方有最低程度的联系。管辖事项同缔约方的关联性是判断该缔约方是否为管辖该事项适格主体的考察因素,也是判断缔约方是否遵循比例原则的门槛。如果缔约方试图管辖与本国无实质关联的事项,该缔约方并非适格的管辖主体,更谈不上规制手段符合比例原则。二是不得对其他缔约方合法权益造成不符合比例的损害。泰国政府根据烟草法案对外国产香烟和烟草原料实施进口禁令,虽然公民的身体健康与香烟具有较强的联系,但从禁令对缔约方对冲利益减损的程度审视争议措施,进口禁令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

#### 四、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的实现路径

根据“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念检视 RCEP 和 CPTPP 在“绿色”与“互惠”关系中的得失,既可验证“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平衡“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关系的效果,也可为 RCEP 高质量实施和后续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提出更为明确的指引。

##### 1. 增加互惠原则,规范术语解释适用

检视国际经贸争端,可以发现部分国家未采用互惠的术语解释方法或未选择更为互惠的解释结论。如美方在“海虾海龟案”中为满足国内渔业协会的需求,将立法原意保护矿物资源的“可用自然资源”延展至“可更新资源”,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渔民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加入互惠原则,以此统摄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的适用,规范“术语”释义与“术语”冲突的解决方式,对冲“可持续贸易”原则引发的术语适用纠纷。具言之,术语具有清晰的内涵与外延,是解决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和正确适用规则的前提。CPTPP 在每一章列出“专有名词”,并特定化其含义。而 RCEP 使用了“主管机关”“紧急措施”“风险分析”“进口检查”“风险管理”等多种术语,却未设置相应的定义条款,在国际贸易与环境的实践中容易造成术语含义不确定的问题,增加推进 RCEP 等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高质量实施的难度。因此,中国需要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廓清相关术语,规定术语释义冲突的解决方式。

##### 2. 明确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经贸协定的关系

“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指出发生在地位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非等价互惠关系所以稳固,在于互

惠双方多领域的“交换”重复进行<sup>[16]</sup>。日本热衷于“海洋法治”，但其强行启动明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废公约》的排海行为，客观原因就在于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经贸协定对违约方的失信惩戒是孤立的。因此，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亟须以“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念延展缔约各方“交换”的范围，明确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经贸协定的关系，倒逼缔约方在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中守信重诺。多边环境协定规制的全球环境问题，既是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也是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sup>[24]</sup>，二者的规制对象存在交叉，将多边环境协定的相关内容体系性植入多边经贸协定，作为缔约各方实施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则的依据，延展了缔约各方在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经贸协定项下的“交换”范围，有助于倒逼缔约方善意履行国际承诺。

### 3. 加强组织保障

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指出通过弥补南北国家竞争起点，有助于实现地位不平等的缔约各方国家间的正义。鉴于南北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与环境实践的能力与地位存在差异，中国在 RCEP 高质量实施和后续经贸规则的建构时应成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扩大委员会的权限，发挥其环境合作、绿色技术转让、规则解释、争议调解的作用。同时，委员会还可承担预磋商区域内国际贸易与环境重大事项的职责，定期召开会议，保障缔约各方的有效参与。缔约方在国际贸易与环境方面的重大举措，在不违背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实施前应在委员会的主导下开展预磋商，但应注意预磋商程序民主性与决策效率性的平衡，预防其演化为新形式的“绿屋谈判”<sup>[25]</sup>。决策原则上赋予缔约方平等的表决权，考虑“协商一致”对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决策的负面效果，对于超出“临界数量”的事项，可以采用权重投票补充一国一票的表决规则。

### 4. 采取“一般性规定+附件”方式兼顾规则的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从多哈回合谈判历程来看，非农产品谈判进程难以推进的原因是各方关切的货物种类不同<sup>[26]</sup>，换言之，缔约各方对不同类别货物的诉求不同，这就决定了笼统规定无法全面地反映缔约各方的诉求，无法让国际贸易带来的发展成果惠及缔约各方。检视 2020—2024 年中国同 RCEP 缔约方的进出口货物类别，可以发现这些产品类别具有高度稳定性。选出缔约方共同关切的货物，依照产品的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授权缔约方实施与环境风险、健康风险

相匹配的标准、SPS 措施、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这样更能反映中国与 RCEP 缔约方的福祉。例如药品、医疗设备和化妆品，由于三者环境、健康风险的差异，CPTPP 授权缔约方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亦有不同。这种规定方式既选取缔约方共同关切的货物，精准地确定进口缔约方可实施的单边环境措施的种类与程度，比笼统规定更具操作性和灵活性，同时又能够在不妨害本国居民健康的前提下弥补发展中国家竞争起点的劣势，具有“互惠”潜力。因此，中国可以选择自己与 RCEP 缔约方共同关切的产品类别，采取“一般性规定+附件”方式对缔约方一般授权，并根据缔约方近期的环境表现，评估缔约方行为对该方出口产品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的影响，调整进口缔约方的一般授权。

### 5. 提高争端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能力

互惠性可持续贸易理论指出保障“当代人”的合法权益是可持续贸易的前提，中国提升争端解决机制化解纠纷能力应当平衡“当代人”内部的权益。“当代人”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缔约方共同追求的价值，二者的冲突属于正当价值的冲突。平衡“当代人”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一方面可以有限度地引入“法庭之友”程序<sup>[27]</sup>，平等地允许环境 NGO 和发展 NGO 参与<sup>[22]</sup>，这样既可以为争端解决机构提供相关知识，又可以作为第三方监督争端解决流程，提升争端解决的透明度与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将联合技术磋商定位为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程序，衔接联合技术磋商与争端解决机制，推迟争端解决机制介入贸易争议的时间节点，给予缔约方非正式解决纠纷的空间，并以争端解决机制倒逼缔约方的绿色技术合作。这样既可以减少缔约方之间的直接对抗，又能深化缔约方之间的技术合作，弥补南北国家竞争起点的差异。

### 注释

①参看 Low N, Gleeson B: *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 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Routledge, 1998, p.2. ②具体可参看范永忠、范龙昌:《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理论与改革》2010 年第 6 期;张玲、付强、周兴维:《走向“中国道路”的“包容性增长”——兼谈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扩大的几个相关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7 期;周小亮:《重大利益协调视角下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 期;陈义国、陈雨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③具体可参看魏吉华、蒋金法:《绿色财政支出:理论与实践》,《当代财经》2018 年第 12 期;张铁亮、周其文、郑顺安:《农业补贴与农业生态补偿浅析——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

《生态经济》2012年第12期;周颖、梅旭荣、杨鹏等:《绿色发展背景下农业生态补偿理论内涵与定价机制》,《中国农业科学》2021年第20期。④具体可参看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期;刘德海:《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与价值取向》,《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任保平、张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绿色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2期;唐啸、胡鞍钢:《绿色发展与“十三五”规划》,《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张金伟、吴琼:《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实现路径及重大意义》,《生态经济》2017年第2期;李福夺、杨鹏、尹昌斌:《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与研究展望》,《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年第10期;杨阳、李燕:《从中国看世界:全球绿色发展研究40年之回溯与展望》,《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5期。

#### 参考文献

- [1]王谋,吉治璇,康文梅,等.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点、影响及应对[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12):45-52.
- [2]孙瑾,丁冉,王杰镭.关于可持续贸易的研究进展[J].经济动态,2020(8):131-145.
- [3]李雪平.国际贸易法制的变迁原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J].法学评论,2021(2):155-166.
- [4]吕忠梅.发现环境法典的逻辑主线:可持续贸易[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1):2-15.
- [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 [6]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贸易原则[J].法学评论,1998(3):73-78.
- [7]刘卫先.后代人权利理论批判[J].法学研究,2010(6):94-113.
- [8]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J].法学杂志,2018(1):23-40.
- [9]那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55.
- [10]赵维田.美国:对某些虾及虾制品的进口限制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8.
- [11]徐嵩龄.环境伦理学研究论纲[J].学术研究,1999(4):22-28.
- [12]刘凤义.论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与唯物辩证法[J].社会科学家,2010(1):57-61.
- [13]谷德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资金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19.
- [14]杨晶.古巴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8-100.
- [15]曾凡银.贸易理论与可持续贸易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3-16.
- [16]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250.
- [17]张乃根.美国:精炼与常规汽油标准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7.
- [18]朱榄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2010—2012[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1-66.
- [19]刘志云.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原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84.
- [20]陈泉生.环境时代宪法对环境资源公平享用的确认[J].现代法学,2004(6):133-139.
- [21]黄志斌,姚灿,王新.绿色发展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8):108-113.
- [22]刘昌明,段艳文.论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NGO)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J].东南亚纵横,2011(9):53-58.
- [23]黄承伟,刘欣.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5(1):157-162.
- [24]潘寅茹.福岛核废水24日起排海 海洋渔业最先受创[N].第一财经日报,2023-08-23(A01).
- [25]刘敬东.WTO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2.
- [26]张磊,王茜.多哈回合谈判的最新进展2010年度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1-64.
- [27]曾炜.论“法庭之友”在WTO争端解决中的发展[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10-116.

## The Dilemmas Faced by Sustainable Trade Theory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Strategies

Xie Mengxia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ustainable trade theory that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ccupies a mainstream position has prominent flaws. It sepa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l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 ignores that “contemporary people”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and fails to reflect the recipro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is given priority over “intragenerational fairness”, and a complete se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needs to work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urther optimize sustainable trade theory through the theory of reciprocity, and form 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at is integrated in theoretical system, fair and reasonable in content, and balanced in interests, breaking the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monopol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Key words:** sustainable trade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intra-generational fairness; recipr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一鸣

#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生成逻辑及行动框架

张世贵

**摘要:**自1949年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在发展阶段上大致经历了从“分离”“统筹”到“融合”的赓续发展过程,其根本目标始终指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耦合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从价值意蕴看,理念上的承行与发展、主体与内涵上的价值同序以及统筹与共享的共同体行动,构成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耦合的核心要义;从生成逻辑看,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耦合于历史演进、理论含义与实践要求的三个基本维度且具有逻辑与现实自洽性。在此基础上,搭建“主体—空间—方向—机制”融合的城乡发展与统筹富裕行动框架,从加快构筑城乡共富社会网络、创新城乡共富应用场景以及引领城乡共富发展方向等一体化实践探索着手,充分释放驱动城乡共富发展的新动能。

**关键词:**城乡融合;共同富裕;耦合;行动框架

**中图分类号:** 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65-0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sup>[1]</sup>。在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的重要难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sup>[2]</sup>。从新型城乡关系再定位出发,城乡全面融合的新时代城乡关系被系统地定义与重塑。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一种集中表达,共同富裕则是对西方世界“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资本主义发展定律的深刻扬弃与历史性超越<sup>[3]</sup>。囿于自身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等先天发展因素的制约,乡村社会若仅凭自有资源的内部循环将难以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促进乡村迭代发展的新动能,并

在目标和价值层面与共同富裕形成理论上的共生与实践中的同构,二者从而耦合为一个互融互促的新质态发展系统。

## 一、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耦合的价值意蕴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共同富裕过程中“城兴乡衰”、城乡失衡等结构性问题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它既现实地表现为数字中国战略下的城乡共同富裕实践,也历史性地呈现为共富价值共识的理念赓续。

(一)承行与发展: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理念赓续

### 1.共同富裕价值共识的承行

共同富裕是“中国之治”矢志不渝的一种社会

收稿日期:2024-10-26

基金项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专项“关于在缩小城乡差距中促进共同富裕研究”(2023ZDZX060)。

作者简介:张世贵,男,法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89),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北京100089)。

价值追求,是全面小康在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的战略升级。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中华民族历史上圣哲先贤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sup>[4]</sup>,其主张民本、和平等大同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建设提供着丰厚的文化滋养<sup>[5]</sup>。其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的社会改革实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梯次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共同富裕建设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和初心使命。其二,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在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牵引下,农业补贴政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和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合力应对“三农”问题的举措陆续出台并有效落地。其三,在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得到了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的进一步体认<sup>[6]</sup>,城乡作为互融共生的有机整体理念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并被不断强化,“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重塑业已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系统性社会工程之一。

## 2. 数字赋能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数字要素赋能城乡融合发展,并正在以新质的组态和创新的方式加速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可以说,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是城乡发展的样态跃升,也是数字赋能城乡发展的主要目标<sup>[7]</sup>。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城乡资源和要素融合。数字要素以其高效性和包容性打开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引擎。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基础上,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资源融合发展,统筹推动智慧城市、智能县城和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创新和完善城乡数字化资源资产平台,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城乡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在弥合城乡区域间数字鸿沟、提升居民数字素养以及防止数字化贫困等方面,数字要素促进城乡统筹与红利共享的赋能功能大幅增强。与此同时,在以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要素流动效益、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城乡融合发展也是保障数字技术充分发挥能动效应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 (二) 主体与内涵: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同序

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共生同构意味着,二者既是从实践中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对中国具体发展道路的理性认识,也是当下一种追寻全民共富、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共时性价值创造活动。扼言之,二者在价值逻辑上高度一致并呈现为主体上的价值同一性与意涵上的全面性两个重要特征。

### 1. 价值主体的一致性

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推进城乡融合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价值追求。城乡融合发展以人为核心,促进着城乡居民在发展机遇和权利享有上的平等;而为人民谋幸福则具体表现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在价值创造上,这两种活动的“受益者”无差异地指向城乡全体人民。由此,准确把握城乡居民这一价值主体的多元需求,区分不同“价值”的性质与地位,并在自觉、可为的价值取舍与统合基础上,保证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是其核心要义。可以看到,从城乡经济社会运行“双轨制”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再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要素配置动力机制与流动轨迹演变映射了我国城乡关系制度设计由“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历史性转向。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无论是加速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是强调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其价值内核都历史地统一于从城乡融合走向共同富裕的“人民性”之中。

### 2. 价值内涵的全面性

在范畴上,共同富裕的“共同”意味着,其实践主体和受益主体均是“全体”人民,而“富裕”的外延则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全面性富裕”样态。锚定收入水平、分配机制、生态品质、公共服务质效、精神富足水平等多维度的共同富裕价值指标,逐渐缩小区域、城乡和行业“三大差距”,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关系”,最终实现多面向、多层次的渐进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即由城乡“二元并立”走向城乡“共生同构”的“自适应性循环”过程。具言之,从满足主体需要的性质看,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都强调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同富裕的双向富足;从主体社会生活领域看,二者都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价值的统一,坚持“五位一体”协同推进;从价值主体层次看,二者都以个人价值、社会价

值、民族价值和人类价值的统一为指归,坚持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协调,以及为城乡居民谋幸福与为共同富裕谋发展相一致;从时空维度看,二者都着眼于短期收益和长远价值、局部利益和整体价值的统一,重视区域、行业、城乡与群体之间,目标与过程之间的调适性互动平衡。

### (三) 统筹与共享: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集体行动

城乡关系蕴含的“融合共生”特质推动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构建了双中心属性的城乡关系<sup>[8]</sup>。进言之,城乡关系的迭代升级与治理现代化转型是以坚持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所内含的统筹与共享为发展要义的。

#### 1. 以统筹扩大城乡富裕增量

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城乡统筹发展理念是以城乡共同富裕为任务导向,强调发挥政府的组织统筹功能;以各级政府作为城乡融合的行为主体,着力解决因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城乡差距过大与发展不平衡等发展障碍。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整合为一个整体,双向同构地推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便合理运用了城乡融合概念中的城乡统筹意蕴。近年来,城乡统筹行动聚焦以社会保障服务为代表的社会领域,如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将城乡统筹作为理论指导进而在实践中予以检验,这既体现了城乡间的相对独立性,又回应了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融合的公平性要求,有利于在实践中消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现实地看,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意味着城乡共同富裕是一个兼具阶段性与渐进性特征的系统工程,故此,城乡共同富裕应以实现城乡内部特别是村域共富为前提条件<sup>[9]</sup>。因而,如何将乡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等多要素协同的城乡统筹发展体系,是新时代加速推进村域共同富裕进程的必答题。

#### 2. 以共享增进城乡共富成色

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在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共享是增进共同富裕成色的一种有效分配方式。城乡共享发展体现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通过初次分配对活劳动<sup>①</sup>创造的价值

进行共享,其共享主体包括劳动者和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二是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实现社会福利共享,此时的共享主体转为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所有人民。就城乡共同富裕这一议题而言,二、三次分配是其共享发展的主要形式。以价值共享助推共同富裕<sup>[10]</sup>、分阶段实现城乡融合目标,为价值创造和共享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价值共享的行为目标上,如何将城乡均衡享有发展权、社会福利权<sup>[11]</sup>提上议事日程;在价值共享的行为方式上,如何以城带乡地跨域延伸反哺效果,通过城镇化、产业群带动惠农价值反哺。与之相应的是,如何加快城乡基础设施网络一体化的共建共享,建立城乡融合共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使“三农”主体能“市民化”地融入城市生活空间,也能均衡可及地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因此,一方面,亟须打通城市产业链条向农村延伸的中梗阻,形成新质态的产业融合形态,健全农民进城、在城、融城的共享机制,将农村纳入城市发展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反哺机制也是增进发展红利、实现城乡共享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扩大“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反哺溢出效应,聚焦乡村内生动力凝结、释放城乡融合的制度效能,也应被纳入面向共同富裕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建设任务栏<sup>[12]</sup>。

## 二、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耦合的生成逻辑

### (一) 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共生的历史演进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中消弭城乡差距是共同富裕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攻坚任务。在其属性上,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共生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探索进程。从其沿革看,城乡关系从城乡分治、城乡互动到统筹城乡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等的演进过程,反映了其政策目标和实现方式既有自身所处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也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特征。

#### 1. 城乡分治到城乡互动:夯实共同富裕底座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城乡分治格局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逻辑起点在于优先保障城市工商业发展,由此,城市作为现代化发展前沿,集结着主要资源与机遇。毋庸讳言,该时期的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率,而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未明显增进城乡工资均等化,城乡差距

反而进一步扩大<sup>[13]</sup>。对此,改革开放开启了从分治到互动的城乡政策调整探索。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尝试打破二元对立结构,如取消农业税和改革农产品价格机制。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资源互补和城乡之间的信息及资源流动,也为社会整体和谐发展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城乡互动增强并催生了更深层次的结构变革,农村地区逐步融入现代经济体系,城市发展也越来越关注乡村生态平衡及其社会可持续性。在此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其日趋紧密、互动的关系逐步得到强化,这为城乡融合和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径依赖式的惯性牵引。

### 2. 城乡互动到城乡统筹:优化共同富裕方式

21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交流互动在程度、幅度、深度的多维强化,城乡统筹逐渐成为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新样态。伴随着国家层面“三农”政策从“取”向“予”的历史性转型<sup>[14]</sup>,各级政府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及举措的着力点也转向更为平衡的城乡统筹模式,并日益聚焦消弭城乡差距的现实攻坚。在此时期,城乡关系不再呈现为割裂和对立的两极,而是逐步融为一个行动统合、共同发展的利益联合体。城乡统筹发展旨在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及均衡的发展机会,持续推动城乡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为此,国家出台了多项促进城乡融合的政策,如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农产品向城市流通、有序引导城市资本和技术向乡村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政策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城乡均衡发展的愿景擘画,而且不断缩减的城乡发展差距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了事实的注脚。

### 3. 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建设机制日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业已成为“中国之治”探索的可示范经验。随着城乡资源流动变得愈发自由高效,加之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战略的同步推进,行政单元的边界被不同程度地突破,新的城乡融合实践为共同富裕发展提供了基于制度效能的“加速度”。一方面,城乡融合体现为资源共享机制的激励与约束兼容,乡村以其土地、劳动力、人文地理等乡土资源对城市发展提供支持,而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的跨域“下乡”也“反哺”着乡村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城乡融合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为有效抓手,积极推动交通、信息、能源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

使乡村居民最大程度上享有与城市相当水平的公共服务,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历时性地看,现阶段是城乡社会一体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从增进城乡互补互动、推动社会整体和谐、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等角度而言,城乡融合发展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 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耦合的理论阐释

在学理层面,人们一般将不同事物或系统间存在的某种相似性或一致性,尤其是那些在目标、过程或结构上的共有性特征,类型化地表述为耦合现象。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场域,其同构主要表现为二者在实现目标和方法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以及相似的逻辑基础。进言之,二者之所以展现出耦合性,是因为它们都追求资源利益的公平分配,注重城乡之间的整体协调,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 1. 从“城乡融合”转向“共同富裕”

从“城乡融合”到“共同富裕”的转变,是对城镇化进程中财富分配机制的理论新阐释。这一观点不囿于城乡之间经济资源如何分配,而更关注实现城乡红利共享最大公约数的策略保障。相对而言,城乡融合更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调节,力求对城乡红利份额的最佳分配,而共同富裕则强调基于政策整合的、更深层次的城乡协同共进关系建构。在此认识背景下,城乡融合不再被看作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而被视为一个更复杂的关系再造过程,因而需要将城市发展动能与乡村生产潜力纳入同一场域并作系统性考量。从城乡融合到共同富裕的新生产关系转向表明,资源的整合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再分配,也是一种社会价值和发展机会的平衡,它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城乡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居其所、自得其乐。城乡融合变成了一种推动共同富裕的策略性工具,旨在以制度创新和分配机制的系统调适打破传统地域与经济壁垒,促进城乡和谐与共同繁荣。由此,超越经济维度的城乡融合、城乡共同富裕建设进一步地将实现公平正义这一价值目标纳入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行动框架。

#### 2. 从“单向性”城乡关系转向“多面向”共同富裕

在理论上,理解从城市化向城乡全面共同富裕的关系转型,需要从更均衡、更包容的城乡协同范式的演进视角加以考察。城乡二元化理论中的城市与乡村常被标签化分置,如城市代表现代化、繁荣与未来方向,而乡村则被视为传统、落后,甚至是历史残余<sup>[15]</sup>。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城市主导型发

展策略的形成不无关系,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一度被视为进步的象征,而反向流动则被视为消极活动。然而,现代城镇化理念提倡乡村应与城市共同步入现代化轨道,乡村也被视为与城市并行的现代性展示区。组织吸纳下规模化的科技与资本“下乡”举措,持续加速着乡村现代化转型步伐与共同富裕发展进程。它并不止步于城乡物理空间的跨界,更着力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经济活力和文化价值的全面提升。可以说,共同富裕的转型发展范式重构了城乡间的物质生活与经济联系,放大了社会结构与组织要素的互嵌效应,使城乡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系统性组织。

### (三)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红利共享的现实需要

承前所述,城乡融合与价值共享战略协同激励了城乡间的资源均衡分配和深度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社会发展红利,和睦共治的社会环境亦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 1.城乡一体化引领共建共享的现实图景

事实表明,城乡一体化是缩减城乡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经验”。它试图通过资源组合与社保民生等政策统筹,保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效能的提升。其目标在于增强城乡资源流通与合作,嵌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城乡一体化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和资本向乡村有序流动,满足乡村高质量共建的需要。城市提供的技术和资本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升级,乡村也以其特色文化、服务和农产品回馈城市,由此形成了资源双向流动、优势互补的共建共享的城乡融合新生态。另一方面,资源均衡配置理念下的城乡一体化是共同富裕成果共享的现实映射。从收入、住房、医疗等物质服务共享扩展至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产品提供,前者如师资交流,后者如文化下乡。一体化机制下的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全面共享发展成果。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转型的关键,城乡一体化战略促进城乡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实现全方位红利共享。因此,它既是对城乡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更是对中国式共同富裕图景的现实回应。

#### 2.城乡均衡发展推进全面共享的实践样态

现实地看,城乡均衡发展是推动全面共享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会公平等为主要目的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能有力地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战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

领域多样态地践行红利共享原则。经济领域,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破除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sup>[16]</sup>,助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助力经济成果共享;政治领域,加强基层民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助推政治权利共享真正落到实处;文化领域,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创新,保护并传承地方性文化遗产,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社会领域,以普惠性共享为根本,将共享发展贯彻到每一个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整体社会福祉得到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强调城乡环境的共同保护和绿色经济,聚焦城乡生态可持续与共同富裕的发展成色。总体而言,城乡均衡发展不仅是回应全面共享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共同富裕战略下城乡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

#### 3.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民共享的主体诉求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将“做大蛋糕”也“分好蛋糕”的共识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进程,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城乡融合发展可以视为推动全民共享的前置条件。城乡融合发展应注重城乡低收入群体和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就业及其社会保障。一方面,着眼于“做大蛋糕”,强化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技能培训,给予其更充分的劳动就业机会,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应“分好蛋糕”,不断优化利益分配机制,让更多城乡弱势群体、困难群众进入发展红利共享“共同体”。从范围上讲,“共同体”中的这种可供共享的“分配池”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推行更加公平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

## 三、耦合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行动框架

承前所述,重塑基于价值意蕴与生成逻辑的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行动框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在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从“主体—空间—方向—机制”的四维搭建融合城乡发展与统筹富裕的行动框架,须从联结行动主体、拓展行动空间、调适行动逻辑以及完善行动机制

等集体行为着手,加快城乡共富社会网络构筑、城乡共富应用场景创新以及城乡共富发展方向引领。

### (一) 联结行动主体: 构筑城乡共富社会网络

有观点认为,由关键群体推动的集体行动凸显了其行动的引领价值<sup>[17]</sup>。就城乡共同富裕网络而言,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力社会正是构成城乡共富集体行动的关键群体,三方从决策主导、资源配置以及关系夯实的不同维度协同共进,持续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发展进程。

#### 1. 强化有为政府, 发挥决策引领城乡共富的主导功能

政府主体是统筹城乡共同富裕建设的主导力量,凭借对顶层设计的持续优化,有为政府可以不断为城乡共富实践供给政策保障。一是强化协同政策研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政府部门通过加大对城乡共富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力度、深度与广度,深入了解城乡融合的国情民意,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助益如“十五五”规划编制等前瞻性城乡发展设计。二是重视决策机制创新,提高决策的人民性。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是推进城乡共富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应在前期调研与社情民意收集的基础上,形成多元化的决策机制,确保发展决策契合城乡居民的利益诉求。三是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提高决策的实效性。推动城乡发展政策的落地执行是产生共富效应的关键环节。为此,政府部门应通过项目监管与评估,切实保障政策执行到位,进而因地制宜地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政策精准落地。

#### 2. 激活有效市场, 让资源配置在城乡共富中起决定性作用

锚定城乡共同富裕,有效激活市场,不仅关乎城乡融合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转,还关系着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因此,以“城乡融合型”乡村发展为模式<sup>[18]</sup>,市场化地释放城乡经济均衡动能,是共同富裕建设策略的当然之选。一方面,须将作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置条件之一的有效市场,视为纾解城乡“二元结构”梗阻的动能引擎。对此,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拆解城乡市场结构性障碍,进一步推进城乡商品和服务跨域交互。这既有利于缩小城乡市场发展差距,又能为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创设市场新契机。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合作治理的逻辑表明,市场的有效激活需要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为必要条件。为此,应以共同富裕为任务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持续引导资源向发展相对滞

后的领域聚合,弥合城乡发展鸿沟。

### 3. 建构友爱社会, 增进城乡共富的价值共创网络建设

社会是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参与主体与最终评价者、受益者<sup>[3]</sup>。以城乡共同富裕价值共创为锚,系统整合社会主体、社会资本以及社会保障的力量,使友爱社会的和美氛围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外拉力。一是吸纳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城乡共富建设。城乡居民与社会组织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生力量,通过开展社会公共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项目,营造良好的友爱社会氛围。二是注重社会资本的嵌入与运用。重视城乡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加强沟通与交流,为城乡共同富裕的合作关系奠定互信基础。三是充分发挥社会慈善事业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常态化机制,既积极发挥社会慈善事业这个社会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又推动社会慈善事业从纾困扶弱的收入分配领域,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诸多领域延伸,充分释放其在促进创新、增强财富创造能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作用,助力共同富裕实现。

### (二) 拓展行动空间: 创新城乡共富场景应用

空间是城乡共同富裕及社会建设的现实载体。须以生产、生活、生态的城乡“三生”空间为切入口,着眼于挖掘发展新动能、营造共建新图景与实践致富新路径,推动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系统的动能优化,不断拓展城乡共同富裕的场景应用。

#### 1. 挖掘生产空间, 释放城乡业态升级新动能

空间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变数,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产品和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与工具的双重属性<sup>[19]</sup>。城乡生产空间是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活动场域,其中,城乡产业空间拓展为业态创新增效、城乡共富动能聚合提供了多种可能。一是集约产业布局空间,促进城乡多产业融合发展。具言之,城乡协同发展需要以顶层设计为政策导向,进一步做好城乡产业定位,合理布局其产业空间;升级城乡产业基础设施,集约高效利用产业要素,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经济效益增值。二是拓展产业创新空间,探索城乡产业新模式。须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为内核,破解乡村产业内生动能乏力难题,释放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效应;进一步地,以此衔接城乡产业联动发展,通过打造“政企研学商”城乡产业联盟,推进

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产业的业态创新。三是挖掘特色资源空间,因地制宜地分类分步骤推进产业融合;延伸乡村产业链,以城市“技术下乡”开发乡村名特优绿色产品或服务;开发休闲农业、数字电商、数字农文旅等“数字+N”乡村产业新业态,提升乡村文旅产业品牌美誉度和竞争力。

## 2. 融合生活空间,营造城乡宜居宜业宜游新场景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城乡发展体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与融合城乡生活空间的重要举措。为此,一是在空间宜居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和美城乡建设。政府部门牵头强化城乡人居环境精细化治理,在加大资金投入、技术性地增强环境装备性能、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治理,工业生产与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扩大城乡绿化植被覆盖面,不断优化城乡生活环境。二是在空间宜业上,拓展城乡就业市场,促进人才要素充分流动。要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促进城乡人才要素双向有序流动;完善人才服务配套政策,为城乡人才创设更多创业就业机会,助力城乡共富目标实现。三是在空间宜游上,开发绿色生态资源,增加文旅产业经济价值;充分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吸引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下乡”,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 3. 共建生态空间,探索城乡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绿色低碳发展是推动城乡共富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型”<sup>②</sup>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如何从生态空间维度蹚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应提上议事日程。一是完善生态政策法规体系,强化城乡生态监管。须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作适时的“废改立”跟进,进一步细化“清单制”下的部门监管职责,保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处罚有度;运用数字化监管技术,对城乡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综合监测,全周期全方位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二是秉承生态保护底线思维,践行绿色产业理念。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广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三是盘活城乡生态产业资源,转化生态经济产出。积极挖掘城乡生态产业潜力,促进生态产业技术创新与生态产业合作机制,推进“生态要素”向“经济要素”的城乡市场融合机制;推行农业产业清洁绿色生产,降低碳排放,推动城乡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低收入群体生态红利。

## (三) 调适行动逻辑:引领城乡共富发展方向

新时期,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sup>[20]</sup>。为此,在统筹集体行动逻辑层面,从协同治理、要素整合与利益共享着手,有效联结城乡融合发展,将大幅加速城乡共同富裕进程。

### 1. 协同治理逻辑,激发城乡基层社会共治内生动力

激发城乡基层社会共治内生动力是推动城乡共富的系统赋能,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也有益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城乡共富提供和睦共治的社会关系基础。在实践中,推进城乡协同治理需要技术协同与组织协同的统合互嵌。一是技术协同,搭建城乡协同共治的信息共享平台。以政府部门与社会化合作形式加大对乡村地区数字网络信息新基建的资金投入,打造数字城乡信息平台,逐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以城乡治理信息互联互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sup>[21]</sup>,不断提升城乡智慧化协同治理效能。二是组织协同,释放城乡共治中多元参与的逻辑价值。要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吸纳功能,制定城乡共治的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引领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治理组织协同过程中,应注重发挥各主体优势互补效能,持续优化“党委领导、政府吸纳、社会协商、公众参与”的城乡协同治理新格局。

### 2. 要素整合逻辑,赋能城乡资源禀赋良性互动形态

在城乡资源禀赋上,人才要素双向流动、金融要素有效配置、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可及,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and 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优化城乡经济能人、新乡贤等关涉共同富裕的人才要素双向流动。鉴于城市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人才向城市的汇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土人才愈发匮乏,亟须构建“精准引才、系统育才、科学用才、用心留才”的政策体系,形塑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态势。二是完善城乡金融资本要素有效配置。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耕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引导城市金融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以农村金融服务应用创新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增收。三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普惠可及。一方面,加大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结合城乡居民生活实际需求,丰富公共服务项目品类,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全方位、全过程地增进城乡居民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互动发展。

### 3. 利益共享逻辑, 优化城乡红利均衡分配关系

建立在城乡共富价值共创基础之上的利益共享, 强调以完善三次分配的方式促进城乡发展红利均衡可及并助力城乡共同富裕实现。三次分配关系的优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同序的, 在某种意义上其有助于城乡共同富裕建设者的成果共享。为此, 一要注重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逻辑。遵循“提低、扩中、调高、取非”原则, 调适城乡收入的结构差异, 兼顾城乡收入的公平性、正义性。二要强化再分配的政府调节逻辑。发挥政府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 通过强化对乡村地区财政支付转移、企业税收政策优惠、社会化服务供给等细化“制度下乡”措施, 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质效。三要激活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活力。注重城乡人文关怀, 加大社会资本对乡村弱势群体扶持力度。应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治理层面、环境层面与监督层面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路径建设, 构建“善”治导向的共同体, 联结公益组织慈善服务、志愿服务以及社会性团体等非营利性力量, 为落后地区提供人才、技术、资金等社会资本的支持。

#### (四) 完善行动机制: 提升城乡共富的县域融合质态

县域是推动城乡共富的关键治理单元, 而提升县域融合发展质量, 既关乎经济社会发展, 更与城乡融合的质态息息相关。因此, 立足县域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内生动力, 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县域发展行动机制, 成为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质态跃升的肯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关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建设要求, 为城乡共富行动机制提供了指南。

##### 1. 锚定技术革命性突破机制, 促进县域发展与共同富裕嵌合

2021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并把县域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新时代要求将技术嵌入县域发展场域, 加速促进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双向提升。一方面, 结合区域特色, 因地制宜地推进县域科技赋能发展。要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县域发展为引擎<sup>[22]</sup>, 引入先进绿色技术, 实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向驱动效应。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成为促进县域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也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治理中的技术难题, 为县域共同富裕注入技术新动能。另一方面, 运用数字治理理

念, 收集、整理、分析、预置县域新技术发展的技术阈值、可能手段与技术突破点, 为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确保县域制度安排落地生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技术赋能”治理模式下, 县域发展目标体系仍然指向人的本体价值和意义、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为农民而建”等着眼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意蕴。

##### 2. 探索产业转型升级机制, 统筹县域生态与经济耦合

县域空间遍布全国, 很多县地处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理位置。县域发展不仅是经济的扩张, 还注重生态承载与环境保护。其核心要义在于打通经济增长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的“中梗阻”, 绿色、智能地创新升级县域发展质态。具体而言, 一是构筑绿色产业发展模式, 推动产业升级与生态保护的双向互动。县域共富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等行业, 将生态价值内嵌于经济发展全过程, 如推动农业的绿色、有机、生态化转型, 打造绿色产业链, 实现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二是深化市场机制创新, 撬动生态资源市场化的配置升级。要实现县域共富, 亟须打破资源配置壁垒, 利用市场力量推动生态产业的商业化运作。如利用“绿色债券”“生态补偿机制”等创新金融工具, 引导资金流向生态保护项目, 激励社会资本参与推进企业绿色升级改造和面源污染治理。

##### 3.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机制, 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县域共富融合

县域共同富裕集中表现为县域内社会结构的深度融合和城乡发展的优质均衡, 其关键在于以资源高效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共富水平, 进而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其一, 加快城乡新质生产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是推动县域共富的根本路径。要跨越县域资源壁垒的城乡一体化门槛, 实现人口、技术、资本和信息等要素的交互融通, 进而完善县域资源整合进程。其二, 深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是提升县域融合水平的基础保障。县域共同富裕及其现代化既要强化经济政策引导, 更应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优化配置。通过建立健全交通、能源、信息等县域基建一体化机制, 增强县域生产要素的可达性与协同性。其三, 推动城乡文化的交融与共享是实现县域共富的目标引领。赓续县域文化与历史传承, 是促进资源充分流动、要素自由配置、凝聚城乡一体化内生动力基础性条件和有力保障。为此, 要将增强城乡居民对地域共有文化的体认与共

识、提升城乡居民地域认同感和归属感,纳入激活县域生产要素配置创新的自觉行动。

### 注释

①活劳动与物化劳动是物质资料生产中所用劳动的一对范畴。前者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能动的劳动力,是劳动者加进生产过程的新的、流动状态的劳动。后者亦称死劳动,指保存在一个产品或有用物中凝固状态的劳动,是劳动的静止形式。②“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J]. 中国人大, 2024(14): 6-9.
- [2] 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N]. 人民日报, 2024-09-25(7).
- [3] 程明, 方青, 吴波. 城乡融合赋能共同富裕: 逻辑关联、理论阐释与实践进路[J]. 西南金融, 2023(11): 104-114.
- [4] 陈桂生, 徐铭辰. 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出场语境及其行动框架[J]. 学习论坛, 2023(5): 109-117.
- [5] 杨增崇, 范嘉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 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7-17.
- [6] 韩振峰, 李卿.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J]. 东岳论丛, 2024(5): 129-134.
- [7] 张世贵. 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协同机理与改革路径[J]. 中州学刊, 2020(11): 70-75.
- [8] 曾凡军, 王鹏.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逻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29-140.
- [9] 聂建亮, 赵腾, 吴玉锋.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

- [J]. 学习论坛, 2024(2): 83-91.
- [10] 彭银春, 孟大虎. 共享价值助推共同富裕: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新视野, 2024(3): 58-67.
- [11] 曹前满. 融合、共享与共富: 乡村城镇化与新型城乡关系重塑逻辑[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3): 95-104.
- [12] 张怀承, 黄文胜.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之现实诉求及实践载体[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23-33.
- [13] 孔祥智, 谢东东. 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2-22.
- [14] 王昉, 张铎. 新中国城乡关系思想演进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 2023(2): 140-154.
- [15] 任远. 城乡整体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1-9.
- [16] 李俊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内在动力机制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81-87.
- [17] OLIVER, MARWELL. Whatever happened to critical mass theory? A retrospective and assessment[J]. Sociological Theory, 2001(3): 292-311.
- [18] 张克俊, 刘莉.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J]. 中州学刊, 2024(1): 45-53.
- [19] 列斐伏尔. 空间生产[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41.
- [20] 杜志雄. 发展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4(5): 17-18.
- [21] 温涛, 赵孝航, 张林. 数字乡村建设能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吗?[J]. 农村经济, 2023(11): 1-13.
- [22] 斯丽娟, 辛雅儒.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15.

## The Value Implic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the Coupling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Zhang Shigui

**Abstract:** Since 1949,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has roughly undergone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separation” to “coordination” and then to “integration”. Its fundamental goal always bee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ll social members, coupled with the socialist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implication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s, the value sequence in terms of subjects and connot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actions of coordination and sharing constitute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logic,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are coupled with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have logical and practical consistency. On this basis, a comprehensive action framework for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prosperity integrating “subject-space-direction-mechanism” will be established, focusing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network for urban-rural prosper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rban-rural prosperity, and innovating application scenarios for urban-rural prosperity. This will fully unleash new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prosperity.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coupling; action framework

责任编辑: 翊 明

##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范式的建构

童敏

**摘要:**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作为基层治理创新重要力量的中国社会工作亟须从现代化视角审视其专业定位和知识范式。通过比较现代化视角下中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者都依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人们对良性社会和生活秩序的渴望,都经历了从环境适应到社会关系改善再到生活关系调整三个阶段的专业探索。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工作是在生活秩序重建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建构实践知识范式的,它依据多元哲学视角,在日益疏离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与环境内外互促的个人自主成长。这是一种关注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而不同于在注重环境适应的现代化初期由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创建的注重事务问题解决的帮扶范式。这种治理范式不仅能够找回在过度标准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丢失的个人自主性,而且能够展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多元现代化的诉求,以及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促进人的现代化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范式;帮扶范式;治理范式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74-08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要求。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重要专业力量之一的中国社会工作,自然也就需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2023年3月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全国各省、市、县级党委也开始陆续组建社会工作部门,这标志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的社会工作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大社会工作”发展格局正在逐渐形成<sup>[1]</sup>。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工

作体制机制”,并且要求“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显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关乎自身专业性的提升,而且关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关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关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乃至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

实际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始终离不开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推动。正是由于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才出现了帮助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困弱人群的社会工作<sup>[2]</sup><sup>9</sup>。而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实现传统慈善救济服务的现代转型<sup>[3]</sup>,它强调运用科学的人与环境的互动方法促进传统困弱帮扶向“助人自助”的能力恢复转变,从而帮助困弱人群重新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sup>[4]</sup>。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与

收稿日期:2024-09-2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子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理论创新与发展”(2024JZDZ036)。

作者简介:童敏,男,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05)。

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从现代化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也就成为不可忽视的分析角度,尤其是在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球事业的当下,这个角度的探讨不仅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准确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和理论范式,而且能够促进国际对话交流<sup>[5]</sup>以及在地社会工作自主知识的建构<sup>[6-7]</sup>。尽管一些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尝试从现代化视角考察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知识体系<sup>[8]</sup>,但是较侧重制度差异的分析<sup>[9]</sup>,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考察<sup>[10]</sup>,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探究等<sup>[11]</sup>,缺乏在现代化视域下的中西方平等对话。对此,有必要对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进行考察,以便能够比较中西方社会工作理论逻辑的异同,从而为创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范式找到依据,建立根植于中国自主实践的社会工作“中国学派”。

## 一、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

尽管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与中国社会工作一样,都是为回应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大规模的快速社会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适应等方面问题而产生,都既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两者也有不同。由于所选择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西方与我国拥有不同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从而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路径。

### 1.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人们从乡村来到城镇,从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以业缘为主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转变给人们带来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社会适应。因劳动方式的转变,人们需要适应现代化的工作要求和节奏,那些因无法适应劳动要求而遭遇困难的人们就会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sup>[12]</sup>。这是推动社会工作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此时,人们关注的是人的适应性<sup>[13]</sup>。二是社会关系。受到现代代理性分工劳动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变得越来越功利,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因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关系不断松动乃至瓦解,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关系和伦理价值的挑战,需要创建适合业缘发展的社会关系及相应的伦理价值,特别是边缘人群,他们遭遇这一问题的挑战更为突出,很容易成为社会工作者的另

一类服务对象<sup>[14]</sup>。此时,人们注重的是人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融入<sup>[15]</sup>。三是生活关系。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自主生活选择意愿和多样化生活诉求的不断提升,人们在社区生活中遭遇自主生活选择的挑战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那些独居空巢且体弱敏感的居民,他们在社区生活中面临的自主选择困境更为严峻,极容易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sup>[16]</sup>。此时,人们强调的是社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自主性,它关乎人们对社区现实生活的接纳、融入和参与能力<sup>[17]</sup>。

显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人们不得不面对因现代化而产生的在社会适应、社会关系和生活关系三个方面出现的诸多挑战。由此,社会工作者也就需要为人们提供与这三个方面相对应的三种领域的专业服务,即适应领域<sup>①</sup>的服务、社会领域的服务和生活领域的服务。适应领域的服务主要是帮助服务对象应对因新的环境而产生的问题,像问题解决模式和任务中心模式等就是人们常用的解决适应领域问题的有效模式<sup>[2]18-20</sup>。社会领域的服务则主要是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方面遭遇的阻碍,像增能社会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帮助人们应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权力不公平<sup>[18]30-31</sup>、性别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sup>[19]</sup>,以及多元文化交往中的社会歧视等问题<sup>[20]</sup>。生活领域的服务则是协助服务对象应对在社区生活中遭遇的多样化生活和自主生活选择的困难,如差异化、多元化以及自主性等就是人们在这一领域经常讨论的主题<sup>[21]</sup>。实际上,这三种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并不是截然分割的,它们常常相互影响、彼此纠缠,尤其对于面临多重困难的弱势群体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他们不仅因无法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而出现适应性的问题,而且时常因处于社会的边缘而面临社会性的困扰,以及因遭遇生活关系的疏离而面临生活自主选择的生活性困境。显然,现代化发展诉求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面临的核心现实挑战,也是社会工作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它是社会工作所推崇的“人在情境中”的根本“情境”。

### 2. 现代化视域下中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进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从环境适应开始的,由环境适应逐渐延伸到社会关系的改善,再从社会关系的改善拓展到生活关系的调整,其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sup>[2]89</sup>。这样,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站在环境适应角度理解人们在社会关系改善和生活关系调整方面诉求的,它遵从一种以促

进人们环境适应为目的并且注重困弱人群现实问题解决的社会福利服务的思路,从而形成了以环境适应为基本框架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sup>[22]</sup>。正是依据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环境适应实践框架,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将人们在环境适应之外的社会关系改善和生活关系调整方面遭遇的问题视为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平的表现,视为人们在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并将其视为困弱人群弱势的重要构成部分<sup>[23]</sup>。这样,人与环境始终处于对立的关系,注重个人心理调适的环境适应逻辑与关注社会变革的公平倡导逻辑之间就会出现无法回避的冲突,这一冲突伴随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整个发展历史,成为影响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议题<sup>[24]</sup>。实际上,这一冲突背后反映的是环境适应逻辑与日益多样化生活中个人自主选择诉求之间的矛盾。

虽然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起步较晚,2006年才开始在国家层面逐渐推展开来,但是在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极为迅速,其路径也像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一样是从困弱人群的环境适应开始的,从环境适应转向社会关系的改善,最后再到生活关系的调整<sup>[25]</sup>。在短短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工作就经历了适应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的专业发展,最终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注重现实生活关系调整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sup>[26]</sup>。这一快速转变使得中国社会工作在专业发展中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直接面对困弱人群现实问题解决的环境适应逻辑与普通居民在生活秩序重建中的个人自主逻辑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中国社会工作除了需要快速从困弱人群的现实问题解决转向普通居民个人自主能力提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工作拥有了基层治理创新力量的要求和身份,需要站在社区生活秩序重建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中的环境适应逻辑与个人自主逻辑之间的关系。

可见,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涉及环境适应、社会关系改善和生活关系调整三种类型,它们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在环境适应、社会关系、生活关系三个方面面临的挑战是一一对应的。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历程相似,都经历了从环境适应到社会关系改善再到生活关系调整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背后呈现的基本矛盾也相似,都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中环境适应逻辑与个人自主逻辑之间的张力。

## 二、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及其内在矛盾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在关注环境适应的现代化初期产生的,它关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活保障和贫困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是注重事务问题解决的帮扶范式。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人们对差异化和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强调,这种修补不足的帮扶范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质疑,它与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的个人自主意识和行动自决能力根本相悖。

### 1.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起步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正是农村和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环境适应,出现了繁重劳动、拥挤环境、疾病保障以及家庭稳定等方面的适应问题<sup>[27]</sup>。同时,在科学实证主义思想推动下,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选择了“医学模式”,强调针对服务对象的“病症”进行治疗<sup>[27]</sup>。这样,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在环境适应阶段采取了困弱人群帮扶的实践逻辑,即“谁困难帮助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种事务导向的问题解决思路<sup>[28]</sup>。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者开始察觉到帮扶实践逻辑过于注重助人的微观环境,忽视了这些微观环境背后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认为这些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如在种族、阶级、性别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等,也是造成人们困弱处境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人们的困弱在社会层面的表现<sup>[29]</sup>。

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将注意焦点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人们个人自主生活的选择<sup>[30]</sup>以及个人独特生活价值的实现<sup>[31]</sup>,并且强调这种个人自主生活的选择是与标准化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对而言的,它需要通过个人主动争取才能获得<sup>[32]</sup>。显然,无论适应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和生活领域,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都是站在困弱人群的实践立场来理解专业服务要求的,它具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困弱帮扶。因此,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遵循的是一种帮扶范式。

### 2.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帮扶范式面临的质疑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是对遇到问题的

困弱人群进行帮扶。这样,问题界定和问题解决就成为这种范式的两项核心内涵,而问题之外的生活各方面因为不在帮扶范式的考察范围内,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因此,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它不是过于强调问题,将服务对象问题化,使服务对象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sup>[33]</sup>,就是忽视服务对象在问题之外的生活,看不到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能力和资源,导致服务对象出现“越帮越弱”的现象<sup>[34]</sup>。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领域也逐渐成为继适应领域之后受到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关注个人对社会处境的自我意识和应对能力提升的增能社会工作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在社会领域经常采用的实践逻辑<sup>[18]</sup><sup>34</sup>。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增能这一概念逐渐从社会领域延伸到生活领域,融入了现实生活的变动性和多样性等特征,成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广泛采用的一种实践方法,不再局限于社会领域<sup>[35]</sup>。显然,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正是因为采取了帮扶范式,所以常常使人们陷入能力与问题的两难选择<sup>[36]</sup>。

除了忽视人们拥有的能力和资源之外,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还常常被质疑为一种以专家为中心的注重环境适应的实践逻辑<sup>[37]</sup>。它不仅无视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独特生活经验这一事实,看不到价值意义对个人生活的影响<sup>[38]</sup>,而且否认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机会和能力,忽视个人的自主成长诉求,最终导致服务对象缺失个人自我成长改变的内在动力<sup>[39]</sup>。这样,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就会时常陷入主客观的割裂中:一旦关注人们的客观现实生活状况,就会不自觉地排除服务对象个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主观意义解释;而一旦注重个人的主观意义解释,就会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属性,忽视服务对象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生活状况<sup>[40]</sup>。显然,这种主客观割裂的现象直接影响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干预成效,使服务对象的成长改变无法达成内外相互驱动的闭环,缺乏可持续性。

显然,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因发端于注重环境适应的现代化初始发展阶段,受科学实证主义思想影响而创建了以现实问题解决为服务目标、以环境适应为基本框架、关注困弱人群的帮扶范式。这种范式因为过于注重事务问题解决,而导致在专业服务中能力与问题、主观与客观割裂,既缺乏对服务对象内在自我成长潜力的调动,也无法搭建内外改变的行动闭环,因而无法给服务对象带来可持续的改变。

### 三、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及其治理范式

中国社会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它需要回应基层治理中重建生活秩序的现代化发展新要求,既需要促进人与环境之间的现实联结,也需要同时增强个人自主的理性选择能力,是秩序与活力的结合。显然,这是一种站在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关注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新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迥然不同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创建的注重不足修补的帮扶范式。

#### 1. 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

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不同,它是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而获得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这种基层治理社会工作不仅代表生活领域的社会工作实践,以回应快速现代化带来的人们在社区生活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如关系日益疏远与个人选择日益多元,而且需要人们站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考察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整体要求,重新审视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这一基本原理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如果说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站在环境适应的现代化初始发展阶段建构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代表一种关注困弱人群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注重个人福祉和社会公平,秉持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视角,强调“人在情境中”的环境适应逻辑,那么中国社会工作就需要站在生活秩序重建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重构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逻辑。这一专业实践逻辑显然与注重环境适应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不同,它需要关注居民在社区多样化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自主能力,注重个人自我成长潜力的激发和社区信任伙伴关系的建设,以促进个人的社区参与和邻里矛盾的化解,它依据多元哲学视角,强调“人在情境中”的个人自主逻辑,是一种注重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

这种注重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两种不同事实:一种是客观事实。它是人们关于事务的解释,需要人们通过情境之外的观察和分析呈现事务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另一种是当下事实。它是人们关于具体情境中的人如何应对的解释,需要人们融入当下的具体情境,呈现人在与情境相互影响过程中的有效行动逻辑。具体说来,第一种是关于“是什么”的事实分析,它把人视为主体,把环境视为客体,强调人与环

境的主客二元对立。显然,产生于现代化发展初期、关注困弱人群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就是采用了这种假设,它受到科学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把环境作为人们观察分析的对象,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第二种是关于“怎么做”的事实,它不仅把人视为主体,而且把环境也视为主体,强调人需要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找到自己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的行动方式,保证人与环境能够协同改善,建立一种人与环境相互积极作用的多元协同关系。注重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遵从了这种多元假设,它受到多元哲学视角的影响,是对现代化发展到生活秩序重建的新阶段面临的多元现实挑战的回应。

## 2. 中国社会工作的治理范式

在基层治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遭遇的多元现实挑战需要放在多元哲学视角下来考察,它不仅关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怎么做”的实务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关乎怎样理解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的学理问题。实际上,怎样理解行动意味着怎样理解人。一旦人们把行动理解为人针对某项目标采取的行为,就会不自觉地把人与环境割裂开来,注重人的理性分析能力,行动也就成为人的意志和想法的实现方式<sup>[41]</sup>。这样,理性人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性人对外表现为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对内则表现为能够清晰了解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西方专业社会工作遵循的关注困弱人群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就是基于这种理解。这种范式的理解将导致人们社会关系和生活关系的日益疏远和功利化的发展趋向,从而出现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sup>[42]</sup>。如果人们把行动视为在多元现实情境中人与环境的联结方式,就会关注行动中的人是如何识别和理解环境挑战的,相信人具有行动反思的能力,并且能够通过行动反思找到多元现实情境中的有效行动应对方式。可以说,此时的情境是一种多元现实的行动情境,而此时的理性则是多元现实行动情境中个人自主的理性,它不仅涉及个人的自主行动选择,而且涉及个人与环境之间积极互动关系的建设。

社会工作帮扶范式所强调的环境适应逻辑与治理范式所推崇的个人自主逻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是以事务问题解决为主还是以个人自主成长为主的分歧。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显然与现代化路径的选择直接相关。一旦人们选择了标准化的现代化路径,就会注重环境适应逻辑,关注事务的问题解决,以帮助那些无法适应现代化

进程的困弱人群重新找到适应的方式;而人们如果认同多样的现代化路径,就会强调个人自主逻辑的重要性,关注个人的自主成长诉求,以激发个人内在的成长改变动力,促使个人成为现实生活改变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承担着协助党和政府实现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参与者。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 is 多样现代化路径的探索者,需要站在基层治理角度审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整体要求,以个人的自主成长为主,结合事务导向的问题解决,把激发个人内在的自我成长改变的潜力以及促使个人成为自己生活改变的主动参与者和推动者作为专业服务的主要目标。显然,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实践逻辑遵循的是一种治理范式,迥然不同于以现实问题解决为目标、以环境适应为框架的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

## 四、治理范式与帮扶范式的异同比较

注重个人自主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治理范式是一种全新理解现代化的视角,与在环境适应阶段关注困弱人群个人福祉和社会公平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存在根本差异。它立足于生活秩序重建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以关系日益疏远中的多元选择能力为主导促进人们在现实情境中的个人自主行动选择,找回个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自主能力和尊严,使个人的成长改变与环境的改善相互协同,达成人与环境内外互促的行动闭环,实现人的自主成长,以避免人因与环境内外割裂而陷入过于注重事务问题解决的技术理性窠臼。社会工作治理范式与社会工作帮扶范式的区别见表1。

表1 社会工作治理范式与社会工作帮扶范式的差异

对比项目	社会工作治理范式	社会工作帮扶范式
阶段	生活秩序重建阶段 (现代化新发展阶段)	环境适应阶段 (现代化初始发展阶段)
对象	所有居民	困弱人群
挑战	多元选择 关系疏离	个人福祉 社会公平
假设	当下事实 人与环境多元主体	客观事实 人与环境主客二元
焦点	个人的自主能力和尊严	事务的问题解决
目标	内外互促的自我成长	内部自我成长与 外部问题解决相割裂
依据	个人自主理性	个人分析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范式存在显著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对立。实际上,两者都是现代化发展的诉求,都注重个人理性,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是社会工作帮扶范式强调事务分析的理性,是有关事的理性,而社会工作治理范式侧重个人选择的理性,是有关人的理性。可以说,社会工作治理范式是社会工作帮扶范式的深化,它所强调的行动反思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动反思,同时融合了问题解决的要素;它所推崇的个人自主理性也是在个人分析理性基础上依据环境挑战要求对个人应对行动作出重新调整的能力,同时整合了个人分析理性元素,使个人从注重外部事务的问题解决转向内外互促的自我成长,具有内外合一的个人自主成长诉求。很显然,社会工作治理范式不是社会工作帮扶范式的反叛,而是社会工作帮扶范式的升华,它在继承现代化初始发展阶段所倡导的个人分析理性的同时,整合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对多元化发展的诉求,真正从对事的关注转向对个人成长的关怀,重新找回因过度追求标准化和一致化的分析理性而丢失的个人自主理性。

实际上,从社会工作帮扶范式转向治理范式涉及对现代性的重新理解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审视,是对单一现代性还是多元现代性的选择。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所推崇的社会工作帮扶范式遵从单一现代性,这种把人与环境视为主客二元对立并且强调环境适应的哲学视角必然因过度关注个人分析理性而导致在具体生活实践中遭遇困境,无法有效应对对生活领域所呈现的生活多样性、多元化和变动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人们追求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对现实生活改善的世俗诉求以及实事求是的积极生活态度,并非出于对宗教神学束缚的反抗。因此,这种多元现代性的选择意味着对在地制度和在地文化的尊重、继承和发展,它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真正扎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促进居民现实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心灵的安顿,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治理范式既是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主动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它把人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倡导“情境中的人”这种多元哲学视角的实践逻辑,根本改变了对社会工作帮扶范式“人在情境中”这种

人与环境适应关系的理解,重新找回了现代化进程中丢失的人的自主性,从而使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范式彰显出对人的现代关怀和多元现代化的示范引领作用。

## 结 语

所谓“助人自助”,就是通过“助人”实现“自助”,它是以“自助”为目标的助人活动,目的是帮助人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工作所秉持的“助人自助”服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对困弱人群的解困,而是具备了恢复生活秩序的社会观察视角。这样,以“助人自助”为目标的关注困弱人群帮扶的社会工作就成为社会良性运行以及生活秩序重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这一社会良性运行和生活秩序重建的诉求就变得尤为迫切。显然,社会工作从产生到发展,始终都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以及人们对良性社会和生活秩序的渴望。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如此,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例外,都经历了从环境适应到社会关系改善再到生活关系调整三个阶段的专业实践发展。

不同的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在环境适应的现代化初始发展阶段创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逻辑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科学实证主义成为其基本哲学视角和具体实践的依据,其目的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帮助困弱人群适应周围环境。这是一种社会工作的帮扶范式。尽管在之后的社会关系改善和生活关系调整阶段,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也作出了相应的改变,引入了增能、差异化、多元化等概念,以突出困弱人群在社会领域或者生活领域面临的歧视以及其他不公平待遇,但是从本质上而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并没有脱离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框架和困弱帮扶的社会福利服务思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则有所不同,虽然它也起源于困弱帮扶的环境适应实践逻辑,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任务的下沉,中国社会工作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这样,生活秩序重建就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而如何帮助居民在日益疏远的社会关系中提升多元选择的个人自主能力就成为摆在中国社会工作者面前的难题。显然,中国社会工作需要站在生活秩序重建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规划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在协助个人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促进其自主成长,实现人与环境

的协同改变。这是一种社会工作治理范式。从这种治理范式出发,人们不仅能够找回在过度标准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丢失的个人自主理性,而且能够展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多元现代化追求以及中国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促进人的现代化的独特作用。

### 注释

①适应领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适应是指因现代劳动方式变化而产生的问题。例如,对成年人而言,适应是指对工作的适应;对儿童青少年而言,适应是指对学业的适应;对于老年人而言,适应则是指对无工作岗位生活的适应。广义的适应则是指因生存环境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如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等。因此,从广义而言,适应需求贯穿人的一生,是人在新环境面前需要不断学习的。

### 参考文献

[1]王思斌.机构设置新格局下“大社会工作”的均衡发展[J].中国社会工作,2023(16):6.

[2]HOWE 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SPECHT H. New Direc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88: 33.

[4]BECKETT C, HORNER N. Essenti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M]. London: Sage, 2006: 4.

[5]KREISBERG N, MARSH J C. Social Work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Utilis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6(3): 599-618.

[6]SHEK D T L, Golightly M, Holloway M. A Snapshot of Social Work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7(1): 1-8.

[7]MCGREGOR C. A Paradigm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 Theory for Early 21st Century Practice[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9(8): 2112-2129.

[8]徐选国.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学海,2023(1):177-187.

[9]陈树强.论社会工作学科体系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关系[J].社会工作,2024(1):20-24.

[10]童敏,王娜.先秦虚静视角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话语体系建构[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3-22.

[11]王思斌.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J].社会工作,2024(1):1-14.

[12]RICHMOND M E. What is Social Case Work?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22: 99-100.

[13]RASMUSSEN B M, MISHNA F M. The Relevance of Contemporary Psychodynamic Theories to Teaching Social Work[J].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2003(1): 31-47.

[14]PAYNE M.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3rd ed.)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92.

[15]CORRIGAN P, LEONARD P. Social Work Practice Under Capitalism: A Marxist Approach[M]. London: Macmillan, 1978: 3.

[16]WEEDON C.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7: 32.

[17]HEALY K. Social Work Practice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ange[M]. London: Sage, 2000: 46.

[18]LEE J A B.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Build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 (2nd ed.)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VALENTICH M. On Being and Calling Oneself a Feminist Social Worker[J]. Affilia, 2011(1): 22-31.

[20]SUNDAR P. Multiculturalism. In Gray M and Webb S (Eds.), 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Methods[M]. London: Sage, 2009: 98-108.

[21]KEMP S, BRANDWEIN R. Feminisms and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twined History[J]. Affilia, 2010(4): 341-364.

[22]HOLLIS E V, TAYLOR A L.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ort of a Study Made for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58-59.

[23]PAYNE M.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3rd ed.)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95.

[24]GUTIERREZ L M, DELOIS K A, GLENMAYE L. Understanding Empowerment Practice: Building on Practitioner-Based Knowledge [J]. Families in Society, 1995(9): 534-542.

[25]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J].社会工作,2024(3):1-24.

[26]童敏,周晓彤.基层治理与自我赋能:中国特色社会工作道路的理论审视[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12.

[27]SPECHT H, COURTNEY M E.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87.

[28]REID W J. Task Strategies: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Clinical Social Work[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29]OKITIKPI T, AYMER C. Key Concepts in Anti-Discriminatory Social Work[M]. London: Sage, 2010: 61.

[30]BLUNDO R, GREENE R R. Social Construction. In GREENE R R (3rd ed.), Human Behavior Theor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M].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17: 237.

[31]FRANKLIN C, HAI A H.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for Substance Us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Health and Social Work, 2021(2): 103-114.

[32]PARTON N, O'BYRNE P. Constructive Social Work: Towards a New Practic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52.

[33]HOLMES G E, SSLEBY D. Empowerment, the Medical Model, and the Politics of Clienthood[J]. 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1993(1): 61-78.

[34]SULLIVAN W P, RAPP C A. Honoring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The Strengths Model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Saleebey 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4th ed.) [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263.

[35]MUCHTAR A T, OVERTON J, PALOMINO-SCHALSCHA M. Contextualising Empowerment: Highlighting Key Elements from

- Women's Stories of Empowerment[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19(8): 1053-1063.
- [36] MCMILLEN J C, MORRIS L A, SHERRADEN M. Ending Social Work's Grudge Match: Problems Versus Strengths[J]. *Families in Society*, 2004(3): 317-325.
- [37] SALEEBEY 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Possibilities and Problems. In SALEEBEY 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4th ed.)* [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292.
- [38] ROWE W. Client-Centered Theory: A Person-Center Approach. In TURNER F J,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4th ed.)*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75-76.
- [39] PAYNE M. *Humanistic Social Work: Core Principles in Practice* [M]. London: Lyceum Books Inc., 2011: 10.
- [40] WEICK A, KREIDER J, CHAMBERLAIN R. Solving Problems from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ALEEBEY 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4th ed.)* [M].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116.
- [41] GOLDSTEIN E G. *Ego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2nd ed.)*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8.
- [42] FOOK J. *Social Work: 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104-114.

## The Governing Paradigm of Chinese Society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Tong Min*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ocial work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needs to examine its specialty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paradig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al work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both rely on the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people's desire for a benign society circulation and life order, and both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professional exploration from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to the adjustment of life relationship. The difference is that Chinese social work constructs the intellectual paradigm of practice in the new stage of modernization of life order reconstruction, and realizes the independent growth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increasingly alienated social relations based on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This is a governance paradigm of social work that concentrates on improving individual autonomy,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pro-problem solving paradigm created by Western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period as the core concern of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This governance paradigm can not only recover the individual autonomy lost in the process of over-standardized modernization, but also show the diversified modernization demands of China, a later-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unique role of social work in promoting human modernization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society work;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service perspective; governing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 苇 如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极限思维的理论寻绎及当代价值

韩 隽 张山杉

**摘要:**自党中央首次提出极限思维一词以来,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要深刻把握极限思维的科学内涵,必须立足其出场和发展逻辑。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共鸣,且蕴含着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极限思维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的发展与运用,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赓续。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防范化解“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极限挑战,必须充分发挥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既要正确处理“风”和“浪”的关系,又要下好先手棋,积极谋求战略主动,更要以顽强的斗争精神来迎接极限的洗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

**关键词:** 极限思维;中国式现代化;底线思维;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82-06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然其道路并非一马平川。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形势局面,要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就必须以极限思维审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潜在的风险矛盾。

## 一、中国语境下极限思维的出场逻辑

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最早应用于数学领域,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极限处理来审视事物的变化特征。知其源则可壮其力。2023年5月30日,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出现极限思维一词。这是该词首次被党中央重要会议所提及,也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对极限情况的有效防范和化解。梳理归纳极限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出场和发展逻辑,既是科学把握并有效发挥其思维

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将这一科学思维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 1. 极限思维一词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提出过程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极限思维一词在中央主要报刊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具体实践领域。如训练中要坚持极限思维、疫情防控中的极限思维、防灾减灾救灾中的极限思维、防汛救灾中的极限思维等。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极限思维一词的运用逐渐转向宏观战略层面。《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三次提及极限思维,分别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挑战”<sup>[1]48</sup>，“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处置系统性危机的预案”<sup>[1]277</sup>，“要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损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形形色色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切实提高防范

收稿日期:2024-10-12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涉疆政策研究”(21XGJ005)。

作者简介:韩隽,女,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张山杉,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化解风险的本领”<sup>[1]</sup>566。可以看出,在2022年下半年,极限思维已经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次提及极限思维的内容为党中央正式提出极限思维进行了必要的预热和铺垫。

2023年5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sup>[2]</sup>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重要会议上明确提出极限思维。该词的提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2023年7月11日,习近平再次强调,“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紧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sup>[3]</sup>。2023年9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sup>[4]</sup>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影响下,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极限思维的出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 2. 对于极限思维内涵的既有认识

从现有成果来看,《学习时报》于2023年6月7日率先刊发《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一文,对极限思维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界定:“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或事物推至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说白了,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时,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它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sup>[5]</sup>随后,一些媒体如《解放军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也相继刊登关于极限思维的理论文章,进一步阐释极限思维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如题为《坚持极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文指出:“所谓极限思维,就是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将所思考的问题及其条件进行理想化假设,当假设被推至极大或极小的极端状态时,问题的本质便会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暴露出来。”<sup>[6]</sup>除极限思维的内涵界定外,现有研究成果还从“极限思维与国家总体安全的关系”“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辩证关系”“极限思维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如何运用极限思维”等方面进行阐述,为学界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引导和方法借鉴。

综合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极限思维的基本内涵已取得初步共识。其一,极限思维是指通过某一问题或事物相包含、相关联的要素条件,通过极限化的处理,模拟出极限状态,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如何规避、怎么应对的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其二,极限思维的现实目标指向在于防范和化解今后时期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风险挑战。其三,坚持极限思维的方法要求是“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通过“下好先手棋”来争取战略主动。其四,为进一步发挥极限思维的现实价值,还应在主观上具备“极限心理”,在认识上持续积累“极限经验”。

## 二、极限思维的理论溯源

极限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既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着高度的哲学共鸣和思维契合,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重唤。对极限思维的理论溯源是深刻把握其理论意蕴和核心要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其有益的补充与诠释,更是进一步激活其现实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 1. 极限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呼应共鸣

极限思维的内在哲学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共鸣,即同样蕴含着联系观,遵循着质量互变原则,彰显着对立统一规律。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极限思维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和完善供给无穷养分。

坚持极限思维,就需要以联系的整体性视野多维窥探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恩格斯指出:“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sup>[7]</sup>一方面,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充分把握某一问题或事物同外部环境的联系、其他问题或事物的联系以及同自身内部诸要素的联系,是科学把握各种变量对事物影响的关键所在。如果抛弃联系观而运用极限思维,仅在单一要素的极值中看待问题,那么得出的一切结论将始终无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事物联系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联系都分别采取各自特殊的具体形式。这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掘某一问题或事物表象之下的深层次、隐性联系,又要以多样性视野审视不同的联系形式与方式。与此同时,要坚持以客观规律为依循,避免在运用极限思维的过程中漫无目的地扩大或缩小问题域,始终注重思维发散与思维聚焦

的有机结合。

极限思维的运用秉持质量互变定律的原则依循。质量互变是双向度的运动变化,既包括推动事物前进发展的积极意义变化,同样也包含存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激化和整体走向衰败倒退的消极变化。

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推送某一变量至极致状态来审视量变的趋势、把握度的节点、发现质变的必备条件,避免将极限思维同激变论和灾变论混为一谈。世界上不存在一蹴而就的质变,极端状态只是以结果的形式进行呈现,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长期的量变与积累。也就是说,“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质的质的”<sup>[8]</sup>。脱离对量的关注,则无法科学推导某一问题或事物的极限。这也说明,在运用极限思维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片面地对待极限情况,而应在重视量的变化过程中适时审视极限。

另一方面,事物同样存在急剧恶性质变的可能性。这既包括因长期忽视部分量变而造成的恶性质变,也包括外力对事物原有运动轨迹颠覆所造成的恶性质变。对此,既要思考如何在形势向好的情况中勇于开创新局,站稳新的基本盘,也要及时跟进掌握因量变所产生的局部性部分质变的具体情况,防微杜渐,谨防底线失守。

坚持极限思维,就要坚持在对立统一的基点之上把握极限。极限的形成是统一体内多种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既包括事物运动变化的上限和下限,同样也是有限和无限的分界线,甚至在特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列宁曾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sup>[9]</sup>。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应当利用好对立统一规律这把“金钥匙”。其一,要坚持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既要推动有利因素最大化地从有限向无限发展,持续扩大向好面,又要始终保持敏锐的预警察觉能力,能够遏止不利因素从有限向无限的蔓延与恶化,避免有限的矛盾风险向无限面转化。其二,要坚持上限与下限的对立统一。既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以内生动力突破上限,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又要严守底线,避免形势的恶化与堕层;既要在突破上限后,稳定基本盘,也要在底线被凿穿的被动形势下,力争重塑底线。其三,要坚持“力所能及”与“力所不及”的对立统一。坚持长期做好“力所能及”之事,是有效避免“力所不及”情况发生的有效途径。当面对“力所不及”的境况时,要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将被动局面转化为激发潜力、提升

能力的机遇,为将过往的“力所不及”转化为今后的“力所能及”创造一切可能条件。

## 2. 极限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赓续

极限思维自古便蕴藏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极限思维既是一种思维形态,也是一种行为形态,更是一种文化形态。极限思维的当代表达与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激活。

一方面,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预立思想”,其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知里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与文化积淀。《礼记·中庸》率先提出“预立思想”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sup>①</sup>。做好“预”的必要准备,既是“立”的关键,更是防止“废”的情况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诸如“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等,同样是古人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警醒后人要秉持“预立思想”,防患于未然。《孙子·计篇》记载:“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sup>②</sup>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预先筹谋,避免极端情况的发生。由此可见,运用极限思维发挥“预”的作用,是有效规避“废”的发生的重要方式方法;反之,则“不预难立”“不立必废”。

另一方面,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饱经患难所形成的重要生存发展智慧,并作为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为历朝历代王侯将相所持重。《孟子·告子下》论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sup>③</sup>唐朝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特别提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sup>④</sup>等思想。从上述经典中可以直观感受到,忧患意识的丧失往往与“危”“溃”“亡”等极端境遇相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忧患意识”往往以极限思维表现为“生死存亡之道”,具备忧患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庭保持长久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必要条件;反之,则容易骄奢淫逸,走向灭亡。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载:“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sup>⑤</sup>概言之,我国古代典籍篇章中虽鲜有明确提到极限一词,但将极限思维的理念、方法贯通于忧患意识的各种解读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新时代,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 三、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 联系统一

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统一。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是促使两种科学思维方法实现思维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厘清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科学内涵,是正确把握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前提。底线思维是一种“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sup>[10]</sup>的科学思维方法,回答的是如何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争取最好结果”的问题。极限思维是指把研究对象推到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的科学思维方法,回答的是在面临“超出预期”“凿穿底线”甚至“史无前例”的情况下,该如何面对问题。由此可见,底线思维是谋划预期之内的科学思维方法,而极限思维更多强调的是如何面对预期之外的难题挑战。这两种科学思维既有区别与联系,又能实现彼此间的补益。

#### 1.“极限”与“底线”的内在联系

底线思维是极限思维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只有充分做好预期之内的事情,才能更为从容地面对预期之外的事。在“以预防废”中,下好先手棋,争取战略主动,是避免出现极限情况的必要前提。这里的“预”实际上是将“超出预期”“凿穿底线”的情况视为所谓的“忧患”。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sup>[11]</sup>由此可见,守好底线是有效规避极端风险、避免系统性矛盾和灾难的关键所在。

极限思维是底线思维的延伸和扩展。其一,从出场次序来看,自2013年7月25日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多达百余次。对比2023年5月30日首次出场的极限思维而言,晚于底线思维的提出近十年。其二,从表述逻辑来看,党中央在强调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之时,按照“底线思维在前、极限思维在后”的话语逻辑进行表述,着重突出了二者之间的递进关系和有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极限思维的提出本身即蕴含着“底线失守

该怎么办”的深意,体现出党中央对可能升级的外部风险的更深层次的研判与驾驭。其三,从现实意蕴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复杂形势和重大风险挑战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难度不断加码。以极限思维对底线思维进行扩展和补充,是应对我国今后所要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现实需要。当前时期,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仅需要具备底线思维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更要以极限思维提前谋划未来时期可能存在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复杂局面。

#### 2.极限思维与底线思维的辩证统一

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虽是两种独立的科学思维方法,但二者之间相互贯通。坚持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发挥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最大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正确运用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遵循。其一,既要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规避极限,也要在“凿穿底线”的极限情况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方面,要始终明确底线是什么、在哪里,“凿穿底线”的危害是什么,并以底线为基,客观谨慎研判未来;另一方面,面对“凿穿底线”“超出预期”的情形,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力求在极限中突破自我。其二,坚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将现有要素进行极限化处理。一方面,要坚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特征、运动轨迹以及本质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系统、发展、全面的视野,既要看到内部因素的极限化可能性,又要清醒认识到各事物间交织产生的极端情况。其三,坚持把“始终做好自己的事”作为应对极端情况的基础和保障。部分极限情况的出现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一定是不可取的。一方面,现有因素是一切极端情况的孕育母体。面对不可预期之事,最好的方式则是“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切忌陷入杞人忧天或者“惊弓之鸟”的错误心态当中。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地发现、重视现存因素中不易察觉、容易忽略的风险因素,提前干预制止存在恶性质变的风险苗头。其四,必须客观承认存在“底线即极限”这一特殊状态。也就是说,在特殊状态下,底线和极限存在相互重合的状态。在此类情况下,一方面,要把“底线当极限”而非把“极限当底线”,二者不容颠倒。把“底线当极限”是坚定根本立场的根本体现,把“极限当底线”实际等同于“毫无底线”。另一方面,在原则性问题上,要把底

线视作极限,对此,不能产生偏差和错误,否则将产生颠覆性危机。因此,要辩证运用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形成二者的思维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 四、坚持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

极限思维的提出始终坚持目标导向,有着鲜明的现实意蕴。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sup>[12]</sup>坚持极限思维的根本目的在于勇于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保持敏锐的战略判断力,下好先手棋,积极争取战略主动。既要努力做到“都想到”,也要对“想不到”有所准备,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正确认识所谓的“极限挑战”往往也意味着“危中有机”,要善于在极限中抓住机遇,寻求突破。

##### 1. 科学审慎把握好“风”和“浪”的关系

习近平多次以“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词语比喻风险挑战。这种话语表达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风险挑战加以形象化的呈现。“风”和“浪”的形式多种多样。“风平浪静”“风高浪急”以及“惊涛骇浪”三者间一体贯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是矛盾风险演变后的最坏形势。从演变逻辑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演变的结果。在此之前,运用极限思维科学把握“风平浪静”阶段是有效规避“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关键所在。其一,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要以“预能力”切断风险和危机产生的可能。如我国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应在各类重点领域制定周密的应急预案,防止“天灾”演变为“人祸”,避免形势朝向“惊涛骇浪”恶化。其二,部分风险和矛盾存在越级演变的可能。如“风平浪静”的状态一旦受到极端因素的影响,可能会直接转化为“惊涛骇浪”的严重局面,因此,应主动规避社会矛盾在外力作用下的极限升级情况,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重点解决容易升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消弭潜在的社会矛盾引爆点。其三,运用极限思维离不开树立正确的极限心理。也就是说,要实现“运用极限思维”和“具备极限心理”二者之间的

统一。须在“风平浪静”中居安思危,在“风高浪急”中面不改色,在“惊涛骇浪”中敢于斗争;同时,要坚决避免在“风平浪静”中放松警惕,在“风高浪急”中惊慌失措,在“惊涛骇浪”中一溃千里。

##### 2. 主动下好先手棋,谋求战略主动

下好先手棋、谋求战略主动,是科学运用极限思维的本质要求,同样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其关键在于“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打算”。习近平指出:“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sup>[13]</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道路,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并联式发展道路。但也需要认识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社会矛盾因自身的快速发展,存在交织并发的可能性。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转型、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国际竞争压力等问题是各个现代化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而我国则需要相对较短的时间阶段内集中面对。除此之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多亿的人口体量虽然是一种优势,但任何潜在风险矛盾同庞大人口基数相交织,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难以估量。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着低容错率的特性。故此,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对于后发型并联式现代化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面对潜在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倘若不能以极限思维“作最坏的打算”,往往将会导致在风险矛盾呈现之时陷入被动局面,阻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发挥极限思维的当代价值,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看,对部分潜在的、深层次的风险矛盾的防范化解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面对大党独有之难题、全面深化改革的下行压力、经济社会发展动能驱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务必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sup>[14]</sup>。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国际社会的共有难题,必须谨防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围追堵截。科学运用极限思维,必须“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潜在的极端风险矛盾,作最坏的打算,并向最好处持续发力,勇于同一切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拦路虎、绊脚石进

行斗争。

### 3. 以顽强的斗争精神迎接极限的洗礼

习近平指出：“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sup>[15]</sup>坚持极限思维的现实价值，关键在于充分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在斗争中防范化解可能产生的极限情况。一方面，敢于斗争是善于斗争的前提。敢于斗争，意味着我们要坚持极限思维，敢于“自找苦吃”，主动发现潜在的风险和矛盾，将其苗头遏制于未然，避免其从未然走向必然，从而防止造成颠覆性错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另一方面，善于斗争在于实现“预能力”与“极能力”的有机统一，将潜在的风险矛盾化于无形，尽可能地避免事后发力、事后弥补。现阶段，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危与机”并存。以极限思维科学处理“危与机”的辩证关系，是实现转危为安乃至转危为机的重要战略思维。

除此之外，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纵深，离不开“极限心理”与斗争精神的思维统一，这是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力量的有效途径。唯有坚持极限思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拓宽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 注释

①参见李凌云、纪双鼎主编：《论语·大学·中庸》，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1页。②参见陈曦译注：《孙子兵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页。③参见中国孟子研究院编：《〈孟子〉七篇解读》，齐鲁出版社2018年版，第822页。④参见吕祖效：《魏征谏言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⑤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0页。

####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3-05-31(1).
- [3]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N].人民日报，2023-07-12(1).
-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N].人民日报，2023-09-27(1).
- [5] 徐文秀.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N].学习时报，2023-06-07(1).
- [6] 王高贺，陈方玉.坚持极限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7-21(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
-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7.
- [9]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6.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0.
- [11]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J].中国民政，2023(10)：4-5.
- [1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N].人民日报，2023-02-14(1).
- [13] 习近平.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N].人民日报，2020-10-11(1).
- [1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3-02-29(1).
- [15] 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当代党员，2023(14)：1-6.

##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Extrem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n Jun      Zhang Shanshan

**Abstract:** Sinc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irst put forward the term “extreme thinking”, i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deep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extreme thinking,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ourselves on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logic. Extreme thinking, as a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 highly resonates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ontains prof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treme thinking i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leverag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extreme thinking to guard against and resolve the extreme challenges of “high winds and high waves, even terrifying waves”. We should not only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and “waves”, but also play a proactive role to actively seek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should meet the baptism of extremes with a tenacious spirit of struggle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table and farsighted.

**Key words:** extreme think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bottom-line think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责任编辑：翦 榛

# 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科技伦理治理

孙春晨

**摘要:** 学科交叉融合是指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的活动。学科交叉融合既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与行为规范,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提供向善的价值方向。科技伦理是科技类学科与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不只存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之中,凡是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伦理问题,都应被视为科技伦理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加快前沿和重点科技领域伦理治理规则的动态调整与制度构建;充分发挥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级各类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功能,科技伦理委员会能够为科技伦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专业功能提供实践平台;“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为培养跨学科的科技伦理治理专业人才提供了条件,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参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能够有效地克服科技伦理治理的技术化倾向,推动科技领域社会治理“伦理先行”的发展。

**关键词:** 学科交叉融合;科技伦理治理;科技伦理委员会;科技伦理专业人才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88-08

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从混沌不分到分化再到交叉融合的历史进程。学科的交叉融合消除了各类学科之间的相互孤立现象,使得由不同学科构成的现代科学研究系统走向全面的整合,共同组成一个以问题导向或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统一体。科技伦理从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层面约束科技活动行为,促进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作为学科交叉融合产物的科技伦理属于“新文科”专业,它的出现因应了科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如果仅仅将科技伦理看作自然科学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与伦理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就是对科技伦理丰富内涵的狭隘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凡是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伦理问题都属于科技伦理问题。针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科技伦理问

题而建立的各级各类科技伦理委员会,是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平台。“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使得培养科技伦理治理专业人才成为可能。

## 一、学科的分化与交叉融合

学科交叉融合是指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的活动。学科交叉融合既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学科交叉融合需要借助各学科的知识才能进行,它是问题导向或问题意识之下的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整合。学科交叉融合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创新性成果的方式之一。

近代以来,学科分化曾经是学科发展的主流。至

收稿日期:2024-10-19

作者简介:孙春晨,男,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北京 100872)。

20 世纪上半叶,大学最终确立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若干经典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学科分化使单一学科专业研究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学科和专业分化是否充分和彻底,成为某一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几十年,学科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重要转变,这就是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加剧,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对一些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复杂问题的研究需要多个学科知识的协同合作,学科发展开始走向交叉融合,传统的经典学科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和超越。在现代学科的整合历程中,交叉学科的异军突起是学科整合的显著标志和重要成果。

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术语,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 Woodworth)于 1926 年提出,他倡导在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开展科学研究。1930 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正式使用了“交叉学科”一词。20 世纪中期,“交叉学科”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开始广为流传<sup>[1]</sup>。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上学科分化与学科整合这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互为补充。随着学科整合的不断深化,新兴的交叉学科大量涌现,这不仅改变了科学的总体结构,也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1970 年 9 月,法国召开了“大学的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跨学科——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问题》。1976 年,英国创办了国际性的交叉学科杂志《交叉学科评论》。与此同时,国际上各种交叉学科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交叉学科总体规律的研究也格外受到青睐<sup>[2]</sup>。我国的交叉学科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起步,然后很快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2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原有 13 个学科门类基础上增设“交叉学科”门类,交叉学科正式成为我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作为一个正式的独立学科门类,突破了传统学科的设置类型,实现了学科划分的根本性变革,交叉学科多年来备受争议的“合法性”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交叉科学部。202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实行先试点设置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机制,为交叉学科发展创造了灵活规范的政策环境。我国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顺应了现代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学科交叉融合是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直接反

映。作为联结和协同不同科学领域链条的交叉学科,有效地打破了学科间的藩篱,弥合了不同学科发展中的相互隔离现象,整个学科研究的结构由单纯的横向分布向纵横交错转化。不同学科只有打破学科固有的疆域限制,在交叉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生命力,释放学科交叉融合的巨大能量,才能真正推动学科的整体性发展。知识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广泛发生在各个学科领域,众多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几乎都来自学科交叉融合领域,学科交叉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学科交叉融合旨在整合两个或多个不同学科,实现不同学科知识和学科话语的互通有无,在研究路径、科研组织方式和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其突出的整合优势。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人类已步入以学科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时代,研究范式、组织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单一学科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难以实现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复杂问题的解决,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

学科交叉融合将加强纵向分化的各专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学科交叉融合消除了各类学科之间的相互孤立现象,使得由不同学科构成的现代科学研究系统走向全面的整合,共同组成一个以问题导向或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统一体。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包括学科体系、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竞争格局在内的全球科技创新体系都面临新的变革甚至重塑。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突破的重要途径,科学发展呈现出相互渗透和重新汇聚的趋势,在科学逐渐分化与系统持续整合的反复过程中,新的学科增长点不断产生,并且衍生出一系列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而学科前沿领域的发展可能孕育着重大的学科突破与变革,引发学科体系的重大变革,带动相关领域的进步与发展<sup>[3]</sup>。由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前沿领域的问题日益复杂,而这些复杂的问题又多居于学科的交叉地带,这就使得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够为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提供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观念和方法,而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所产生的成果亦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和现实关联,当今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 二、作为学科交叉融合产物的科技伦理

交叉学科不是人为刻意形成的,它不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任选出来的学科硬性搭配在一起被创造出来的。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的知识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上存在相互联系时,富有成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才能得以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复杂,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科技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这些伦理挑战涉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生命尊严、人类基因编辑等多个方面,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共同应对。科技伦理是科技类学科与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属于“新文科”专业,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蕴含着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伦理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除了带来不容置疑的好处之外,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当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造成非常多的没有想到的后果,可能带来有害的影响。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物的科学技术,有可能反过来非预期地制约人类自身。风起云涌的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颠覆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规则,制造了多种新型的伦理交往和道德生活场景,打破了传统的常态伦理秩序和道德生活。在科学新发现、技术新突破日益造福人类的同时,大量科技活动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风险难以预判,科技的误用和滥用将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个人权利等造成显性的与潜在的威胁。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科技伦理的引导,科技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各方面风险就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大。在科技创新成果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诸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算法歧视、隐私保护等社会问题,基因编辑、基因增强等生命科学新技术引发的不确定性伦理风险等,也已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和加以解决的现实难题。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和预测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

科技创新面向前沿科技领域,是对人类未知领

域的探索与开拓,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这种不确定性以多种形态呈现出来,比如,不确定的技术路线,不确定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不确定的社会影响等。由于存在这些不确定因素,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推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将会带来大量显在和潜在的伦理风险。科技成果的误用和滥用,对个人而言,将会对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威胁,侵犯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对社会来说,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强化了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进程,而技术治理具有“双刃剑”的特征,如果社会治理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技术治理无视伦理边界或基本的伦理准则,技术治理所引发的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以及公共权力的越界等伦理问题也会随之暴露出来。科技赋能的技术治理缺失价值理性。从全球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看,因科技创新而加持的治理技术已全方位运用于社会治理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技术治理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形态,彰显了社会治理的现代性特色。科技赋能的技术治理对公众生活产生了深度影响,技术治理过分强调工具理性,缺乏对价值理性的考量,存在“治理”变“控制”的伦理风险,而“技术乐观主义”加速推进了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这就可能带来将社会治理转变为完全依照科学技术方法进行运作的风险,导致个人的主体性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合宜性等关乎人类生活价值的因素被忽视,复杂多样的个人和社会伦理关系都被抽象成一组或多组数据与代码。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技术治理过程与治理伦理目标逐渐分离,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维度被忽视。

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与人与自然关系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与行为规范。作为科技活动道德指引的科技伦理,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提供向善的价值方向,从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层面约束科技活动行为,促进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推动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科技伦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科技创新成果不损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保障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切身利益,促进人类社会沿着合乎伦理和道德的方向可持续发展。科技伦理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包括科技研发、产品生产、服务提供等多个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节,科技活动应最大限度避免对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潜

在威胁, 尊重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

科技伦理不只存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之中, 如果仅仅将科技伦理看作自然科学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与伦理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就是对科技伦理丰富内涵的狭隘认识。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密切相关, 凡是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伦理问题, 都应该被视为科技伦理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科技伦理涉及的学科就更加多样。比如, 数字科技带来的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 塑造了企业伦理和经济伦理的新形态, 因科技的嵌入所呈现出来的企业伦理和经济伦理问题有着明显的新特征。平台经济企业的用工制度就对传统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伦理关系形成了新的挑战。传统企业用工要签劳动合同, 有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但是, 因采用数字技术而出现的平台经济企业, 其用工制度特别灵活, 劳动者和企业之间不一定签订劳动合同, 出现了“去劳动关系化”的趋向。平台经济企业的灵活就业模式或许扩大了劳动者选择职业和岗位的自由权, 但“去劳动关系化”又会带来企业如何保障员工权益的伦理问题。作为灵活用工的个体劳动者, 与企业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的权利就可能受损。这样的企业伦理新问题也是由科技进步引发和延伸出来的, 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之上的经济生活领域的新型伦理问题, 而不只是科技活动单一领域的伦理问题。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之上的其他应用领域的伦理问题, 是广义的科技伦理问题, 当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的伦理问题都与科技进步和科技发展相关联。

### 三、学科交叉融合之于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性

推动科技向善必须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从国家层面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 确立了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 明确了科技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 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要求。这一顶层设计, 对有效防范科技伦理风险、推动我国科技向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随着我国科技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 科技创新的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扩大, 涉入更多的“无人区”, 科技创新引发

的新型伦理问题给科技伦理治理带来更多的挑战, 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需要全面加强科技伦理研究, 加快提升科技伦理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开展科技领域的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伦理先行”。科技伦理要求回答以下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在规划一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时, 是以“防范原则”还是“先占原则”作为主要价值导向?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 如何理解和实践“伦理先行”的原则? 如何确定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策略, 如何制定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具体方案? 对科技创新来说, 如果缺乏伦理学辩护和伦理学论证, 就难以制定出来引导科技发展方向的合理的伦理规范, 更不可能对科技创新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管, 科技活动的前沿探索也会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因此, 开展科技领域的社会治理, 需要对科技创新的伦理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 打破科技创新“先做事, 后讨论”的原有思路。在科技研发活动的社会治理中, 唯有做到“伦理先行”, 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伦理标准和规范指南, 推动科技活动相关领域的伦理立法, 才能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科技创新实践, 并通过建立伦理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融合和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价值相协调的良性社会治理。

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合作。科技伦理研究和科技伦理治理涉及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专业, 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 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合作。科技伦理治理要求打破学科壁垒, 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研究, 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全面的学理支持; 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可以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多元化的思考方式, 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针对科技发展中的新型伦理问题, 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可以产生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科技伦理治理要求健全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机制, 加强科技伦理专业研究人员与其他学科专家学者的交流、对话和合作, 与科技工作者开展协同合作研究, 吸纳新知, 更新思维, 前瞻性地预判、权衡和应对科技伦理风险, 在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等问题上融入相关的科技伦理理念, 达成基本的伦理共识, 向全社会传播科技向善的道德文化, 为解决科技伦理问题提供咨询建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其带来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相关的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法规,如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19年4月8日发布),用于指导企业和政府部门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这个伦理准则包含了7个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监督能力、安全性、隐私数据管理、透明度、包容性、社会福祉、问责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在未来能够值得依赖。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2021年9月25日发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同时,增强全社会的人工智能伦理意识与行为自觉,积极引导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活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这些准则和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和协作,充分吸收了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科技伦理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涉及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专业。随着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复杂,呈现出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快速进步,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这些挑战涉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生命尊严、人类基因编辑等多个方面,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共同应对。因此,需要健全多学科研究协同机制,加强科技伦理专业研究人员与其他学科专家学者的交流、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科技伦理挑战。通过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完善协同研究机制,加强学科间交流与合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决策提供学理支持,为现实科技伦理问题解决提供咨询建议。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亟须通过不同学科的合作,促进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提高科技伦理治理的能力。2024年11月22日—23日,由中国科技伦理学会(筹)联合中国伦理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13家全国一级学会共同主办的以“跨越边界的科技伦理”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科技伦理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多视角、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与思想碰撞,为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跨学科的全新视角与方法,为科技伦理研究拓展深度与宽度,为解决具体的科技伦理问题提供更丰富的路径,为科技创新的健康发展探索坚实的伦理支撑与治理策略。

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间的融合与创新。在科

技伦理治理中,这种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形成共识,共同应对科技伦理挑战。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合作,可以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科技伦理治理涉及众多领域和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共同应对。多学科协同研究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全面的学理支持。例如,哲学可以为科技伦理提供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法学可以为科技伦理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规范,多学科协同研究能够针对具体的科技伦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可以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多元化的思考方式,从而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社会学可以研究科技伦理问题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态度,为制定科技伦理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工程技术学可以研究科技伦理问题的技术实现和风险控制,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多学科协同研究有助于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创新与发展。针对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可以产生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这种创新与发展有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挑战,推动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不断进步。

科技伦理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法治、广泛的民主、高效的管理、透明的政务等通常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善治”,其要义之一就是在国家治理的全部领域嵌入伦理价值的要求,推进社会优良伦理秩序的建立,尊重并保护公民的行为自由、隐私等多方面的权利。当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科技活动领域的治理,而科技创新活动引发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差异化的趋势。目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领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看,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科技伦理治理,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让科技创新造福人类。

科技伦理治理助推国家治理走向“善治”。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做出系统部署,确立了我国科技

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科技活动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伦理原则。这一顶层设计,对有效防范科技伦理风险、推动我国科技向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科技伦理治理贯彻实施上述基本要求和伦理原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善治”的伦理目标相契合。技术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在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同时,需要切实维护公民的尊严,保障公民以自由为核心的多方面权利,努力消除因技术控制而带来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科技伦理治理嵌入社会生活的全领域。科技伦理问题具有横跨多学科领域的复杂性,对因科技创新而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进行社会治理,必然涉及多学科知识。跨学科性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特征,当代出现的新型科技伦理问题有赖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关学科的合作联动才能得以阐释和解决。在科技伦理治理中,伦理学者需要与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开展协同合作研究,前瞻性地预判、权衡和应对科技伦理风险,在科技伦理治理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科技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管理、教育、生态等领域都因科技创新发生着巨大变化,引发了诸多新型伦理问题。科技伦理治理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只是对科技活动的伦理治理,应当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理解科技伦理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不只是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自身提出了如何进行伦理治理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的直接影响,诸如数字经济、生命医学、生态环境、国际关系、个人隐私和社区管理等,同样需要进行相应的伦理治理。

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在科技迅猛发展并全面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今天,科技伦理治理应当超越只是治理科技活动的界限,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例如,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引擎,而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式,因科技创新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新形态,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形态和市场组织结构,引发了诸多的经济伦理新问题,对传统经济伦理理论形成了多方面挑战。市场机制推动了企业之间、商业之间公平竞争伦理的逐步实现,但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市场化数字平台经济却出现了垄断现象,

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数字化技术侵害了消费者的隐私权、知情权和选择权。经济伦理治理虽然不同于科技伦理治理,但因科技创新对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只是依靠传统的经济伦理治理模式不能解决科技创新时代经济生活领域的新型伦理问题,科技伦理治理有必要介入经济伦理治理的过程之中。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伦理治理都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以科技伦理治理为代表的各领域的社会治理联动合作,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 四、学科交叉融合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

### 1. 加快前沿和重点科技领域伦理治理规则的动态调整与制度构建

当前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脑科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脑机接口等领域,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前沿生命科学与医学。人工智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主要代表,它研究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开发应用系统。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出突破式发展、快速迭代演化的态势,带来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生成、个体认知操控等伦理风险。由于人工智能具有替代职业岗位的作用,由此产生就业结构调整问题,失业危机加剧,这就牵涉到人的工作权利和就业伦理。如果将人工智能进行武器化应用以及开发出强人工智能系统,对人类的整体生存发展将构成巨大的威胁,人的生命权就得不到保障。对人工智能领域出现的伦理风险,国际社会通过发布指南、建议等伦理“软约束”,确立了对该领域的伦理治理原则。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人工智能法案》等,就是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防范措施,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准则的动态调整和制度构建提供了参照。

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技术已经发展到临近突破现有伦理规则边界的阶段,需要及时通过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对现有伦理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技术发展对伦理规则的需要,进而展开相应的伦理治理。例如,国际干细胞学会(ISSCR)于2021年发布指南,放宽了数十年来培养人类胚胎的著名的“14天规则”(指研究者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胚胎,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的伦

理规则)的时间限制,允许胚胎生长超过14天,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发育,追溯一系列疾病产生的源头,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是否放宽人胚胎研究“14天规则”,各国相关学科的学者应积极开展对话,设置专门的科学研究及伦理监管程序,评价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在获得国内外多学科同行共识的基础上,审慎调整人胚胎研究的伦理规则。

## 2. 充分发挥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级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功能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作为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的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专家委员会,下设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医学三个分委员会。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目的是加强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其任务是抓紧完善制度规范,健全治理机制,强化伦理监管,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从世界范围看,伦理委员会作为社会治理的行动机制首先出现在生物和医学科技领域。随着生物和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涉及生命和技术的各种伦理问题日益增多,伦理委员会的作用范围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具体的科技领域。《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就是在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指导下,科技部在深入调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起草而成的。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将研究制定科技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清单,其中医学、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是重点领域,这些清单的发布和动态更新的目的就是要让科技共同体、管理者和社会公众等群体认识到具体的科技伦理风险。

2023年10月,科技部会同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伴随产生的伦理问题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科技向善,迫切需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审查办法”是覆盖各领域科技伦理审查的综合性、通用性规定,重点解决科技伦理审查职责不明确、审查程序不规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健全体系、规范程序、严格标准、加强监管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措施,做出相关规定。“审查办法”划定了科技伦理审查的主要范围,明确了科技伦理审查的责任主体,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设立标准和组织运行机制,规定了科技伦理审查的基本程序,确定了伦理审查内容和审查标准。

其中第七条规定,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人数应不少于7人,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若干。此规定,对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学科专业背景提出特定要求,即由具备相关科学技术背景的同龄专家以及伦理、法律等相应专业背景的专家组成。将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作为科技伦理审查管理的责任主体,并要求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与科技伦理相关的社会治理领域非常广泛,只是成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是远远不够的。科技伦理要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在各个具体领域成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就势在必行。比如,数字技术对企业伦理和消费者权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各级工商管理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和各类与企业相关的社会组织可以牵头成立平台经济伦理委员会;因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环境伦理问题令人担忧,各级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各类环境保护团体或组织等可以牵头成立环境伦理委员会等。针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科技伦理问题而设立的各种类型的专业性伦理委员会,能够为科技伦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专业功能提供实践平台。

## 3. 培养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伦理治理专业人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增设“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为培养科技伦理治理专业人才提供了条件,使得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加入科技伦理治理过程成为可能。科技、医疗、教育、经济、环境、社区等领域的相关行业或组织在应对新出现的具体伦理问题和道德场景时,亟须一大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参与行业或组织的伦理决策与伦理治理。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计划招收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高校有20所左右,几乎都设置了科技伦理专业方向。“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解决问题越来越需要整个科学领域的知识,从物理学到生物学直至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在极需要能够参与处理这类问题的‘通才’。但在这些情形中,通才不可能是一个对整个问题都有全面的技术理解的人,这种人通常是不存在的。确切地说,通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在一两个专业受过扎实的基础训练,而他的探索兴趣和技能使他能够深入了解所涉及到的更大范围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sup>[4]</sup>众多高校设置科技伦理专业,培养具有扎实伦理学和科技知识的科技伦理专门人才,对

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如何培养适应科技伦理治理需求的合格的专业人才尚在探索之中。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建立解决现实的科技伦理问题的知识系统和学习体系,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为此,需要在跨学科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上下功夫,转变传统的单一学科讲授式课堂模式,以多学科视角把案例教学、研讨教学、实践教学等更有利于科技伦理教学的课堂形式引进来,着力开发以案例分析为重点的教材体系,以实践推理能力为中心重塑学生的学习体系。引进跨学科师资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通过建立专业的实训基地和建立行业导师制度,面向真实的科技伦理治理情境,培养学生实际工作中提升治理水平和实践能力<sup>[5]</sup>。在现代社会治理系统中,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由应用伦理专业人才构成的应用伦理职业共同体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主体。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涌现了诸多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隐蔽性等特点的新型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单一学科的实践智慧很难对这些新型伦理问题予以阐释和加以解决。跨学科的科技伦理专业硕士人才参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能够有效地克服科技伦理治理的技术化倾向,推动科技领域社会治理“伦理先行”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潘懋元,陈斌.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21(4):56-60.
- [2] 刘大椿.学科整合与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J].中国外语,2008(5):110-111.
- [3] 《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2035发展战略总论》项目组.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突破的重要途径[N].中华读书报,2024-08-21(18).
- [4] 西蒙.科学中的交叉学科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1986(3):233-235.
- [5] 张霄.培养科技伦理人才守护科技安全[N].中国教育报,2024-12-04(2).

## Promoting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un Chunchen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activity of constantly breaking down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promoting mutual infiltration, intersection, and fusion between disciplines on the basis of recognizing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not only a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generate innovative results. Technology ethics refers to the value principles and behavioral norm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 society, and nature when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roviding a positive direc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thics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disciplines, ethics,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It not only exis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but also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that arise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Any ethical issue aris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and solved in technology ethics. The governance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governance rules in cutting-edge and key technological fields, fully leverage the functions of various levels and types of technology ethics committees composed of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provide a practical platform for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technology ethics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ster's degree in "Applied Ethics"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professionals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technological tend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first"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thical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ethics committee;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echnology ethics

责任编辑:思 齐

#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及其优化路径

肖祥

**摘要:** 伦理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而政治伦理基础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政治观念与政治制度供给是政治伦理基础的基本构成,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支撑,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公民权利、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基础,其价值追求以共同善和实现共同善为鹄的。从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实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设担负着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使命。优良的政治价值观念与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重要路径:一是铸牢人民至上与法治文明政治价值观念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之善;二是完善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之善。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政治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096-12

在复杂现代性之下,有效应对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投射”,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优越性,必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伦理基础是伦理理念、伦理制度供给、伦理环境条件的要素集合,它是由政治伦理基础、经济伦理基础、文化伦理基础、社会伦理基础和主体伦理基础的系统构成。在其中,政治伦理基础是一个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在伦理基础的构成中具有根本性地位。政治伦理基础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善”的政治价值观念和“实现共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前者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之善”,后者确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之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既不是一个无根基的方案,也不是一个完成性的框架,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和“将来完成时”的持续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政治文明必然之理的实践展开。

## 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 内涵与追求

从价值叙事的实质内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是适应中国现代化新道路、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尊重公民权利、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民主自由等主题和要求“兼济”之政治制度安排。具有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基础是政治观念与政治制度供给两个层面的有机构成,其价值追求以共同善和实现共同善为鹄的。

### 1. 根本性政治伦理基础的内涵

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构成包括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行为主体伦理等要素,它旨在建立权力运行伦理规范、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提升政党执政能力、实现善政与善治。以中

收稿日期:2024-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研究”(24AZX002)。

作者简介:肖祥,男,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金华 321004)。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恢宏的使命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任务需要一种具有根本性的新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规范体系支撑。为此,从具有逻辑优先的伦理基础——政治伦理基础,重构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论,是本性的伦理基础工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合法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国探索,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走出的现代化新道路。就此意义而言,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拓展,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或者说,缺失政治伦理基础,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政权兴亡疑问时,提出了跳出周期率的民主新路——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奠基和准备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发展时期;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sup>[1]28</sup>。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正式确立,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找到了正确方向并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二,以实现善政与善治目标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观念及制度安排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主体框架。政治治理或国家治理的伦理目标是实现善政和善治的协同推进。就“政”和“治”的逻辑序列而言,善政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善治是善政的后果和效应。善政即“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其关键是政治权力的正当运用。善政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严明、政府清廉、行政高效、服务良好。善政意味着合理的政治观和国家观的建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书·大禹谟》)因此,“能否提供最大化的公共价值就成为最根本的

政治观和国家观”<sup>[2]</sup>。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是善政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落实,善治的过程就是善政施与社会生活和广大民众的过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善政向善治的推进,也是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然证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理念和行动,不仅建构和正在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政体”的实质性价值秩序,也建构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政道”的程序性价值秩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实质性推进。

第三,维护公平正义的观念及制度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道义证明。好的政治以实现目标的善为追求。目标的善何以体现?毫无疑问,通过国家对全体公民负有的责任得到证明——此乃公平正义的实质与诉求。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现代国家合理性的首要原则是共和主义原则,国家据此从公民的委托中获得统治权力,这一原则使正义成为政治伦理的核心。事实是,公平正义不仅仅是制度伦理学关注的主题,也是美德伦理学的核心论题,更是当代发展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制度正义论者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sup>[3]3</sup>，“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sup>[3]54</sup>，“正义与否的问题只涉及现实的并且被公平有效管理着的制度”<sup>[3]55</sup>。罗尔斯强调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以及如何运用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改变不平等状况。制度正义究其实质而言,主要是从制度上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划界,从而实现主体公平。美德正义论者认为,美德的正义就是主体对正义的道德确认,即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在当代发展伦理学看来,发展的理想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古莱认为,发展的目的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sup>[4]12</sup>,伦理的

重要任务就是使得发展的行动保持人道。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享公平正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公平正义的伦理要求,旨在构建一种融合制度正义、美德正义和发展正义的现代化模式,以充分彰显发展的人道主义关怀。

第四,尊重公民权利的观念及制度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主体追求。尊重公民权利的制度建构决定了“好的政治”的伦理标准获得了共识,即“好的政治”不是用某种巧妙的方式或智慧的策略实现某个政治目标来定义,而是由它所追求和达到的目标的善本身而得到确定。从政治伦理基础的主体追求而言,好政治必须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对此给予制度确认和保障。在中外政治伦理思想中,何为“好的政治”观点众多,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确定的,这就是“好的政治必须合乎一线伦理——人权价值”<sup>[5]</sup>。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sup>[6]</sup>。文艺复兴以来,人权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论题。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做了界定:“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sup>[7]</sup>在康德那里,人权不再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一种理性权利,它是权利与义务、尊严与责任的统一,关涉着对他人平等权利的尊重和对契约合作的承诺。尽管西方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但是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作为现代人权的哲学基础的历史事实,“现代人权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sup>[8]</sup>。中国传统的“仁政”和“仁道”思想,尊人道、重人伦、讲人性、辨人格,实质上就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推崇。“孔子之学名为‘仁学’,这是就其理想而言。就其现实而言,孔子之学则可名为‘人学’。”<sup>[9]</sup>“仁学”即为“人学”,二者密切关联。中国传统伦理对人之权利的重视,深嵌于中国的文化血脉,影响着当代文化和社会生活。近代中国,国人从国家主权出发逐步认识个人权利,而就当时内忧外患的现状而言,生存权无疑是人之最重要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广大民众的权利变得充实、有效而丰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不仅获得了形式上的有效保障,也获得了实质上的充分证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尊重公民权利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目标。

第五,保障民主自由的观念及制度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实现方式。从政治伦理秩序的角度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秩序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如果公民服从该秩序,那么这种国家秩序就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sup>[10]</sup>。保障民主自由的制度实践,旨在建构一个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伦理秩序。民主的实质是自由,但显然,自由需要一种强制来维持其有效存在,也就是说,民主是自由与强制的和谐统一。民主并不是特殊意志的自由表达或协调一致,因为这样只能产生“众意”,民主应是具有共同善的追求的“公意”——它不否定特殊意志,而是使特殊意志成为“社会的”存在。“一种合理的政治理论并不在于去发现用来超越特殊意志的方法,而是在于理解真正的普遍性是如何可能在特殊性之中并且通过特殊性而呈现出来的。”<sup>[11]</sup>真正的民主,就是能够尊重特殊意志的存在,并且使之能够和谐地推进共同善的过程和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艰辛而漫长的探索逐渐形成和巩固,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获得了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坚持民主协商,有效保护“公意”并使之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提供了坚实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为个体意志提供自由空间,也为将一人一族之义凝聚成公意提供民主制度保障。

## 2. 共同善及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价值追求

在人类政治生活历史中,再也没有比对“何为善”与“何为共同善”更为悠久探求的政治话题了。在古希腊德性伦理思想中,“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sup>[12]3</sup>,最高的善或目的就是人的好的生活或幸福。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共同体所关心的不是当前的利益,而是生活的整体利益”<sup>[12]247</sup>,其影响深深地刻印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善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核心,是“好政治”的基本要

求,也是一个好政党、好政府的重要体现。共同善是政治的本真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价值追求表现在对共同善的准确定位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善的积极追寻。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征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追求的“共同善”就具有了双维度的内涵和要求。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言,共同善就是普遍认同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3]</sup>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共同善的目标。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共同善。就共同善的实践内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追求的共同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目的性共同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凝聚人口规模巨大集体力量的条件性共同善;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成果性共同善。就共同善的实现形式而言,共同善就是符合目的的政治伦理状态,其必然的实现形式是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发展全过程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形式,即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整合社会关系、促进民主监督、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生活改善。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而言,共同善就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和达成全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当代社群主义思想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只有通过恢复共同体传统、建立社群,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这个政治与经济进程纠缠在一起的网罗”正在制造的“越来越大的不平等”<sup>[14]</sup>。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善与公共利益相等同,并主张一种以共同善为实质内容的社会整体福利思想。社群主义对共同善的追求,对于克服新自由主义造就的当代个

人主义倾向和道德利己主义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但是社群主义建立在德性之上的、知识论意义的分配正义的解决方案,能否承担起更大范围的人类生活对共同善的追求,能否抗衡全球化对人类福利的破坏,甚或能否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都是值得怀疑的。与之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追求的共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共同善具有规范意义的方案设计,其价值智慧则是世界意义的。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基于人类未来发展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此后,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该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并被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做出了规定,指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善的目标追求——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sup>[15]</sup>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正是全人类共同善的目标设定。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只有采取合作共生的政治伦理逻辑,才能有效实现对共同善的追求。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一人一族一国的生存问题,只有寄希望于通过融通而出现一种超越一人一族一国之‘殊义’的普遍公义,才能得到解决”<sup>[16]</sup>。

概而言之,只有建构一种以政治哲学方法论为指导的价值思维——一种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传统、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人类文明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致思路径,身处复杂现代性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有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彰显对人类命运的价值关怀。由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才能焕发出亮丽光彩。

## 二、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设的文明使命

文明的概念与现代性相联系,是现代事物(如工业化、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等)的一个统称。康德将文明与公民社会、公共性、公意联系起来,认为文明的核心含义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规范性探索。现代政治文

明是现代社会人类政治活动进步的产物,它包括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政治理念与政治文化、现代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现代政治运行机制与程序等诸多成果。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全球化场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现代性背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设担负着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使命。在复杂现代性和矛盾全球化中,我们如何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传承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之既有作为一般范畴的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有作为特殊范畴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质,还有作为个别范畴的中国形态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总体性价值方向。

### 1.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为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提供价值保障

就推进中国发展的历史使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为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开拓了新道路。政治伦理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相互促进提供坚实保障。激发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是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国家的豪迈壮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sup>[17]</sup>。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且充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其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一方面,政治伦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契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sup>[18]</sup><sup>185</sup>,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和展示。马克思指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最后都要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19]</sup>。也就是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状态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是高度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就是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渐进实现的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将人

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sup>[20]</sup>。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并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sup>[1]</sup><sup>15</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建设中愈发受到重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21]</sup>的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化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确证——从社会关系的发展阶段和状态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获得了科学的理解,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sup>[22]</sup>。社会主义提出约五百年,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断彰显,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得到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目标正在从理想逐渐向现实转变,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由此熠熠生辉。

另一方面,政治伦理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为重要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雄健的姿态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加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整体性目标的实现进程。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力在于经济增长、物质财富丰饶、生产力提高,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公平正义。“发展的优点任务既不是求得总增长的最大化,也不是其最优化,而是为满足全国人口中最贫苦的、处于某种‘贫困线’以下的阶层的一批基本需求。”<sup>[4]</sup><sup>105</sup>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在解决“蛋糕做大”的同时,把“蛋糕做得更美味”,还要把“蛋糕分好”。也就是说,发展要遵循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大任务。”<sup>[1]</sup><sup>17</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大程度地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它开拓了规避西方“现代化悖论”和“现代性之殇”的新路径,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出场具有了与西方文明迥异的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sup>[23]</sup>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sup>[23]</sup>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一个恢宏的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主体工程,而基于政治伦理引导和保障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则是这个主体工程的两个重要基点。新发展阶段,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sup>[17]</sup>。

## 2.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动力

政治文明是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重要标识,而政治伦理基础是政治文明生长的沃土,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动力。作为世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表现在以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实现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进上,而这种推进具有显著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为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注入多维内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sup>[24]</sup>。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倡导,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价值观。从主体基础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个人、社会、人类主体,旨在为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类等关系提供价

值准则。从国际交往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而不同、共赢发展的价值路径,“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sup>[25]</sup><sup>568</sup>,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sup>[26]</sup>。从政党责任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照人类命运的世界情怀。从实现方式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拒绝“西方中心论”,反对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强调以尊重、平等、对话的方式实现和睦相处和合作共赢,因而是一种和合共生、开创未来的价值创造模式。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指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从文明发展协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从生态文明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类文明进步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从此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导引着人类文明的新走向,构建着人类文明的新格局,创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式。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为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容提供要素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形态文明的追寻,而是一种全要素文明探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27]</sup>这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容。与西方资本主义以掠夺、殖民为特征的单向度文明形态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性的、超越性的文明形态。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现道路提供逻辑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着哲学逻辑、历史逻辑、生成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哲学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主主平等”的思维方式,区别和超越西方传统的“主客对立”的现代化思维模式,因而能够实现文明之间的平等尊重和相互交融。从历史逻辑

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探索过程中、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相契合中逐渐形成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人类文明曲折发展而前途光明的历史方向。从生成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自己的路,体现了一种自主性生成的自信自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一种内涵式生成的价值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类命运和人类文明纳入发展视野,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生成的全球责任。从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抓住“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28]</sup><sup>28</sup>,改变了发展中国家要么依附发展、要么脱钩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人类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新的选择。

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推进、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了历史性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三、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优化理路

正如上文所言,优良的政治价值观念与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政治伦理基础两个基本层面的构成,前者从意识形态或观念上层建筑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根本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目的善”的彰显,后者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鲜明指向,是中国式现代化“手段善”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优化,必然是一套新型政治价值观念体系和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建构。

#### 1.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之善:铸牢人民至上与法治文明政治价值观念

政治价值观念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和政治活动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政治价值观念对个体政治行为(如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生活选择等)和社会政治生态(如政治氛围、政治环境等)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价值追求而言,优化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必须铸牢和践行人民至上和法治文明这两个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念。

第一,人民至上:尊崇和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政治

伦理基础的核心价值。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内含着是否体现公共利益、是否尊重公民的权利、是否尊重民意和是否给予弱势群体关怀等价值追问。这些价值追问,实质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构的基本要求。优化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必须进一步将公共利益、公民权利、民意表达和弱势群体关怀落到实处,使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成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

一是公共利益优先。公共利益是人民至上的实质内容,公共利益优先就是将公众利益放在政治活动的优先地位。对公共利益的重视有着悠久的历史伦理传统。中国古代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政治理念,其义就是倡导关注天下人的利益。孔子倡导仁爱,墨子倡导兼爱,其实质都是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心;道家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殒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吕氏春秋·贵公篇》亦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总的看来,战国秦汉之交,普遍性和全体性的“义”(“公”)的观念已经具有规范含义,并横亘整个以公权制为特征的古代中国。

在古希腊,被亚里士多德视作“主要科学”的政治学就认为,政治学事关人类最高的善——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并致力于寻找最适合于人类“优良生活”和“幸福生活”的优良政体。他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sup>[29]</sup><sup>3</sup>——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不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性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循着亚里士多德对城邦价值目标的哲学思考——把城邦的公共利益视为“善业”,并且是所有善业中的“至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理念做出基本的设定。作为人类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在公共利益问题上却显示了明显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矛盾特征。其时代进步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公共利益需求;其历史局限性则突出地体现在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成为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如此一来,“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sup>[30]402</sup>。而一旦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便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sup>[30]406</sup>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至高地位进行了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的意志得以存在,并承认这种存在是政治国家的最高存在,是伦理生活的最高存在”<sup>[31]</sup>。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否定私有财产,而是认为私有财产或资本作为劳动、作为积累的劳动,是人作为主体的本质属性<sup>[18]178</sup>,私有财产作为财富,是人得到自我满足的基本条件<sup>[18]200</sup>——马克思否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财产及其造就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扬弃不是消灭私有财产,而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和实现<sup>[32]</sup>。

中国近代以来基于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开启了对政治文明的实践探索,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中国政治新道路,对实现人民的公共利益做出了价值承诺。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sup>[33]809</sup>“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sup>[33]1094</sup>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加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sup>[28]27</sup>,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所谓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过程。

二是公民权利是人民至上的具体呈现。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对权利的理解

有伦理的和实证的两种进路。前者将权利看作人基于道德的理由或超验根据所应该享有之物,如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和国际法学创始人格劳秀斯就认为权利是一种道德资格;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人认为自由是权利的本质;康德和黑格尔则从自由意志解释权利。黑格尔认为:“权利的基础是精神,它们的确切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意志既是权利的实质又是权利的目标,而权利体系则是已成现实的自由王国。”<sup>[34]258</sup>从伦理的进路对权利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将利益作为权利的实质内容。从实证的进路理解权利,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将权利置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来理解,权利就具有了确定的、可感的内容。与以上两种理解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利用法律确认的权利,不过是出于维护有利于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对广大的劳动者往往徒具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法律上确认公民具有广泛的权利,如财产权、平等权、自由权、收益权和政治参与权,并且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保障,权利具有前所未有的真实性。

三是尊重民意是人民至上的价值态度。所谓民意,是指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在西方,尊重民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sup>[35]</sup>卢梭所言的整体的“意志”就是民意。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重视民心民意被推崇。中国古代就有“中和民意以安四乡”(《庄子·说剑》),“君多恤民意,毋忽岁谨忧”(《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等说法。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得民心、顺民意、厚民生、行民主,作为执政的根本价值理念。中国政治建设实践证明,民心民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生产工作上实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sup>[36]</sup>。邓小平强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死路一条。”<sup>[37]370</sup>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

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sup>[28]</sup><sup>37</sup>

四是给予弱势群体关怀是人民至上的底线要求。所谓弱势群体,从社会学而言主要指社会上易受伤害和比较脆弱的社会群体,从经济学而言主要是指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劣势、生活质量较低和承受力脆弱的特殊群体。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没有实现共赢,相反却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利益的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现象严重、社会福利削减。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的膨胀、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造成的弱势群体现象,成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一面镜子。与西方现代化发展不同,中国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37]</sup><sup>373</sup>。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非常重视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以“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受到保障)为基本要求,在2020年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关心民众生活、提高民生保障,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底线要求,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奠定了基本的保障基础。

第二,“法治文明”:巩固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秩序保障。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支撑,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提供秩序保障。“法治”,意思是法的治理,就是将“法”作为最高价值予以遵守和信仰,法律之下无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捍卫个人权利的保障。“法治”与“法制”相区别,“法制”则是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被用作治理的手段和强制的工具。从社会发展而言,法治是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国富民强的基本保障,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从公民个体而言,法治是维护公民的价值和尊严的强力保障。法治不仅仅表现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更重要地表现为理性精神的力量——“现代法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sup>[38]</sup>。从现代法治而言,只有强化权利保障、共铸契约精神、实现平等自由、加强宏观调控、推进协同治理,才能为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提供切实保障。

一是强化权利保障。权利是利益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表达。利益是社会的构成基础,“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sup>[39]</sup><sup>258</sup>。追求利益是人的存在特征,“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40]</sup>。只有将利益在法律上确认为正当权利,利益才是正当的、合法的,因此,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使利益机制得到充分保障,必须通过权利立法对利益机制进行确定和表达。

二是共铸契约精神。西方契约精神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壁鸠鲁以契约解释法的起源,苏格拉底更是因为信奉自己和国家之间有神圣契约,必须维护城邦法律而慷慨赴死。近代以来,霍布斯、洛克等人开创了西方契约精神的新发展,展现了对平等、自由、合意、信任、义务等价值追求。卢梭肯定了自由在契约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即社会契约的产物。康德进一步发展了近代契约论,“康德比卢梭更加坚信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正当性,肯定正是通过社会契约才建立人在社会中的自由”<sup>[41]</sup>。他把社会契约与“绝对命令”等同起来——因为“绝对命令”为入之行为提供最终根据,社会契约也就成为立法的最高标准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在19世纪,社会契约论遭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批判而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使得契约精神获得现代新发展,“作为公平的正义”被推崇,契约作为保障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方法而被肯定。在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契约精神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实质上可称为“契约经济”,它不仅以物的经济联系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奉守等价交换、遵守规则的原则,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到凸显,社会经济活动因为契约而实现公平竞争。随着经济契约化发展,契约精神已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契约精神是公共理性的绽放,其蕴含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原则建立在对个人主体性尊重的基础之上,为实现“我—他”“群—己”和谐提供价值路径,使得理性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建设成为现实。

三是实现自由平等。法治是文明历史演进的结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法律对自由的确认和对自由的保障。一方面,自由的价值观念构成了法治的本体论基础。在黑格尔那里,法、法律和法治是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法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

之积极生成。“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精神的世界”<sup>[34]</sup><sup>10</sup>。法律是法的外在形式。“法律是自在法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在它的客观规定在中,这就是说,为了提供于意识,思想把它明确规定,并作为法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通过这种规定,法就成为一般的实定法。”<sup>[34]</sup><sup>218</sup>法治则是法律的运用,就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治理使人回到自由即法的状态。自由作为法的本质或根本特征,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自由的理念是最宝贵的价值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sup>[42]</sup>在现代法治秩序的建设中,法是自由的彰显,并通过法律秩序的理性化而实现,这样的理念指导现代法治秩序的建设实践。现代法治秩序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安全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守的自由价值正是法的赋予和馈赠:法不是对自由的束缚,而是对自由的肯定和确认;自由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一种与责任相契合的主体有效支配必然性的方式,是法的实质体现。另一方面,法治社会贯穿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人人平等。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或地位。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内含着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的价值评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衡量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才算是实现真正的平等。也就是说,实现真正平等的根源在经济领域内,经济平等构成了平等的基础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最高层次的平等目标。

四是加强宏观调控。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实行以市场为轴心和导向的宏观调控,以此来组织经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目标。因此,现代法的精神必然包含宏观调控这一政策基础<sup>[38]</sup>。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五是推进协同治理。治理有理性沟通、协合而治、协商以治之意,突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元主体行动。治理思维是一种秩序思维,具

有鲜明的价值目的性和伦理导向性。“它主要是在把握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规律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自身形成的‘内在尺度’出发,以‘应然’的视角看待社会治理现实,赋予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方法、治理方式等社会治理要素以新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追求。”<sup>[43]</sup>所谓协同治理,就是运用治理思维,以公共善为理性目标的治理活动。就其多元主体的协同和治理的共同追求而言,协同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就是一种多元主体(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社会组织等)的沟通与行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协商民主在整合社会关系、促进民主监督、提升决策效率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为协同治理提供积极有效的方式。

走法治道路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sup>[28]</sup><sup>40</sup>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现代政治文明的滋养。“我们愿继续同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探讨实现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sup>[44]</sup>同时,我们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证并坚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sup>[45]</sup>

## 2.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之善:完善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安排

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核心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优良的政治制度供给并不断实现政治制度体系优化以实现这些价值目标。

从宽泛的意义而言,传统政治理论中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是指为实现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和方法的总和。在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就是政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优良的政体是一个能使人人“尽其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sup>[29]</sup><sup>344</sup>,他认为最好的政体应该有最好的治理,

“最优良的政体”意味着“最优良的治理”。在西方的政治制度理论传统中,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财产不仅被认为是促进政治完善的重要手段,本身也被认为就是目的。洛克的主张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从马基雅弗利之后,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观点成为政治制度建立的基本理念。在后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sup>[25]</sup>262-263。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政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sup>[25]</sup>262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时候,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同,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重要制度服务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是在根本制度架构下和基本制度基础上,在党的领导、政治、法治、行政、经济、文化、民生、社会、生态、军队、国家统一、外交、监督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展现了政治制度供给的优良性特征,成为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良的政治制度提供政治保障,以更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源和保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实现制度自信就是要促进人民群众从情感、思想、行为等方面对国家制度高度认同和充满信心。坚定制度自信,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而且可以凝聚社会强大合力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综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的展现。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指出的,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如果一定要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sup>[39]</sup>730,那么,这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只会得出完全无头脑的荒谬结论。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魅力的实践证明,其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闪耀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指出的,在现代文化系统中,包括理念、行为和制度在内的政治生活方式,构成在市场之外生产、再生产秩序的重大领域。由此,政治的现代化当属最关键的现代化<sup>[46]</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夯实政治伦理基础,无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最关键也最具有根本性的任务。

####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晏辉.公共管理的伦理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15.
- [3]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4]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钰,温平,李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甘绍平.好政治的伦理标准[M]//单继刚,孙晶,容敏德.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 [6]陈志尚,黄楠森.《世界人权宣言》的重大贡献及历史局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17-22.
- [7]洛克.政府论:下[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6.
- [8]成中英.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J].东岳论丛,2000(6):91-95.
- [9]成中英文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02-403.
- [10]施威德.什么是好的政治?[M]//单继刚,孙晶,容敏德.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哲学的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 [11]萧公权.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M].周林刚,译.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4.
- [1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 [14] 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2-16.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 [16] 邓安庆.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古典实践哲学的思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
- [17]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3):4-8.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0.
- [2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5.
- [2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1-11-11)[2024-10-12].[http://www.cac.gov.cn/2021-11/11/c\\_1638226476385060.htm](http://www.cac.gov.cn/2021-11/11/c_1638226476385060.htm).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2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86.
- [2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0.
- [2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4.
- [32] 李惠斌.“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马克思私有财产语境中的共产主义理论——一种语境学的考察[J].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3(1):21-55.
-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35]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1.
- [3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8] 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J].中国法学,1994(6):5-11.
-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41]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M].盛葵阳,崔妙因,刘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61.
- [42]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7-311.
- [43] 王维国.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8.
- [44]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15(2).
- [4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64.
- [46]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0-106.

##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Basi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Optimization Path

Xiao Xiang

**Abstract:** The ethical basis provides value support and sustained momentu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thical basis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it. The political concept and political system supply are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political ethics foundation, that is, based on the legitimacy support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concept and political system arrangemen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respecting civil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ethics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s value pursuit is aimed at common goodness and achieving common goo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practice of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ears the civilized mission of creat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excellent political values and perfect political system arrangement are the important paths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eth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irst is to build up the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kindness of purpo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is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safeguar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kindness of mea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ethics foundation; political system supply

责任编辑:思 齐

# 存身与救世的两难及其克服

——《庄子·人间世》的生存论意蕴

郭美华

**摘要:**《庄子·人间世》的主题,从其开端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来看,是救世。但颜回所欲拯救的“世”,是扭曲的尘世。拯救尘世的真正展开,引出存身与救世的两难之境,这显露出道德自圣化救世的不可能及其悖谬,即自圣化反倒是世界的更深扭曲。由此,颜回所领悟到的心斋即虚而无己,就成为克服道德救世论的良方,并以此昭示出无限性天地整体与个体自身以及无数他者的三重通达。《人间世》以孔子、颜回对话彰显存身与救世的两难之境后,再以孔子与叶公子高及颜阖与蘧伯玉的对话,深化了这个两难,并逐渐转向存身的真朴与神圣。

**关键词:** 存身;救世;自圣化;无限性天地整体;虚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08-11

《庄子·人间世》是《庄子》内篇中的一篇文章。《庄子·人间世》(以下简称《人间世》)开篇讲述孔子的弟子颜回将要出仕卫国,孔子和他的一番对话。《人间世》的题目,“间”字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作为动词,读四声,意为人之“间于”世,或处于、入于、游于世;一是作为名词,读一声,间则为空间,世则为时间,“人间世”是人世与人间的合用,意为人间之世或人世之间,即人所处身的这个“宇宙”或“世界”,“人与人聚而成人间,人与人积而成人间之世”<sup>[1]</sup>。就义理脉络来看,《人间世》承《逍遥》《齐物》《养生》而来。此三篇之旨,如果不恰适地加以理解,似乎有一种向外弛逸且独善其身之意,仿佛有“出世间”可求。《人间世》则指出,根本没有“出世间”可言、可求,人只能在此世间与人相处而无所逃,“与人群者,不得离人”<sup>[2]75</sup>。在此无所可逃的世间,《人间世》的主题即是“为涉乱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术”<sup>[3]34</sup>,自全亦即存身,全人亦即救世。简言之,存身与救世就是《人间世》的主题。

## 一、颜回的形象及存身与救世主题的彰显

个体之自由,万物之齐一,无论是审美、思辨还是形上的生存,都以生命的自然而自由的绵延为依归,所以养生需要直面个体必有之死。但人亦有不得其死者,更毋庸论自由存在之自得与世界整体之显现。生在人间世,存身活命殊为不易。太平之世,苟且而安庶几不是难事;但乱世纷纭,苟安则难。自存尚且艰难,何以救世救人?在一定意义上,生活在这个世间,因为既存规范并非完满的,生存的基本感受就基于某种“不满”而对之加以抵挡:“抵挡者不满足于他们在他们个人生存和社会生存中经验到的秩序的要求……在经验到的不满足之基底中,还有折磨人的普遍悲苦,那就是赫西俄德所枚举的饥饿、苦力、疾病、早夭,以及弱者必须在强者手中遭受的伤害。”<sup>[4]52</sup>生存的不满及其抵抗,展开为两个面

收稿日期:2024-04-16

作者简介:郭美华,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41),贵阳孔学堂访问学者(贵州贵阳 550025)。

向,一是自身自由生存的可能性,二是所有个体自由生存的可能性。

人存天地间,便有天地间一段情怀在。当此之际,抽身独在与舍身救民,对于任何一个透悟天地间生存道理之人,都是一个残酷而持久的拷问。孔子讲“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微子》),孟子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儒者的中庸智慧。如此智慧与某种自炫的使命、责任观念相表里,似乎透露出儒家的逃避主义与其责任、使命的虚妄性。

颜回是孔门高徒,其睿智甚至有高于孔子之处。在《论语》中,颜回已经显示出儒者修德的至高境界,并透露出与孔子其余弟子相异的人生取向(所谓自得其乐的逸世倾向),但可惜的是,其存身艰难,英年早逝。在颜回与庄子之间,可能具有某种思想上的内在关联,尽管是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还无从考证。但在义理上可以看出,从孔子经颜回再到庄子,有一个思想的内在逻辑。如果置于“存身与救世”这个主题下来看,从《人间世》乃至《庄子》其余篇目所显示的“颜回”的形象,可以看到传统上儒家与道家截然划界的粗暴。

庄子并非一个犬儒主义者,也绝非一个自私麻木不知世间疾苦的唯一主义者。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几问几答,将庄子“存身与救世”的悖论彰显出来。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存身与救世的悖谬,指引向一个基本的生存论领悟:“如果人们只靠他人生活,那么,人们就是一样的。”<sup>[5]</sup><sup>891</sup>如此存身与救世悖谬的彰显,不仅仅是因为二者彼此反对,而且还因为,存身与救世各自就包含着自身的反面,所存与所救在其存与救之中,都呈现出荒谬从而自行丧失——所欲存之身,并非能存者之存的本质;而所欲救的世,亦并非世界之为世界的本真。由此,《人间世》将“生存在世”引向更为幽深之处。

所以,《人间世》直接的问题本来是:个体在乱世何以存身活命?但在开篇,颜回与孔子的对话谈论的却是:一个有所领悟的人如何救世(拯救乱世)?问题在于,如果此世间作为扭曲的境域必须被加以“拯救”,那拯救的意思恰好就是要将被扭曲的世间加以拆解,以回复到其未被扭曲之自然状态。就此而言,要拯救的就不是一个被乱世中的权力和仁义所扭曲、遮蔽的世界,相反,要拯救的是天地本身,而拯救的意思恰好就是将天地从这种扭曲的状态中释放出来。

顺着庄子的这一思路,捍卫天地的自在性与无限性,就成为“救世”的真正指向。一个人要活着,只能活在世界中;存己必先存世界,只有先行让世界之在得以可能,自己的自由之在才能有根基。这个世界中的手握权柄者,却将世界据为己有,使得世界不再是在其自身的存在。让世界从手握权柄者的手中释放出来而回返自身,并经由世界的在其自身,使得世界中的每一个体得以回到其自身,这是一切“救世”的根本之义,也是个体追求自身存在的基本前提,但也仅仅是前提而已,并非终极的归宿。

就人自身的存在而言,在存身与救世的两难之间,庄子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引?自由而自在地活在这个唯一的世界中,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我们常常为自身杜撰的实体或神所牵拽而离开自身:“世界的主体性不是人神同形的,而是一种人世间的;我们是神的梦中的人物,揣测着神怎么梦想。”<sup>[6]</sup>我们必须祛除一切虚构的永恒与神圣,让世界回到自身,在自然与自在之中拥有无限广袤与无垠深邃,每一个体就在此绝对之无中自由地创造自身。

## 二、知识与道德救世的困境与悖谬

从《人间世》对话的具体情境来看,颜回因着自己有所学、有所担当而欲往卫国劝君救世救民,孔子依据道对颜回的主观救世愿望进行了分析,揭示其自恃其德以救世之不可能。其间,某种程度上依稀可以视为庄子对孟子的批驳。《人间世》开篇以“颜回请行欲劝卫君”为起: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所行,则庶几其国有瘳乎!”(引文以传世本郭注成疏为据,下同。)

颜回的初衷似乎在于,一个有点学问和德行的人,看到乱世中流俗政治草菅人命之状,便自以为有能力、有责任拯救天下苍生。但实际上,这种道德自圣之举,不但不能救世,甚至尚不能自存其身。颜回想向卫君加以劝说的“知识与道德”<sup>①</sup>,其自身尚未夯实笃定,存身尚且不足,而企图以之救世,只能适得其反:“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那么这个世界中的混乱将会显著增加。”<sup>[7]</sup>在孟

子哲学的意义上,具有良知或本心的道德个体,可以完全认识自身,彻底实现自身以至于上通于天命,并以此作为担负使命与责任的根据。而庄子则认为,其中实质上有着某种扭曲与颠倒。“凡在认识你自己或许成为导致毁灭的药方的地方,自我遗忘、自我误解、自我缩小、自我狭隘化、自我平庸化就会变成理性本身。用道德说法来讲就是:博爱,为他人和他物而生活,可能是维持最强的自身性的保护法。”<sup>[8]</sup>对于任何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主义者而言,他以高扬自身的方式而扭曲了自身,相应地,那些作为差异性他者的生存者,则更是被湮灭了。因此,庄子借孔子之口指出了颜回自恃知识与德性以劝君救民的悖谬与不可能: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而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矜,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育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孔子指出“道不欲杂”,反衬出颜回的初衷没有抵达据于道而纯的状态,只是未至于道的私德与小知。如此私德与小知,其根底在于名利之争。如卫君之为流俗的表征,汨没于名利场之竞逐自不待言;颜回之自恃其私德与小知而企图规劝卫君,因为并未让道“实有诸己”,本质上也只是名利之变形或曲折的表现而已。一方面,“知生于心……心各有知,不知者不肯拙于不知,则气以愤兴,既以忤人之心,复以犯人之气”,“自谓名闻吾之所不争,而人心方

且争之”<sup>[3]35</sup>,颜回之欲图以道德和知识劝卫君本身,就已经是将道德和知识置入名利场之举,从而显示出颜回之道德与知识并未抵达其自身(天地之无限性与认知之有限性的双重领悟)。另一方面,即使颜回救民救世之心真有其德在己,但是在竞于名利的流俗之域,颜回之德并不可能得到肯认——自守其德不暇,何以救人救世?真正的道德智慧本身与名利场本质相异,怎么可能用以救之?在一定意义上,名利场上的杀戮者与被杀戮者,共享着同样的名利观。二者之统一,就是“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而名(概念或声名、名分)与知(知识)就是彼此倾轧、争斗的工具而已。颜回以道德或智慧去劝君以救国救民,实质上就是将道德与智慧扭曲、堕落为声名与知识。

以道德和智慧的仁义之言(即所谓仁义绳墨之言),去揭示、否定名利场的杀戮之事,就是以人世之恶来反显自身道德智慧之善,这是对名利场杀戮者的否定,也就是“灾人”;反过来,名利场的杀戮者如卫君之流,基于竞名逐利而将如此道德智慧之人加以否定,这就是“反灾”。灾与反灾,将道德救世与权力竞逐的丛林辩证法彰显出来:“暴人之气尤为猛烈,则恶其美也深,见为灾己,而报以灾也倍酷……彼此交灾,身死国亡。”<sup>[3]35-36</sup>在此处的孔子看来,自身“悦贤”持善而“恶不肖”,不必去恶之场域彰显善恶之异。在恶之场域故意彰显善恶之异,或者说,道德与智慧如果进入恶之场域并与其倾轧、相争,道德与智慧便扭曲而染上名利色彩,因此丧失了道德与智慧本身。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不为君王所召,自视德厚智高而自行前往,便陷入名与利的辩争而自顾不暇,“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眼目眩惑,神色呆滞,口中辩解,脸上卑恭,内心顺从)。名利场的辩争,其最后的决定者是绝对的物性力量,有道德有智慧者在其中不但不能救人救世,反倒是自陷于危难而“必死于暴人之前”。

进而,道德与智慧以“异于”政治名利场的规定性进入其中,不但不是对于政治名利场的扭转与匡正,反而将使政治名利场中纷杂之名利增多(即道德与智慧也成为一种名利),并加强了君王对于名利的争夺之势。这就是以道德和智慧救世最易于陷入的困境,自圣化者自以为是以善止恶,结果反而是以恶的方式增加了恶,即所谓“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而水火“益多”。在本质上,“益多”就是以善止恶导致对于“道”的扭曲,反而使得自身与社会的危

险与恶增多,“益多者,言增多其恶也”<sup>[9]</sup>。庄子对于道德救世而恶“益多”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

庄子的意思是,自圣者自以为修德爱民而可以以下拂上,结果就是“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自身为暴君为杀。其所以如此,即在于“修身而爱民,因为上之所忌”<sup>[3]36</sup>。暴君之褒扬道德仁义,不过就是一种粉饰,关龙逢与比干迂以为实而好其名,为暴君因其名而杀之。庄子以为,如果不将道德之域与政治之域加以区隔而混为一谈,道德就只能成为权力的粉饰与附庸。而将与权力沆瀣一气的所谓道德加以理想化和实在化,导致身死道废,更是加剧了政治之域的恶化。桀纣在道德上有恶名,庄子更进一步说,即如尧舜禹在道德上有善名者,在政治之域也不能逃于权力争夺之“名实”。政治之域所谓名实,“荣于外者名也,利于己者实也”<sup>[3]36</sup>。所以,为了利于自身,举着仁义之名,尧对丛、枝、胥敖,禹对有扈进行了攻伐杀戮而使之“国为虚厉”。《人间世》中的颜回欲图以自身道德智慧来劝君救世,本质就是昧于如此政治之域如此实情。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颜回的最初意图是走上行路线,即以道德智慧劝君以救世,是“得君行道”之意;他没有走向教化民众的“觉民行道”之路,更没有走向隐逸自修之路<sup>②</sup>。以“得君行道”之论的逻辑来看,能让民众懂得的道理,不是能救之的道理;而能救之的道理,往往又不是民众所能懂得的,或者更不是能让其懂得的。这是救世哲学的普遍困境,也是妄图以思想俘获他人之论的普遍困境。概而言之,庄子认为所谓以道德智慧救世的“得君行道”,不是欺世盗名就是蠢不可及。所谓“德厚信弘,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交换一下,改为“德厚信弘,未达人心;名闻不争,未达人气”,也是同样的意蕴,即个体自身内在厚德之实,与世道人心风气没有直接的关联。

在庄子眼中,政治之域的历史与现实不断证明一个基本的见识:“人类是最残暴的动物。”<sup>[10]</sup>庄子眼中的善恶本就是政治中的权力与流俗的懦弱二者共同的虚构,自以为真实的德性进入流俗政治欲图拯救之,其结果不是道德约束了权力之恶,反而是权力之恶绑架了道德。正因此,领悟于道德与智慧救世的不可能,依然还以救世面目出现的所谓孟子式自雄自圣的道德,就转而成了对权力进行伪饰的“仁义”(其先知先觉以觉后知后觉之论,实质上也就是得君行道之论)。

### 三、“天”“人”“传统”作为救世论之三重根据的无效性

紧承上文,孔子与颜回有了第二个回合的问答。《论语·公冶长》记载,对孔子的教导,颜回闻一知十,具有超凡的领悟力与智慧,在其与孔子的交往与对话中,常常透露出哲思的深意。在《庄子》的文本中,颜回与孔子之间的教学相长,以更为细腻、具体、生动的样式体现出来。甚至,以思想自身的深邃化为鹄的,颜回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德慧之境也被牵引出来。孔子“若必有以也”之问,显露出思想的接生术,让颜回从自身生成着思想,而思想则以不断生成的方式走向自身的深邃:

(孔子曰:)“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薪乎而人善之,薪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谏之,实也<sup>③</sup>。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谏,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显然,颜回领会到孔子指出的道德智慧之自存与救世的两难,在于二者之背离不一。对此,颜回的第一反应还具有一定的形式性,试图化解自身德慧与政治名利场的直接性冲突,将自身德慧的表现形式加以完善——“端而虚,勉而一”。“端而虚”,即内心自持其德慧,而表现出谦虚之状,以避免与政治名利场的掌权者有直接冲突;“勉而一”,即竭力通过让对方(如名利场之卫君)主动接受的方式,来实现道德智慧与政治名利场的统一,使得救民救世得以可能。孔子以为,颜回的“端而虚,勉而一”,是“以阳为充孔阳,采色不定”。“阳,外著也。气凝曰充,意露曰孔阳,此所谓发气满容也,属端。采色不

定,所谓载色载笑也,属勉。”<sup>[3]36</sup>就其实质而言,“以者,乘人之无以而斗之,抑乘人所以者之不善而斗之,以生于心知,而非人心之有。有以则作于其气,而逆人之气;以其端乘其邪,以其虚乘其窒,以其勉乘其惰,以其一乘其纷。‘端勉’不可也,‘虚一’亦不可也。盖端而虚,则非虚;勉而一,则非一也。以充扬之色伺人之感,而乘机以进,自谓之虚;以执而不化者,日渐进之求成效,自谓之一;皆挟其所以,成乎心而形乎容者也”<sup>[3]37</sup>。内有成心而外为形容,就是形式的虚伪化。因此,孔子表达了完全的否定。一个人自身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内在充实而气象外显(类似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样子),但又言辞刻意、举止谦逊以顺于流俗权力,如此便使得面容色彩摇曳无所定,一般人(包括政治名利场的掌权者如卫君)就不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直接与如此道德智慧相违背,但实际上内心并不认可。事实上,通过漫长的耳濡目染让对方主动感受进而接受道德与智慧,试图以这种方式塑造日常小德都不太可能,遑论要塑造真正的大德大智(比如卫君从行恶政转而仁政)。究其本质,端虚勉一还是内外截然为二的:内在固执而无灵活之转化,外部迎合而不对流俗名利加以根本性的否定。因此,如此救世,不但不是对流俗之恶的弹正,反而是对于流俗之恶的纵容。如此救世却纵容流俗之恶,既败坏德本身,也并不能自我存身,因为“虽或免乎暴人之暴怒,而内之憎忌益深,岂但德之并不成与?灾且逮之矣”<sup>[3]37</sup>。

由此,颜回与孔子有了第三次问答(前段引文后半)。颜回在孔子对“端虚勉一”之说加以否定之后,进而提出了三条“救世”的更高原则。端虚勉一还是在一个单纯道德救世的范围之内的做法,道德与政治、自我与世俗之间,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上的牵合,而没有建构起实质性的通道和桥梁。要使救世得以可能,就必须在能救与所救二者之间寻求更为深厚的共同根基。在第三次问答中,颜回从单纯个体道德和一己智慧的狭隘见解中上升到了“神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来阐述“救世”的道理。

首先,“内直”是“与天为徒”,是将自身与君王(乃至百姓)视为源自一个共同的神圣根据(天)的“后裔”:“天子者,天之子也。己亦天之子也。视之如同胞,无爵禄之可欣,刑法之可畏,其内坦然,是为内直。于是己必尽言,而于人之从违皆无期必之心,与童子之不知利害同焉。”<sup>[3]37</sup>这有后世儒家所谓民胞物与或万物一体的意思,以基于伦理性整体的

情怀来消解存身与救世的鸿沟。这就意味着,救世不是基于个体的道德智慧,而是基于“天”或整体的旨意。“而独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善之邪”,这话可能有残缺,不易解释,大体意思是强调,尽管“救世”的主张在“颜回”(我)这一个体上表达出来,但“我”之所言,实质上是天之所言,不管人(卫君之类)是否以之为善,都不影响天之所言经由“我”而呈现出来——不以救世者和治国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对性本质由此凸显出来。如此,救世之言取得某种神圣而本有的形态,这对于救世者而言,就是在本体论上让自身处于与天合一的“童子”状态(源初而真实的状态)。

其次,“外曲”即“与人为徒”,是将自身与世俗(卫君与民众构成的整体)置于同一个现实流行的社会整体之中。“与天为徒”可以视为“体”,“与人为徒”可以视为“用”,在体用不二的意义上,神学的“共同根据”与现实的“全体大用”之间,本质上就是“体用一如”的。在体用之间,共同之一体的认定,也就是同处于一用的认定。就肯定这个社会作为现实共同生存空间而言,这可以视之为“社会学”的角度。颜回的回答意味着,其救世的道德和智慧不再是与所救对象(世俗)相对立的道德和智慧,而是世俗自身所归属之整体具有的、所有世俗之人共同使用的礼仪形式。就“存身与救世”的统一实现而言,在“与天为徒”和“与人为徒”之间,神圣的根据与世俗的根据二者之间具有体用不二的辩证关联——作为神圣根据之实现或表现,世俗之大用流行既有与体内在一致的一面(这是存身与救世所以可能的理由),也有相背离的一面(这是存身与救世所以必要的理由)。如果仅仅看到“一致性”,那么“救世”就是虚妄的空话,而成为一种以神圣根据为流俗背书的行为;如果仅仅看到“差异性”,那么不但不能救世,存身也成为不可能。因此,就神圣与世俗二者的背离而言,“外曲而与人为徒”可以说为“外形委屈,随人事之所当为者也”<sup>[2]81</sup>;就神圣与世俗二者的一致而言,“外曲而与人为徒”可以说为“‘外曲’所以答‘执而不化’之教,曰‘与人为徒’,则非执己不移者矣”<sup>[11]</sup>。两方面统一,就是“致曲”“言委屈周至也”<sup>[11]</sup>,即以顺应世俗扭曲的方式来转变世俗。

最后,在“与天为徒”同“与人为徒”二者统一之中,有一个历史性的统一,即“成而上比”的“与古为徒”。毕竟,救世的着眼点在于世俗悖离于道,而道亘古恒在,救世即是背离之世俗引归于本然之道。

救世的个体(颜回),尽管一方面依循世俗的礼仪规则而行,一方面将救世的道理基于自身与世俗共同的神圣根据(天),但必须言说出那个用以救世的、作为天或道的表现的“话语”,以之“教化世俗”“指摘君王”(二者恰好就是救世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教化与指摘是体化而为用并使得体用保持“一致性”的方面,而被救之世是与体具有“异质性”的用。体用不二的整体,就是在“一致性”对于“异质性”的克服与拯救中真正实现的。

现实中体用一致性与异质性二者的辩证,具有历史性的维度,二者的矛盾纠缠古已有之,这是一个“历史学”视角。教化与指摘世俗的“救世”,不单单是一个当下的个体(颜回)之所为,而是古已有之的“历史性跋涉”。从体用不二的历史性展开中寻找根据,进一步化解了救世中能救者与所救者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使得存身与救世的统一更加深化。

那么,颜回提出的救世的三重根据是否有效呢?孔子的回应简单直接:“恶!恶可!”如此救世完全是一种徒劳:“前之端虚勉一者,以为存诸己也,而所存者非己也。与物相刃相靡,案人之感以责人,而自恃其仁义,故虚者非虚,一者不一也。内直、外曲,成而上比以辟咎,则莫非存诸人矣。一念以为天,一念以为人,一念以为古,多其术于心,杂扰而无定,岂己之有固存者乎?固人之欲达其心气耳。前者既有我而有偶,后者又因偶而立我,心之纯一者散,而杂其心知,以曲用为范围人心人气之师,则人亦测其无定而终狎之,不能化物必矣。”<sup>[3]37-38</sup>简言之,与天为徒、与人为徒及成而上比的三重维度,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其一,三重根据的设定,“成而上比”“与天为徒”“与人为徒”是理智造作的过多敷设,真正的道并不能借以显示;其二,如此搅扰为事,不过是使得自身免于受罪而自存,根本不能救世而化之;其三,根本之处在于,这三重根据,都是自身的师心自用而已,并没有敞现真正的整体世界自身。

#### 四、心斋:虚而无己以通达无限天地

颜回所提出的“三重根据”(天、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救世路径。此一路径,在庄子的对话中,经由“孔子”之口加以否定——三重性根据就其实质而言,是“太多”,即师心自用而悖于道,其中饶有意味。有人的这个世界,其本然之状极简极易,但因为人的“有而为之”之扭曲,就转而为复杂与多。换言之,人视自身扭曲的“有而为之”

为易,则世界自身丧失其易简而陷于奥赜:“有以者,以其所以者为有。端虚、勉一,曲直、上比,皆其所以,则皆据以为有者也。夫人之应物,有则见易,无则见难。易则若可不慎,取给于所有而有余裕。天之化物,天无自有之天,因之而不齐者皆齐矣。有而见易,则违天而贪取于名,以生其慢易,天所不宜,诘足以化物哉?”<sup>[3]38</sup>万物在天下自行化育,天并不以自身为每一物之化育的支配者,从而每一物乃至万物之齐在于其自身的不齐。天且不持有自身,人却轻易地师心自用而自以为拥有天,世界的困境与复杂由此而生。于是孔子与颜回围绕存身与救世之两难的对话,转进到第三层: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辟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克制师心自用之多,须得“斋”。“斋”是某种仪式性的东西,常常意味着在日常饮食上的克制,比如不吃荤腥、不过量进食等。但“斋”在其仪式化的表现中,真正的底蕴可能被表演性形式所湮没,成为做戏的虚无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对虚文之儒的一种讽刺。充斥着繁文缛节的流俗之斋,因其繁文缛节而陷于以伪为实,恰好是《人间世》所谓斋的反面,因为“心斋之要无他,虚而已矣”<sup>[3]38</sup>。

因此,《人间世》的“斋”不是祭祀之前所做形式化的造作为为之“斋”,而是直呈生命底蕴的本质之“斋”,是化造作为虚的“心斋”。如此化而为虚的心斋,就其本意而言,可以在三个不同角度加以理解。

首先,从认识论上看,凝志或统一自身之精神性

内容的“一志”是起点。“若一志”有点类似于《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志”或《孟子》“吾尽其心”的“尽”，但是一个本质的差别在于，《庄子》这里的“若一志”走向的是一种否定性的认知路向，而孔孟则是一种肯定性的认知取向。在庄子看来，“一志”，是两重层次的领悟：第一层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消解感官对于心的充斥和褫夺，让心直面事物自身；第二层是“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不让主观之心阻碍物之自身而使物之自身得以如其所是地呈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耳不能听、心不能思，而只是让耳之听止于其听，心之思止于其思。就耳之听止于其听来说，一个声音的呈现，需要耳朵的聆听，但聆听本身并不对声音施加节奏与秩序；就心之思止于其思来说，一切精神内容的显现，当然需要心的反思，但是心之反思本身并不赋予所思对象以本质与法则。让耳朵之聆听止于其听而不逸，让心之反思止于其思而不漫，万物便自行充盈为世界。如此，“心含气以善吾生，而不与天下相拘，则长葆其天光，而至虚者至一也”<sup>[3]38</sup>。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气意味着超越于感官固化与理智实体化的缥缈而玄通之境。简言之，气就是无限性与无碍性的虚。唯有感官之耳与反思之心抵达虚，才使得无限性天地之“至一”与开放性之“葆光自我”，二者同样得以可能。从而，世界得以拯救，自身得以存续，存身与救世都成为可能。

就儒家的认知取向而言，需要立定一个积极的认知主体，即奠定内在的心性基础，在此基础上与真理直接相通，从而敷设一个自为主体与自在世界本质上相一贯的整体世界，即主体经由自身认知的自觉，认知并改造自在世界，而能动地建造出一个自为世界<sup>④</sup>。但在庄子看来，本质一贯式的主体性世界建构在认知上是完全不可靠的。作为主体的人，在“斋”的认识过程中使用的不是积极的加法，而是消极的减法，即不以自身的耳目感官、心思等“妨阻”万事万物、世界自身及其自在法则的呈现。所以，耳听与心思之止，就是虚己，就是把万物、世界及其道能够呈现之所“腾挪”出来。道自身呈现，尽管显现在每一物以及万物之中，但它并不拘限在任何个体那里，不为任何主体所拥有——主体在认识上只有一个自觉可能，即否定性地领悟到自身是道（作为世界及其法则的整体）呈现的阻碍，并自行拆除对道之呈现的障蔽。如此否定性克服并开放自身，以使得道自行如其所是地呈露，是“心斋”在认识论上

的基本含义。这是一种消极意义的认知取向。

其次，从修养论的角度看，“心斋”可以说与《大宗师》中的“坐忘”<sup>⑤</sup>是一致的，即以每一物之双重通达（向无限天地之境以及自身的通达）为鹄的。从人的实存而言，身体（感官）、心思与万物的相与共在之整体如何实现，这本身是一个存在者如何真正落实存在的问题。修养要奠基于自觉的领悟，但一切领悟其实都有一个生存论前提。这个生存论前提，根据庄子的意思，可以使用一个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即“自发的领悟”。这个领悟，后来在儒学的心学系统中，就是“明觉即自然”（大程）的含义。“心斋”在修养论意义上的理解，实质就在于将明觉返于、止于“自然”，剔除附加于自身“自然”之上的“累赘”。也即，对耳目感官、心思之官加以管束、节制、清扫，让弥漫万有的“气”依照其自身的法则“来临”，“澄其气以待物耳……与皦天之虚以化者，同为道之所集，外无耦而内无我，庶可以达人之心气而俟其化”<sup>[3]39</sup>；让自身成为世界本真得以“驻留”之所，将自身生命之存在委顺于广袤无垠之宇宙，依循于万有宏阔之道，“探讨无限，从来就只是为了服从于它”<sup>⑥</sup>，而不是将无限归属于自身主观性或主体性精神意识。这是让生命真实得以养护从而也是修身的要义，也是存身与救世得以可能的根基。

修养论意义上的“心斋”，就是将认识论上的“心斋”加以切己地实现，打开自身的通道使万物得以“畅行”，从而使得心以及整个人自身也得以畅然而迈往广袤之野。

最后，需要重视的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消极主义的认识论与自由的关联，在今天几乎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观念，但是在伪儒学与伪救世主义哲学的浸淫下，长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篇中的颜回领悟到心斋就是无己或“聆听心斋之道，而丧失了自身”（“未始有回”），孔子认为这是心斋的终极实现——“心斋”至于“无己”而“尽”：“游于人间世之极致，至于未始有我而尽矣。”<sup>[3]39</sup>虚与无己具有同样的本质，即在相与共在的生存活动中，每一物都经由让渡出天地整体的自在性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回到自身。这既是心斋的生存论意蕴，也是心斋的政治哲学意蕴。

这一对话的主题，开端是讨论颜回何以救世，结果是意欲救世的颜回丧失了自身。这是一个很直白的宣称——世界的救护，其基础不是主体道德使命的建构，而是世界自身本位的树立。简言之，颜回的救世主张将世界视为自身道德责任乃至哲学智慧的

外化对象,庄子认为这在一开始就是本末倒置的。让世界及其万物如其所是,这是“心斋”的政治哲学意蕴。但是,自觉而能动地进行“心之洁净”的个体并非消失了,而是其要以自身否定自身、管束自身的方式,让自己呈现为一个世界得以显露其原貌的“缺口”或“通道”。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提着灯笼进入集市一般,“心斋”的个体也必然投身于尘世之中,即所谓“不得已”而在尘世。尘世构成世界整体的有机要素,一定意义上恰好在于其“扭曲而悖于世界整体”而使得“世界整体得以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心斋”的个体存世的深沉意义。

世界及其道的显现需要通道,心斋而无己的人就是那个可能性通道。世界整体本身没有界限,心斋无己之人自身没有藩篱,但是尘世及其掌权者人为地设立了各式围墙。心斋无己者能够“自由出入”尘世的围墙,使得无界限的世界整体能够显现出来,“入其藩而无感其名”即是“放心自得之场,当于实而止”<sup>[2]83</sup>。所谓“入则鸣不入则止”,即心斋者能自由进入尘世围墙,却不为尘世所羁绊,而能自由出离尘世。如此自由的出入,一方面使得权柄支配的流俗世界保持其开放性,从而获得自我矫正之机;一方面让自身的自由出入,显现为拘限于流俗世界的无数存在者迈向天地整体的通道之导向。“一宅”是无限性天地整体之域,“寓于不得已”则是存身有藩篱之尘世。心斋者不让自己成为世界及其道呈现的“障碍”,以自身的自由出入,昭示一个栖居于其中的无限性整体世界(天地及其道的统一整体),“处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应之”<sup>[2]83</sup>,让自身的栖居成为一种自然而不得已的“呈现”——由自身的栖居而呈现使栖居得以可能的世界及其道,“使物自若,无门者也;付天下之自安,无毒者也”<sup>[2]83</sup>。

基于此,以认识论、修养论与政治哲学三层含义相统一的“心斋”为基础,存身与救世的两难意蕴,转进到个体隐逸与天地整体呈露的难易互换。“绝迹易,无行地难”,实质上人之生存根本不可能绝迹。毫无可能的“绝迹”被视为“易”,而“无行地”被视为“难”,这已经是一种修辞上的强化,突出的是存身与救世之间的复杂与张力。就其字面意义而言,个体“隐逸”而自存于世,似乎显得“容易”,个体奔竞于天下以“救世”而不伤害自身本真之在,则显得“困难”:“不行则易,欲行而不践地不可能也。无为则易,欲为而不伤性不可得也。”<sup>[2]83</sup>这显然存在着对浅薄之救世的讥刺意味,因为浅薄的救世主义

是欲图由自己为无数他者造出一个世界。而庄子经由存身与救世之两难所揭示的,却是如何突破流俗世界的囚禁,让无限天地整体及其道如其自身地呈现,以使得自身乃至于无数他者都能自由而自在地切己而在。借由孔子之口,庄子强化了消极性认知的意义。对于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在政治哲学或救世哲学上的基本含义是,“人”(其实就是自己)不要以“作伪”的方式救天下,反而是要让天下得以如其自身地真实呈现。在有人的世界里,由于扭曲与遮蔽历久弥深,使得个体性自欺式的“隐逸”轻而易举,而异常艰难的是,经由自身昭示迈向无限自在天地整体及其自然之道,并让自在天地整体及其自然之道得以呈露,从而让自身以及所有人在其自身的本真隐逸得以可能。此即“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夫人情驱使,其法粗浅,所以易欺;天然取用,斯理微细,是故难矫。故知人间涉物,必须率性任真也”<sup>①</sup>。

庄子之心斋意味着经由自身昭示出迈向无限天地整体的通道,呈现无限天地整体及其自在之道,是无作伪的自然之行;其所昭示的是逸出自身认知的自在天地整体及其自然之道,它不以自身的有限性认知包裹天地及其道,而是以承认自身不可认识天地及其道的方式来领会天地及其道。所谓“闻以有翼飞者也,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即是说,通常的救世莫基于主体的积极自我建构,凭借自己的“翼”让自己的“飞”作为天下之“飞”,以自己特定内容的一曲之知等同于天下、世界整体之本质。这是尘世中所谓智者和有德者的常见之举,也是庄子眼中充满作伪意味的矫饰与僭越之举。真正的救世,不是因自己有翼,以自己之飞作为天下、世界自身之飞,而恰好是因为自身无翼,以自己不能飞昭显了天下世界之飞;不是以一己之知昭显世界,而是因为自己无知而昭显世界本身在知的层面上的不可域限性。唯其不可域限于知,世界作为世界才得以真正呈现。只有领悟于自身之无翼无知,才能处身至虚而任万物自化:“无至虚之宅,无由有化物之实也。”<sup>[2]83</sup>

这样一个彰显自身无翼、无知的心斋者,一个真正使得世界得以呈现的“救世”者,就是这个世界自身得以呈现的“缺口”,“阒音缺,牖也,隙也”<sup>[3]39</sup>,就是天地作为整体性世界显现的“光亮处”,“虚室而纯白独生”<sup>[2]83</sup>,“莫非天光”<sup>[3]39</sup>。一个无己虚己而洁净了自身的人,才是真正使得光明得以闪耀之处,也才是世界及其整体真正的寓居之所。心斋

无己者栖居于世界整体,世界整体经由此栖居而显现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世界栖居于心斋无己者。栖居是一种留驻之止,心斋一方面是止住自身的“主观性侵夺”,一方面是停留于“世界整体”。于自身有所止,即领悟于自身有限性而不僭越;只有心斋而无己才能真正止于世界,即有限性自身的领悟就是有限性自身的开放,从而使自身置身于无限性世界而止,且无限性世界显现于开放的有限性而止。如此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双重之止,这就是“止止”,因止止而让天地呈露为“吉祥”之境——天地及其道不为任何僭越个体据为己有,而每一个体以及所有个体都能依循自在之道,自由而自然地栖居在无限天地之中:“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者也。”<sup>[2]84</sup>

如果不知止而喋喋不休于“救世”,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坐驰”,“若夫不止于当,不会于极,此为以应坐之日而驰骛不息也”,“可谓形坐而心驰者也”<sup>[2]84</sup>。坐驰与人之必然入游其藩的尘世生存有关,而克服坐驰以任化则是心斋的“自知自明”:“物无贵贱,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谓知者,岂欲知而知哉?所谓见者,岂为见而见哉?若夫知见可以欲为而得者,则欲贤可以得贤,为圣可以得圣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为知以知之;不见见之自见,因欲为见以见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将为生以生之。故见目而求离朱之明,见耳而责师旷之聪,故心神奔驰于内,耳目竭丧于外,处身不适而与物不冥矣。”<sup>[2]84</sup>因此,所谓“坐驰”包含着如此意蕴,即任何个体自己原本无可避免地受限于一隅,是一个有限性的具体存在者,却昧于自身有限性而僭越地将此一隅夸大为世界的本质或等同于世界本身。如此僭越的夸大,丧失了自身与世界“相互栖居”的双向之止,自身与世界也就丧失了其“吉祥”。只有心斋而知止者,经由对耳目感官与心之官的自我管束与自我限制,将自身显现为一个无阻碍的通道,自在天地及其自然之道就以逸出认知的神妙方式自行降临、自行显现,此即是“鬼神来舍”——天地之自在,道之自然,每一个体以及所有个体在其自身,从而万物、天地及其道都自行神妙莫测地栖止于其所止而自化其身:“外遗于形,内忘于志,则隳体黜聪,虚怀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当乎!”<sup>[2]84</sup>如此心斋而知止者,作为某种圣人,其斋其止,就是让世界得以成为自身,从而自然地彰显其神圣性。相反,如果以逐鹿中原的丛林形式抢占天下,以其成王败寇之论而自诩、杜撰为圣人,万物、天

地及其道则将完全丧失其神圣性。进而,如果以自身作为“为天地立心者”,为万物和天地赋予一个外在的、造作的本质,万物、天地及其道,也就彻底失去其神圣性。让万物、天地及其道如其自身而显露其神圣性,让天下得以成其为自身,这才是救世。而救世,就此成为存身的另一面相。

## 五、由救世转向存身

《人间世》开篇前三节以颜回欲图救世为出发点,转而成为存身与救世的两难之境,经由克服道德(仁义)救世论的悖谬,而透出个体克己而虚的在世生存论。其意蕴在于,无限性天地整体与自由个体以及差异性他者的三重通达。借颜回和孔子的对话消解了道德自圣与智慧自高以救世的两难之境后,庄子接下来借孔子与叶公子高的对话,进一步敞露个体在流俗政治—仁义之域存身的悖谬之境,即在扭曲的政治—仁义沆瀣一气之境中,任何个体作为“使者”(在异化的流俗世界里,个体丧失了在其自身的自然性而沦为权力与名教的载体)在入道之患与阴阳之患上的两难之境。在某种意义上,扭曲而异化的流俗世界是无限性天下整体的必由之曲径,即所谓天下必有君臣父子之大戒:“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庄子·人间世》)所谓“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方面是说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关系本身归属于无限性天地整体世界,而不能超脱于天地之外与天地之上;一方面是说存身于天地之间,必然要有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环节。但是,流俗世界中的这两种关系必然导致扭曲,即二者反过来将天地拘禁在自身之中,从而湮灭了天地的无限性与自然性。扭曲的弹正,一是让父子伦理与权力政治彼此相对分离,使得父子伦理回返自然与淳朴,权力受到天地自然秩序的制约,从而释放出个体的自然与自由,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与自在;一是每一真实的个体透彻地领悟到,扭曲自身必然陷入自行崩溃,不去自圣化地担当改造政治的道德使命,而在其自身葆守其自然与自由,经由乘物游心以至命的个体性存身,反倒是敞露了迈向无限性天地与自然而真实个体的通道。

进而,《人间世》再借由蘧伯玉与颜阖关于有德者教化无德少知之君的对话,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在扭曲的流俗政治之域救世与存身的困境——要么危

害吾身,要么危害吾国。蘧伯玉的回答,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的虚以透迤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的自为持守,突出了对自身有限性的领悟与人我(他物与自身)异质性的理解,如此构成存身与救世的双重根基。这并非肯定性的知识性说明,而只是否定性的引导——庄子心目中真正的教化不在流俗政治之域。这是前面“流俗政治之域不是真实的世界”之旨的进一步深化。庄子对于伦理—政治世界的理解,其出发点并不在自圣化者的主观观念里,也不在权柄者的手里,而是一种显豁出不可湮灭之差异性的与他者之关系。由此点出发,“我们寻求从某种本质的超脱出发,达到一种非本体论的上帝的概念;我们从与他人关系出发,从这一关系使得客观性(客观性总是要包含一种内容)成为不可能的差异出发”<sup>[12]221</sup>。自圣化救世说的根底,就是缺少了这个蕴含差异性而使得普遍绝对的客观性不可能的“关系”维度。这个政治—仁义的流俗世界,庄子将之虚无化,以寻找一种新的伟大的虚构,那是一个纯粹可能性的领域:“当我置身于纯粹的可能性的领域,我的结论经常是诗性的。”<sup>[13]</sup>诗性的自我生存,就是存身的极致,而世界的拯救也以此为终极性的目的。

继而,《人间世》以栎社树为喻,阐释了一种深刻的存身智慧。一方面,栎树材质无用于流俗,所以不因有用而被砍伐;另一方面,栎树又寄身于神社,所以也不因无用而被砍伐。由此,栎树之存身才得以可能<sup>⑧</sup>。换言之,栎社树的存身,就因为其处在了流俗世界的一个缝隙或空域中,即流俗之实用与流俗之敬畏二者交织豁显的可能性空间。流俗对于本真的扭曲,其极致就是神道设教——圣人以为教而众人以为神,恰好在“教”与“神”的歧异与裂痕中,栎树才得以存身。栎树以不同的样式,彰显了同庖丁一样的剖决流俗网罗而迈向自身自然与自由生存的可能。《人间世》对于社庙所牵涉的神圣有所显露,指引了存身与救世的可能性方向;但对于神圣寄身的社庙及其仪式,则潜藏了深沉的戒惧之意。简言之,宗教性神圣的存身与救世,不是证成流俗之“用”,而是彰显自身迥异于流俗(无论政治、道德还是教化)的“无用”。在此意义上,无论后世的“国师”还是“天师”,都不是救世者,而是从神圣领域滑下的堕落者。栎社树的生存智慧,那种神圣性的根底,在于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是想为自己而行进……(为此)人们必须能够另一番作为——能够自发地为自己而行进,必须能够另辟蹊径。在这两

种情形中,人们都必须做到与众不同。”<sup>[5]672</sup>要使得每一个存在者与众不同的生存得以可能,就不能从本体论神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栎社树的神圣意味,即以最高神为一切存在的确定性根据,并且最终归结为“只有一个神学家:上帝——而神学则是上帝拥有自己的方式”<sup>[12]157</sup>。栎社树瓦解了如此作为确定无疑根据的唯一神信仰,而将每一物在其自身的生存奠基于消解了一切流俗功用性标准的一无所依的深邃之境,即无限天地及其秩序的自在性与每一个体自然而自由之在的统一之境,也就是个体存身与广袤天地敞露的一体之境。

《人间世》末尾,庄子记述南伯子綦谈论商丘大木与荆氏之地楸柏櫟的材与不材,以此深化“神之所以神”,并以支离疏之支离其形而存身反衬支离其德以存神,再以接舆之言否定了自圣自智以救世的孔子,最后归结为“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有用与无用,作为一个基本的对立,以无用之用克服有用之蔽,是整个《人间世》的结论,也是《庄子》文本的基本主题之一。实质上,庄子通过对尘俗之用的否定,以无用于尘俗的方式,迈向了对于生命本身的真正肯定。“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有用性:因为即使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也会存在下去。”<sup>[5]539</sup>在庄子眼里,尘俗之用的“价值表”中,每一物都被剥夺了在其自身的自我肯定,从而“自寇自煎”,在尘俗之虚幻而欺骗的“价值口号”下,虚无化了自身。如何突破如此虚无的否定,而走向生存的真实本质,就需要透视并克服尘世“有用之用”对人自身的否定与虚无化,而领悟并迈向“无用之用”的自为肯定。如此,“肯定变成了本质或权力意志本身”<sup>[14]</sup>,人才能在其自身而在。

在终极的意义上,有用的流俗世界,或者说流俗世界的有用性,与追求有用的个体存在者,并不是需要拯救的,而是需要“刺破”与“开掘”的。这就是人“间”世的主题,“间”作为动词的意义,就是要“掘破”流俗世界,使得真正的个体与真实的世界达致自由与自然的统一。单纯在观念上预设某种神圣实体或者秩序,要么消解人的现实生存而给出一个超越的世界作为归宿,要么勾销现实生存的自在性而以之为实现超越实体与秩序的工具,都与真实的存在相距甚远。“在意识的悖逆之极端,‘实在’与‘超越者’变成两个分离的实体,两个‘事物’,那是有待被受苦者魔术般利用的,所图无他,要么是通过消除‘实在’并遁入‘超越者’,要么是迫使‘超越者’的秩序进入‘实在’。古代的灵知主义者选择第一条

魔术之路,而现代的灵知主义思想家则选择第二条道路。”<sup>[4]</sup><sup>53</sup>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唯一的世界。《人间世》因此透显出警世之意:不能把如此世界当成真实的,要揭示其虚假;不能把如此世界当成真理,必须展露其荒谬。必须勇于面对大地与太阳,舍弃为了苟活而对谎言的需要。存身与救世的双重实现,是对将人虚无化的流俗世界的批判与战斗,是经由克服虚无化而让天地本身与每个人的自然如其所是地显露自身。

### 注释

①严格说,此处所谓“道德”并非老庄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但因为颜回本身的道家色彩,其德又不同于孟子式的勉强仁义。在一定意义上,颜回有着自然而真实的内在德性。《人间世》的解读,就用“道德”而非“仁义”来表述颜回救世的愿望。②关于“得君行道”,可以参见余英时相关论述。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另外,对于颜回的形象,在其实质上,从《论语》安贫乐道、用行舍藏等记载来看,我们可以视之作为一种真正的隐逸式生存,并且可以体会到其思想与庄子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庄子·人间世》以及其他地方的有些论述,为了彰显颜回思想的展开及其深化有着内在环节,假设了其思想的初始轨迹。因此,这里所说“未能自觉地将隐逸修德与政治之域区分开来”,是因着其思想展开的源发性而论。③“之”字后逗开,从王夫之《庄子解》句读。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④尽管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觉知,但是,因为他者之差异性以及天地之外在性被消解,其知的本质一贯性衍化,实质上也就是一种虚妄的造作与建构。⑤《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⑥勒维纳斯引笛卡尔语。勒维纳斯著,余中先译:《上帝·死亡和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页。

⑦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3页。在此意义上,说庄子是犬儒主义或者消极主义的论调,是缺乏深刻性的肤浅之见。⑧这与《庄子·山木》篇中庄子同其弟子关于“无用与有用”的讨论而归结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之意侧重不同而略可相通。《山木》突出“法则”与“道德之乡”的统一作为个体存身的基础,《人间世》栝社树寓言则注重消解流俗政治神道设教的虚伪而彰显个体自然真实之在的神圣性。

### 参考文献

- [1] 杨析孙.庄子正读内篇[M]//方勇.庄子纂要:第2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488.
- [2] 南华真经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
- [3] 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卷5[M].徐志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5] 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6]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M].维茨巴赫,编.林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00.
- [7] 赫斯勒.道德与政治: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伦理基础:第1卷[M].罗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50.
- [8] 尼采.瞧,这个人[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50.
- [9] 林希逸.庄子内篇口义校注[M].周启雄,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59.
- [10]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52.
- [11] 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2.
- [12] 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M].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13] 巴迪欧.哲学与政治之间谜一般的关系[M].李佩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9.
- [14] 吉尔德勒兹.尼采[M].王绍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8.

## The Dilemma and the Overcoming Dilemma of Self-survival and World-saving

### —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of *Ren Jian Shi* in *Zhuangzi*

Guo Meihua

**Abstract:** The theme of *Ren Jian Shi* (The World on Earth) in *Zhuang Zi*, as seen in the opening dialogues between Confucius and Yan Hui was saving-the-world. But the “world” that Yan Hui wished to save is the distorted earthly world. The real unfolding of earthly-world-saving led to the dilemma of self-survival and world-saving, which revealed the impossibility of moral self-sanctification of world-saving and its paradox, that is to say, self-sanctification was in turn a deeper distortion of the world. XinZhai (emptiness of mind-heart and selflessness) learned by Yan Hui was emptiness without self, becoming the remedy to overcome morality saving the world, and demonstrating the triple accessibility of the infinite wholeness of heaven-and-earth, each individual and countless others. Then, the dialogues among Confucius, Lord Zigao of She, Yan He and Qu Boyu deepened this dilemma and gradually turned to the native and sanctity of self-survival.

**Key words:** self-survival; world-saving; self-sanctification; the-infinite-wholeness-of-heaven-and-earth; emptiness

责任编辑:涵 含

# 儒贾商士：明代的商贾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陈宝良

**摘要：**明代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不仅是“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人身份转换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随之而来者，则是商业道德的重建。明代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利轻义的鹜利之徒，转而变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并且具有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关键词：**明代；儒贾；商贾知识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1-0119-10

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明代的商业极其兴盛，城市化发展的势头尤为迅猛。南京、北京、苏州、杭州之类的繁华大都市姑且不论，仅以商业中转中心的钞关所在地为例，小的如直隶河西务，布店就多达160余家。至于大的钞关如山东临清，有统计数字显示，单是“伙商”就有38人，缎店计有32家，布店计有73家，杂货店计有65家<sup>[1]</sup>。商业之繁盛，商帮之林立，几乎被朝鲜人误以为全民经商。如朝鲜人崔溥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sup>[2]</sup>这无疑为明人经商之风的实录。

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是籍以业定，不同的职业具有相异的户籍，其中最为常见的户籍名色，有军、民、匠、灶四种。明代末年，顺天府所行保甲的户籍登记，无疑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的户籍登记，又可细化为民、土著、流寓三类。而在民籍中，主要户等名色为士、农、工、商。除此之外，尚包括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丐<sup>[3]372</sup>。民籍中的士、农、工、商，进而形成四民等级社会的结构基础。传统时代的职业观，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将士视为

“四民之首”。传统的职业观承认，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均为正当的职业，但在“即道即艺”的过程中，却有大、小之判。换言之，士为四民之首，必须具备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进而担当起传道不坠的职责。二是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借助于劝勉百姓耕稼，提升农业乃至农民的地位，进而抑制弃本逐末之风。三是劝耕稼，禁惰游，进而达臻无旷土、无游民的境界，以使赋役均、国用足<sup>①</sup>。尽管明代的职业观属于一种“旧学说”，并不是像清末那样的“新学说”，认为“人人有职业，即人人担责任”<sup>[4]</sup>，但随着“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形成，工商皆本的意识转而崛起，传统的四民等级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形成。正如傅衣凌所言，明代思想界的变化已经证明，“知识的占有者已不完全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分子，有许多思想家出身灶丁、商贩、瓦匠、樵夫、农民、佣工，即黄宗羲所谓非名教中人”<sup>[5]</sup>。这无疑为知识人群体壮大的最好佐证，更可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

“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这不仅是“士商互动”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贾身份转换

收稿日期：2024-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社会研究”（22BZS052）。

作者简介：陈宝良，男，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

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所谓“儒贾”,大体可以析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儒而贾”,即名为儒者,炫智钓奇,实则具有“市心”,专门鬻利;另一类是“贾而儒”,即名为商贾,实则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具有儒者之行<sup>[6]617</sup>。商贾一旦具有仁心或儒行,无疑已经完成了从商人向儒家知识人的角色转换。唐代柳宗元曾作《吏商》一文,将受贿的官员讥讽为商人。所谓“商士”,并非“官贾”,而是指那些具有士者之行的商贾。竞锥刀之利,甚至忍心害理而不顾,这显然是商人或商业社会的常态。名为商人,与市井为伍,却又能做到轻利重义,如此方可称之为“商士”<sup>②</sup>。

## 一、四民相混:士商互动与社会转向

士大夫求利意识一浓,势必导致“士商相混”乃至“士商互动”。明代士大夫喜欢与商人交往,“视铜臭之夫,如蝇之集膻也”<sup>[7]</sup>。史载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与徽州人詹景凤有过一次话语交锋,反映了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之间的关系。王世贞说:“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詹景凤反唇相讥:“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面对如此事实,王世贞也只好尴尬地笑而不答<sup>[8]</sup>。可见,士大夫与商人交往,实则看重的是商人的钱财,从中获取利益。反之,商人喜欢与士大夫交往,也不过是借助士大夫的名头而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颇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动现象,即从“四民异业”向“士与农、商常相混”(即“四民相混”)的转变。一方面,即使是士大夫家庭,“皆以畜贾游于四方”,通过经商而获取利润,即“士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却“以《诗》《书》为业”,即“商而士”<sup>[9]319</sup>。

### 1. 士商互动

明代的士商互动,包括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弃儒就贾”,二是“弃贾就儒”。前者多为士子为了生计而不得已之举,后者则多为商人提升自己身份的主动行为。

在“弃儒就贾”这一社会性动作中,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士子放弃科举仕进,主要还是因为迫于生计。如会稽人章渐,因“穷约”而废弃“儒术”。无奈之下,只好稍稍贷款,“观货邓林之材,走闽、歙、三衢间,终不徙业以老”。即使如此,其经商所得,也不过“给饔飧而已”<sup>[3]165</sup>,即仅可维系家庭生计,并未由此发达。当然,弃儒就贾行为的

发生,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有些甚至是主动的选择。王世贞笔下所记的“卢翁”即卢姓老者,即为典型一例。这位卢翁,是绍兴人,年少时是读书人,“少读书罗壁、秦望诸山”。读书业成之后,转而迁至杭州,慨然道:“士何常之有哉!使行贩,逐什一息,圣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匱,亦士道旁施之尔。”这位卢翁的见识尤为可贵:一是敏锐地察觉到,在科举社会中,“士”并不能永久保持自己的身份;二是认为经商不但可以“避名而藏身”,而且若能“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匱”,同样属于“士道旁施”<sup>[10]57</sup>。

在明代,弃儒就贾之例,俯拾皆是。以山西沁水为例,就分别有张学柳、窦渊、杨元吉等。史载张学柳秉承母亲焦氏之训,年少即知义让。成年后,学书不成,随即弃去,“往来梁宋间贾贩,权子母为治生计,家稍丰焉”<sup>[11]335</sup>。窦渊,开始也是学书,随之弃去,“继而学贾”。杨元吉,生性豪疏,幼时习博士家言,才识超越同侪,后“弗屑占毕,遂弃去”,“往来梁宋间,用计然策起家”<sup>[11]352-354</sup>。

耿定向作有一篇《儒贾传》。“儒贾”这一概念的出现,大抵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商人不但“弃贾就儒”,甚至可以“化贾为儒”。徽州商人程豪,即为典型一例。在程豪的经商生涯中,儒与贾的关系尤其突出,且实现了从贾向儒的身份转变。这可从以下三点观之:一是程豪的经商之道,“诚心平价”,由此获得经商成功。在经商成功后,转而与贤者相交,并积极投身于地方慈善事业。“儒贾”之名,由此而得。二是程豪与长兄程表,伟干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程豪之师郭令,曾游于王阳明之门,专谈良知之学。于是,程豪“魏冠褒衣,趋绳视准”。长兄程表,也是“口不谈儒,而深醇隐厚,居然儒者”。这就引发了下面一个话题,即儒家伦理与商人经商之间的关系。按照通俗的看法,商人经商是为了赢利,而儒者讲学则会因迂言而废事。程豪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如下事实:“儒何负于贾哉!”三是儒贾的世袭性,程氏一门,堪称“彬彬多儒矣”。程豪、程表兄弟,著声乡里,凭借自己的声望,几乎可与“缙绅先生埒”<sup>[6]617-619</sup>。

继弃贾就儒之后,则是“化贾为儒”,即商人凭借子弟的读书乃至出仕,而后晋升为儒者或仕宦阶层。公安派文人袁中道,将徽州商人吴氏兄弟的子弟化贾为儒,与自己家族的“化农为儒”相提并论,进而道出庶民家庭的上升之路,无不在于读书仕进。吴氏兄弟借助子弟的“下帷读书”,而后完成了从

“贾”到“儒”的身份转变。这些商人家庭的子弟,一旦相继鸣跃而起,势必远胜“寒门兄弟”<sup>[12]510-511</sup>。汪道昆家族是商人家庭借助读书、科举而后成功的典范。汪道昆之父汪玄仪,原本是一位盐商,甚至被公推为“盐策祭酒”,亦即盐商领袖<sup>[10]455</sup>。其子汪道昆,读书、科举、仕进,最后位至高官。

## 2. 士商关系: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相交,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声望。至于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甚至称道商人之贤,其目的显然在于看中商人之资,甚至视商人为自己的“外府”。明代著名文人士大夫屠隆曾有言:“荆扉才杜,便逢客过扫门;饭笏一空,辄有人求誉墓。万事从来是命,一毫夫岂由人。”<sup>[13]</sup>文人士大夫一旦“饭笏一空”,家中缺钱使用,即有商人上门,索求谀墓文字。这无疑已成一时风气。如徽州休宁商人吴汝义死后,其行状即由徐学谟撰写。至于吴氏遗存之诗,其子吴子行通过王世贞好友俞仲蔚的介绍,则由名士王世贞作小引<sup>[10]157</sup>。又徽州歙县商人吴自宽,字克仁,曾在山东、淮海之间经商,所交尽是有名的公卿。尤其是一位姓乔的尚书,更是视吴氏为“布衣交”,两人相交甚欢。吴氏一度客于乔尚书的住所,乔氏亲自替吴氏撰写《处士赞辞》<sup>[14]1000</sup>。可见,对于徽州商人而言,一旦经商成功,成为素封之族,势必“文藻亦附焉”,亦即开始追求文藻。他们借助于“黄金贄”或“白璧酬”,借此“乞衮于世之文人”。这些有名的文人,从商人自己提供的家状中,有时很难获得商人的“懿美”事实,只得“指染而颖且为屈”,亦即曲笔,动辄称商人道:“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这种替商人撰写碑传、墓志铭的风气,以汪道昆、王世贞两位大名士为甚<sup>[12]772</sup>。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其例俯拾即是。如徽州一位姓程的商人,少年时即在苏州经商,苏州的士大夫,均“喜与之游”。尤其是都穆,喜欢程氏的淳朴,为程氏所居题名为“白庵”<sup>[9]318</sup>。又如徽州歙县商人鲍松,在开封、杭州经商时,当地的贤士大夫,“往往与之游”<sup>[15]138</sup>。据李日华的日记记载,可知李日华与徽州商人交往甚密。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七月十八日,一位姓程的徽州商人,以酒舫将李日华与他的儿子迎至鸳鸯湖中。中间,“呼广陵摘阮伎二人,丝肉竞发,颇有凉州风调”。其后,酒酣月出,又登烟雨楼“清啸”<sup>[16]267</sup>。至于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更是与徽州商人吴云台交往甚密。据袁中道记载,徽州商人吴氏兄弟,均以

“质行称”,兄弟一起在楚地经商。尤其是长兄吴云台,更是“修儒者之行”,与袁宏道、袁中道、苏惟霖相善。云台人有心计,且真实可以倚仗,袁宏道到京城任官后,更是将自己家里的“营综家事”托付给吴云台<sup>[12]509</sup>。至于普通的商人,即使自己无法与缙绅交游,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儿子与缙绅交游而得以扬名。如李伦,河南祥符县人,居住在河南杞县。此人“少贫,尝为亲负米,力贩鱼盐”,显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李伦虽有“田野笃行”之美,却一直默默无闻。不过,李伦的儿子是著名文人李梦阳的门人。李伦死后,经儿子的请求,凭李梦阳所撰一篇墓志铭,而后得以令人知晓<sup>[17]1563-1564</sup>。

## 3. 从“四民异业”到“四民相混”

明代唐宋派文人归有光,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发现了明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动,即从“四民异业”向“四民相混”的转变。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随之而来者,则是“士而商”或“商而士”现象的广泛出现<sup>[9]319</sup>。归有光的玄孙归庄,从苏州洞庭东山严氏家族的变化中,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的四民等级社会,转而向“士商相杂”转变<sup>[18]</sup>。

就学者“好贾”而言,“官贾”的出现,堪称典型的例证。以广东一省为例,官贾的现象尤为明显,且势力颇盛。相较而言,民贾仅占十分之三,而官贾则高达十分之七。官贾资本雄厚,凭借自己的特权乃至奇策,绝流而渔,可以获得数倍之利;民贾即使极其勤苦,也无法与官贾相争。其结果,则导致民贾日穷,而官贾日富。官贾日富,势必使官员加入经商的行列者日多,甚至遍布山海之间。这些官贾,有的是坐商,有的是行商;以经商地域言,近的仅限于广东所属十府,远的甚至到达东、西二洋。随之而来者,则是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然无别,贾与官亦不再有别。一旦无官不贾,甚至无贾而不官,官与贾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必然导致民既畏官,且又畏贾<sup>[19]</sup>。官贾的出现,以及他们把持或垄断市场的行径,固然不利于商业化的进程,但有一个事实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即官贾的出现是士商互动的有力证据,更是引发了四民相混。

就商贾“好学”而言,如詹高,徽州休宁商人,自20余岁时,即从休宁至苏州府昆山县客居经商。詹高虽为商人身份,所从事的也是获取“机利”之事,对于文章,却“生平好之,甚于知之者”<sup>[9]479</sup>。另有一位徽州休宁商人金塘,曾随其父金显耀经商大江

南北,但所到之处,最喜与“大人长者”交游,尤其喜欢吟咏作诗,所作之诗,即使是社中名家,亦无不有所称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塘对士与商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一方面,在经商致富之后,他宁可让自己的四个儿子接受传统的经义教育,做一个真正的儒者,也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入赘国子监。另一方面,在经商获得成功,他同样不愿捐官入仕。换言之,金塘最为青睐的,是保持一种“商而儒”的身份,而不是追求“仕而商”<sup>[10]497</sup>。

## 二、商亦有道:商道的重建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闻之道,即为儒家之道,是儒家人士的最高道德追求。商亦有道,此即所谓的“商道”。简言之,商道即为经商之术。稍加提炼,商道又可上升到商业伦理或商业道德的层面加以认识。

### 1. 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

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一点毋庸置疑。商人以求利为本色,专鹜利己。为了获得商业利润,商人不惜做出诸多“少恩”的举动。进而言之,儒与贾判然有别:商人对于自己的子弟,不过“教之逐什伍,丰积聚而已”,说白了就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儒者则不同,父教子弟,无不是“介洁贞白、秉道守义”之类的训条<sup>[20]</sup>。换言之,所谓的“贾道”,亦即商道,其最终目的在于求取“厚利”;而儒家之道,则所求在于“名高”。一为利,一为名,即“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畛域井然<sup>[14]1098-1099</sup>。

正如汪道昆所云:“夫商,殉利者也。”<sup>[14]1327</sup>商人的趋利本能,导致儒家学者对商人多有诟病,甚至大张“商之害道”之帜。如林鸿儒,字允德,福建安溪人,儒学生员。他著有一篇《奇货可居论》,开篇即说“商之害道”,强调如下事实:“人农则童,童则机事寡而重流徙;人农则朴,朴则死其处而无二处。”反之,一旦经商,则将人的“童朴”之质砍伐殆尽。经商之人,先想的是“有无”获利,而后又计较获利的“多寡”,最后更是妄想获利千万,势必使“天下之道”沦丧殆尽。更为可怕的是,经商之人,不仅视物为商品,而且“以人为商”,即将人也视为一种商品。经商之风一旦形成,其结果必然导致“以五伦为贸迁”,儒家五伦随之荡然。这不仅仅限于“商之害道”,更是凸显“商者可畏”。林鸿儒此文,深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如王慎中一见此文,即欲拜林鸿儒为师。经王慎中的介绍,林鸿儒结识了唐

顺之。唐顺之读罢此文,亦大为震惊,道:“此子议论高千古!”即使如何乔远,也有如下感叹:“余读其所谓《奇货可居论》,严乎哉!圣门义利之学矣。”<sup>[21]1448-1449</sup>可见,林鸿儒此文的功效,在于严义利之辨。

在商业道德尚未建立的商业竞争中,代表着“善”的儒家道德,无疑与经商求利存在着不小的冲突。下面的一则记载,足以成为一种佐证。如四川的蒋里,有一位善人,善善而恶恶,诚信而不欺人,受到乡里之人的推服。有一位富人,不立借券,从这位善人那里获取千两银子作为资本,前往陕洛地区经商。在他乡经商,这位富人仍然秉持乡里善风,以善待人,诚信不欺,结果则颇为悲剧,在三年时间里,就将千两银子的资本赔光,狼狈返回家乡<sup>[22]</sup>。这则故事至少说明,儒家所倡导的“善”,与商业世界中的尔虞我诈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 2. 儒、商之辨与商道重建

若是从儒、商关系入手,转而经过仔细的辨析,显然有利于重建商道。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既是儒商互动的结果,又是一种全新的商道,随之而来者,则是“儒贾”“商士”形象的重塑。这又可从以下四个层面观之。

其一,“商”与“士”或“儒”与“贾”之辨。山西蒲州商人王现有一段名言,充分诠释了商与士的关系,其中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sup>[17]1562</sup>可见,追求的是商与士的合一,从而成为一个“以义制利”的“商士”。汪道昆率先提出“贾儒”与“儒贾”两个概念,认为“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究其原因,所谓的“贾儒”,属于一种“狸德”,并不可取;而所谓的“儒贾”,则是“以儒饰贾”,正如蝉蜕一般,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甚至可以被称为“良贾”<sup>[14]1268</sup>。所谓“良贾”,通常能做到“躬行彰彰”,甚至不输“困儒”<sup>[14]1146</sup>。

其二,“儒富”与“奸富”之辨。有一个现象显然值得引起关注。即在明代商业化的进程中,即使是儒家士大夫,也不再崇义黜利,不再以“致富”为讳。一旦经商成风,在致富之术上同样存在着“儒富”与“奸富”之间的冲突。儒富之人,“惟以什一为准,无所干没”,是“贾名而儒行者也”。奸富之人则不同,“逐什一,务干没”,视奸富为“良贾”<sup>[14]364</sup>。换言之,奸富,大多“用纤,趋利若渴”;而儒富,则“好行

其义,不持利权”<sup>[14]1292-1293</sup>。可见,以义致富,显已成为新的商道。随之而来者,商贾之术,不再限于“深刻取赢羨”,甚至“以机利相高”,乃至被视为集恶、谬于一身的“大奸巧”,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务仁义之行”的儒贾<sup>[17]1841-1842</sup>。

其三,商人经商,以“诚信”致富,诚信成为新的商业道德。在明代山西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合伙而商”的习俗,即由东家出资本,各个伙计负责具体的经营。假若伙计想从东家那里获取资本,就必须依靠“诚信”。如在经营过程中,即使没有发下誓言,但绝不会“私藏”利润;伙计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资本,即使祖父死后,历经数十年,子孙仍然“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决不欺心<sup>[23]</sup>。可见,伙计凭借自己的诚信,最终获取东家的信任。洞庭东山人金观涛,辅佐席氏经商,时间长达30年。在此期间,每年外出四方经营之人,均受到他的指派。经营完毕,也都向他汇报。至于所得“子本”,更是全部集中于金氏之所。作为东家的席氏,从未问其出入。即使如此,金氏未尝取一“无名钱”,为了子孙而“自润”。这种行为,显然是凭借自己的诚信而获得东家的信任,使其成为一个“贾而士行”之人<sup>[24]1605</sup>。

其四,商人经商,以勤、俭致富,勤、俭随之成为新的商人品德。张五典在论及山西沁水商人张鸿基时,曾认为商人并非一味“鬻利”,而是“有道”。所谓的“道”,即是商道。他说,若欲成为一个“良贾”,必须具备勤、俭、直、谦这四大品德,即“勤以生之,俭以守之,直以取之则人不怨,谦以居之则于物无忤而不悖出”。一旦具备了这四种道德品质,不但可以称为“良贾”,更可称为“善士”<sup>[25]</sup>。

### 3. 商道:超越儒术的独特经营之术

商道并不仅仅限于儒家固有的道德品质,而是另有一整套独特的经营之术,且有维系同行之间特殊的商业伦理。这无疑又是明代商人重建的另外一种商道。如山西蒲州商人王现经商成功之道,主要有以下三条:一是“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二是“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三是“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阱罗”<sup>[17]1561</sup>。除却第二条“信义”二字仍不脱儒家道德品质之外,其他两条无不是商人独特的成功品质。

明代商人经商之道的独特性,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观之:其一,商人伦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维系同行内的社会交往。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社会交往崇尚两条准则:一是尚齿,即以年岁的长幼决定身份地位的高

低;二是尚爵,即以官衔的高下决定身份地位的高低。商业社会则不同,是以资产的多少,排定社交聚会时的座次。如扬州商人聚会时,其座次的排定,“率以资为差”,即“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sup>[14]739</sup>。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借波斯胡商为例,说:“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sup>[26]9</sup>这则记载同样可以证明,商人聚会座次的排序,一向不论“年纪”与“尊卑”,而是“以利为重”。其二,货殖并非小道,在经营过程中,迫切需要商人“经权取舍,择人任时”。所有这些都并不能从儒家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营养。正如徽州歙县商人程嗣勋所言,必须拥有“管、商之才”,甚至通晓“黄、老之学”<sup>[27]</sup>。这无疑使商道在继承儒家道德之上,进而超越儒家道德。其三,以“无竞心”应对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转而获取商业成功。商场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带有一种竞争之心而参与商业经营活动,这显然不可避免。有意思的是,并非内具竞争之心,即可获得商业经营的成功。在人人具有“竞心”的风气下,若是不带竞争之心,有时反而会获得意外成功。徽州歙县商人鲍光宇的成功,即为典型一例。他自述成功之道时,坦然相告道:“吾惟无竞心云尔。”<sup>[28]710</sup>其四,摆脱传统中国商人固有的对官僚士大夫的依赖,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成就一种全新的商道。徽州歙县商人余育,即为典型一例。余育的经商方式与其他商人有所不同。尽管他在闹市设店,但又专治“静屋”,“日闭关诵苦吟,弗豪势人交”。到了年终,一算整年的利润,反而与其他商人相等。至于其中的原因,余育一语道出:“夫价之昂卑,岂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随其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有恒闲也。夫争起于上人,吾既随其昂卑卑,息与诸埽也,侮压又胡从至矣?吾是以弗势豪交而息罔独缩。”<sup>[17]1616-1617</sup>这就是余育所谓的“商亦有道”,至少说明明代商人在重建商道的过程中,正在努力摆脱权贵势力的束缚。

## 三、儒贾商士:商贾知识人群体的形成

士大夫与知识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虽同为知识的占有者,但士大夫拥有官衔与科名,知识人则仅属庶民身份。有一个事实值得引起关注,即在明代,知识人群体正日趋壮大,很多仅具庶民身份且来自不同职业领域的人,纷纷跻身于知识人群体

的行列。在日趋膨大的知识群体中,商贾知识人,则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大势下,商人安排自己子弟的未来,通常亦作多种打算,或教之学贾,或勉之学儒。如徽州休宁县海阳镇商人范汝珍,生有两个儿子,一为范泓,一为范涑。范泓“稚少艾”,就继承父业,继续经商;范涑“有志学古”,即命其读书学儒。当然,即使是商贾知识人,在明代商人的眼里,宁可成为“儒贾”,而不愿被人讥为“贾儒”<sup>[14]638</sup>。

### 1. 捐资入仕:商人地位的晋升

在明代,士商互动已经风靡一时,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上升。以宁波的富商为例,他们凭借前往日本的海上走私贸易而致富,导致“富商巨室,权侔于大吏”<sup>[29]</sup>。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些巨商富可敌国,但朝廷的礼仪与法制规定,终究限制了商人的身份地位,使其仅仅是编户齐民之一,而不可与仕宦官员平起平坐。对于商人来说,假若说“弃儒就贾”是一种无奈之举,那么,一旦经商获得成功,“弃贾就儒”乃至捐资入仕,这似乎又成为许多商人的最后归宿。

明代商人捐纳为官,不乏其例。如正德年间,东莞商人袁晃,因“输粟助边”,照例被授予七品散官,其后又照例被授“冠带寿官”<sup>[30]</sup>。正德年间,徽州商人吴自宽“以贖买爵一级”<sup>[14]1000</sup>。万历年间,蒲州商人展玉泉应朝廷之令,前后上纳数百两银子,最后被授予归德府商丘驿驿丞<sup>[31]635</sup>。又蒲州商人韩玻,“尝入粟实边,授义官”。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四维之弟张思诚,经商成功后,“会有工部例,乃入贖授龙虎卫指挥僉事”<sup>[31]762,772</sup>。万历二十七年秋七月,长芦商人钱桂,将价值1000两银子的自置住房一所,“愿献入官”,作为普宁分店。明神宗嘉奖其忠义可嘉,下谕“准给冠带”,协同税监征收税课<sup>[32]</sup>。

商人捐纳为官,有的所授仅为“寿官”“义官”,或者“冠带荣身”;有的仅授“散官”,并无实职。即使是被授予实职,亦不过是驿丞之类的下级官员。即使如此,商人一旦捐纳为官,地位随之得以晋升,可以头戴进贤冠,身穿彩衣,名列缙绅,可谓荣宠之极。当然,商人的仕进之路相当复杂,捐纳为官不过是商人人生历程中的一环而已。

### 2. 仕宦经商:商人群体出身的多样化

细究明代商人的来源,显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景象。世代经商,经商职业的家族传承,固然不乏其例,但“弃儒就贾”之风的盛行,势必导致以下两大结局:一是官员子弟经商成风,二是秀才经商亦多

其例。

明人陆深有言:“自三代井田法坏,士大夫鲜不兼农贾之事,况他无禄位者乎?”<sup>[28]710</sup>细究其义,无非是说士大夫经商之风,是井田制败坏的结果,并非明代所独有。当然,官员经商,亦即所谓“官贾”的形成,尤以明代为盛。至于官员子弟经商,可以丘琥为例。据载,丘琥,字伯玉,号松山,兰阳人。其父丘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丘琥幼年颖异,于书无所不读。过分的刻苦攻读,导致他得了吐血之病,经服用白术丸数十升,方得痊愈。其后,又得眼病,只好弃去读书仕进之业,转而经商。经营40余年,“遂起家至千金”<sup>[17]1546-1547</sup>。

秀才经商,更是不乏其例。如刘滋,濮阳人。少为秀才,因家中贫窘,田不过20亩,又值水旱不登,无以自活,于是尽将田地卖掉,“逐什一之利”。经营10余年,得以成功,“致数万金”<sup>[33]</sup>。项承恩,字宠叔,号玉怀道人,徽州歙县人。占籍杭州府仁和县,成为杭州府学秀才。屡试不第,于是隐居西湖岳坟之侧,转而经商。他开设一个小店铺,类似于古玩店,“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贵”<sup>[16]237,274,275</sup>。

### 3. 商贾之知识人化

商贾之知识人化,得益于商人家庭或其出身的多样化。尤其是官员子弟经商、秀才弃儒经商以及商人中的“书贾”、古玩商人,更为商人转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明代商贾之知识人化,大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其一,商而兼士,兼具商人与士人双重身份。按照传统的观念,商人居四民之末,徽州却并不如此。在淮上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大多出于缙绅巨族。在这些盐商中,凭借“急公义叙”而进入仕途者固然很多,至于读书登第,入词垣而后跻身臬仕,更是不乏其例,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商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朝廷更是为他们专门设立了“商籍”。岁试、科试两次考试,但凡每次考试,徽州商人均可额取生员50名,其中20名入杭州府学,仁和、钱塘两个县学,各有15名。这种专设的商籍,渐有扩大之势,随后淮商也开始请求设立商籍。由此可见,在徽商群体中,人文已渐趋兴盛。所谓的商人,不再是“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而是兼具商人与士人的双重身份<sup>[34]</sup>。

其二,在明代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崇儒尚文的家庭,且斯文一脉,得以绵延连续。苏州洞庭席氏与广东南海姚氏两个家庭,堪称范例。席本祯,字宁

侯,别字香林。生而嶷然露头角,读书专治《诗》《春秋》。他经商颇为成功,能够做到“任时而知物,笼万货之情,权轻重而取舍之”,但又不专注于经商获利,反而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江南大侵,地方官设法募捐,席本祯捐出8000两银子,救助饥民,得到崇祯帝的“优旨嘉奖”。随后,又捐助资金以佐军需,被朝廷授予文华殿中书一职,并兼太仆寺少卿。席本祯生有四子,尤其是次子席启图,字文舆,岁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席启图好读书,贮书多达万卷,遍辑先贤嘉言懿行,条晰部居,编成《畜德录》一书<sup>[24]</sup>1588-1589。姚经,字宗理,别号石川,广东南海县人。少负奇气,读书通大义。早年失怙,不再读书仕进,转而经商。姚经曾著遗言20篇作为家训,且率先躬自勤约。从人称“石川先生”而不名这一事例中,足见姚经不仅仅是一个求利的商人,而且获得了乡里之人的尊重,甚至被归入知识人之列。姚经的几个儿子,显然继承了父亲好儒之风。如姚文宽,别号东皋。曾追随其父“西游,信孚益裕”。姚文宽擅长作诗,并与有名的商人结成“兰亭诗社”。姚文贯,字道夫,别号悟斋。幼时读书,有颖性。12岁时,即能赋中秋诗。年长之后,开始学习经商,但未尝“废学”。姚文粹,字纯夫。其人颖敏,好读书,日诵数千言。习举子业,为文清畅。多次参加地方考试,不第,于是弃取科举之业。嘉靖初,奉父亲之命,游学于黄佐门下,馆于粤洲草堂,每日深究经史百家之言。经黄佐教诲,学行大进,不再徒然求博,转而反躬力践,守约崇礼<sup>[35]</sup>。

其三,模仿文人士大夫生活样式,或取有字与别号,或聚会赋诗,或好书、刻书,借此重塑商人形象。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开始渐趋文雅,借助于取字、取别号,以便与商人趋利之俗有所区别。相关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徽州歙县商人鲍辅,字“以立”,号“豫斋子”<sup>[17]</sup>1775。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商人喜欢鬻利,属于没有“趣致”之人。但是,若商人能诗,势必拉近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距离,甚至得到文人士大夫的亲昵。如徽州商人夏道甫,经商虽未成功,但“日与造物者游”,所作之诗,深得梅国桢、丘坦、李贽的称道,众口一词,称之为“韵人”<sup>[12]</sup>523-524。商贾不仅好诗,而且在聚会时,不乏觞咏的场景。如在苏州虎丘,曾有几个商人在虎丘山亭子上饮酒聚会,且不乏吟咏。此类行径,虽被苏州放荡才子张灵所戏,但至少说明商贾开始模仿文人之举,聚会赋诗<sup>[36]</sup>。商人嗜书,是成为知识人的重要前提。在商贾跻身于知识人的过程中,明代商人不仅好书,而且喜欢刻

书,积极置身于知识的传播。徽州商人鲍松,即为典型一例。鲍松生性“酷爱古今书”,不惜重价购书,所积书籍,多至万余卷。于是,在所居横塘之上,建造一楼,作为藏书之所,并延聘名师,在藏书楼中教其子弟。鲍氏好书,声名所至,四方“挟异书者,日走其门”。鲍氏多书,于是闻名于歙县。不仅如此,鲍氏还亲自校讎图书,加以刊刻,刊刻之书相当精核。鲍松所刻之书,有《小学旁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以及李白、杜甫的诗集<sup>[15]</sup>137-138。

#### 四、崇儒尚文：商贾知识人的知识世界

在经历了士商互动以后,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义轻利的鬻利之徒,转而成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徽州商人程锁就是典型的例子。程锁晚年释贾归隐之后,除了“上奉母欢,下授诸子业”,其他闲暇之日的活动,几如文人士大夫无甚差别,成为一个翩翩的儒者。他的日常活动,是“召宾客,称诗书”;所交往之人,分别有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等人。至于他所阅读的书籍,诸如《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则大抵已经说明,商人的知识世界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景象<sup>[14]</sup>1268。

##### 1. 儒行商名：商人之崇儒

明代很多商人,名为商人,实则具有“儒行”,亦即行为如同儒者。换言之,这些渐趋文雅的商人,其实就是没有穿戴方巾、襖衫的儒者。如山西蒲州商人沈廷珍,是大学士张四维的祖姑丈。沈氏幼年知学,进取甚锐。其后,不得已而放弃原本的志业,转而经商,“拓产殖家”。最值得注意的是,沈氏经商之时,仍然携带《小学》《通鉴》两种书,且“时诵习之”。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沈氏身为商人,仍不忘旧时嗜好,不但在经商途中时时读书,甚至工楷书,喜欢作近体诗;二是沈氏所携带的书籍,并非仅仅用来阅读,有时是为了便于自己的经商,解决经商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即“遇事辄有援证”,以使经商获得更加成功。张四维称其为“儒行商名,湖海之英”,可谓不刊之论<sup>[31]</sup>758。

明代商人虽不得不凭借经商维系生计,但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具有一种“好儒”甚至“崇儒”的情结。如商人赵宏,完全与其他商人“窳蕪重钱,心计及毛厘”不同,而是生性慷慨,他人有了缓急告助,无不主动出费帮助。他在告诫第二个儿子赵时用,有一句完全违背经商原则的名言,即“黄金满

籛,不如一经”。在金钱与知识的天平上,赵宏更为看重知识,这是明代商人知识世界的典型表征。于是,商人不再是趋利而去义之人,而是行同儒者,“耆义如渴”。如海阳商人金甫,即“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他仿照义仓而行“贷谷法”,又效法范仲淹的遗意,“兴茔墓之役,持畚鍤者日以数百人,寓赈于佣”<sup>[37]</sup>465,467-468。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讲究“业中求道”,儒学趋于通俗化,使儒学不再是知识人的专利,而是将教育的对象转向农工商贾。如邹守益认为,商亦可成就学问。从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即职业虽有不同,但学问则归趋于—。商人与学者之别,在于义利之辨。假若商人“志于义”,可以成为尧舜;反之,如果身为公卿而求利,那么只能沦为盗跖<sup>[38]</sup>。如此之说,显然为商人晋升为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王门泰州学派的异军突起,既是儒学通俗化的表征,更是农工商贾一跃而成为知识人的有力佐证。在商贾尚学的风气中,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更是商人成为著名学者的典范<sup>[39]</sup>78-89。

## 2. 富而好文:“诗贾”的形成

商人一旦富而好文,或以文雅相高,“诗贾”随之出现。自古以来,托于隐者很多,且其中不乏凭借文采自现。商人因为“心有营业”,即将心思致力于计算骛利,导致商人大多缺乏文采。即使是诗风勃兴的唐代,桑门、闺秀中,不乏诗人,却很少有文采的商贾。明代则不然。如黄徽,作为一个商人,且身处器纷,但其心“宁以明”,最终成为一个“诗贾”。黄徽,字季美,是杭州一位商人,有“诗贾”之号。他曾出赘于沈姓老翁,替沈氏主持经营大事,深得福建商人之爱。前往福建经商时,无论是在旅舍,还是在船埠,黄徽时时以赋诗为娱乐,并将诗集命名为“鬻音”。所作之诗,不乏佳句。如《送李左虚》诗云:“日落千山寂,秋深万木寒。”《桃花》诗云:“过雨繁枝重,含风碎萼新。”《浦城买舟》诗云:“山火夜不减,滩声寒愈流。”《秋日》诗云:“青芜眯古砌,丹叶隳平沟。斫竹屏重补,为幔布屡裁。”<sup>[21]</sup>1509-1510 诸如此类的佳句,置诸诗人之林,毫无逊色。

商人能诗,且擅长作诗,不乏其例。如徽州歙县商人鲍弼,与著名文人李梦阳有交往。在苏州,鲍弼更是与山人孙太白有交游,“酣歌弄月,冥心顿会”。鲍弼之诗,多有佳什。如《忆子》诗云:“吾儿屈指一裁别,他乡回首长相思。在抱两周知数日,携行三岁

随歌诗。前与论宾主,膝上为我开须眉。情偏忆汝老更苦,中夜难禁回梦时。”诸如此类的诗句,被李梦阳誉为“君诗佳顿如此”<sup>[17]</sup>1555-1557。徽州歙县人王野,字太古。年幼时,王野习作诗,稍长,弃博士业,追随其兄在江淮一带经商。时日一久,诗益有名。晚年,王野之诗颇受竟陵派的熏染,深得钟惺的称誉<sup>[40]</sup>605-606。

商人不但能诗,且有诗集行世。如苏州商人沈野,有《卧雪》《闭户》《燃枝》《榕城》等诗集,王稚登、徐惟和、曹学佺为之作序<sup>[40]</sup>609-610。南京商人姚澗,原为“金陵典客”,显然以典当为业。他亦著有诗集《海月楼集》,由李维楨作序<sup>[41]</sup>。徽州歙县商人郑作,著有诗集《方山子集》,由李梦阳作序<sup>[17]</sup>1683。徽州歙县商人余长生,字存修,号钝斋,有“处士”之名,著有诗集《缶音》,并由李梦阳作序<sup>[17]</sup>1695。余长生之子余育,字养浩,号邻菊居士,又号潜虬山人。其诗最初学的是宋人,后经著名文人李梦阳提醒,称宋人无诗,又改学唐人,究心唐宋以上的赋、骚<sup>[17]</sup>1616-1617。徽州歙县商人吴义斋,曾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经商。此人“服贾而行儒”,著有《经畚堂集》1卷<sup>[42]</sup>。

## 3. 兴趣广泛: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除了崇儒好文之外,明代商人的兴趣极其广泛,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如徽州歙县商人鲍弼,兴趣相当驳杂,不但擅长理生、饬行、训幼、玩编、修艺、课田、省植,而且“能医、能形家者流”,即精于医术,善于堪舆之术<sup>[17]</sup>1555-1557。海阳商人金甫,字子公,幼年时即“游于贾人”,然生性喜欢读书,尤其精于医疗、堪舆家言<sup>[37]</sup>467-468。福建莆田商人郭少愚,经商之余,除了吟哦赋诗之外,还喜欢先朝的琴书、名公诗画,“必多方罗致,珍藏什袭,时对客展玩,以此自娱”<sup>[43]</sup>。

明代商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观之:其一,精于算术,通晓数学。粗通算术,应该是商人最为基本的知识。如沈江,生性敏捷,有很好的记忆力。弱冠失怙,无法继续求学,只好“牵车服贾”。即使如此,他还是喜欢广泛涉阅,舟车所至,必定“携短帙自随”,旨在通晓方技小说家言,以至“算数有声于廛井间”<sup>[31]</sup>760。商人张思诚,16岁时就远游经商,“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他所具“综计精确”的能力,显然得益于精通《九章算术》一书<sup>[31]</sup>771-772。其二,独好子史,且有史识。如徽州休宁商人程元利,“世世隐贾”。程氏知识广博,沉溺于象纬、堪舆、龟策、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

通,但“独好子史”<sup>[10]456-457</sup>。其三,信佛佞神,信仰丰富。据文人李日华记载,徽州有一位吴姓的商人,凭“什一起家”,但人有隐德,最后成为一个佛教居士。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李日华替他作《省吾居士赞》<sup>[16]201</sup>。徽州歙县商人阮公弼,因经商而致富。至晚年,“崇事二氏,种诸善根”,并在田赭山修缮三茅宫,装饰各座神像<sup>[14]765</sup>。小说《初刻拍案惊奇》说徽州人心性俭嗇,“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sup>[26]224</sup>,堪称实录。其四,收藏图书古玩,以文雅相高。嘉靖末年,海内宴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治园亭、教歌舞之余,兴趣间及古玩。影响所及,徽州商人也以收藏图书、古玩为雅。商人凭借雄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最终导致“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sup>[44]654</sup>。又如杭州商人高应鹏,经商致富以后,在家旁筑藏书室,收藏古今图书。又造一座楼,收藏古代尊彝钟鼎<sup>[14]1004</sup>。尤其是徽州巨商吴廷,更是不惜花费巨资刊刻法帖《余清堂帖》。此帖出自其友杨不器的手笔,“稍得古人遗意”<sup>[44]658</sup>。

## 五、余论：商贾形象的重塑

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像明代这样的科举社会中,唯有科名是一条“荣路”,即通向高官厚禄的荣耀之路。在“四民”中,只知道“尊士”,却贱视农、工、商贾。至晚从明代中期开始,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传统的“四民”观做了深刻的内在反思。农民、商人,或者说文人、武将,虽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各有不同,但都有其存在于世的社会价值。“左贾右农,谁与通功?轩文轻武,谁与御侮?”曹于汴的反问,足以说明“左贾右农”已不再适应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动,而是应该回复到“农人农,贾人贾”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使之发挥各自应有的社会作用<sup>[45]</sup>。明代士大夫在肯定匠艺之人的同时,属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以及位于四民之外的贱者仆婢,同样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在士大夫群体中,开始关注商人的日常行为,并一一加以记录,尤其关注商人羡慕“孔氏之雍容”或者“轻财好义”的历史动向,甚至喜欢称赞商人“以游侠闻”<sup>③</sup>。随之而来者,则是对传统四民观的反思,以及新四民观的萌生。相较而言,当士子汲汲于科举,竞相趋于“浮末”,甚至“耻非所耻”,亦即毫无羞耻感时,实则还不如“挟技艺,牵车服贾”,工匠、商贾的行径反而显得“身不失义”。这就牵涉到一个士子的治生问题。在张履祥

看来,诸如教书、行医、耕田乃至工匠技艺、商贾,都是治生之术,只要能做到卓然自立,仍然可以不堕“儒素家风”<sup>[46]</sup>。

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商贾久已被视为“贾竖”或“贾竖子”。一方面,商贾的话语,如同女子一般,不识“大体”;另一方面,商贾不识《诗》《书》大义,易于被利益所惑。如此刻板印象,乃至在道德上有所贬抑的称谓,在传统的观念上根深蒂固,一直沿袭至明代,以致明代商人尽管被税使太监所看重,但还是被称为“贾竖”。即使商人自己在面对税使太监时,也不得不自称“贾竖”。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这一社会史的转向之后,士商之间趋于互动,商人地位得以提升,商贾形象随之重塑。在商人与士大夫交往时,士大夫出于“善视”商人,通常只称商人的“字”,而不称商人的“名”<sup>[47]</sup>。

明代商人形象的重塑,历经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鹭两个阶段。商人不再唯利是视、损人厚己,而是致力于慕义好施,赈穷周急,善及一乡一县,借此形塑自己的形象。随之,一种全新的商人形象呼之欲出:他们是“儒商”,属于“儒行商名”;他们是“商士”,名为商,实则是儒家知识人;他们是“廉贾”,不但“不侵”民利,而且重然诺;他们是“长者”,赤手致富,无所芬华,不做一个“财虏”,即守财奴;他们是“智士”“达人”,心怀智慧,而且通达;他们是“贾隐”,是“隐而贾者也”,天真自得,颇有高致之态;他们是“商侠”,轻财好义,甚至集商贾、儒生、侠客于一身。

在商人形象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鹭的过程中,商人群体已呈日渐分化之势:一则务名,通过结交贤士大夫以显名;二则务实,蹈隐约躬,专行仁义<sup>[10]298-299</sup>。无论是务名,还是务实,商贾的知识人化,则是其中的变迁大势。随之而来者,商人的衣冠装束、话语、行为,渐渐已是一种儒者形象,即“被服言动,俨然儒者”<sup>[48]</sup>。或者如商人王艮那样,在立志成为儒家学者之后,按照《礼经》,制作五常冠、深衣、绦经、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如此装束及其行为,看似怪异,实则是儒者的“法服”<sup>[39]89</sup>。衣冠一番改变,商人形象随之得以重塑。

### 注释

①相关的阐述,见薛瑄、周忱、刘宗周之论。参见薛瑄:《读书续录》卷五,薛瑄著,孙玄常、李元庆等点校:《薛瑄全集》第3册,三晋

出版社2015年版,第982页;周忱:《双崖文集》卷三《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周忱撰,吴志远注译:《双崖文集辑录与译注》,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页;刘宗周:《论语学案》三《子路第十三》,《刘宗周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②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三《近古录》一,引陈良谟《见闻纪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21页。③如归庄记商人吴绍素事云:“吴某字绍素,歙县人,流寓扬州,雄于赀,而慕孔氏之雍容。轻财好义,以游侠闻。”参见归庄:《归庄集》卷七《书吴绍素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 参考文献

[1]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4458.  
 [2] 崔溥.漂海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5.  
 [3] 吴光.刘宗周全集:第4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4]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10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611.  
 [5]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8.  
 [6] 傅秋涛.耿定向集: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 文元发.学圃斋随笔:下册[M].台北: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578.  
 [8] 周晖.金陵琐事 续金陵琐事 二续金陵琐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312.  
 [9]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0] 沈乃文.明别集丛刊:第34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3.  
 [11] 张道藩.张司隶初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2] 袁中道.珂雪斋集: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3] 曹臣.舌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51.  
 [14] 汪道昆.太函集:第2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4.  
 [15] 董纪.中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6] 屠有祥.味水轩日记校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17] 郝润华.李梦阳集校笺: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20.  
 [18] 归庄.归庄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59-360.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4-305.  
 [20] 李廷机.李文节集: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404.  
 [21] 何乔远.镜山全集: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22] 唐甄.潜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23] 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61-62.  
 [24] 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第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5] 田同旭,赵建斌,马艳.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24.  
 [26]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长沙:岳麓书社,2002.  
 [27] 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97-598.  
 [28] 林旭文.陆深全集:第2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29] 阎海文.傅锦泉先生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  
 [30] 冯奉初.潮州耆旧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31.  
 [31] 张志江.张四维集: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2] 万历邸钞[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1180.  
 [33] 谢肇淛.小草斋集: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249.  
 [34] 许承尧.歙事闲谭:下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4:603.  
 [35] 黄佐.泰泉集:下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1135-1136.  
 [36] 罗仲鼎.艺苑厄言校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395.  
 [37] 焦竑.澹园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8] 董平.邹守益集:下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728.  
 [39] 陈寒鸣.王艮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4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1] 俞樾.九九消夏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57-58.  
 [42] 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黄淳耀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51-52.  
 [43] 曹学佺.曹学佺集:第2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745-747.  
 [4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5] 曹于汴.仰节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04.  
 [46] 陈祖武.杨园先生全集: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658-659.  
 [47] 李伯齐.李攀龙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3:502-503.  
 [48] 徐阶.世经堂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06.

## The Confucian Businessman and Scholar-official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rchants: The Business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Knowledge World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 Baoliang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merchant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business intellectuals” were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prosperous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soil. The emergence of the two concepts of “The Confucian businessman” and “business scholar-officials”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social ac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lar-officials and merchants”, but also the symbol of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merchants, that is, from merchants with “market heart” to Confucians with “benevolence”. Then came the rebuilding of business ethics. The morals, knowledge and even the image of the merchants in the Ming Dynasty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and they changed from those who valued profit over justice to those who worshiped Confucianism and good literature, having diversified knowledge world.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the Confucian businessman; business intellectuals

责任编辑:王 轲

## 从上博简《武王践阼》看两周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变迁

邓国军

**摘要:**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君王南面”礼制是两周统治者基于建筑空间所建构的一种君臣身份秩序,它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中起着总体导向性作用。“君王南面”礼制在两周时期展现出了沿袭与变革的双重面向,其中变革表现为:一是“下移”,即“南面”的主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强者、臣僚,“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二是“上移”,即随着造圣运动的兴起,东周时人将“南面”的权力赋予“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的理念,“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理论化。至战国中晚期,礼学家、思想家们结合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构起了制约王权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上博简《武王践阼》中武王“东面”“北面”正是其典型表现。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历时性变迁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空间”在周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价值,由此可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分析路径,以此来管窥“空间”在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上博简;君王南面;《武王践阼》;两周君臣身份秩序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29-08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随着周代社会阶层的细化,周人贵族强化了对于生存空间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划界,在朝觐、祭祀、册命等礼仪活动中利用空间方位来区分君臣、主宾乃至生死的身分等级秩序,空间方位因此成为了凸显王权、区分贵族身份的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行手段<sup>[1]</sup>。西周早期宜侯矢簋铭文云:“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入社,南向。”<sup>[2]2695</sup>西周中期走马休盘铭文又云:“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宫。旦,王各大室,即位,益公佑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向。”<sup>[2]5475</sup>上揭材料表明西周早中期周人已在南北方位与君臣关系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君王南向”“臣属北向”成为了君臣尊卑秩序的重要标识。

然而,上博简《武王践阼》记载了周武王两次向太公望问道之事,其中所涉朝堂礼仪中君臣面位皆非“君王南面”。武王第一次所问为“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其文云: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如欲观之,盍斋乎?将以书见。”武王斋三日,端服、冕,踰堂微,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夫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西面而行,曲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奉书,道书之言。<sup>[3]151-153</sup>

简文中武王本欲南面而问道,师尚父明言“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为了“东面而立”。武王第二次向太公所问为“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其文云:

收稿日期:2024-10-23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社会秩序”(20CZS012)。

作者简介:邓国军,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心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82)。

武王问于太公曰：“亦有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有之乎？”太公望答曰：“有。”武王曰：“其道可得以闻乎？”太公望答曰：“身则君之臣，道则圣人之道。君斋将道之，君不斋，则弗道。”武王斋七日，太公望奉丹书以朝。太公南面，武王北面复问。太公答曰：“丹书之书有之曰：‘志胜欲则利，欲胜志则丧。’”<sup>[3]162-164</sup>

此次朝堂问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上博简《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文献，其内容未必为西周史事之实录，但其所载武王“东面”“北面”问道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这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当重新反思“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的适用范围，周代统治者利用空间建构君臣身份秩序的具体面向及背后逻辑；另一方面也要对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时代性进行客观审查、合理批判。过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表达中的作用<sup>①</sup>，但尚未将“君王南面”礼制与“君王北面”“君王东面”“臣僚南面”等内容纳入到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这一整体框架下予以讨论。事实上，这些问题恰恰是理解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析与诠释，不仅有助于揭橥两周王权、空间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互动的复杂面向，还有助于探究空间方位在中国古代权力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 一、君王“南面”：西周王朝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形式

在西周整个权力系统中，王权起着主导和枢纽的作用。为了实现对邦内诸侯、臣僚及民众进行有效统治，周王具体通过分封、巡狩、册命、聘享、征伐等方式使其权力加以运行。王权的实际运行需要依赖一定的空间，因为空间不仅是王权运行的载体，同时也为王权运行提供了场域。循此思路，我们通过西周文献所载王权运行的具体形式，便可清楚地获悉王权运行的空间场所。

西周王朝凡继承王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赏赐臣下，都要举行隆重的册命礼。就现有史料而言，册命礼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铜器铭文，这些铭文中载有册命活动举行的具体场所。西周中期七年趯曹鼎铭文载：“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旦，王各大室，邢伯入佑趯曹，立中廷，北向。”<sup>[2]1450</sup> 铭文

明言周王举行册命之所为周般宫大室。逢祭祀、出征凯旋、封建诸侯、大射前后，周王往往要宴飨诸侯群臣。周王宴飨活动在西周金文中通常表述为“王飨礼”“王飨酒”或单作“飨”。西周中期效卣铭文亦载：“唯四月初吉甲午，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飨于王，王赐公贝五十朋。”<sup>[2]3414</sup> 铭文表明举行飨礼的地方为尝公东宫。此外，周代王权运行还体现在朝聘活动中，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公钟铭文云：“唯正二月初吉，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馈王于周，辛未，王各于康，荣伯入佑应侯见工。”<sup>[2]100</sup> 此处“康”疑为“康宫”，应侯在成周为周王举行了馈问活动，周王在康宫召见了应侯。上揭史料表明，无论是册命、宴飨或是朝聘活动的开展，均离不开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空间。这些礼制建筑空间构成了王权运作的主要场域，周王在这些场域中通过册命、宴享、朝聘等形式，使其权力得以顺利运行，进而确立了王权的独尊以及对臣权的统属。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在构成王权运行场域的同时，这些建筑空间的位置、方向、尺度、高度等内容也体现着权力的差异，影响和制约着王权的运行，其中空间方位对于周代王权运作的影响尤为明显。《周礼·天官·叙官》开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sup>[4]1373-1374</sup> “辨方正位”，贾公彦疏曰：“谓建国之时，辨别也。先须视日影以别东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别也。正位者，谓四方既有分别，又于中正宫室朝廷之位，使得正也。”<sup>[4]1374</sup> 周代统治者在建国营都过程中，通过辨正方位的手段，将建筑空间秩序与政治权力秩序、君臣身份秩序巧妙对应起来，并以宫殿、宗庙、朝堂等建筑的形式使之视觉化，从而使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方位布局成为标识君臣身份秩序、彰显王权独尊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方位布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体走向，二是宫、庙、朝、寝等建筑空间内部的方位布局。显然，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和规制。有关周代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体方位布局，具体通过考古发掘的西周遗址可窥见一斑。目前已发掘的西周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基址主要分布于周原地区、丰镐地区。其中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夯土基址平面呈长方形，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方向北偏西 $10^{\circ}$ <sup>[5]</sup>。从基址出土的陶器来判断，其始建年代约在武王灭商前，废弃年代当在西周晚期。关于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性质，有周王行宫、宫

室建筑或贵族宅院诸说<sup>[6]</sup>。丰镐地区在沔东的斗门镇、官庄村和花楼子等地已发现 10 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五号夯土基址整体呈“工”字形,主体建筑为坐北朝南。发掘者认为该建筑始建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根据其规模及营建方式,推测应是一座重檐式的天子宫寝建筑<sup>[7]</sup>。以上考古材料表明,西周时期的宫、庙等建筑大多采取坐北面南的布局。周人之所以选择“坐北面南”的建筑取向,固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即坐北面南不仅有利于采光,还可以避开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同时它也与当时的礼制密切相关。因为,宫殿、朝堂等建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民建筑,而是周王施政布政之所。这些大型宫殿建筑的基本功能在周代已然超越了普通“遮蔽物”范畴,被周人赋予了更多的礼制内涵,成为周代宗法礼制、权力秩序的重要载体。与此相应的,这些宫殿建筑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上成为体现周代礼制精神及权力秩序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着权力主体在建筑中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这在西周册命礼仪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册命礼仪中,周王位于廷北,南面,受命者由傧引入,立于中廷,北向。周王授册命之文书给史官,史官位于周王的右侧,南面宣读文书。在中廷中,周王占据尊位,立北面南,臣子则立南面北接受册命。

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王立北面南发布册命、训诫、赏赐,臣属立南向北接受任命、训诫、封赏,久而久之,君臣之间的南北方位逐渐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识。西周晚期晋侯苏钟铭文:“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sup>[8]</sup>,此处并不涉及宫庙、朝堂等传统的权力空间,但铭文特意交代了周王巡视晋师下车后所立方位为立北面南,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君王南面原则在王权的反复实践中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施政场所,被抽象成了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条准则。“君王南面”原则也因其鲜明的政治性,被周人赋予了礼制内涵,成为周王朝秩序之必要构成部分,并以“礼制”的形式形成传统,成为周王经营自己位置的手段。

综上,“君王南面”礼制是基于建筑空间中君王与臣属之间空间站位以及尊卑等级关系而建立的一种君臣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形式,严格规范着周王朝君臣身份秩序。君王处于权力空间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地位,在权力空间中臣属的位置均围绕君王而展开。“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建构中起着总体导向性和根本制约性的作用,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在空间方

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对应关系,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独尊性,他们在遵循“君王南面”前提下,又通过“中心—边缘”“内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 二、“君王南面”礼制的沿革与东周政治秩序的维系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时期展现出了“传承”与“变革”的双重面向。其中“传承”主要表现为东周时人承袭西周形成的“君王南面”礼制传统,十分强调君王与臣属在权力空间中的空间站位及权力关系。大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仪礼·士相见礼》云:“凡燕见于君,必辩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sup>[4]2108</sup>意即臣僚在闲暇时见国君,也要遵循“君王”南面的空间礼制,不能因为国君不是面朝南,臣僚就可以斜向国君。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夏官·司马》更是云:“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sup>[4]1833</sup>引文中的“南乡”即为“南向”,“正朝仪之位”就是让君王南面而立,三公北面称臣,“辨其贵贱之等”指尊者处尊位,卑者处卑位。上揭史料中“君王南面”与“臣属北面”对举,“南面”“北面”二者相互依存,共同表征着君臣身份秩序,这也揭示了“君王南面”礼制依然是春秋战国君臣共同遵守的一条准则,严格规范着东周政治秩序。此外,“君王南面”礼制有时会省略权力运作的具体空间以及空间中的君臣站位,直言“君王南面”“南面而霸天下”“南面而君天下”“南面行王事”,所强调的是“南面”的权力象征意涵,即认为“南面”成为王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君王治天下必先南面,南面实际上成为取得王位行使王权的象征或者代名词。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沿袭的同时亦在变革,其中变革路径可概括为两条:一条是“下移”路径,一条是“上移”路径。其中“下移”路径主要表现为东周时人将“南面”的主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强者、臣僚甚至丧主,形成了“霸主南面”“嫡子南面”等理念,致使“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上移”路径主要表现便是东周时人将“南面”的权力赋予了“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等理念,“君王南面”礼制由此走向了理论化。

首先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与东周政治秩序的维系。“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主要是

针对“南面”主体身份等级而言的,即时至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作为表征君王身份秩序的“君王南面”礼制出现了僭越与泛化的现象。其中“僭越”表现为“臣子干君位”和“诸侯僭天子之位”。“臣子干君位”的典型例子是春秋时期的“魏子干位以令大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sup>[9]</sup>魏子南面,以卿的身份居君位,在卫彪傒看来这是比不敬“天”还严重的事情。“诸侯僭天子之位”典型例证是“齐闵王欲南面吊唁邹国国君”,《战国策·赵策》载:“将之薛,假涂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sup>[10]</sup><sup>1040</sup>齐闵王僭越行天子之礼,欲南面吊唁邹国国君,遭到了邹国群臣激烈的反对。

与“僭越”现象并存的是“君王南面”礼制的泛化,具体表现为:“强者南面”与“嫡子南面”。“强者南面”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文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sup>[11]</sup>此处“鲁后世其北面事齐”所涉及的权力主体为鲁国与齐国,已经超出了普通君臣的范畴,意思是鲁国后世将成为齐国附属,显然是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附君臣关系。“嫡子南面”见于《礼记·檀公上》,卫国的贵族司寇惠子去世,家中举行丧礼,但家里并没有按照礼的要求,让其嫡子虎作为继承人来做丧主,而是惠子之兄文子做起丧主。孔子的弟子子游通过一系列违礼的吊丧行为让文子意识到丧礼的不妥之处,随即“扶适(嫡)子南面而立”。此处“嫡子南面而立”涉及的是“丧主”与“丧客”的空间站位,并不涉及君臣关系。显然此处东周时人基于家国同构的理念,将国家政治权力空间中的“君王南面”泛化为家庭权力空间中的“嫡子南面”。

此外,“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在《论语·雍也》中“雍也可使南面”体现得最为典型,孔子以“南面”代指君位,认为其弟子冉雍的能力足可胜任一诸侯国之国君。

再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上移与“圣人南面治天下”观念的出现。“圣人南面治天下”观念的出现不仅与“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密切相关,同

时也与东周时期“造圣运动”的兴起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圣”字由原始含义向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转变<sup>[12]</sup>,“诸子将圣人与道、天、地加以连系,使圣之古义大为扩大延伸。从此,圣人乃能明乎道,通乎天地,不仅是一般的睿智通明了”<sup>[13]</sup>。该时期的思想家们不仅将理想化的先王纳入了圣人谱系,还将有德行的贤者塑造为圣人,“造圣运动”逐渐兴起。刘泽华先生曾指出:“由先秦诸子所发起、在百家争鸣中充分展开的‘造圣’运动,建构了一个以圣化为中心的政治思维普遍范式。”在这一政治思维范式中,“圣人成为政治思维过程中的最高范畴和最终的决定力量”<sup>[14]</sup>。随着王权凌夷,“君王南面”礼制不断地下移与泛化,春秋战国思想家们为了重建失序的王制秩序,遂在“南面”的权力主体中还加入了尧、舜、禹等上古圣人,以此作为现实“君王南面”合法性的更高层次的依据和指归。“君王南面而治天下”相应地也表述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sup>[15]</sup><sup>3265</sup>其中南面的主体已然由“君”变为“圣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又云:“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sup>[16]</sup>“南面而王天下”的主体便是圣人尧、舜。上揭材料共同表明,周人利用南北方位标识君臣身份秩序的传统,在战国时期已被抽象成了“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综上,时至东周,虽然王权式微、礼崩乐坏,但是“君王南面”礼制在传承与变革中已成为政治思维前提性和社会整体控制性的普遍观念,在东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无论是“君王南面”礼制的“上移”还是“下移”,它都严格规范着君臣之间的身份尊卑秩序,以至于时人将君王的政治统治之术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sup>[17]</sup>。

### 三、战国中晚期制约王权理论的兴起与“君王”面位的多元化

“君王南面”礼制成为周代重要的统治理念并为时人所熟知和尊崇,这是否就意味着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完全垄断或独占呢?西周时期王权神授,天子独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和最高权力的象征,周王独享权力空间的尊位,自然是可能的。但是春秋已降,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周天子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在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制约王权独尊理论的出

现,如尊先王理论,人们打着尊先王的旗号,来批判现实的君主。再如权势与道义二元化理论,儒家力求道与王的统一,在道与王发生矛盾时,主张从道不从君。道家在认识上把君主和道分为二元,崇尚道高于君<sup>[18]</sup>。这些理论的出现表明在东周权力空间中出现了一些制约和抗衡王权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师、道、祖权与神权。出于尊师、重道、敬祖、重神等原因,当君王与师、尸抑或代表神意志的卜筮之官共处同一权力空间时,君王有时就要让渡出“南面”之权,需“东面”甚至“北面”,这从东周文献中可窥见一斑。

首先,来看师无“北面”之礼。《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sup>[15]3302</sup>其中“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意即因为尊师的缘故,当臣为王师时,无须遵守“北面”之礼。师无“北面”之礼亦见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武王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颡顛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sup>[19]</sup>《武王践阼》又见于上博简,所述事情大致相同,就其反映的礼制来看,武王改君臣之礼为师徒之礼,立西面东,尚父立东面西,授之先王之书。武王面位的转变,虽有“尊师”的考量,但更多是受“重道”观念的约束。此外,《吕氏春秋·下贤》又云:“尧不以帝见善卷,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卷,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卷,道得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sup>[20]</sup>引文中尧向得道之士善卷问政时“北面”,也完全是基于“重道”的考量。由于尊师、重道的缘故,逢师或得道之人,君王处于卑位,对应到南北方位上,则是君王“北面”,师或“得道”之人“南面”。这与“君王南面”礼制传统明显不同,其背后反映的是以“师”为代表的师权或以“得道”之人代表的“道”对于王权的制约。

其次,来看尸无“北面”之礼。所谓“尸”,指宗庙祭礼中用于代替祖先神灵的活人。《公羊传》宣公八年云:“祭之明日。”何休注曰:“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sup>[21]</sup>《礼记·曾子问》云:“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sup>[15]3030</sup>尸在宗庙中的地位最为尊贵,无

论主祭者为君或为父都得恭敬服事。《礼记·学记》记载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其中之一便是当其为尸,则弗臣也。意为当臣属充当“尸”的角色时,君就不能使“尸”来行臣礼,亦即“尸”无北面之礼。《礼记·祭统》云:“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sup>[15]3483</sup>孙希旦集解曰:“此据祭考庙而言之,故尸于主祭者为子行,主祭者于尸为诸父也。北面而事之者,天子、诸侯之礼,朝践时尸在堂上南面,主人北面而事之也。”<sup>[15]1244</sup>引文及相关注释表明《祭统》的作者已将君臣关系与尸主关系联系在一起,并利用宗法传统和祭祀仪节,将“尸”的地位置于现实君王之上。在事尸之礼中,相对于“尸”而言,现实的君王地位较卑,故处于卑位,遵循的是“北面”之礼。尸无“北面”之礼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南面”并非君王的特权,当君王面对地位较高的以“尸”为代表的祖权时,就只能屈居卑位,以“北面”来行事尸之礼。

最后,来看神无“北面”之礼。《礼记·祭义》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孔疏云:“立以为《易》者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与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即今时《易》也。‘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为占《易》之官抱龟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执卑道,服袞冕北面。”<sup>[15]3474</sup>孙希旦云:“易抱龟南面,此‘易’谓卜、筮之官也。”“此卜者南面,天子北面,盖卜郊之礼。”“天子让善于天,因举卜、筮一事,以见圣人之尊天,又因圣人之尊天,而言圣人之尊贤,皆所以教天下以谦让之德也。”<sup>[22]</sup>由引文及诸家注疏可知《祭义》的作者圣人、天、《易》与卜筮之官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卜筮之官与天子由君臣关系演变为人神关系。在周人观念中,天的权威要高于天子,因此在权力空间中代表天意志的卜筮之官要立于尊位,即“面南”;而王权的所有者——天子则处于卑位,要“北面”,这揭示了当卜筮之官充当“神”或“天”的角色时,亦无须行“北面”之礼。“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表明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位,逢地位尊贵的“天”时,君王会处于卑位——立南面北,而代表“天”神的卜筮之官则处于尊位——立北面南。

综上,上述记载君王“北面”的文本主要包括《礼记》、《大戴礼记》、上博简《武王践阼》、《吕氏春

秋》,这些文本的成书时间都不早于战国前期,但其所记内容或多或少带有战国以前的史影。由于史料阙如,尚不能深究上揭材料所载“君王北面”在东周时期到底多大程度上实行过,但君臣之间的空间站位明显地传递出文本编辑者的基本意图。单就文本所反映的编者意图来看,“君王南面”礼制虽成了周代重要的统治理念,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王权会受到师、道、祖权、神权的制约,这与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出现的制约王权独尊理论是相契合的。战国时期的礼学家和思想家们在以当时可以想见的场景来描绘古史,或以古史人物说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先王之书,不可北面”“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即在宗庙、朝堂等权力空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位,逢尊师、重道、祭尸、敬神时君王也会处于卑位。这也揭示了“君王南面”礼制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准则,而有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战国时期“君王南面”礼制仅适用于君臣关系,当君臣关系转化为师徒关系、尸主关系、人神关系时,“君王南面”礼制就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南面”也不再是君王身份的标志。

#### 四、基于制约王权理论重申上博简《武王践阼》中君王面向的历史建构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sup>[4]</sup><sup>1373-1374</sup>表明周代统治者素来重视空间方位在周代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作用,空间方位因此也成为周代社会秩序、政治秩序重要的表达形式。君臣身份秩序作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它的具体呈现和表达无疑离不开空间方位。“君王南面”礼制正是统治者利用空间方位来经营自己位置的具体实践。不过,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文献所载君王“东面”“北面”乃至臣僚“南面”皆与“君王南面”礼制存在着明显张力。这不仅揭示了战国时期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多重面向,客观上也展示了空间、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的多元互动,具体为,王权的运作依赖于权力空间并通过权力空间来开展。周代王权运作的空间主要有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这些礼制空间不仅为王权运作提供了具体的场域,同时它们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也深刻地影响着权力主体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并且成为表征周代君臣身份等级尊卑秩序的重要准则。在表征权力主体尊卑秩序的过程中,空间方位与权力主体的身

份等级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并被权力主体赋予尊卑属性,甚至某些方位固化为部分权力主体的代名词。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臣之间的南北面位逐渐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识,“南面”代指君王,“北面”表征臣属。“君王南面”礼制的生成过程揭示了南北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与君王身份等级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

君王“东面”“北面”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张力的存在揭示了周人利用空间方位建构身份秩序的复杂性,“君王南面”本质上是“尊者南面”。当空间方位固化为礼制时,其尊卑属性也就基本定型,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脱离了权力主体身份,可以独立地表征君臣、师徒、人神等不同权力主体的身份秩序。具体就南北方位而言,当南面为尊、北面为卑固定以后,南面的权力主体就由“君王”演变为“尊者”,“君王南面”就转变为“尊者南面”。也就是说,当君王为尊者时,其便可南面;当逢尊师、重道、敬祖时,君王便须北面。以上信息表明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具有绝对性,权力主体的尊卑关系则表现出相对的特征。

“君王”南面与臣属“南面”在同一权力空间中是可以共存的,不过,在同一空间中尊位是唯一的、绝对的,即君王与臣属同为“南面”并不意味着君王与臣属共享同一个尊位。当君王与臣属共同“南面”时,周人就会通过诸如内与外、中心与边缘、上与下、左与右等其他方位系统来区别或表征君臣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确保君王独享权力空间中的尊位。这客观上也揭示了在同一权力空间中,当权力主体人数较多时,权力空间中的尊位并不是由单一方位系统(即四正系统)来界定的,而是由不同的方位系统共同界定的。易言之,南面与北面仅是周人所构建的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回过头再来分析本文开头所引的上博简《武王践阼》中的君王面向,武王第一次问“黄帝、颛顼、尧、舜之道”,本欲南面而问道,师尚父明言“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为了东面而立。武王第二次问“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太公望答曰“身则君之臣,道则圣人之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复问。虽然两次问道所处的空间皆是朝堂,武王与师尚父的现实身份也均为君臣关系,但是由于“先王之书”“圣人之道”象征着更高的权威,凌驾于现实的君权之上,现实的武王需要将朝堂空间中的尊位让渡给“先王之书”“圣人

之道”的掌握者师尚父。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记载的君臣面位随着权力关系转变而作的调试正是战国时期空间、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多元互动的一个缩影。

叙述到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以上博简为代表的东周文献中所记载的君王“东面”或“北面”,到底仅仅是一种历史建构,还是有其史实之素地?从上揭文献记载来看,君王“东面”或“北面”出现的文本多为战国时人的托古之作。上博简《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的文本,其所载周初武王践阼的具体场景,绝非西周历史之实录。不过,揆诸事理以及战国时期其他文献,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载的君王“北面”或“东面”问道的情形与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有诸多相合之处。《战国策·燕策》云:“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sup>[10]</sup><sup>1552</sup>意即身份尊贵的帝者、王者、霸者以及亡国之君,屈尊北面问学,应是战国时期君主招揽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综上可知,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文献中所载君王“东面”或“北面”既是一种历史建构,也有史实之素地。战国时期的礼学家、思想家,通过托古的方式,将战国时期“北面受学”“西向对而师之”等内容与周初武王践阼等事实叠合在一起,以此来宣扬自己尊师重道之主张。如果以上判断不谬的话,那么我们由东周时期权力空间中君臣空间位置关系的多重面向可知,空间方位在表征君臣身份秩序的过程中具有了尊卑属性,形成了权力空间中的“尊位”。权力空间中“尊位”一旦形成,便独立于其所附属的君臣身份秩序,固化为尊者处“尊位”的局面,即“尊位”并非为君王所独占,当君王在权力空间中非最尊者时,便不可居“尊位”。

## 结 语

空间方位既关联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亦牵涉君臣身份秩序的表达。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外在化、空间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空间方位被赋予权力和秩序诸种语义的过程。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在空间方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对应关系。君王处于整个建筑空间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地位,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

独尊性,两周统治者一方面基于宫、庙等建筑空间方位建构了“君王南面”的君臣身份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心—边缘”“内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做了更进一步细化。不过,春秋以降,随着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王权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东周时期礼学家、思想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构起了“先王之书,不可北面”“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出现了君王“东面”甚至“北面”的情形。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历时性变迁无疑构成了两周礼制变迁的一个缩影。在家国同构的周代社会中,君臣身份秩序在社会秩序建构中无疑起着统括作用。对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多重面向的揭橥,不仅有助于厘清周代君臣身份秩序建构所遵循的权力逻辑,还可以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分析路径,以此来考察周代夫妇、宾主、师徒、人神等不同社会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进而管窥空间方位在整个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要之,“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空间礼制在两周社会领域里的具体实践,不仅展现了周代权力运作的空间法则,亦为学界认识两周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提供了一种崭新且富有穿透力的视角,这也揭示了“空间”之于两周社会史、政治史意义重大,必将成为当前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大有文章可作。

### 注释

①“君王南面”礼制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命题。考古学者主要是基于考古材料来考察周代宫庙建筑的朝向布局问题,代表性成果有曲英杰:《先秦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蔡运章、愈凉巨:《西周成周城的结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6年第1期,等等。历史学者主要是基于西周册命金文材料来考察册命朝议中君臣的空间站位问题,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的部分章节均有专门的讨论。

### 参考文献

- [1] 邓国军.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王朝秩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73.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4]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79(10): 27-37.
- [6] 井中伟, 王立新. 夏商周考古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213.
- [7] 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 1999-2000 年度发掘简报[J]. 考古, 2002(9): 3-26.
- [8] 钟柏生, 陈昭容, 黄铭崇, 等. 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M]. 台北: 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6: 642.
-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518.
- [10] 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汇考: 增补本[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524.
- [12] 王文亮. 中国圣人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7.
- [13] 邢义田. 天下一家: 皇帝、官僚与社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1.
- [14] 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2.
- [15] 阮元. 十三经注疏: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6]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58.
- [17]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32.
- [18]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 109-110.
- [19]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3-104.
- [20]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70.
- [21] 阮元. 十三经注疏: 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952.
- [2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234.

## Discussing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the Order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in the Zhou Dynasty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Wu Wang Jianzuo*

Deng Guojun

**Abstract:** Spac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onstituents of human society, and also a basic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order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evolution. The ritual order captured in the aphorism “the ruler faces south” was a ruler-subject identity order established by Zhou rulers, which was based on architectural space. It played an overall guiding role in the spacial expression of Zhou rulers-subjects identity order. It was a spatial expression of the overall directionality of the status dynamics between Zhou period rulers and their subjects. During Zhou period, “the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developed aspects of bo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hange: firstly, there was a “downward shift”, namely, a downward shift in the status of those who could “face south” from monarchs alone to eventually encompass various hegemony, strongmen, and bureaucrats, and there was a dilution of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secondly, there was an “upward shift”, namely, with the inception of a movement of “sage-creation”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the prerogative to “face south” was also bestowed upon “sage-kings”, thus there developed the idea that “the sage-king faces south”, and as such there was a theorization of the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By the middle-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itualists and thinkers employed a sort of appeal to antiquity, and in combining this with the realities of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they constructed a theory which would constrain monarchical power. This to some degree eroded the monopoly held by monarchs over the “supreme position” in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power, and the portrayals of King Wu as “facing east” and/or “facing north”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Wu Wang Jianzuo* are prime exemplars thereof. At the micro-level, gradual changes in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ruler-subject during Zhou reveal that “space” was greatly valu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 political order, and as suc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thodology of “spatial positioning—power relations—identity order” allows us a glimpse of the effects of “space”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in early China.

**Keywords:**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ruler faces south; *Wu Wang Jianzuo*; ruler-subject identity order in Zhou Period

责任编辑: 王轲 长亭

# 祖莹、祖珽父子的为人与为文

刘跃进

**摘要:** 祖莹、祖珽父子为东魏、北齐重要的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东魏、北齐文学的发展。祖莹代元颢所作《与孝庄帝书》表现了作者“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特色,可惜为严可均《全后魏文》失载。祖珽创办文林馆,广纳文才,监修大型文学文献资料汇编《修文殿御览》,在当时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林馆学士是北齐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士集团,在北齐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祖莹;祖珽;《修文殿御览》;文林馆

**中图分类号:** 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37-07

史书中,祖莹、祖珽父子均以贪腐而扬名,但他们都才华横溢,对东魏、北齐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祖莹的文章、祖珽的诗歌,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祖珽创办文林馆、主持编纂《修文殿御览》均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 一、祖莹行历略论

祖莹(?—535?),字元珍,范阳道(今河北容城)人。据《元和姓纂》《魏书·祖莹传》,祖莹为两晋之际名将祖逖之后。其曾祖父祖敏,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赐爵安固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祖父祖焜,字符达。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父祖季真<sup>①</sup>,位中书侍郎,卒于安远将军、巨鹿太守。

《魏书·祖莹传》记载,祖莹好学耽书,八岁能诵《诗》《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由是声誉甚盛,尤好属文,深得中书监高允赏识。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为太上皇,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改元延兴。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后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太和二

十三年(499年)二月,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征署祖莹为司徒法曹行参军,掌书记。高祖顾谓元勰曰:“萧贇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这里将祖莹比作萧齐“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王融以《曲水诗序》驰名北方,颇为北人所重<sup>②</sup>。祖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对此《北史·文苑传序》也有记载: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颀颀汉彻,跨蹶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

这一年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499年),永明文学的高潮刚过,孝文帝以元勰比作萧子良,以祖莹、袁翻、常景等比作“竟陵八友”,多少有点与南朝争胜的味道。与此相类似的情形,还有王肃与元勰、祖莹即兴吟诵《悲平城》与《悲彭城》之事。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年),南齐大臣王奂为齐武帝所杀,王奂之子王肃奔魏。《魏书·祖莹传》载,尚书令王肃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

收稿日期:2024-10-28

作者简介:刘跃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郑州 450046)。

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诗的格调看,似乎是初到洛阳所见的景象,所以有此感悟<sup>③</sup>。“尚书令”乃追述王肃官位之辞。彭城王元勰嗟叹其美,误说成《悲彭城》,被王肃嘲笑。当时祖莹在场,应声吟诵《悲彭城》诗:“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王肃大为赞赏,元勰亦大悦,退谓祖莹曰:“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魏书·元勰传》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北巡至平城,路旁有数十棵大松树,孝文帝遂行而赋诗,对元勰说:“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元勰终于有了洗去羞耻的机会,遂仿王肃《悲平城》而作《问松林》:“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祖莹后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又为李崇长吏,均以“货贿”“截没军资”等罪名被除名。其贪图财物的恶习,深刻地影响到其子祖珽。关于祖珽下文还会详述。

在文学史上,祖莹最有名的作品是代元颢所写《与孝庄帝书》。原文见《洛阳伽蓝记》卷一,严可均《全后魏文》失载。《与孝庄帝书》曰:

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讷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誓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羯。不意驾入城皋,便尔北渡。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貳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阏,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于急难,凡今莫如。弃亲即讎,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倘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

在荣为福,于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道意,卿宜三复。义利是图,富贵可保,狗人非虑。终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

最后特别注明:“此黄门郎祖莹之词也。”这封书信的写作背景如下:孝明帝元诩武泰元年(528年)二月,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元诩,立故临洮王宝暉世子元钊为帝。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人奔赴,勒兵而南,立魏长乐王元勰之子元子攸为帝,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并率兵攻入洛阳,百官迎驾,至者尽诛之,杀王公、官民两千余人,还将胡太后及幼帝沉到河中,史称“河阴之难”。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先后逃奔萧衍。元子攸改元建义元年,九月,又改元永安元年,实际上仍由尔朱荣掌控朝廷。十月,梁武帝以元颢为魏主,由陈庆之率兵护送,入据南兖铨城(今安徽宿州)。翌年四月,元颢在陈庆之的护送下,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孝基,并乘虚攻陷梁国、荥阳,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北逃,依尔朱荣。元颢入洛,以祖莹为殿中尚书,致书孝庄帝,痛斥尔朱荣“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的暴行,希望元子攸“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又说:“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这些话温婉中透露出杀气,平和中隐含着强悍。

元颢执政不过两个月,尔朱荣又攻入洛阳,元颢被杀。祖莹很幸运,仅被免官。孝庄帝没有杀祖莹,可能念及他与父亲的密切关系。《魏书·太武五王传》载,永安末,乐器残缺,孝庄帝命元孚监修仪注,祖莹参与了礼乐修撰事宜。《魏书·太武五王传》载元孚《修乐器表》云: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间、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干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龔簏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簇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皋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

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

这段历史背景《魏书·祖莹传》也有所交代:“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魏书·乐志》收录了长孙稚、祖莹合署的《上表乞定乐舞名》以及祖莹的《乐舞名议》,以当时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逐条记录,存之乐府。所谓“三载乃就”,即指此而言。由此,祖莹迁为车骑大将军。

北魏后废帝元朗中兴二年(532年)三月,高欢率三万军队,在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大败尔朱光二十万军队。四月,高欢前部至洛阳河桥,尽杀尔朱氏之党羽。高欢废元朗及节闵帝,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改元太昌。祖莹以太常行礼,封文安县子,又一次成为新朝的宠臣。

祖莹的生卒年未详。《魏书·祖莹传》载:“天平初,将迁邺,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以功迁仪同三司,进爵为伯。薨,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按:为避西魏锋芒,东魏迁邺在天平元年(534年)十月。史书未言迁都后祖莹即卒,至少卒于迁都邺城之后。温子升有《司徒祖莹墓志》,《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收录。其文曰: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悠远,枝叶繁华。祖德润于身,声高邦国;父行成于己,名重京师。公钟美多福,资神积善,器局闲灵,志识开悟,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声(疑作“文”),门有善业,家传庆灵。砺金成器,相遣满籥;琢玉为宝,待价联城。匪直也人,实惟有道,言折秋毫,辞连春藻。<sup>[1]</sup>

温子升在墓志中称祖莹祖上积德,故“钟美多福”,“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文”。善辩能文,大约是时人对祖莹的评价。《魏书·祖莹传》载:“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有,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于世。”这段话说得很有分量,说出了祖莹的文学理想。“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述此说,足见其影响。《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护军将军祖莹撰《神龟壬

子元历》一卷”,可惜其文集久佚。

## 二、祖珽生平考述

祖珽,字孝徵,为祖莹之子。《北齐书·祖珽传》载:“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典仪注。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sup>④</sup>制《清德颂》,其文典丽。”《北齐书·高昂传》载有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高昂之事,时在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534年)。

据《北齐书·祖珽传》,祖珽与其父一样,多有受纳,丰于财产。当时,有人兜售梁武帝组织编写的《华林遍略》<sup>⑤</sup>,高澄召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祖珽借机偷窃《华林遍略》“数帙质钱糶蒲”,被施以杖刑。武定七年(549年),高澄遇害,祖珽又盗窃官府所藏录本《华林遍略》。他甚至推荐自己的陈元康也不放过,陈元康死后,他盗取其家藏书数千卷。这些行为皆为人所不齿。“文宣(高洋)每见之,常呼为贼。”而他却大言不惭地宣称:“丈夫一生不负身。”

祖珽在官场谋于心计,攀附权贵,逢迎进取,搬弄是非。《北齐书·祖珽传》记载,北齐孝昭帝高演皇建元年(560年),祖珽为章武太守职,“会杨愔等诛,不之官,授著作郎。数上密启,为孝昭所忿,敕中书门下二省断珽奏事”。后为和士开所忌,出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以母老乞还侍养,诏许之。孝昭帝高演年间(560—561年),祖珽为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掌诏诰,官位越做越大。

河清四年(565年),祖珽作《黄初传天录》<sup>⑥</sup>,又作《上书请传位东宫》云:“陛下虽为天下,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他建议高湛禅位于子高纬。高湛颇为认可,乃拜祖珽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四月,武成帝高湛果然禅位,自称“太上皇帝”。高纬即位,改元天统,但高湛实际仍然掌控政局<sup>⑦</sup>。

祖珽在官场如此矫情饰貌,实乃“志于宰相”。他在获利的同时,也得罪了很多人,常常为人攻击。天统三年(567年)祖珽被打入地宫,致使目盲。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此前,他通过黄门侍郎刘逊秘密状告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结果事泄获罪,被流放光州,寻又被打入地宫。但在目盲后,祖珽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通过陆令莹为他在后主前求情,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

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转为侍中,渐被任遇。

祖珽在人品上劣迹斑斑,但他在文化史上做出了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他担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期间,倡议创办了文林馆。《北齐书·文苑传序》载:“(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早在武平二年(571年),祖珽就提出建议。翌年,文林馆正式开馆,第一次就收招三十多人,以后陆续扩容,多达近七十人的规模<sup>⑧</sup>。文林馆学士皆为清流之士,有名当时。祖珽也因此被称为“衣冠宰相”<sup>⑨</sup>。《隋书·经籍志》著录《文林馆诗府》八卷,注曰:“后齐文林馆作。”<sup>[2]969</sup>这是文林馆学士的诗歌总集。

祖珽曾监修《修文殿御览》,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北齐书·后主纪》载,武平三年二月,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祖珽又将其改为《修文殿御览》。《北齐书·文苑传》详细记载了该书的编纂情况:

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义、太子舍人王劭、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爽、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合祭酒崔德、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恂、之推等同入撰例。复令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王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通直散骑常侍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骞、前西兖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骞、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颀、获嘉令崔德儒、给事中李元楷、晋州治中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疆、司空士曹参军卢公顺、司徒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骞并入馆待诏,又敕右仆射段孝言(段孝先弟)亦入焉。《御览》成后,所撰录人亦有不时待诏,付所司处分者。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虽然,当时操笔

之徒,搜求略尽。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才性,入馆诸贤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诏文林,亦是一时盛事,故存录其姓名。《御览》即《修文殿御览》,《太平御览》卷六〇一中引《三国典略》也提到该书的情况:

初,齐武成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珽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

可见,《修文殿御览》是在阳休之《芳林遍略》、宋士素《玄洲苑御览》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由于参与人员众多,修书进展顺利,仅半年时间就完成全部工作。上引《三国典略》中记载了祖珽《上〈修文殿御览〉表》,其中云:

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

《隋书·经籍志》著录《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卷数相同。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六“六道篇”引《韩诗外传》《礼记》《十六国春秋》《神异经》等,注:“右此四验出其《御览》。”此《御览》,即《修文殿御览》,说明该书仍流行于唐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载:

北齐尚书左仆射范阳祖珽字孝徵等撰。案《唐志》类书,在前者有《皇览》《类苑》《华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则此书当为古今类书之首。珽之行事,奸贪凶险,盗贼小人之尤无良者,言之则汗口舌。而其所编集,乃独至今传于世。然珽尝以他人所卖《遍略》质钱受杖。又尝盗官《遍略》一部,坐狱论罪。今书毋乃亦盗《遍略》之旧,以为己功耶?《遍略》者,梁徐僧权所为也。又案《隋志》作《圣寿堂御览》,卷数同。圣寿者,实齐后主所居。<sup>[3]</sup>

陈振孙为宋人,所见《修文殿御览》尚完整,为三百六十卷。他怀疑这么大的书,如此短的时间完成,很可能就是抄自《华林遍略》。宋元之际的王应

麟《玉海》对此亦有著录：“《修文殿御览》放天地之数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sup>[2]</sup><sup>958</sup>这说明宋元时期《修文殿御览》仍然存世。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一“苏李诗”条引《修文殿御览》所载李陵诗：“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阴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穹庐子，独行如履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焉辨淄与澠。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杨慎说：“此诗《古文苑》只载首二句，见于《修文殿御览》。”<sup>[4]</sup>按：杨慎所说“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见《古文苑》卷七，下注：“阙”。《修文殿御览》则辑录了全诗。由此推断，《修文殿御览》在明代仍有流传。该书佚失的具体时间不详。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仅收录了《修文殿御览》残卷<sup>[5]</sup>。作为一部类书，《修文殿御览》难免有叠床架屋之弊，但该书收集大量资料，以类相从，有的文献首见于此书，还是很有价值的。

由南入北的大儒颜之推也参与了文林馆的创办与《修文殿御览》的编纂工作。《北齐书·颜之推传》记载：

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联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寻除黄门侍郎。

史称颜之推为颜黄门，即指他曾担任黄门侍郎，这是其担任的最高职位。颜之推《观我生赋》云：“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恶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并称自己“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赋中称“欸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仆射掌机密，吐纳帝令也。”又称：“祖孝徵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潜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又说：“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而济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

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六人”指崔季舒、张雕虎、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以崔季舒为首。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573年）十月，崔季舒等六人被杀，这让颜之推念念不忘。然而，祖珽却逃此一劫，但他很快就去世了。

祖珽卒于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年）前后。《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为北徐州刺史，遇陈人伐齐，祖珽却之，卒于州。据此，祖珽守北徐州当在这年陈人攻北齐淮北之时。次年，周大举伐齐，本传及《北齐书》各篇皆不记祖珽事，时祖珽当已卒矣。

《北齐书·祖珽传》载，祖珽之子祖君信、祖君彦，并有才学。祖君信“涉猎书史，多诸杂艺。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中书郎”。《隋书·祖君彦传》载：“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辞讷涩，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壶关录》对其亦有记载：“祖君彦，范阳人，齐仆射孝徵第六子。博学强纪，下笔成文，贍速之甚，名驰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于隋文帝，帝曰：‘岂非歌杀之斛律明人者耶？’炀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调为东郡书佐、检校宿城令，称为祖宿城。自负其才，尝郁郁思乱。及李密用为元帅府将长史、记室参军，恨被隋朝摈弃，所以纵笔直言。”<sup>[6]</sup>《旧唐书·李密传》记载，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三年（617年）春，祖君彦为李密作书以移郡县。开篇几句，《旧唐书》无。严可均参考了《壶关录》，但未曾辑录祖君彦文章。其实祖君彦在大业十四年（618年）十月为王世充所杀，仍为隋人。他的文章在《壶关录》《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文献中多有记载，理应收进《全隋文》中。

祖珽有弟祖孝隐，亦有文学，早知名。词章虽不逮兄，亦机警有辩，兼解音律。时徐君房、庾信来聘，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级摄职，更递司宾。孝隐少处其中，物议称美。庾信《将命至邺酬祖正员》诗题中的“祖正员”，就是祖珽弟祖孝隐，未知其名。又有从父弟祖茂，颇有辞情；族弟祖崇儒，涉学有辞藻。见《北齐书·祖珽传》附载，《元和姓纂》亦有载。

### 三、祖珽的创作特色

祖珽多才多艺，诗、书、画、乐、舞等无不精通。《北齐书·祖珽传》说他：“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

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其是所长。”祖珽擅长绘画和舞蹈。《北齐书》本传记载:“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土开胡舞,各赏物百段。”《颜氏家训·风操》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祖珽擅长绘画:“(李)构尝与王松年、祖孝徵数人同集谈宴。孝徵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坐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李构,顿丘(今河南浚县)人,为北朝大姓人家。他母亲为宋广州刺史刘纂之孙女,浸染江南风教。李构父母双亡,按照士族规矩,父母的住所终身闭锁,不忍打开。祖珽随意漫画,有违礼数,这勾起李构的伤感,所以就马而去。祖珽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失礼。

祖珽自幼精通音乐。《北齐书·祖珽传》记载:“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僮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疋,令诸姬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后因种种秽行,被贬官。“未及科,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散参相府。”按:温子升《定国寺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认为作于天保八年(557年)<sup>⑩</sup>。这时温子升已故,不可能有《定国寺》之作。从《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看,祖珽、温子升都有《定国寺碑》,肯定作于《芒山寺碑》之后。《芒山寺碑》当作于芒山之战(543年)后不久。温子升称《芒山寺碑》为昔作,至少在两三年之后,高欢下年正月死,高澄嗣事,因此,祖珽《定国寺碑》不会晚于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四年(546年)。可惜,祖珽的《定国寺碑》已失传。

《北齐书·祖珽传》载:“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其是所长。”高洋称帝后,祖珽复被召从驾,作《上书请定乐》,见《隋书·音乐志中》。史书记载,祖珽因采魏安丰王元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sup>⑪</sup>所谓《西凉乐》实出后凉,《隋

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

至于诗,也是祖珽的强项。《北齐书·祖珽传》载:“时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赏。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之,大为时人传咏。”按《魏书·蠕蠕传》:永熙二年(533年),“阿那瓌遣使朝贡,求婚。献武王方招四远,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之,改为兰陵公主。瓌遣奉马千匹为聘礼,迎公主,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出塞》及《公主远嫁》诗当作于是时。可惜,魏收、祖珽诗已佚。

《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载,孝静帝元善见天平三年(536年),裴让之举秀才,对策高第,“与祖珽俱聘宋,邢劭省中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赋能诗,裴让之。”祖珽的诗,最有名的是《从北征诗》,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诗曰:

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干。  
祁山敛雾雾,瀚海息波澜。  
戍亭秋雨急,关门朔气寒。  
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

这里出现了几个地名,桑干、长安,都是当时文人多写的意象,不一定是实写。但是,从邺城到晋阳,确实是一段北征的路程。裴让之也有《从北征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诗曰: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  
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  
高台朔风驶,驰野寒云生。  
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按:裴让之卒于天保六年(555年)之前,《从北征诗》大约和祖珽作于同时。《采菽堂古诗选》对其评价不甚高,认为“北朝之风,仅能其体若此”<sup>[7]</sup>。

天保四年(553年)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至昌黎,与契丹战,大破之。掠十余万口,杂畜百万。高洋登碣石山,临沧海。祖珽《望海诗》当作于是时,该诗收录于《艺文类聚》八。诗曰:

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

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  
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  
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

前四句很有气象,颇有唐人风范。王夫之《古诗选评》卷五称其“迢迢峻而安”,洵为的评。

《挽歌》收录于《乐府诗集》,系为北齐文宣帝之死而作,时在天保十年(559年)十月。诗曰:

昔日驱驰马,谒帝长杨宫。  
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  
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  
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

按: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在这次唱和中,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两首,卢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胜过诸人。不过,祖珽诗“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颇为诗评家称颂<sup>⑫</sup>。尾句“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也蕴含着很深的人生感慨。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依然汲汲于功名利禄,这是他的悲剧。

撰写《挽歌》那年,魏收五十四岁,阳休之五十一岁,祖珽亦年龄相仿,而卢思道不过二十五岁,可谓后来者居上。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后,卢思道逐渐引领诗歌风尚,成为北齐至隋初最重要诗人之一。

#### 注释

①此据《魏书·祖莹传》。《元和姓纂》卷六谓“(祖)敏生季真,后魏巨鹿太守;生莹,右仆射;生孝徵。”据此,祖敏为祖莹之祖父。②《南齐书·王融传》:“(永明)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南齐书·王融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2页。③《魏书·高祖纪》载,王肃为尚书令在太和二十三年,那年,孝文帝在邺城,准备讨伐南齐,四月卒,未

曾有平城之行。所以,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王肃初到北方的太和十七年(493年)。④按:万俟洛,字受洛干,“万俟受洛”后当脱一“干”字,《北齐书》有传,未及冀州刺史事。⑤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二十类书类《梁华林遍略》载:“《梁书》: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应选,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969页。以天监十五年(516年)下推八年,为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北方读到是书,不过二十年。⑥刘知几著《史通·古今正史》:“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⑦北齐诸帝,高澄、高洋、高湛为兄弟,同为高欢之子。高殷为高洋之子,很快就被高湛所废。⑧参见庄芸《北齐文林馆考论》,《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关于人数,宋燕鹏《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又补出七人:王晞、王伯、张景仁、荀仲举、阳俊之、徐敏行及萧退。⑨《北史·封孝琰传》。⑩陆增祥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载北齐有《赵郡王高睿修定国寺颂》《高睿定国寺塔铭》。《定国寺颂》曰:“齐天保八年岁次丁丑四月己巳朔八日丙子,使持节都督定瀛幽沧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地居两献,化拟二南……”《定国寺塔铭》落款:“大齐天保八年岁在丁丑。”⑪《旧唐书》:“《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⑫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一:“‘素盖转悲风’,唐人佳句。”

#### 参考文献

- [1] 欧阳询. 艺术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837.
- [2] 王应麟. 玉海艺文校证[M]. 武秀成, 赵庶洋, 校证.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3]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23.
- [4] 杨慎. 升庵诗话新笺证[M]. 王大厚,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47.
- [5] 罗振玉. 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413.
- [6] 温大雅, 韩昱. 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M]. 仇鹿鸣,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251.
- [7]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李金松,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045.

##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 of Zu Ying and Zu Ting

Liu Yuejin

**Abstract:** Zu Ying and Zu Ting, father and son, were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s i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The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se dynasties through their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Letter to Emperor Xiaozhuang* by Zu Ying on behalf of Yuan Hao showed the author's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must come from one's own ideas and style, and form a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Unfortunately, this letter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ater Wei* compiled by Yan Kejun. Zu Ting established Wenlin Academy, which attracted many talented writers, and supervis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arge literary reference work *The Xiuwen Dian Yulan*.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 The scholars of Wenlin Academy were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group of writers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ha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Qi literature and thought.

**Key words:** Zu Ying; Zu Ting; *The Xiuwen Dian Yulan*; Wenlin Academy

责任编辑: 采薇

## 试论魏晋文化的总体潮流精神

宁稼雨

**摘要:** 魏晋文化是士人文化的起步阶段,在中国士人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演变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士人文化的最大特色与亮点,就是用个人色彩很强的全新士人价值观念和人生信条来取代此前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服务的帝王文化。其总体潮流精神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物质欲求,二是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的规矩樊笼,三是以“道统”良知取代皇权“势统”控驭,四是以审美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人生态度。这些理念不仅明确夯实了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基本底色和价值取向,而且也为此后唐宋士人文化高潮繁荣局面的到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

**关键词:** 魏晋文化;潮流精神;士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44-14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质疑,但它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难以彻底颠覆的。受达尔文进化论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西方学者往往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解析或挖掘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力和内在根源。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丹纳《艺术哲学》等对于文学艺术发展深层根源的挖掘,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潮流背景下的文学艺术发展动因具有启发意义。

根据笔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sup>[1]</sup>的提法,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帝王文化(先秦两汉时期)、士人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市民文化(元明清时期)。魏晋文化是士人文化的起步阶段,在中国士人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演变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有其必然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先秦两汉时期盛极一时的帝王文化至汉末已呈颓势。连年不断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使国家千疮百孔,百姓民不聊生,朝不保夕,人心思变。在统治集团内部,由宦官、外戚矛盾造成的深刻社会矛盾更是

引起局势动荡,群雄纷起。面对如此衰败的局势,以往为帝王文化统治和管理服务的儒家大一统思想无力解释和有效应对,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国家思变。与此同时,在汉代社会矛盾和危机中乘势崛起的门阀士族却应运而生,成为新生的社会主导力量。他们首先在经济上迅速膨胀壮大,并借此实力,在西晋国家危难之际,协助朝廷完成晋室南迁的壮举,并在江左协助司马氏建立东晋王朝,同时在政治上取得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位,形成东晋门阀政治。与之相伴,代表士族阶层利益和观念的社会文化,也在玄学的引领下逐渐形成魏晋士人文化的主旋律。魏晋士人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用个人色彩很强的全新士人价值观念和人生信条来取代此前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服务的帝王文化,其总体潮流精神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古老的

收稿日期:2024-09-20

作者简介:宁稼雨,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话题。从横向看,东西方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各有所重。从纵向看,中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变化和起伏。

大致说来,西方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三段转折变化历程。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思想家一直非常强调精神对于物质那种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带来极大的物质生产飞跃进步和人们从中获得的极大物质享受,物质主义理论逐渐取代精神主义而占据上风。但由于柏拉图的伟大深远影响,精神主义还难以完全退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将二者折中的二元论。这个发展过程反映出西方人在精神与物质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一边倒的绝对权威观点。

中国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学说,但也不乏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其中有两个方面的探讨与此密切相关:一是关于“义利”之争,二是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道器”之争。对这两个方面的探讨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比较一边倒地向着精神层面的“义”和“道”倾斜。先秦时期,儒家十分强调“义”对于“利”的优越和主导地位,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2]267</sup>,“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sup>[2]1119</sup>等,并且明确提出“君子不器”的主张。道家则更是明确地把“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老子提出著名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学说和庄子的“得鱼忘筌”“得鱼忘言”等观点。从中能够明显看出先秦时期重“道”轻“器”、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取向。

汉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注重物质的思想有所抬头。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一是汉昭帝时霍光召集的盐铁会议,二是东汉时期王充提出的唯物思想。这两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物质观念做了相当有力度的宣扬,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能够达到将精神层面优势翻盘倒挂的程度。倒是曹操在长期掌管国家权力、指挥军事征战过程中,迫切感受到物资匮乏对于国家运转和军事行动的不利影响,因而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强调发展经济和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但这只是社会实用的层面,从社会全局来看,“重义轻利”“道优于器”的观念仍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和颠覆。正是这个大背景为承接而来的魏晋门阀士族以自身的发展历史来昭示精神大于物质提供了可信度和说服力。

正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方面。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政治营垒上与曹魏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联系<sup>①</sup>,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对曹魏复辟抱有幻想<sup>②</sup>。这导致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司马氏政权的相处与对峙上,对发家致富之类的物质追求似乎不大在意。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自我形象刻画中,已经透露出其家境状况的清寒。阮籍所在的道南阮氏更是如此,《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阮仲容(咸)、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绣。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sup>[3]732-733</sup>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家境清贫的道南诸阮对北阮富族的蔑视与嘲讽姿态,这不仅是对传统“重义轻利”“道优于器”观念的继承,也是进入曹魏时期之后门阀士族在精神和物质观念上的一次公开表态。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竹林名士中虽然也有家财万贯者,但其财富物质观念却不大像暴发户。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虽然“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但同时却以吝啬闻名天下。更令人费解的是,他竟然对“钱”字讳莫如深,《世说新语·规箴》记载: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闾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sup>[3]557-558</sup>

从“洛下无比”的财产到斤斤计较的吝啬鬼,再到闭口不谈“钱”字,这看上去反差极大的表现,其实也代表着竹林名士在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上的多种尝试。在这则故事中,王戎是因为“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才口不言“钱”字的。由此可见,其以超然精神追求取代物质欲求的理念也是十分明确的。

到了元康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高平陵事件后大批曹党遭到镇压,司马氏已经彻底粉碎曹党复辟的希冀,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使得社会上人们不再从这个角度关注社会政治;另一方面,门阀士族在经济实力方面获得极大发展,享乐放纵成为相当流行的士族心态。在此背景下,一些正始名士一改超然物外、甘于清寒的生活态度,而代之以骄奢淫逸的追求物质享乐的生活态度。如《世说新语·汰侈》所载王恺与石崇互相炫富、斗

富,王济生活奢侈、挥金如土,为求美味以人乳喂猪。这股以物质享乐为主题的风潮偏离了正始名士的超然精神追求方向,是门阀士族在精神与物质关系探索之路上所走的一段弯路。

东晋时期虽然偏安江左,但对于门阀士族来说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壮大机会,同时也使他们又重新回到重视超然精神追求的轨道上来。借助西晋南迁的机会,门阀士族不但辅佐司马氏皇权建立东晋王朝,而且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在政治上形成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门阀政治局面。雄厚的经济实力、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优越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来思考和实践更高层次——精神境界的问题。具体而言,他们意识到元康名士虽然为自己的物质享乐寻找到合理理由,但其忽略了士族文人最根本、最宝贵的东西——精神追求。为此他们一方面吸收元康名士享受物质生活的合理性部分,同时又提出更加重要的精神需求问题。与物质享乐相比,超然的精神追求是士族文人的灵魂,更需要身体力行。

魏晋门阀士族文人对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性思考到自觉为本阶层整体利益去经营发展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变化过程。其基本轨迹就是从自身对物质与精神的切身经历和深刻体会中去思考和总结:作为门阀士族阶层在精神与物质关系这个至关重要问题上应该给出什么样的最终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经历清贫和富有两个物质极端之后,士族文人最终发现,只有超越物质层面的超然精神追求,才是自己这个阶层精神的核心要素。

对于超然精神的追求符合门阀士族文人阶层的社会属性和阶层利益。门阀士族不但是魏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主宰,而且是魏晋社会文化的主流设计与创造者。从汉魏到两晋的社会发展历程看,门阀士族在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成为魏晋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之后,很快就凭借“九品中正制”成为社会上层<sup>③</sup>,并最终发展成为门阀政治,形成当时社会政治主宰的局面<sup>④</sup>。凭借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门阀士族很快把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政治转向社会文化方面。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魏晋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门阀士族的社会需求和有意为之。

魏晋玄学不仅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更是代表着门阀士族阶层社会属性和阶层利益的思想总结和精神诉求。从思想方法角度看,玄学

不仅继承了传统哲学思潮“重道轻器”的理念,还能从老庄道家思想中借鉴“大象无形”“得鱼忘筌”的理论认知,更加明确地提出“得意忘象”的哲学理念。无论是对于“言”“象”关系的探讨,还是对“象”“意”关系的探讨,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要强调“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绝对优越地位。魏晋士人如此看重“形而上”的价值地位,也正是他们从社会价值认知角度认为“超然精神追求胜过物质欲求”这一认识的一种哲学升华与表述。

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看,魏晋时期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繁荣,也正是玄学思潮统摄下注重精神层面追求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从文学角度看,魏晋时期出现“文学自觉”,中国文学从其他实用性文体中独立出来,开始以纯文学形态出现。尤其具有说服力的是,“魏晋人向内发现了自己,向外发现了自然”,以抒发文人个人情怀、自我欣赏为主要特征的文人诗和欣赏赞美自然美景的山水诗,成为这两个发现的重要成果。

从艺术领域看,人物画取代山水画成为绘画艺术的主流,顾恺之非常明确地提出“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与玄学领域的“得意忘象”一脉相承,是“形而上”胜于“形而下”等理论观点在绘画领域的贯彻和运用。而在书法领域,汉隶的工整和规矩被“二王”洒脱流畅的行书、楷书所取代。这些艺术成就也从不同角度昭示出抽象对于具象、“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优越态势。

作为魏晋文化潮流的外在表现和行为实践,魏晋士人的生活价值取向及其行为方式堪称鲜活的社会文化标本。其内在表现就是把玄学的“得意忘象”理论演绎成为一种注重精神层面追求、忽略物质层面占有享乐的社会思潮和行为方式。其外在表现就是具有标志性的服饰,木屐与麈尾、宽衣大袖一起,成为魏晋名士在服饰上体现其风流韵致的标配,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价值取向的形象演示。纵观魏晋士人生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演变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物质与精神、金钱与情怀,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两种人生目标和境界。但是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和结论是:笑到最后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精神和情怀。

《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麓箸背后,倾身障

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3]356-357

祖士少即祖约,为祖逖之弟;阮遥集即阮孚,为阮咸之子。在这场钱财与木屐的较量中,后者能够胜出也正是这种文化潮流的反映,也可以视为魏晋士人精神情怀与金钱物质对峙争雄的一个结果。《世说新语·贤媛》所记载的另一事例可以与之相佐: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3]699

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似乎很难在二者之中分出高下。但如果理解当时文人价值观中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优势地位,就能清楚理解,王夫人对于顾家妇的胜利,也可以视为阮孚与祖约较量的另一版本演绎。可见,魏晋名士在物质金钱和精神价值两者的占有和追求中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那就是自物质聚敛起步,而最终归于精神追求。

## 二、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的规矩樊笼

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难题。对于魏晋士人来说,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和微妙。按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个体和社会这对矛盾双方各自有其存在和约束对方的理由和意义。从社会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意志和规范,个性自由肆意泛滥,社会就难以维系和运转,所以必须主张社会统一意志;从个人角度看,向往追求个性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社会的规范又是扼杀个性自由的绳索,所以应该突破。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个社会能否安定持久,个人与社会矛盾双方的拿捏和适应程度是决定要素。正如社会学家的描述:

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使各自不同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个人向往自由,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亚历山大),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会的各自诉求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

源,以至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4]

笔者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人)”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含义,其中物质是基础和条件,精神是升华和归宿。所谓“物质基础”,主要指个人对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拥有程度;所谓“精神升华”,则是指根据生产资料的拥有程度而产生的精神自由度。“社会”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含义:“显性”是指政府组织,“隐性”则是指大众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等。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关系,往往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的演变来延续或发生变异。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能够得到验证。

自秦汉以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抵牾的状况。一方面,由于封建制和户调制等措施的推行,土地私有制得到巩固,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受此背景影响,门阀士族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形成一股重要的个体经济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利于对于个性精神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统治力量也加强了社会对于个人的行为约束和精神统辖。如果说秦始皇的统一国土和度量衡是从物质层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统一意志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更是明确从精神领域对社会意志的垄断要求。正是这个国家层面的决策,逐渐把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导向引入“以孝治天下”的儒家纲常伦理中,维护礼教成为统治者理直气壮施行高压统治的依据和借口。从曹操杀孔融、祢衡,到司马昭杀嵇康,表面理由都是他们违背了礼教,真实原因却是他们的个性行为和思想触犯了当时的社会统治意志。这样,伴随门阀士族势力崛起而来的个性发展需求与皇权势力借国家道德伦理统一推行高压统治之间产生了严重对峙和矛盾。但从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看,汉末以来门阀士族阶层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实力和发言权,他们的个性、意愿、欲求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过皇权所代表的社会约束力。所以,汉末至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主流是崇尚自然,这种精神是代表门阀士族文人个人自由意愿的个性潮流对代表国家和社会约束的名教思想的突破。

魏晋时期,作为汉代统治根基的名教思想观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现象鲜明地体现和传达出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的规矩樊笼的社会潮流。这个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君权与君臣观念的淡

漠,另一方面表现在家族伦理的危机<sup>⑤</sup>。东汉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扩张,以往知识分子直接的忠君观念逐渐被察举制及“门生故吏”观念所取代。门阀大族成为未仕文人与帝王之间的屏风隔断,未仕文人不但在出仕之前受到门阀故主的庇护和制约,即便出仕之后,也要承担效忠故主的义务<sup>⑥</sup>。这就大大淡化了文人与帝王之间的君臣义务观念,从而滋生出怀疑君权的行为理念。《后汉书·逸民传》记载: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耶?”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sup>[5]2775</sup>

老者对于君王的鄙夷和揶揄,充分反映出当时君权观念淡漠的广泛影响,同时也说明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社会意志的挣脱。怀疑君权思潮继续发展,也就自然生成无君论思想。鉴于天子们“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和“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无道劣迹,阮籍公开提出“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君论观点<sup>⑦</sup>。

与无君论相比,家族伦理危机与社会普通人的关系更大。伦理是人类为维护正常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约定和行为规范,本身是人类脱离野蛮社会的一种进步表现。但到了东汉后期,儒家倡导的名教礼法已经被高度形式化的种种虚伪举动推向了反面。在察举制度的推动下,对孝道的推崇无以复加,有的人为了达到以“孝”名进身的目的,不惜弄虚作假。东汉赵宣以守丧墓道20年获得乡里重誉,同时却因在墓道生育5个子女被青州刺史陈蕃处罚<sup>⑧</sup>。孔融任北海相时,将“哭泣墓侧,色无憔悴”的伪孝子处死<sup>⑨</sup>。这些伪孝行为引起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意识的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抗争。那个以四岁让梨著称的孔融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呐喊:“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sup>[5]2772</sup>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魏晋时期士族文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个体突破社会群体尤其

是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然自由人生的精神诉求。

这种精神诉求首先表现在魏晋文人的自我意识。学界不乏关于中国文人缺乏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说法<sup>⑩</sup>,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做具体梳理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看,这个说法或许能够成立。但对此话题做具体分析时,就会发现反例情况。我们纵观中国历代文人情态表现,还不能绝对说没有独立人格。从屈原到陶渊明,从李白到关汉卿,虽然可以对他们的独立自我意识打些折扣,但不能无视其自我意识的存在。如果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表现,与所处时代的文人群体人格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即便就群体人格而言,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文人群体人格而言,魏晋文人完全有资格被认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他们与屈原、李白等文人个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皇权和名教的态度。屈原、李白之流虽然与皇权所代表的社会意志相龃龉,但他们与皇权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自己被当权者遗弃之后的牢骚,骨子里还是儒家式的人世情怀,正如苏轼所言:“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而魏晋文人群体个性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与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名教根本对立的态度之上。他们完全无视那个被儒家奉为至宝的名教,而只是迷恋那个最宝贵的“自我”,因而《世说新语》中频繁出现“我”字。《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sup>[3]521</sup>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sup>[3]522</sup>

用现在的话语表述,这些人约都有些“自我膨胀”。近来有学者注意到《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中广泛使用了具有多种内涵的“我”字<sup>[6]</sup>,应该也完全可以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来理解。正是因为“我”字当先,才使得魏晋名士无处不在强化突出自我、表现自我。《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处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sup>[3]120-121</sup>

无论是“翳然林水”还是“鸟兽禽鱼”,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在于其是否能够被人的“会心处”所感应,都只能依据是否“自来亲人”来判断。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孟子的“万物

皆备于我”，都在这个微小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当然，自我意识的最高表现不是会心自然山水，而是对人自己生命的重视。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王濛临终前“如此人，曾不得四十”的哀叹，都是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表现。更有甚者，则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形象物化，嵇康是这方面的代表。《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sup>[3]344</sup>

嵇康生命结束之际，也就是《广陵散》绝迹之时。一曲音乐成了一个人格的生命化身，充分体现出魏晋文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sup>[7]</sup>

伴随自我意识而来的就是频繁而多样的个性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狂放举止。西周时期随着礼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都有了规范标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社会约束是人类告别动物、走向文明的一种进步。按照这样的社会约束，狂放举止显然属于受约束之列。但自秦汉中国进入大一统格局后，这些代表文明进步的礼制礼仪逐渐被统治者操控，发展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汉代以来以伦理为中心的名教高度政治化，是否符合礼教精神的伦理标准成为人才选拔、社会舆论、价值观念的首要衡量准绳。这种假公济私的虚假“社会意志”遭到魏晋士人的强烈对抗，其外在表现便是用狂放举止去冒犯统治者所推重的名教。这一点在竹林名士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刘伶狂饮，以至褻渎神灵，裸体现形，意在抨击礼教代言人“缙绅处士”；阮籍母丧饮酒，近嫂攀谈，宣称：“礼教岂为我辈设也！”嵇康喊出他们的共同心声——“越名教而任自然”！相比之下，后来的元康名士其狂放行为虽然比竹林名士更为夸张，但其反礼教的态度却大大减弱。尽管如此，这些狂放行为却足以改变名教笼罩下的社会风气。如《世说新语·德行》记载：

王平子、胡毋彥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刘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

之本。故去巾幘，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sup>[3]24</sup>

二是怪异行为。为了求新求异，有人故意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甚至形成一些怪癖，以此彰显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这些行为虽然不及狂放举止那样大胆、夸张，但也足以表达出挣脱名教束缚的强烈愿望。下面我们通过学驴叫和长啸这两种有代表性的怪异行为来略作分析。

在汉末以来的上流社会中，曾经流行一个有伤大雅的怪癖行为——以口技形式学驴叫。据载东汉大名士戴良的母亲喜欢听驴叫，戴良为了表达孝心，竟然经常为母亲学驴叫以取悦其心<sup>⑫</sup>。魏晋时期，最常见的学驴叫行为多发生在送葬活动中。比如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婿王济很喜欢听好朋友孙楚学驴叫，王济去世后，多位大名士前来吊唁送葬，可孙楚却选择了一种最为特殊但却是逝者最喜欢的方式——学驴叫——给他送行，以此表达二人的亲密关系。用驴叫为逝者送行在那时似乎也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皇帝也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伤逝》记载：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sup>[3]636</sup>

为了寄托对王粲的哀思，堂堂魏文帝竟然带着满朝文武官员齐声学起驴叫。可以想见，这一奇葩的举动在朝野能够引起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

长啸类似今天的打口哨。说到打口哨，今天人们一般会联想到那些街头混混或嬉皮士之流。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那时曾经风行一时的口哨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阮籍。《世说新语·栖逸》记载：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佗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哨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sup>[3]648</sup>

看过并理解了这个故事，便会明白阮籍的口哨与那些街头混混和嬉皮士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和《竹林七贤论》，阮籍从

这位真人的啸声中悟出人生自由的真谛,挥笔写出《大人先生传》来展示其思想的飞跃。这个从思想到行为带来的示范效应非常明显,从阮籍开始,“啸”这种口哨闲散形式竟然成为士人抒发自由性情的一种特殊媒介形式,因而受到格外追捧。谢鲲因挑逗邻家女子,被人打掉两颗门牙,还被人们编出歌谣取笑:“任达不已,幼舆折齿。”但谢鲲对此并不在意,他关心的却是牙齿折断后还能否长啸,并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sup>⑬</sup>其中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歌啸能够宣泄情感,抒发个性自由。谢安面对惊涛骇浪,“神情方王,吟啸不言”<sup>⑭</sup>;王徽之见到喜爱的竹园,则要“讽啸良久”<sup>⑮</sup>。如此风气竟然使歌啸之美发展到令人痴迷的程度。一位老妪因为痴迷于刘宝的歌啸,竟然把他请到家里,杀了一头猪来款待他。但刘宝吃了一头猪,还是没什么反应。老妪只好再上一头猪,刘宝实在吃不完,吃了一半,终于开始用歌啸答谢<sup>⑯</sup>。

三是率真行为。为了对抗礼教束缚下的虚假面孔,魏晋文人频频以率真举动展示个性,率真行为逐渐成为潮流新宠。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集中阐明自己之所以不肯入朝为官,就是无法忍受官场那一套虚假的繁文缛节和模板面具,不想以此淹没自己的心性。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也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套中人予以无情嘲讽和鞭笞。他们二人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不仅表现在文章中,更表现在许许多多率真的行动上。嵇康因冷落钟会而得罪小人,最终丢掉脑袋;阮籍主动求官步兵校尉,竟然是为了橱中美酒。受其影响,丢掉面具枷锁、坦露真实个性成为很多士人的行为方式。荀粲直言“妇人当以色为主”,自己冻冷身体为发烧妻子降温<sup>⑰</sup>;王导与儿子王悦下棋时想要悔棋,儿子竟然按住父亲举棋之手不让棋子落下<sup>⑱</sup>。

率真行为方面表现比较突出有两位,一个是王戎,另一个是王述。王戎不但挖去自家好李的种核出售,而且还在小资小钱方面与晚辈斤斤计较。可一旦中年丧子,他则悲痛欲绝,自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sup>⑲</sup>当王导手下一群人对其大唱颂歌时,唯独王述站出来大唱反调:“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sup>⑳</sup>但当他自己接到尚书令一职的任命时,马上就接拜。儿子在一旁劝他要按惯例客气谦让一下,他却振振有词地反问,为啥要谦让?你决定我能否胜任?能胜任为啥还要谦让<sup>㉑</sup>?但最能反映王述率真性格的还是《世说新语·忿狷》中记载的那个著名的吃鸡蛋故事: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乃下地以屐齿跟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sup>[3]886</sup>

这位怒得可笑而又十分可爱的蓝田大哥,可能会让每个读者燃起跟他交朋友的欲望。

与个性活动相关,还有文人交往中的个性表现。个性的展示往往需要在对比和映衬中去实现,所以交往是文人个性实现的重要渠道。只是这样的交往一般要通过两个渠道,即通过和谐和冲突两种外在形式去展现。

促成魏晋文人在和谐交往中展示个性的机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雅集。很多文人集会活动为他们展示个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建安七子”和曹氏兄弟的西园之会、西晋时期石崇邀集的“金谷之会”、东晋时期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发起的“兰亭之会”,使文人们在交流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和才华。二是人物品藻活动。汉代以来,随着评价标准的游移变化,人物品藻活动对于文人个性的评价和导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汉代在儒家思想统摄下,人物品藻评价标准以品德(尤其是“孝”)为核心。但从曹魏开始,“唯才是举”打破并改变了人物品藻活动的评价标准,对人物才能的关注和重视显然有利于文人个性的发展。嗣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人才选拔已经失去对人物品藻评价结果的依赖。于是,人物品藻的标准又从注重才能转向注重审美。魏晋时期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又更加刺激了文人个性的展示。《世说新语》中很多美好的形容词句把不同人物的美好个性神态淋漓尽致地描绘勾勒出来。例如: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sup>[3]688</sup>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sup>[3]671</sup>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sup>[3]672</sup>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sup>[3]672</sup>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sup>[3]692</sup>

如果说这种评价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只是发现并展示别人的个性的话,那么还有许多人在评价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其中。《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sup>[3]522</sup>

评价别人其实只是自己个性展示的一个平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建立在相互了解至深的基础之上。王濛和刘惔这一对清谈大师就是如此。王濛曾深深感慨道:“刘尹知我,胜我自知。”<sup>②</sup>评价别人和自我评价的相互换位,能够在映衬对比中把各自个性特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彻底。《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冀州刺史杨准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sup>[3]507</sup>

两位品藻者不仅评出了被评者的个性特征,而且在评价中融入自己的主观个性色彩,堪称精彩的个性展示与对决。

门阀士族的经济崛起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很多士族文人自信心爆棚,个性膨胀,从而也助长了他们性格中的排他性。这样的人在相互接触及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引发矛盾,出现龃龉现象。如阮籍擅以青白眼面对好恶不同之人<sup>③</sup>,谢奕因小事遭王述冒犯,竟然“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sup>④</sup>,桓温与袁耽以樗蒲赌博,“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更有甚者,有的脾气暴躁,还能发生肢体冲突。《世说新语·忿狷》记载: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梧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复足与老兄计?”螭拔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sup>[3]887</sup>

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竟然因为两人一言不合,便反目翻脸,动起手来。但与下面这个故事相比,这还只能算是小巫: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sup>[3]888-889</sup>

朋友之间竟然因劝酒而险些酿成千人群殴事件,足见各自个性之强盛。

魏晋时期士人的个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这一特殊群体的个性涌动是中国文化史和文人心态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反思中国士人历史、认识现实问题,均大有裨益。

### 三、以“道统”良知取代 “势统”皇权控驭

从本质上看,“道统”与“势统”关系的核心是“真理”和“权力”的各自社会价值如何平衡的问题。士人是“道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代言人,皇权是“势统”的代表者和掌控方,二者是相互抵牾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依存角度看,权力一方需要获得真理的肯定和认可,以取得执行权力的合法性;真理一方也需要有权力的认可和保障。从抵牾的角度看,双方的和谐稳定关系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平衡的基点。一旦失去这个平衡的基点,双方就会产生矛盾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有待于双方的配合,二者互相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真理与权力关系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一个国家政权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成熟,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一个知识阶层群体的形成和成熟。西周时期,这两个条件开始同时具备,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真理和权力伴随咬合和拒斥滚动的历史帷幕。

余英时先生曾将东西方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做过一个对比,认为二者都经历过一个真理代言人与权力操控者之间的边界范围和职能属性从模糊到分离、清晰的过程,但分离之后的状况不尽相同。在西方,教会和政府形成分别代表所谓真理道义和权力掌控的两个部门。二者泾渭分明,教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更大的社会权威性。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代表真理一方的士人阶层始终没有能够像西方教会那样取得与政权分庭抗礼的地位<sup>⑤</sup>,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难以撼动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两个方面。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血缘关系社会走向地缘关系社会。而中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并未充分解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血缘观念仍以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延续。无论是国家层面同一朝代的皇位继承,还是社会大众层面的家庭财产继承,依然严格按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始血缘关系为根据和常理,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宗法观念。血缘宗法观念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产继承方面,还广泛深入地影响到国家社会管

理方面,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大于一切,唯我独尊观念为天经地义之法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真理代言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道统”与“势统”难以形成和谐与良性的互动关系。

西周时期是中国完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从“道统”与“势统”的关系来看,虽然双方各自已经进入成熟的状态,但就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力度来看,“道统”一方完全处于“势统”的笼罩统驭之下。“学在官府”已经从社会制度上规定了作为真理载体的知识和学术只能受“势统”一方的管理掌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从个人的社会身份上规定了包括真理代言人的文人必须臣服于“势统”一方。

春秋战国的动荡局势激荡出“道统”与“势统”关系态势的新格局,同时也使为真理代言的“道统”一方有了清晰的社会群体形象和职业特征。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原先那些吃官饭的文化人失业走向社会,成为职业自由人。他们开始把所学的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碰撞出“百家争鸣”的灿烂思想文化局面。作为真理和知识的代言人,他们不仅全面打造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而且在总体上也得到“势统”一方的认可与支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道统”与“势统”关系相对和谐而且堪称双赢的时代。所谓“双赢”是指双方在此期间各自均有所得。就“道统”一方来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基础上,也获得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去周游列国,去朝秦暮楚,去合纵连横,去发表各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从而创造社会价值。就“势统”一方来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在于,无论“道统”们怎样变换行为方式,怎样“百家争鸣”,其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集中汇合在“君人南面之术”即“为我所用”这条主线上。“势统”一方用还给士人自由人身和自由言论的方式,获得“道统”一方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道统”与“势统”相处最和谐的时期,也是对中国历史和人类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

随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道统”与“势统”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二者进入势同水火的敌对状态。嗣后,随着汉代“势统”执政理念的变换,“道统”与“势统”的和谐良性关系开始呈现倒退趋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使儒家思想之外的其他思想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

显然是对战国时期自由和谐局面的背离。这种思想局面对很多士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像东方朔这样生活在汉武帝身边的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汉武帝的为政为人发挥一些制约和影响作用<sup>②</sup>。东方朔之流有时能够通过委婉讽谏的方式对汉武帝刘彻进行监督和批评引导,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表真理的“道统”监督批评“势统”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东方朔似乎已经是高高在上,能够发挥真理代言人作用,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己在汉武帝那里不过是“用之者则如虎,不用者则如鼠”,只能在“伴君如伴虎”的状态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度日。另外像贾谊和司马相如,表面看上去似乎也能深得文帝和武帝赏识重用。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与帝王之间的关系似乎还不能上升到“道统”与“势统”关系的层面上去理解和认识。真正能够从“道统”与“势统”层面对士人和皇权之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东汉以后“势统”一方将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化,以此绑架包括士人在内的整个社会,从而严重限制士人的思想创新和行为自由。东汉时期为博得“孝子”美誉而沽名钓誉者层出不穷,正是“势统”这个导向的恶劣后果。与此同时,皇权内部矛盾重重,宦官与外戚矛盾激化,殃及国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终于酿成清议运动和党锢之祸。清议运动和党锢之祸标志着汉代“道统”一方为真理代言的努力遭到“势统”一方的残酷镇压。战国以来“道统”与“势统”的和谐良性关系完全遭到解体,二者关系从此进入黑暗时代。

这样的社会背景给魏晋士人的“道统”责任担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真理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魏晋士人没有辜负时代赋予他们的“道统”责任与良知诉求。他们通过不同途径,以多种方式和渠道履行作为“道统”一方对“势统”的监督责任和批评义务。

一是明确以“势统”批判者的面目出现,指斥批评“势统”的各种不当行为,并公开与之对抗。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孔融和祢衡。从进入东汉朝廷上层官僚班子开始,孔融就一直以一位社会批判者的姿态来指点江山、评鹭世事。他先是反对朝廷打算礼葬不光彩窝囊而死的太傅马日磾的计划,继而又极力否定推翻朝廷恢复肉刑的计划,然后又反对献帝打算为几位夭折的王室成员举行四时祭祀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孔融作为社会批判者的形象逐渐明确清晰起来。如果说孔融对汉献帝的批评还算

态度温和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疾之如仇的曹操的批判则是酣畅淋漓,嬉笑怒骂,毫无保留。他先是竭力反对曹操终生引以为豪的东征乌丸计划,继而又几次就禁酒问题与曹操展开激烈的辩论。更有甚者,他还在曹操父子争夺甄氏的事情上把曹操狠狠恶搞了一通<sup>⑳</sup>,以致为自己埋下了送命之祸。与孔融相比,祢衡对曹操的态度更加直接粗暴。孔融曾向曹操极力推荐祢衡,而且对祢衡赞美有加。曹操本来就爱才,听到孔融举荐后几次要约祢衡见面。但祢衡却出人意料不愿与之见面,反而四处散布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舆论。曹操听说后震怒,但如果直接惩治,又显得有失风度。于是,曹操打算安排祢衡去做击鼓手,以此来羞辱他。可是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被祢衡以裸体击鼓方式羞辱了一番<sup>㉑</sup>。孔融和祢衡最后都因此遭遇不幸,这个现象说明清议运动遭遇镇压后广大士人对于“势统”的抵触心态,昭示着“道统”与“势统”关系破裂之后的对抗状态。

二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道统”身份与“势统”的距离,主动与之保持疏离和不合作的距离感。“道统”与“势统”之间关系的复杂微妙之处还在于,作为执政者的“势统”方面,手里掌握着能够决定“道统”方面承担者利益资源乃至身家性命的权力。如果仅从利益角度考虑,士人和社会其他人等都需要与执政的“势统”一方搞好关系,以避免自身利益遭受损失。但真理和良知之所以没有彻底泯灭,就是因为在任何时代,总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产生不利于自己利益的负面作用,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真理代言人的“道统”身份,主动与他们认为已经“无道”的“势统”一方划清界限。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嵇康和阮籍。

无论是从家庭社会背景还是个人条件考量,嵇康都有可能成为魏晋时期官场上炙手可热的天花板级人物,可他却偏偏没有走上这条光明大道。嵇康在经历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之后,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经营努力的目标都不是国家社稷,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因而他完全断绝了对于功利名教利益的留恋与追求。当老友山涛推荐他入朝做官时,他借题发挥,以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宣布与老朋友绝交。从表面上看,他所给出的不能接受山涛举荐就任的理由,主要是自己个人秉性方面的原因,如“必不可堪者七”“甚不可堪者二”。但实际上,通过这些陈述,他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与司马氏政权的对立立场和不合作态度。因为他已经公

开表明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倾向,而“汤武”“周孔”正是司马氏政权借以维护所谓名教统治的主要凭据。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势也正是当时“道统”与“势统”分庭抗礼局面的形象写照。

阮籍虽然没有像嵇康那样和盘托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异曲同工,堪称同道加兄弟,只是由于个人秉性不同表达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对于以“汤武”“周孔”为中心的名教礼教,阮籍和嵇康一样,也是明确持反对态度的。阮籍不仅在言论上公开提出“无君论”的观点,而且在行动上故意冒犯礼教。礼教明确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甚至具体到“叔嫂不通问”的程度。阮籍却偏偏专与嫂子聊天,而且还公然声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母亲去世后,阮籍不仅公然违背礼教规定喝酒吃肉,而且连友人前来吊唁时,也不按礼教程序进行接待<sup>㉒</sup>。与嵇康不同,阮籍与司马昭的关系有些微妙。阮籍曾受人邀请,大醉为司马昭写过劝进表,并且也因此得到过司马昭的保护。但因此事并非阮籍本心所愿,所以他引以为耻,懊悔痛苦。能够证明他这片苦心的,是他严守与司马氏政权关系的底线,为了拒绝与司马氏联姻,他曾大醉60天,不给司马昭提亲的机会。他谋职步兵校尉,也并非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大志,只是为了自保,奔着办公室壁橱中的好酒而去<sup>㉓</sup>。可见,他在灵魂深处仍是以“道统”自任,有着与“势统”保持距离的明确认知。

三是进行“道统”参与和取代“势统”的尝试。魏晋以降,随着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崛起,这个社会群体很快产生了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利益诉求。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门阀士族取代皇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决策势力。除了门阀士族自身的实力强大外,从社会环境来看,西晋王朝的覆亡使皇权遭到重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皇权借助门阀士族力量举朝南迁,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东晋王朝的重要政治特点就是门阀士族参与朝政、左右朝政,形成所谓的门阀政治。因为门阀士族的主体也是魏晋士人阶层的主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门阀士族参与东晋王朝政治既是西周之后“道统”与“势统”的再度握手联合,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道统”与“势统”关系中“道统”居于主导地位的罕见局面<sup>㉔</sup>。王导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过程,既是这场历史剧的开始,也成为这场剧目后来的范本。《晋书·王导传》记载:

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

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现襮,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覩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讲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sup>[8]</sup>

从上述引文可见,东晋王朝始建过程中,王导完全是总导演的身份,从晋元帝到朝臣和吴中大族,均在王导策划安排下各司其职,各就各位,使东晋王朝逐渐步入正轨。以“道统”身份参与并左右朝政的王导,不仅以政治家的能力辅佐稳定局面,而且充分发挥“道统”传人的思想和智慧优势,在执政理念、文化学术传承等多个方面去努力实践“道统”一方在获得自由活动空间后尽最大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并与“势统”一方一起再次谱写一曲双方良性合作的和谐凯歌。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道统”与“势统”之间的关系从分离开始,经过不断碰撞与磨合,终于回到良性和谐状态。这一状态回归不仅是对西周时期“道统”与“势统”双方和谐局面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为嗣后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平衡“道统”与“势统”关系,使二者呈现出新的和谐局面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

#### 四、以审美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人生态度

以上三个方面如果上升到人生态度的层面,应该就是汉代以来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被魏晋士人的审美人生态度所取代。按照一般理解,人生态度属于人生观的范畴,而人生观又从属于世界观。所以,人生态度决定着个人生活道路的方向选择、价值利益取舍、生活美丑判断等重大人生问题。

人生态度基本可以分为功利型和超脱审美型。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

世间人有生来是演戏的,也有生来是看戏的。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地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因为有这个区别,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sup>[9]</sup>

所谓“看戏”和“演戏”,也正是功利型和超脱审美型两种人生态度的同义表述。如果从中国传统处世思想角度看,也就是儒家入世思想和道家出世思想在人生态度方面的影响和反映。

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从汉代推重儒家思想以来,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影响并构建出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为核心的入世人生态度,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为国家和社会建言献策成为很多文人的热衷追求。他们或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那样“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或如张衡《南都赋》所说那样“经纶训典,赋纳以言”。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直接用经义内容去表达其入世理念和人生态度。班固《两都赋》记载: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sup>[10]31</sup>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入世者的宏伟蓝图和美好理想。但在入世思想的强大惯性作用下,即便在入世人生道路上碰壁后的牢骚或是忧虑,其实也同样是入世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汉代文学中一批以失意经历为背景而生发的“不遇”主题,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像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刘歆的《遂初赋》、班固的《幽通赋》,以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等,都表现了他们在仕途上未能获得重用而产生的不平之气以及无可奈何的感伤。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汉代人那种昂扬向上的激情逐渐淡化,超凡脱俗的充满道家出世色彩的人生态度逐渐演变为士人的主流心态。促成魏晋士人人生态度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巨变,尤其

是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现实。汉代国势强大,百业繁荣,为士人提供了展示入世人生的广阔舞台。但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人命危浅,国势衰败,不再是一个可以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可入之世。以往儒家入世之心因此受到压抑,也是势在必然。与此同时,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以往以儒家孝悌礼教为核心、以举贤良方正为程序渠道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被“九品中正制”保护下的以家族背景为依据的人才仕进途径所取代。这意味着,对于门阀士族来说,积极用世入世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进取发展出口;对于一般的寒族来说,因为没有家族背景,也很难实现入世理想。在此背景下,经济实力雄厚并已逐渐获得政治权力的门阀士族文人逐渐开始把以往帝王文化的政治核心转向文化核心。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以往服务于帝王文化的功利入世生态态度转化为表现士族文人精神世界的审美生态态度。这一重要的文人心态变化不仅影响到魏晋士人文化格局的构建,而且直接促进了后来唐宋时期士人文化高潮的到来。

由实用功利人生态度转向审美人生态度的关键价值取向的变化。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通过《逍遥游》中那个著名的大树故事阐发了这个重要的人生哲理: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sup>[11]</sup>

同样一棵樗树,如果从实用功利角度看,它毫无用处。但如果从审美角度看,把它放在广袤的原野中,使其获得自由生长,无论对于树本身还是对于它的观众而言,都是一件美好惬意的事情。庄子这里意在宣扬一种摒弃实用功利生活态度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审美的人生态度。

然而,这种美好的人生态度在汉代入世精神的笼罩下,基本湮灭无闻了。魏晋士人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开始重新思考一种告别功利实用的审美人生态度。《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孙绰赋《遂初》,筑室映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

施?”<sup>[3]140-141</sup>

从这个故事可以明确看出,在实用功利和审美超脱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中,后者显然居于优选地位。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明确的审美人生态度,魏晋士人的生活充满了审美韵味,并且从多方面展示出人生审美的高超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这种审美人生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善于在静观生活中发现生活之美。生活之美本来无处不在,发现它对任何人也是机会均等的。但之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发现生活之美,原因就在于碌碌世事分散了人们的观察注意力,而功利实用的观念又遮住了人们的审美目光。所以,美只能属于能够发现它的人,正如罗丹所说:“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sup>[12]</sup>告别汉代功利实用人生态度的魏晋士人也正是如此。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sup>[3]120-121</sup>“书圣”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sup>②</sup>。那位披着袈裟的名士支遁喜爱养马,人言“道人畜马不韵”,支答曰:“贫道重其神骏。”<sup>③</sup>支遁不仅能在骏马奔驰中体味出人生自由的意义,而且推而广之,在其他动物行动中去寻找人生之美。《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支公好鹤。住剡东岭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铍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sup>[3]136</sup>

可见他们长于观照生活,善于从审美的高度上把握和体味生活。华林园与冶城的风景,骏马与仙鹤的风姿,都是他们审美人生的得意佳作。

二是善于把自己打造成为人生艺术品,实现自我塑造与欣赏。人生如戏,如同戏剧理论界三种不同的经典表演理论体系阐释,人生演戏的舞台上也有不同的表演套路和体系特色。儒家入世精神的人生表演,如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理念,演员需要与角色融为一体,完全进入角色,把观众视为现实生活的“第四堵墙”,也就是要忘记自己的表演身份。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种入世表演的总结概括。深受老庄自由人生精神影响的魏晋士人,其人生表演与儒家入世精神要求的入世表演刻意地保持着距离,如同中国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和德国布莱希特表演理论的“间离效果”。这有些

接近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也就是表演者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是以游戏的态度来扮演人生的角色。他们不但能演给人看,还能自我欣赏。在儒家思想统领的功利性生活信条的规范下,人们只能按照“不逾矩”的要求来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社会利益和资源,但这样也就只能与生活的审美感受失之交臂。魏晋时期的士人开始意识到这种功利型活法的无趣和可怜,开始努力摆脱束缚,解放自己,寻找自由人生。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称:

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sup>[10]601</sup>

这里描述的人物行为方式与儒家入世范式完全背道而驰,这封绝交书堪称追求自由人生的宣言书。作者明确把生命本性作为最宝贵的东西来坚守,并且因为有同道中人的认可和老庄思想的滋养而愈加自信和坚定。这是一种由行为者本人描绘塑造的自我自由行为画像。魏晋士人有了这样的思想根基,便可以自由地去设计和实践自己的人生。

受此风气影响,庄子强调张扬的“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冥的人生境界在魏晋士人这里得到充分实现。《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袷衣,诸君何为入我袷中?”<sup>[3]731</sup>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sup>[3]740</sup>

如果了解到此前儒家入世功利人生的刻板 and 面具式的生活样貌,也就不难理解和赞许刘伶、毕卓这种貌似放诞颓废的行为方式。其中既包含着对功利人生的彻底颠覆,更充分表达出对自由人生的信念和激情。这种放诞玩笑的人生态度还有其内在的深刻意义,这就是在超越现实生活基础上完全实现自我——把自我的行为方式视为一件艺术品向社会展示,并自我欣赏。魏晋士人努力使自己按照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向践行,庄子强调并宣扬的“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冥的人生境界在魏晋士人这里得到充分实现。王忱慨叹:“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sup>③</sup>王荟声称:“酒自引人著胜地。”<sup>④</sup>

他们以饮酒为媒介,希望进入形神相亲、物我两冥的境界。“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sup>[13]24</sup>魏晋士人以狂放的举止来表演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戏剧,以身躯为彩笔,来描绘人生的苦乐图画。这些放诞行为背后隐含着这些人生艺术家的内心独白:我的人生乐趣和追求,就是来源于欣赏这些自己创造的艺术品。在这个审美世界里,正如尼采所言:“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在这里,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臻至‘太一’最高的狂喜满足。人这种最高贵的陶土,这种最可珍爱的大理石,在这里得到捏制和雕琢,而向着狄奥尼索斯的宇宙艺术家的雕琢之声,响起厄琉西斯的秘仪呼声:‘万民啊,你们倒下来了?宇宙啊,你能预感到那些造物主吗?’”<sup>[13]26</sup>

三是与生活保持有距离审美。无论是从静观中发现生活之美,还是从审美角度进行自我形象塑造,都需要把握好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提出审美需要距离的学说,主要是指艺术品的欣赏<sup>⑤</sup>。但他论证这个观点所举出的著名“雾海行船”例子,却是一个富有画面感的生活场景。正是这个富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让我们联想到与之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魏晋士人生活故事。《世说新语·雅量》记载: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sup>[3]369</sup>

船上之人对于遇到风浪的两种态度,也正象征着实用功利和审美生活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从实用功利角度看,风急浪涌会有生命危险;而从审美角度看,惊涛骇浪,波澜壮阔,乃是难得的美丽图景。文中观众及作者对于谢安行为的赞许和推重,也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审美人生态度取代功利实用人生态度的胜利。

在这种人生态度的影响下,魏晋时期对生活有距离的审美大行其道。《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sup>[3]760</sup>

功利实用人生态度注重事情结果,凡事需有始有终,结果才是事情的价值所在。而在审美人生态度那里,关注重视的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兴之所至过程本身,结果被完全忽略了。在魏晋士人看来,“兴”是一切活动过程中的审美愉悦,它才是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与庸庸碌碌的功利实用结果相比,“兴”才是王者。儒家礼教名教那套蝇营狗苟的功利结果,已经被“兴”荡涤冲刷得无处藏身。魏晋士人的审美人生态度,也成为历代文人心向往、追求的美好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魏晋文化总体潮流精神包括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道统”与“势统”、审美与功利四个方面。其外在表现是士人社会行为等现象方面,但折射的内在核心是士人独立的人格精神。魏晋文化通过这些渠道全面构建了中国士人文化以“道优于器”传统思想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体系,并在士人人格社会实践方面得到认定和落实。它不仅明确夯实了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基本底色和价值取向,而且为魏晋之后唐宋士人文化高潮繁荣局面的到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 注释

①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集团的重要谋士。嵇康的妻子又是曹操曾孙女长乐公主。②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士族的生成和升降”部分的相关论述,中华书局1983年版。④⑤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⑥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转变”中的相关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⑦参见杜佑《通典》卷68、卷99,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本。⑧参见阮籍《大人先生传》,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⑨参见《太平御览》卷262引《秦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⑩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新华文摘》1987年第2期。⑪见《后汉书·樊英传》。⑫见《世说新语·伤逝》刘孝标注。⑬见《晋书·谢鲲传》。⑭见《世说新语·雅量》。⑮见《世说新语·简傲》。⑯⑰⑱⑲⑳见《世说新语·任诞》。㉑见《世说新语·惑溺》。㉒见《世说新语·排调》。㉓见《世说新语·伤逝》。㉔见《世说新语·赏誉》。㉕见《世说新语·方正》。㉖见《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㉗见《世说新语·忿狷》。㉘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中的相关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㉙比如一些野史笔记中提到不少东方朔“谏”成功的传闻故事,见《汉武帝内传》等。㉚《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五官将纳熙妻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博学,真谓书传所记。后见融问之,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㉛见《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及该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㉜㉝见《世说新语·言语》。㉞参见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 [1] 宁稼雨. 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J]. 求索, 2017(3): 4-13.
  - [2]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郑杭生, 杨敏.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J]. 江苏社会科学, 2003(1): 1-9.
  - [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6] 袁嘉喜. 《世说新语》之“我”与魏晋社会风景[J]. 学术界, 2023(9): 106-114.
  - [7]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438.
  - [8]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745-2746.
  - [9] 朱光潜. 看戏与演戏: 两种人生理想[M]//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二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550.
  - [10] 萧统.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0-21.
  - [12] 罗丹. 罗丹艺术论[M]. 葛赛尔, 记. 沈琪, 译. 吴作人, 校.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 5.
  - [13]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Trend and Spirit of Wei-Jin Culture

Ning Jiayu

**Abstract:** Wei-Jin Culture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entire Chinese culture.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and highlight of Wei-Jin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was replacing the imperial culture that served the centralized autocratic rule with a completely new set of scholar-official value concepts and life creed that bore strong personal colors.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culture wa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replacing materialistic pursuits with detached spiritual pursuits, replacing social constraints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arefree attitude, replacing the “dynasty’s moral authority” with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Way”, and replacing the utilitarian life attitude with an aesthetic life attitude. These values not only clearly solidified the basic color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 culture, but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leading role in the arrival of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ang and Song scholar culture.

**Key words:** Wei-Jin Culture; trend and spirit;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责任编辑: 采薇

## 出海的网红：面向 Z 世代的内容生产、情感共同体建构与跨文化传播

吕 鹏

**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及网络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红出海,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员。不过,基于商业逻辑的个体营利需要的“网红”与作为基于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塑造及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体制需求的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张力。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海成功的网红们,在视频生产和传播的内容选题、视听语言以及传播视角等方面有着一些共通的特征特色。基于内容生产和传播互动过程中的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最终建构是其取得成功的本质因由,而这也是协商网红个体与国家间对外传播张力的基础。出海网红们的个案和经验,可以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样本,甚至可以将其纳入整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系。因而,要站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高度对网红出海进行引导,从而赋能民间及个体的中国故事讲述,进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网红;网络主播;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1-0158-09

数字经济的繁荣及网络平台的发展,使越来越多人以网络主播的身份投身到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中,以期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随着国内竞争的加剧,也有众多网络主播选择另辟蹊径,在国际平台面向海外受众进行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虽然绝大部分面向海外的网络主播没有取得现象级的成功,但也有如李子柒一样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国际舆论场中获得用户一致好评的“网红”。李子柒等这些非官方的个体传播者的内容生产无心插柳地代表并传播了中国的正面形象,潜隐并事实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sup>[1]</sup>这一对外传播的总体规划与要求。不过,基于商业逻辑的个体营利需求的“网红”与作为基于和平崛起国家形象塑造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2]</sup>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体制需要的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张力。出海网红们的成功个案,可以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样本,甚至可以将其纳入整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系,前提是允许或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二者之间对外传播直接目的的不同所带来的张力。因此,对成功个案进行总结和提炼,深挖其背后的传播逻辑及理论因由,就显得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站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高度进行引导,从而赋能民间及个体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建构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进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更加必要。

基于此,本文以国际最有代表性的视听平台 YouTube 为例,选取其影响力和订阅户最多的面向海外传播的三位中国网络主播——李子柒、办公室小野、滇西小哥,对其传播特色和传播内容进行分析,以求在个体营利与国家跨文化传播之间建立联

收稿日期:2024-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23JZD033)。

作者简介:吕鹏,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系、消弭张力,从而寻求更好赋能网络主播出海,增进文化交流,探索有益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 一、出海的网红:平台抉择与职业化生产

“网红”简单可以理解为在网络上走红的人,这是一个出现并未有多久、富有时代感且经历了转变的概念。网红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最先开始指的是在网络论坛主动或被动出名的人,最初具有负面的意味,例如初代网红“芙蓉姐姐”“凤姐”等以“黑红”为特色的人。彼时网络新兴且未占据人们的生活,网红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奇观”和“审丑”出现进而为人们所关注的。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或希望成为网红,尤其是短视频、直播出现,世界已视频化<sup>[3-4]</sup>后,网红逐渐由负面向中性转变。21世纪1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短视频、直播进行生存的个体越来越多。随着网红的外延变大,基本上网红成为有一定粉丝量和影响力的相对成功的网络主播的代名词。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过1.8亿个(多平台非去重数据);截至2023年12月,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sup>[5]</sup>;截至2022年年底,其直接或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超1亿个<sup>[6]</sup>。2024年7月,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将网络主播正式认定为19个新职业之一,将其定义为“基于互联网,以直播、实时交流互动、上传音视频节目形式发声、出镜,提供网络表演、视听信息服务的人员”<sup>[7]</sup>。由于其巨大的体量和逐渐普及的社会认知,由网络主播为主要代表的网红,也逐渐成为大众中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 1. 从声名到职业

国内网红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契合或同步于国际上以网络为生的人群。相对于国内网红的概念,英语世界的网红(micro-celebrities)一词最早公开于特蕾莎·森福特对于美国网络视频女郎(camgirls)的研究<sup>[8]</sup>,她将网红定义为“利用网络技术如视频、博客以及社交网络进行在线表演以提升自己名气的那些人”<sup>[9]</sup>。由于最初的网红研究基于网络视频女郎,也因网红有较强的性别属性,因而性别视角是网红研究的主要进路之一。当网红成为一种潮流且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进来后,男性网红也成为研究关注的对象<sup>[10]</sup>。在森福特之后,学者们不断拓展

对网红的研究,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理论和视野<sup>[11-12]</sup>,对这一群体又有网络名人(internet celebrity)<sup>[13]</sup>、影响力者(influencer)<sup>[14]</sup>等不同命名。可见,声名<sup>[15]</sup>是网红们寻求的目标。虽然早期网红活跃于网络媒体中的目的不同,但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社会与经济生活逐渐数字化,借由声名实现对经济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共识。从劳动或经济尤其是数字劳动的视角对网红进行研究,成为另一重要进路。伴随数字网络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数字平台进行非物质劳动来获取报酬,对数字劳动的认知也由一种免费的劳动<sup>[16]</sup>逐渐向一种寻求收益的劳动<sup>[17]</sup>转变。当短视频、直播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传播和社交方式后,作为网红主要生成和指代对象的网络主播,就开始寻求以声名为中介进行利益转化向主要通过职业或劳动的方式获取报酬方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网红逐渐完成了职业化的转型,从而彻底地扭转了其早期命名中负面的内涵。

### 2. 从本土到海外

各式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为网络主播声名探求和越来越职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和保障。从社交媒体的角度而言,从微博、微信到快手、抖音等,也见证了其内容生产与传播由文字逐渐向视频转化的过程。受平台与平台之间特色及“调性”不同、主播们的创作特色以及用户们的消费习惯的变化等影响,网络主播们会随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地在平台间迁移,即从一平台转战其他平台,学界将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这种行为命名为“网络迁徙”。有学者将网络迁徙归纳总结为“场所迁徙”和“注意力迁徙”两种迁徙类型<sup>[18]</sup>,前者一般指长时间弃用某一平台而转向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而后者则主要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将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为。虽然很多网络迁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一般用户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但网络主播作为一种特殊的用户,也会遵循声名获取及经济收益最大化的逻辑来寻求最优平台。平台迁徙的更进一步发展是随着复媒体<sup>[19]</sup>(theory of polymedia)理念及实践的深入,基于经济理性,网络主播们会选择在众多平台间“摇摆”<sup>[20]</sup>(platform swing),也即其生产的内容在不同平台间分发,以获得最佳的传播流量和经济回报。从网红的发展历程和网络主播的平台实践来看,网红们的网络迁徙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转变。一是从社交媒体平台的属性来看,网络主播们经历了从文字和图

片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向以短视频、直播为主的平台迁徙过程,在此过程中以识字教育为主的文化资本对于网络主播的从业影响越来越小,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能够成为网络主播的缘故。二是从传统境内外“空间”划分来看,随着国内平台竞争的加剧以及短视频、直播平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网络主播们渐次由着力国内平台开始转为耕耘国际平台。这种转变有两种实践方式:一种是将生产制作的内容在国内国际平台间同时分发,一种是完全深耕境外平台。从本土发展到向海外进军,网络主播们需要基于平台生态和场景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内容生产与调试,这既给网络主播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也促成了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同时客观上那些具有较强民族和国家特征的主播及其内容,也成为“中国故事”讲述的组成部分,而这是本文分析和研究的逻辑起点。

## 二、生活化的中国:面向海外 Z 世代的内容生产及传播特色

以国际为舞台、主要面向海外受众进行跨文化传播为主的网红,是网红细分的一种。他们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视频化内容生产和传播由本土向海外进行拓展的新趋势。虽然与面向国内的网络主播相比,他们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小,但其代表性意义及国际传播价值等不容小觑。综合 SocialBlade 以及 SocialBook 等的统计数据<sup>①</sup>,剔除相关干扰项,目前 YouTube 上真人出境、以中国本土为创作背景但面向海外受众为主(即讲中文,但配备英文字幕,视频评论以外文为主)的网络主播按订阅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李子柒(@enliziqi)、办公室小野(@Ms-YeahOfficialChannel)和滇西小哥(@dianxixiaoge)。

订阅排名第一的李子柒,是 2017 年 8 月注册的账号,已上传了 128 个视频,到数据统计时订阅用户数是 1910 万。2021 年 7 月 14 日,李子柒上传视频《我们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后,其主页就停止更新<sup>②</sup>。排名第二的办公室小野账号注册于 2017 年 2 月,已上传了 435 个视频,用户订阅数为 1380 万。滇西小哥的账号注册于 2018 年 7 月,上传的视频有 508 个,拥有 1090 万位订阅用户。

出海的网红众多,为何是这三位成为前三名?尤其是李子柒因为商业纠纷停更“三年”,依然居于中国出海网红的第 一,地位至今无法被撼动。李子柒等人在海外传播取得成功,可被总结并一定程度

上可供复制的经验是什么?

李子柒在海外取得的成功曾引发了众多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对其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有学者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分析,认为李子柒通过拟古女性形象的“破”与“立”满足了外国观众对中国“田园美人”的想象;通过对自然风光国画底色的诗意描摹满足了其对中国“田园美景”的想象;通过展示新古典主义审美范式与东方精神的饮食文化满足了不同国家受众对中国“田园美食”的想象<sup>[21]</sup>。也有学者认为,镜头语言润物细无声、精耕短视频内容、传播视角生活化、深层文化的解构,这使李子柒的短视频满足了受众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赢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奠定了坚实基础<sup>[22]</sup>。也有学者指出,李子柒的视频之所以能够深受城市及海外人群的追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呈现的是“一种按照标准的田园梦所构建的拟像”,而非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sup>[23]</sup>。

基于三位代表性的网络主播视频内容的文本细读以及对于其视频下评论的内容分析,本文认为,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其取得传播和商业等成功背后的本质因由和理论逻辑。所谓的跨文化情感共同体是指,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主体间基于传播内容形成的共同或共通的情感体验。主要面向海外 Z 世代进行传播的网络主播们,他们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至少在视频内容的题材选择上、在视频制作的视听语言上以及在视频内容的传播视角上,契合了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而这些起初可能是探索性的策略又契合了 YouTube 的平台特色与算法机制,从而共同造就了这些主播的成功。

### 1. 内容选题:移情、反思与想象

排名前三位的主播的视频内容,如果提取其共同的关键词的话,即是美食。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以中国乡村为背景,将美食与传统文化、田园风光等相结合,而办公室小野则以办公室为空间背景,将带有创意性的美食生产与加工作为输出内容。可见基于日常生活的加工而进行传播,是其共同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流行文化、传统文化更感兴趣”<sup>[24]</sup>的研究结果。以美食、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以及最常见的办公室场景等为元素进行视频的生产 and 传播,迎合或契合了海外受众的想象、移情和反思。在选题内容上,从以下三个方面与海外受众的接受达成了一定的情感连接与共鸣。

第一,符合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异域想象,同时

又有一定程度的反叛与修正。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sup>[25-26]</sup>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事实,但中西方的文化隔膜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于彼此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以传统媒介的宣传为基础的想象层面,西方受众对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想象尤甚。李子柒等的视频内容基于美食,传达了一个基本上符合西方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异域东方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有完全符合西方想象的传统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的一面,这可视作对其想象的部分反叛或修正。由此,基于其已有的经验,结合视频的呈现,受众的心理和情感的接近与接受便得以达成。

第二,达成传递信息与建构意义之间的协商。李子柒、办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的信息传达是较为清晰的,因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会较少乃至消除其文化折扣<sup>[27]</sup>。然而,作为内容生产的意义建构与解读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原有内容及信息的完全框定。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基本呈现了一个可以预期但又有些不同的中国社会及其生活。受众的意义解读与建构基本建基于内容生产,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意义的增值,加大了对于内容所呈现世界的情感投入乃至认同。由此,内容生产与意义建构在海外受众间达成了正向的协商结果,而这又进一步促进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第三,情感带入与对现代性反思的内心契合。有学者认为,李子柒等的短视频之所以能受到海内外观众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恰是因为其切中了加速社会中现代人过度焦虑的痛点,并通过建立一种崇尚古风生活、维护传统价值的文化潮流和新情感结构,尝试为人们摆脱“现代性焦虑”提供一种新的途径<sup>[28]</sup>。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主体的没落、焦虑的增加、心灵的失据乃至精神的安放等,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物质可能极大丰富的Z世代所共同面临的困境。李子柒、办公室小野以及滇西小哥的视频内容,虽然是生活的现实呈现,但也是一种提纯和净化后的表演,更提供了一种纾解的渠道和问题解决的一种“理想”的途径。这种悠闲、缓慢又带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视频内容较为完满地契合了Z世代的精神需要,在情感上达成共识。

## 2. 视听语言:留白、写意与趣味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曾提出:“任何交流都表现为高语境、低语境或中语境。”<sup>[29]</sup>不同的传播语境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在高语境文化传播中,人与人在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含蓄

且内隐,往往是经过精心编码的,人们更加关注“语境”而不是“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双方要利用相应的背景文化知识以及情境处理信息,中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虽然霍尔的研究是基于语言的人际传播,但可据此将其开拓,来分析为何作为高语境的中国文化,可以在传播过程中达到低语境的效果,从而为海外的受众所接受?影像或视听语言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于人际交往语言表述的迂回与含蓄,也不同于虚构的相对复杂的影视作品需要一定的文化或知识储备,李子柒等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简单而直接,即通过视频表现某一食物生产加工的过程,这将意义的传输全部集中于“内容”,将“语境”基本只化约为中国这一符号。因此,海外受众在内容的接受和理解上不会存在障碍。而在此过程中,三位网络主播的视频内容生产,都使用尽量少的语言,而在视听内容上更多地以留白、写意、纪录的影像风格并加入有趣味的细节呈现,来表意传播。从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操作策略而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无疑是成功的。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因为地理环境的隔阂、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语言、传播技术等相互隔离,导致了社会习俗、宗教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sup>[30]</sup>。语言和文字交流曾在很大程度上为跨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过视频时代的来临,使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不同媒介形式的传播内容,实际上会极大地影响其传播者及受众的内容生产与消费的抉择。比如脸书的算法系统就不断地随着平台的发展而发展,由前期更倾向于促进信息在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传递,即所谓的“有意义的互动”<sup>[31]</sup>,变为现如今以用户为导向,“重视用户认为有价值的内容”<sup>[32]</sup>;而YouTube的“算法推荐并不追求真实、平衡或民主系统的健康,而是让人们在平台上花费更多的时间”<sup>[33]</sup>。这也是为什么三位主播在YouTube和脸书以及Twitter都同步发布了内容,而只有以视听内容为主特色的YouTube获得了最多的订阅数并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因由。

李子柒等视频形式的内容生产与YouTube的平台特质相吻合,平台的算法机制也使其用户黏性较高,这保障了视听内容的传播和接受。同时,三位主播对于视听语言的风格化运用,首先,降低了语言壁垒,比如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视频多以纪录为主,极少有语言解说;办公室小野的视频虽然有语言,但也

是为了增加趣味性,而不是为表意,受众对其内容的理解完全不需要通过语言的辅助。用内容的物质性且不需要转译的影像来具象化传播,以生成共通的情绪和情感。其次,影像对于网络主播们传播内容的符号化表达和视觉传播,不太会遭遇理解和认同的困难,可以最大化地降低文化折扣<sup>[34]</sup>,又由于视频内容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展演,使其意识形态解读大大降低。最后,运用有中国特色的影像记录语言,比如留白的、写意的。影像画面中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抓取和展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加放大这些元素的优点,将想象具化,从而产生浸润式传播的效果。这些都是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在形式层面必不可少的保障。

### 3. 传播视角:个体、非精英与性别

除了内容选题和影像语言的利用外,三位网络主播在进行对外传播过程中内容生产的传播视角的选取,也是其能够与海外受众建立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重要原因,而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在事实上的建构又是其取得成功的因由。详细分析三位网络主播的视频内容,可以析出三者视角的共性,即将个体、非精英与性别相结合的传播视角。

第一,个体而非集体或国家,且第一人称的传播视角,是三位网络主播都采用且最重要的视角。“个人作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赋予跨境信息以情感温度,具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优势。”<sup>[35]</sup>个体的生命探索和生活追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具身性和可借鉴意义,其鲜活性和真实感,是非个体视角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看到三位网络主播都是在最大程度减少设计感的基础上,进行个体生活的展示,这既便于海外受众理解,同时也能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受众的意识形态和传播偏见。

第二,三位网络主播的传播视角都是大众、平民化的,而不是精英化的。李子柒和滇西小哥的人物形象设定是村民,而办公室小野则是职场的小人物。这些基于真实身份的“人设”,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内容生产具有可信性,也让受众更容易接受内容。一方面,大众且平民化的内容生产并不具有很多需要知识解读的障碍,而大众且平民化视角下的内容生产应是海外受众更想更愿意看到的内容,这也反向地解释了其成功的因由。另一方面,非精英化的视角和三位网络主播的内容生产之间具有天然的匹配度,这看似一种自然而然的视角选定,实质上是一种必然的抉择。

第三,性别视角的运用。三位网络主播都是女

性,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偶然,而是因为女性视角与其内容传播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情感勾连性。在对外传播中,使用情感相关的因素要比不使用情感相关因素更能吸引海外受众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对于那些偏向人类情感和感性的信息,受众往往会第一时间注意到,并且在有相同的感受或经历时会产生情感共鸣<sup>[36]</sup>。而三位主播的内容生产在情感因素的使用上,恰恰凸显了性别的优势,从而展现了更加生活化的中国。

不过,传播视角并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而是个体、非精英和性别视角在视频内容生产交互过程中起作用。内容选题、视听语言以及传播视角共同交互所产生的跨文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化学反应是三位主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由。网络主播有其传播的个性和特点,这是其能取得成功且很难被取代的核心竞争力,同样也是为什么李子柒有众多中外的模仿者,而其虽然停更了三年也没有超越者的原因。除此之外,情感共同体建构的策略性元素可以综合利用,服务于未来网红出海,使更多成功成为可能。

## 三、个体与国家:两种逻辑的张力与协商

网络主播出海是其职业化过程中的平台抉择行为,而成为“网红”则是其最渴望达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声名与经济收益的双重实现。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因为出海网红的身份和内容生产都基于中国本土,天然地带有传播和形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功能与作用。有学者就认为:“在当前‘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秩序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形下,通过以普通民众为传播主体、以差异化个体叙事为传播内容、以社交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民间渠道来布局国家品牌的传播,将成为提升国家形象的突破口。”<sup>[24]</sup>社交媒体也被认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对传统媒体导致的负面看法起到纠偏的作用<sup>[37]</sup>,也可以纠正海外舆论,打造积极的国家品牌,有利于提升一国的正面形象<sup>[38]</sup>。因此,对于这些民间力量,有学者主张发挥其能量和作用,开展自媒体公共外交<sup>[39]</sup>,也有学者认为要将民间自媒体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补充<sup>[40]</sup>。

出海的网红本身就天然地带有对外传播的功能和作用。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对外传播主要是国家和社会团体发挥作用,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内容生产与传播为主的出海的网红,则是发挥这一功能

的又一主体之一。因此,他们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家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个体的出海网红及其所代表的民间群体,“中国”形象和对外传播体系与话语建构背后的国家和政府,以及传播所要面对的海外受众,三者间所演绎的关系图谱在跨文化传播与接受中存在潜在及或隐或显的张力。这表现在网红出海的目的是赚取经济收益,其本质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目的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从而争夺国际话语权,其本质是一种政治权力行为。二者之间的目的及本质不同,因而虽都传播国家形象、“讲述中国故事”,但其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 1. 基于市场逻辑的内容生产与流量变现

数字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所带来的应用转化往往被视为普通个体传播赋权的有效工具<sup>[41]</sup>,从而引发普通个体借之寻求自我展示、社会参与,分享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获取声名和经济收益。跨国平台的存在以及产业完善后,网红们可以将其内容交由专门的代理机构进行海外运作,进而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三位网络主播实际上就依循这一路线。最具代表性的李子柒,最先是在国内面向本土受众生产其视频内容,在做出一定的影响力后其团队委托海外有资质运营商葡萄子传媒集团(WebTVAsia)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该机构是YouTube首批认证的MCN合作单位之一,对李子柒的内容进行了符合平台系统需求的本土化运作,包括翻译、标注、内容分发等。

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子柒等现象凸显了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以下平台化特征:流量中心主义是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孵化更加去语境化和个体化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紧密互动,打造具有优质的观赏性、适度的时长以及丰富的情感动员能力的产品<sup>[42]</sup>。然而,网红们基于流量及流量变现的内容生产,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虽然短期可能产生一定的话题效应和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的角度而言,也可能出现一定的问题。

第一,按照流量逻辑,网红出海生产乡土带有传统文化意味的视频,最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有众多的网络主播们选择生产与李子柒相同类型的视频内容。因为全球市场蓝海的巨大,这些网络主播都多少可以分享一些视频生产的红利。然而,长久的、表征的“自我东方化”,也可能产生对中国及其社会更

深的“刻板印象”。这显然不符合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向海外展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追求。

第二,以网络主播为主的个体、民间的传播,缺少建制化的体制机制保障,如果商业逻辑未能理顺,则很难保证持续且高质量的传播。李子柒就由于商业上的纠纷,停更了三年多。虽然在停更期间其视频仍被播放,订阅用户数仍在增长,但停更后影响力和作用的发挥显然打了折扣。另外,个体、民间传播是基于“网红”个人形象及影响力的传播,因此对网红个人形象管理有着极高的要求。

第三,嵌入平台经济逻辑下的个体生产者面向海外国际社会展演中国生活,因可能遮蔽国家社会的真实图景,进而引发国际间认知疏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并不符合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与形象传播的诉求。

因此,如何尽量消弭其张力,更好地发挥民间群体作为传播主体的关键性作用,就成为国家在对外传播和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以李子柒为代表的职业内容生产者拥有优质内容的持续生产能力,因此,应鼓励更多的中国“网红”以市场化机制运作出海<sup>[43]</sup>。然而,如何在以市场化的机制实现出海的过程中,让国家起到调节作用或者与其进行协商,从而更好地完成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体系化争夺,就更考验政策制定和实施者的智慧;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基于什么目的、出发点为何、本质追求是什么,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实现这些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基于这一前提和基础,个体和国家间就有着巨大的协商空间。

### 2. 基于情感共同体建构的共同目标追求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个体民间的内容创作和传播与捆绑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建制化的官方媒体之间的内容创作及传播,应是各有侧重且为互补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对外传播两大媒介化力量,而前者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其作用和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或主流的媒体自然也可以借助海外的社交媒体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事实上,这也是众多国内媒体出海的现实性且成本较低的抉择。然而,官方媒体本身所带有的传播意图以及海外不同群体对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导致了其传播可能受限,因而效果的发挥就有可能受影响,比如最近有关TikTok将标记国有媒体账户并对官方媒体进行限流的报道<sup>[44]</sup>即为证明。基于此,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网红们的作用就更加凸显起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搁置乃至利用可能存在的

张力,强化个体和国家间的协商,并加大国家对网红们出海的引导和助力,以个体和民间的形式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最终达成国家话语权的争夺,似可作为一条对外传播的路径被重视和考虑。

李子柒等生产的视频内容有意无意所传递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从情感层面慰藉了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语境下人们普遍的对生活、工作乃至自然环境等的焦虑,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于东方异域的想象。这些慰藉、反思以及想象有着典型的均质化生产的特质,体现了比较典型的“东方化”和“自我东方化”。它一方面区别于西方,但另一方面又以整个东方为圈层,中国特质或中国场景并不必然为海外受众所关注,或者并不是其读解观看的关注点,这也是为什么李子柒在西方大火之后,越南等国家也会有相似的内容创作,甚至出现李子柒被误认为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的情况,以至于李子柒专门出视频澄清自己国籍。这也说明了,李子柒的成功,至少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其国族性的重要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那么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李子柒等的内容生产起到了情感动员的效果,与受众之间建立了情感纽带,最终让传播内容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意识形态观众间在社交平台上基于内容建立了跨文化的情感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基于人类对于共同生存、生产和生活的追求的反思和想象。在此过程中,这些生成于社交媒体的内容,既建构了一个乌托邦,也生成了一个异托邦。而这虽然不是国家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本质追求,但不失为一种有益且可资利用的资源,基于中国元素的众多内容的传播,即便其国族性并不见得为国外受众所重视,但随着内容和中国元素的不断沉浸式传播与接受,影响的发挥也会是潜移默化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作为个体的网红和国家达成其目的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国家手中。

中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落在具体的路径策略上,是要通过实践使其他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家形象,这其中有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认知。“讲好中国故事”不是单方面的输出或宣传,而是打破不同国家间文化壁垒,最大程度地建立文化亲近,而在此过程中,共情是机制也是桥梁,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最终建构则是达成目标的条件、基础与保障。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个体的内容生产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最为便宜的基础设施,也为官

方话语的民间运作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在国家层面对出海网红的孵化和助力上,韩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定可资借鉴的经验。韩国文化运动旅游部推行并由韩国文化信息院实际运行的“K-网红”(K-influencer)项目,针对的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白人网红的战略管理,它提供的培训、资助以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条件,招募网红以个体的身份对韩国进行传播;而网红们与国家政府的合作会实际转化为其国家形象传播和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资源<sup>[45]</sup>。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应该站在国家传播能力提升和话语体系建构的高度来赋能网红的出海,甚至如韩国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对象也延拓至海外的网红,将其纳入整体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体系,助力其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 结 语

情感与国际传播的结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情感转向,也渐成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其实践却并不新鲜,只是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和参与主体的多元,而呈现新的态势。有学者已经论证了当前国家形象传播情感回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sup>[46]</sup>,而更多的研究则将视野投向情感在国际传播中的具体运行机制的研究,挖掘当下跨文化传播中共情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实现从情感共情到认知共情再到联想共情的层级递升<sup>[47]</sup>。也有学者关注短视频生产过程中的语态,将共情作为面向国际的短视频生产的动力机制<sup>[48]</sup>。还有学者也关注了李子柒、滇西小哥等 YouTube 上的视频博主,将其统归为中国非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认为讲好中国非遗故事,仍需从在地文化场景、共享情感类型和共情内在机理三个方面进行反思<sup>[49]</sup>。已有的研究很好地发现了情感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机制,在跨文化传播内容生产中的引入和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效。

本研究将作为个体的网红出海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之一,将其放置在国际传播的国家战略开展和布局中,以期揭示其个体或民间的传播行为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张力和协商,力图为情感和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跨文化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是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够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取得传播成功的本质因由。基于此,个体和国家在国际传播中有达成共识的基础,也有互相成就的可能。而在此过程中,国家需要赋能出海的网红,助力其建构跨文化情感共

同体,而这也是社交媒体环境下国家达成对外传播目标的最优路径之一。

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构建,长久以来被视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责任,因此,将对外传播的战略具象化为更容易理解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国家而非个体的叙事,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传播范式<sup>[50]</sup>。对外传播或“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其实现的途径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大转变的情境下,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以出海的网红为代表的个体,也在此过程中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讲好全球化时代中华古老文明复兴、转型和创新的“中国故事”,将中国定位为“文化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过程中<sup>[51]</sup>,就需要国家创新性地利用其与作为网红的个体之间的张力,赋能个体或民间的国际传播,从而建立跨文化的情感共同体,最终以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达成在国际传播中能力及体系的建构。

#### 注释

①数据收集及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5月11日。②2024年11月12日以来,李子柒沉寂三年后,突然在包括YouTube在内的全平台更新了《奶奶的衣柜坏了,给她翻新了一下》《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等3个视频,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截至2024年12月12日,李子柒在YouTube共上传视频131个,订阅数为2100万。

#### 参考文献

- [1] 文建.把握国际话语权 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J].中国记者,2016(4):35-37.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4-35.
- [3] 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4):34-40.
- [4] 孙玮.技术文化:视频化生存的前世、今生、未来[J].新闻与写作,2022(4):5-14.
-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快手.网络主播新职业发展报告[R].2024:2.
-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R].2023:11.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发布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的通知[EB/OL].(2024-07-31)[2024-08-02].[https://www.mohrss.gov.cn/xgk2020/fdzdgnr/rers\\_4225/jnrc/202407/t20240731\\_523268.html](https://www.mohrss.gov.cn/xgk2020/fdzdgnr/rers_4225/jnrc/202407/t20240731_523268.html).
- [8] SENFT T M. Camgirls: webcams, live journals and 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 in the age of the global brand[D].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erformance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2005:1-58.
- [9] SENFT T M. Camgirls: celebr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 network[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25.
- [10]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男性气质:基于快手的数字民族志研究[J].社会科学,2021(6):179-192.
- [11] ABIDIN C. “Aren’t these just young, rich women doing vain things online?”: Influencer selfies as subversive frivolity[J].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2016(2): 1-16.
- [12] JERSLEV A. In the time of the microcelebrity: celebrification and the YouTuber Zoella[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 5233-5251.
- [13] ABIDIN C. Internet celebrity: understanding fame online[M].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14-16.
- [14] BAKER C, BAKER D. An Influencer’s world: a behind-the-scenes look at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and creators[M].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23:3-4.
- [15] 吴世文,杨小雅,冯铭钰.网红的历史长歌:网络声名的累积、流通与变现[J].传媒观察,2023(12):57-68.
- [16] 泰拉诺瓦.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J].杨荣均,曹秀娟,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1):53-69.
- [17]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J].国际新闻界,2021(12):53-76.
- [18] 熊奕瑶,董晨宇.作为“移民”的用户:社交媒体中的迁徙行为及其影响[J].新闻与写作,2020(5):56-60.
- [19] MADIANOU M, MILLER D.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3(2):169-187.
- [20] TANDOC J E C, LOU C, MIN V L H. Platform-swinging in a poly-social-media context: how and why users navigate multi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9(1):21-35.
- [21] 刘朝霞.第四消费时代的现代性反叛与田园想象:以李子柒海外走红为案例分析[J].现代传播,2020(9):60-67.
- [22] 傅婵妮,马玥,刘心怡,等.从李子柒系列短视频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2(2):80-85.
- [23] LI H. From disenchantment to reenchantment: rural microcelebrities, short video, and the spectacleization of the rural lifescap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 14:3769-3787.
- [24] 张昆,张晶晶.海外社交媒体用户原创内容中的国家品牌传播研究:以Twitter和YouTube上对李子柒的评论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1(2):67-76.
- [25] MCLUHAN M.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21-31.
- [26]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5: 34-35.
- [27] 喻国明.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J].新闻与写作,2020(3):62-65.
- [28] 曾一果,时静.从“情感按摩”到“情感结构”: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22-130.
- [29] 霍尔.超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0.

- [30]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5): 59-76.
- [31] LUA A. Decoding the Facebook algorithm; a fully up-to-date list of the algorithm factors and changes [EB/OL]. (2017-11-08) [2024-08-02]. <https://buffer.com/library/decoding-the-facebook-algorithm/>.
- [32] LANG K. Decoding the Facebook algorithm in 2024: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EB/OL] (2023-11-06) [2024-08-02]. <https://buffer.com/library/facebook-news-feed-algorithm/>.
- [33] LEWIS P. "Fiction is outperforming reality": how YouTube's algorithm distorts truth [EB/OL]. (2018-02-02) [2024-08-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feb/02/how-youtubes-algorithm-distorts-truth>.
- [34] HOSKINS C, MIRUS R. 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88(4): 499-515.
- [35] 任孟山, 李呈野.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新时代经验与可能路径: 李子柒爆红海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思考 [J]. 对外传播, 2020(1): 16-18.
- [36] 徐明华, 李丹妮. 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 "中国故事" 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 [J]. 现代传播, 2019(3): 38-42.
- [37] CHAVEZ M, HOEWE J. Reconstructing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an examination of U.S. Mexico border relations [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0(3-4): 181-190.
- [38] HARRIS B. Diplomacy 2.0: The future of social media in nation branding [J]. Exchange: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 2013(1): 1-16.
- [39] 相德宝.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 [J]. 当代传播, 2011(6): 98-101.
- [40] 冯海燕, 范红. 社交媒体环境下涉华新闻接触与对华态度: 基于在京外国人的实证研究 [J]. 现代传播, 2019(11): 151-157.
- [41] 柯兰, 芬顿, 弗里德曼. 互联网的误读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5.
- [42] 姬德强. 李子柒的回声室? 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破界与勘界 [J]. 新闻与写作, 2020(3): 10-16.
- [43] 张志安, 李辉. 海外社交媒体中的公众传播主体、特征及其影响 [J]. 对外传播, 2020(5): 7-10.
- [44] 鞭牛士. TikTok 推出新规则, 限制官方媒体账号影响力 [EB/OL]. (2024-05-24) [2024-08-0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890042073958699&wfr=spider&for=pc>.
- [45] LEE J, ABIDIN C. Oegugin Influencers and pop nationalism through government campaigns: regulating foreign-nationals in the South Korean YouTube ecology [J]. Policy & Internet, 2022(3): 541-557.
- [46] 张昆, 张晶晶. 动之以"情": 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 [J]. 中国编辑, 2022(11): 33-37.
- [47] 钟新, 蒋贤成. 跨文化共情传播机制探新: 基于孔子学院院长访谈的跨国比较研究 [J]. 东岳论坛, 2023(2): 49-61.
- [48] 何天平, 蒋贤成. "共情" 作为动力机制: 国际传播视野下短视频新闻的语态变革与情感化策略 [J]. 中国出版, 2023(12): 17-24.
- [49] 张龙, 蒋烨红, 康骏驰. 共情视域下中国非遗文化视频的国际传播 [J]. 当代传播, 2023(2): 45-49.
- [50] 刘瑞生, 王井. "讲好中国故事" 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2): 151-159.
- [51] 陈先红, 宋发枝. "讲好中国故事": 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 [J]. 现代传播, 2020(1): 40-46.

## Wanghong Going Global: The Content Gen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Communit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Generation Z

*Lv Peng*

**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platforms, more and more Wanghong are going global and becoming part of the "telling the story of China".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ir needs for individual profits and the country's needs for shaping the image of a peaceful rising country and building i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There 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in the content choices of video gen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visual-audio language, and in th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among the successful Wanghong going global with certain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cultural emo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content gen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ir success, and this is also the basis for negotiating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ension between Wanghong and the country.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Wanghong who have gone global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sample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ve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overall strategic framework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Wanghong to go glob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so as to empower the storytelling of Chinese stories among the public and individuals, and the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Wanghong; internet anchors; cross-cultural emotion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沐紫

# 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生态竞争优势与进化策略

严怡宁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艺形式,微短剧具有制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传播分众化等特点。凭借其独特形式,微短剧强势攻入海外市场,成功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成为一种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自由流通的媒介产品。从生态系统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微短剧的海外传播态势可见,微短剧的海外竞争优势来源于人性化进化逻辑、出海网文提供的海外传播生态资源、横竖屏互补构建的生态群落优势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构筑活跃受众生态等几个方面。但微短剧海外生态的发展仍面临挑战,需从强化内容供给、夯实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位竞争力,以平台生态系统思维推动内容共创、实现内容的商业增值,数智技术赋能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进化三方面优化竞争策略。

**关键词:**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竞争优势;进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67-09

2022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对网络微短剧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情节”、“具备制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传播分众化等特征”的“新兴网络文艺样态”<sup>[1]</sup>。作为移动网络媒介环境中诞生的新物种,微短剧这一兼具“微短”的轻体量和“剧”的强叙事双重特点的视听媒介,强势“入侵”影视行业生态系统,并迅速在海外市场打开局面。2022年8月以来,由中国公司推出的微短剧应用程序陆续登陆海外应用商店并取得亮眼表现。如截至2023年11月17日,ReelShort在iOS和Android上的下载量已超过1100万次,在2023年“双十一”期间,ReelShort一度成为美国排名第二、娱乐榜排名第一的应用程序<sup>[2]</sup>,被业界称作短剧“出海”元年开启的标志。微短剧以其独特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就成功跨越地域与文化界限,成为一种能够在国际

市场中自由流通的媒介产品,与海外受众建立起活跃的联系,并与当地社会文化不断互动交融。

## 一、微短剧海外竞争优势分析的生态学视角

在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是指“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通过彼此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学功能单位”<sup>[3]</sup>。生态视角也被引入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当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嫁接于媒介信息传播研究的学科,媒介就被视作“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生命’系统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对动态平衡”<sup>[4]</sup>。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社会的到来,各类边界被打破,各要素之间进一步联结形成复

收稿日期:2024-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23JZD0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面向Z世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23ZD012)。

**作者简介:**严怡宁,女,传播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081)。

杂的相互作用,更需要从生态网络入手,才能深刻理解媒介和传播的结构性革新,找准其演进方向。

媒介生态位的概念被引入用来阐述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学家奥德姆把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态,而这种位置和状态则决定于该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的行为。”<sup>[5]</sup>生态位揭示了每个物种都有其所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角色和贡献,只有当某个物种占据了与其生存需求最契合的生态位时,才能有效获取所需的生态资源,在长期的生态竞争中持续生存并不断壮大。从生态位的角度审视媒介发展,不难发现,每一种媒介都有其所在媒介生态环境中的最适宜生态位,占据正确生态位的媒介才能够获取竞争优势。

有学者根据生态学研究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四个层次,将传媒产业分为个体传媒机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同类传媒种群、不同传媒种群及其环境构成的传媒群落以及一定时空范围内共同存在的所有传媒及其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传媒生态系统<sup>[6]</sup>,并认为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深入研究传媒产业种群结构布局、传媒组织资源配置与传媒生态链循环等<sup>[7]</sup>。邵培仁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的六大原则:一是整体优化原则,尊重其“自然的有机整体性”,需要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念来研究媒介生态;二是互动共进原则,主张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协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携手并进;三是差异多样原则,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是生态动态平衡的重要标志和生态合理序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丰富资源生态位、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正确对策;四是平衡和谐原则,媒介发展及互动具有均衡性、协调性、互动性、融洽性;五是良性循环原则,要求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促进媒介生态系统传播要素之间和资源要素之间产生持久性的、连续性的、流动性的、有序良性循环;六是适度调控原则,媒介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性,单纯依赖自然调节必然产生一系列媒介生态问题,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寻求最佳媒介生态区域和生态位,不断开拓冗余生态位,合理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媒介生态系统潜力<sup>[8]</sup>。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化平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及管理视角的研究也更多从生态系统入手。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被提出,学者深入研究具有共同价值和共同进化关系的平台经

营方、互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sup>[9]</sup>。互联网平台的国际化战略研究聚焦也从企业竞争优势转向生态系统竞争优势,认为各参与方带来的互补性资产和分散式创新等资源以及生态系统各参与方的互补性结构及其正外部性,有利于平台出海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新的商业模式。

为更好地理解我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竞争优势,本文将从媒介生态视角开展综合分析,从人性化进化逻辑的海外传播生态位基础、出海网文提供的海外传播生态资源、横竖屏互补构建的生态群落优势以及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构筑活跃受众生态等四方面进行竞争优势分析,并从夯实内容供给、以平台思维提升内容增值和数智化生态变革三个维度提出优化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发展的竞争策略。

## 二、人性化进化逻辑构成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位基础

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媒介技术会慢慢地优化或者无限地接近人的要求或者尺度,越来越人性化,让人类通过媒介技术更为方便和便捷地传播信息,进行交流和沟通。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将沿着消弭时空障碍的方向发展<sup>[10]</sup>。作为诞生于碎片化消费时代的新型剧集形态,微短剧也展现出了对时间、空间条件的高度适应性。

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媒介的移动化发展趋势愈发显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用餐、通勤、排队等碎片化场景中,日益倾向于利用各类移动设备来满足多任务处理的需求。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看来,这种需要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的压迫感是由于现代人普遍感到“时间匮乏”,人们“被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以及对于‘不再能赶得上’的恐惧所打败了”<sup>[11]</sup>。在加速社会中,人们渴望通过短时间内强情感刺激的方式疏解压力,微短剧则完美匹配了这种对高效娱乐方式的追求,为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提供了量身打造的“情感快餐”。作为一种新型剧集形态,微短剧具备快节奏、强反转、“爽点”密集的特点,通过短时间内高强度的情感刺激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样是一分钟的时间,传统影视作品尚未完成片头播放,而微短剧已经为观众构建出引人入胜的悬念,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剧情戛然而止,观众的好奇心被瞬

时激发,好奇心和认知闭合的需求促使观众继续观看,以解锁完整剧情。在油管(YouTube)的微短剧专区下,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用户评论,如“我是被 Facebook 上的片段吸引来的”“我也是从 Instagram 找到这里的”等。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偶然间浏览到微短剧的投流广告,注意力能够因强情感刺激在极短时间内从社交媒体转移到微短剧上,而在随后的剧集观看过程中,不断反转的剧情设计和高强度的情感波动使观众的注意力得以维持,这种快速吸引并维持观众注意力的能力使微短剧迅速赢得了海外受众的青睐。

另外,微短剧还能够不受限于特定的空间条件,灵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其碎片化的媒介需求。根据保罗·莱文森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是对旧媒介缺陷的补偿<sup>[12]</sup>,任何媒介都有其固有的形式特征和内在偏向,有其优点,也有其局限,但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必然会修正或者克服旧媒介的不足和局限。在移动互联网媒介兴起以前,电视剧、电影等影视形态受到空间条件的严格规制,即人们只有在电视机、电脑前或在电影院里才能完整观看。而微短剧作为一种可以在移动端随时观剧的便捷的娱乐方式,有效弥补了旧媒介形式在空间灵活性方面的不足。比如很多受众利用乘坐交通工具、上下楼梯的过程就能完整观剧,获得以往不曾有的观剧体验,因而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随着全球传播走向“平台世界主义”,以 TikTok、Twitter、YouTube 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平台,消解了国际传播中传统的官方外交和精英话语格局,国际传播逐渐向个人化和碎片化过渡。作为顺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对现代社会时空条件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新媒介时代产物,微短剧是“平台世界主义”逻辑下全球传播适应人性化需求的新实践形式,它是符合媒介发展逻辑的经济产品,这使微短剧具备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属性,为其在海外市场发展构建了坚实的生态位基础。

### 三、出海网文提供微短剧 海外传播生态资源

媒介的生态资源是传媒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以信息资源为基础,媒介生态系统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美国战略管理教授杰伊·巴尼就强调,拥有具备价值性、稀缺性、

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sup>[13]</sup>。这些资源可转化为能力,是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

中国微短剧的海外传播正是获得了已经成功走向海外的网络文学的充分资源供给并有效实现视频化的能量转换,从而形成了在海外市场独特的竞争优势。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已超 40 亿元,海外原创作品数量超过 62 万部,海外访问用户突破 2.3 亿<sup>[14]</sup>。中国网络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积极探索“网络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路径,其海外传播经历了从翻译、阅读中国网文到模仿中国网文的变化,实现了网文 IP 全业态传播,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网文出海已经从单纯的作品出海转变为生态出海<sup>[15]</sup>。通过网文市场的前期开发,中国公司拥有了大量适合二次开发的 IP 版权,为微短剧本改编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形成了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重要资源基础。著名网文企业中文在线的海外子公司枫叶互动推出短剧应用软件 ReelShort 前,就曾打造 Chapters 和 Kiss 两款阅读应用。其中,2017 年推出的 Chapters 已经进入全球将近 110 个国家,覆盖 16 个语种。目前 ReelShort 的核心人员都来自 Chapters 团队,他们负责从网文素材库中选出能够打造为“爆款”的 IP 和桥段,再进行改编<sup>[16]</sup>。事实证明,在微短剧的传播生态中,“视频化网文”的能量转化效果明显,ReelShort 平台推出的《命中注定我的禁忌阿尔法》(*Fated to my Forbidden Alpha*)和《千万不要和隐秘的亿万富豪女继承人离婚》(*Never Divorce a Secret Billionaire Heiress*)都成了北美爆款短剧。

总体来看,中国微短剧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网文平台上积累的数据资源,精确选出留存好、变现力好的作品来进行影视变现。通过爆款网文 IP,微短剧平台充分了解当地用户的习惯和偏好,网文市场所揭示的巨大市场需求也给企业带来进一步将网文进行视频转化的信心。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先锋力量,网络文学为中国微短剧出海提供了获取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当前,微短剧出海已经形成了从网文到微短剧的生态链路:一方面,网文为微短剧提供剧本改编创作的资源池;另一方面,微短剧帮助增强网文 IP 的海外影响力。生态链路内的良性互动为中国积聚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原始资源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微短剧生态系统中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网络文学已成为促进微短剧海外生态系统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资源。

## 四、横竖屏互补构建微短剧 海外传播群落

从媒介生态来看,同一生态位需要避免高度重叠,以免恶性竞争,影响媒介生态健康。生态位重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位相似的物种生活于同一时空中分享或竞争共同资源的现象,在生物群落中,多个物种取食相同食物的现象就是生态位重叠的一种表现<sup>[17]</sup>。从中国微短剧出海来看,原主流长视频平台先行出海的横屏短剧和微短剧海外应用程序后来居上的竖屏短剧,在海外市场各有特点,互补协同,避免了同一生态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或投入产出比降低,从而有利于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群落的健康发展。

### 1. 横屏制作精良追求长剧水准,竖屏低成本追求爽感刺激

横屏微短剧主要是由原先主流长视频平台出品,长视频平台是中国网络微短剧的出海先驱,以爱奇艺、优酷、腾讯等为代表的国内头部视频平台都在海外版应用程序(爱奇艺国际站 IQIYI、优酷海外版 YOUKU、腾讯视频海外版 WeTV)和油管上增设了微短剧板块。这些微短剧的剧集体量通常被缩减到30集以内,单集时长控制在15分钟左右,就好比是长剧的加速版,虽然剧集体量缩小,但视听语言和叙事水准都向长剧靠拢。横屏微短剧以“爱情”为叙事核心,通过在现代、民国、古代等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爱情故事的讲述,展示中式爱情美学。在延续了长视频的横屏拍摄方式后,该类微短剧除了注重对人物的刻画,还特别突出横屏画幅中的场景呈现,整体制作追求精良效果。

竖屏微短剧主要由网络文学公司、影视制作公司等布局的海外微短剧客户端推出,发展迅速。2022年8月,中文在线旗下子公司枫叶互动(Crazy Maple Studio)在海外率先推出竖屏短剧应用程序 ReelShort,国内其他平台紧随其后,纷纷在海外推出微短剧应用程序,包括点众科技的 DramaBox、新阅时代的 GoodShort 等。海外应用程序上发布的竖屏短剧拍摄形式与短视频相似。相较于传统的横屏拍摄,竖屏拍摄对故事背景、场景搭建、氛围处理等方面的要求不高,拍摄重点在于对人物的打磨与刻画,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对话和情感冲突,通过对角色互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推进情节发展<sup>[18]</sup>。竖屏短剧的拍摄成本相对较低,剧集体量也小,一部剧通常被

剪辑为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单集时长在1分钟左右,通过短时间内高强度的情感刺激吸引观众。在内容叙事上,竖屏微短剧同样以“爱情”为叙事主旋律,同时融入“霸道总裁”“甜蜜复仇”“先婚后爱”等网络文学中备受追捧的爽文元素。作为“加长版的短视频”,成本较低、制作周期更短的竖屏微短剧迅速抢占海外市场份额,增强了海外观众对中国微短剧摄制方式的认知与适应,进而逐步拓宽中国影视作品的受众范围,为未来竖屏微短剧在全球传递中国价值观的精品化发展之路做了很好的铺垫。

### 2. 横屏占据东南亚微短剧生态位,竖屏布局北美传播生态

在海外市场的选择上,长视频平台的横屏微短剧以东南亚市场为主要发力点,利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文化接近性”,积极输出国内制作的微短剧作品。而在传播策略的制定方面,鉴于中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国家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折扣较低,观众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理解障碍较小,平台方普遍采取“国内制作+译制字幕”的投放方式,通过给国内现成的微短剧资源添加外语字幕,实现内容的快速投放和市场的迅速占领。与东南亚市场截然不同的是,长期以来,北美流媒体市场竞争激烈,Netflix、Disney+、HBO Max、Apple TV+等本土平台为获取市场份额提供大量高质量、多样化的视频内容供观众选择,传统的横屏视频市场已趋近饱和,因此,中国长视频平台选择了一条迂回的海出路径,即先从亚太市场开始,在占领东南亚微短剧生态位的基础上再逐步拓展全球市场。

与横屏微短剧不同的是,竖屏微短剧在 Tiktok 于北美取得巨大成功,在显示北美市场对竖屏短视频产品极高接纳度之际,迅速占据海外短视频生态位,强势布局长视频平台久攻不下的北美市场。如果说以 Netflix 为代表的流媒体巨头为海外观众提供了如“豪华套餐”般的优质影视作品,那么这种“剧情土味”“表演夸张”的短剧作品,如同别具一格的“风味小食”,为北美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观赏体验,迅速赢得受众青睐。

### 3. 横屏微短剧扎根中国文化,竖屏内容突出海外本土化

横屏微短剧背靠长视频平台,作为“精练版的电视剧”拥有更为优质的资源配备和更加充足的经费保障,以精品化内容见长,在题材选择上更加贴近中国文化,视频制作也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带有鲜明传统文化印记的古装爱情作品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腾讯 WeTV 在 YouTube 上传的微短剧《我的医妃不好惹》(*I Have a Smart Doctor Wife*) 为例,这部古装穿越剧上线 9 个月,总播放量达 231 万次,在评论区中,观众除了对演员的颜值和演技表示赞赏,还对剧中出现的中国食物表达了喜爱之情,如“传统中国食物看起来真好吃,看完就馋了”“中餐非常好吃,剧中出现的麻婆豆腐是我的最爱之一”等。

竖屏微短剧在其北美主阵地则突出了对本土观众审美偏好的迎合,最明显的是在内容创作的过程中基于中国短剧叙事模式,融入了“狼人”“吸血鬼”“龙族血统”等西方文化元素,在 ReelShort 的 7 部主页推荐剧中就有 3 部是狼人题材。此外,在演员和制作团队的选择上,竖屏微短剧也展现出鲜明的“本土化”再造特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选用海外演员、外籍编辑以及当地团队来执行拍摄与制作已成为主流做法。尽管故事的内核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但到了其他地域却被赋予当地的面貌,展现出一种当地化的土味,从而避免产生文化上的障碍<sup>[19]</sup>。罗兰·罗伯逊阐释“全球本土化”时认为,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同时,总是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sup>[20]</sup>。竖屏微短剧平台主动对内容进行“本土化”转化,充分考虑海外受众需求,表现出对他者文化的尊重态度。从他者出发的北美“本土化”尝试,成功拉近了与当地观众的距离,有效帮助微短剧破解“局外人劣势”。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竞争环境的改变,传统意义上“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模式已经

逐渐让位于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竞争格局。在这种新的发展生态下,“非零和竞争”成为主导,它强调通过合作与共享资源来寻求竞争优势<sup>[21]</sup>,而非单纯地对抗和消灭对手,这样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免快速提升内容生产资料成本以及消耗用户对同类型内容的兴趣。竞争各方通过不断努力获得一定竞争优势后,在总体竞争格局下,谋求一定时期内无须直接正面冲突的市场份额,各得其利,共存共荣,形成“强弱并存、数强共荣、相互渗透、共得稳定”的“相容性竞争”模式<sup>[22]</sup>。

在微短剧海外市场中,横屏微短剧和竖屏微短剧并存、优势互补的现象,正是这种“竞合”生态的生动体现。

结合前文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横屏和竖屏微短剧在发展策略、内容呈现、制作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各有特色(见表 1),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圈层的用户需求和习惯。横屏微短剧利用其画面优势,吸引对视觉体验要求较高的用户,同时利用文化接近性向东南亚市场输出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而具有更强便捷性和互动性的竖屏微短剧,则服务于用户的移动场景,满足其碎片化媒介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本土化”策略率先打入传统横屏模式久攻不下的北美市场。横屏、竖屏微短剧强强联动、共存共荣,形成了以东南亚和北美市场为主要发力点、逐步向全世界扩展的生态格局。二者目前相互合作、资源共享的趋势也越发明显,将进一步壮大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生态群落,推动微短剧海外市场的繁荣发展。

表 1 横屏、竖屏微短剧特点比较

类型	发展策略	内容呈现	剧集体量	制作方式	主要市场	代表平台	叙事核心
横屏微短剧	精品化 中国传统文化 是重要资源	精练版的电视剧 兼顾人物和场景	30 集以内 单集时长 15 分钟左右	国内制作+译制字幕	东南亚	IQIYI YOUKU WeTV	爱情
竖屏微短剧	本土化 西方文化元素 是重要资源	加长版的短视频 更注重人物刻画	几十集到上百集 单集时长 1 分钟左右	国外本土演员+ 海外拍摄	北美	ReelShort DramaBox GoodShort Flex TV	

## 五、海外社交媒体连接用户 构筑活跃受众生态

受众资源是媒介生态赖以发展的营养来源,中国微短剧出海传播借助社交媒体对用户的连接性,引入、留存受众,并通过引导内容共创增强用户黏性、促进创新优化,同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上虚拟社

群的构建促进凝聚力、打造强关系,从而得以拓展生态价值。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免费分享资源,是微短剧平台引入海外观众、形成产品印象的重要策略。常见做法是将剧集的前一部分免费投放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如 ReelShort 就在 TikTok 上传了其爆款短剧《命中注定我的禁忌阿尔法》的前 20 集。在上传后 8 个月时间里,该剧在 TikTok 上的单集最高播放量

已突破3000万,引发了观众的热议,评论区中诸如“我想看更多”“在哪里可以看到全集”的评价屡见不鲜。通过官方平台在评论区的巧妙引导,观众得以自然而然地被引流至微短剧平台。这一做法确实有效增强了中国微短剧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社交媒体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场所,更为中国微短剧在海外市场品牌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渠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中国微短剧所特有的故事情节、制作手法及文化元素得以被更多的海外观众所接触和认知,使得海外观众提及微短剧时,他们脑海中呈现的是中国微短剧的特定形象。这种“品牌联想”的形成,在海外观众心中塑造了中国微短剧独特且鲜明的品牌形象,有助于构建“基于品牌崇拜建立了结构化社会关系的特定的、不受地域限制的社交群体”<sup>[23]</sup>,从而初步聚集起对中国微短剧品牌形成认知和喜好的用户。

此外,微短剧公司还利用TikTok、Instagram、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搭建了用户沟通交流平台,增强了用户的反馈互动。首先,微短剧公司积极发布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精准算法推荐机制更有效地触达潜在观众群体。以ReelShort的Instagram账号为例,截至2024年3月,该账号累计发布了720篇帖文,成功吸引了97.5万名粉丝的关注。其次,通过社交平台,微短剧公司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激发观众的主体性,通过互动式参与增强受众黏性,同时也加强了内容共创,优化创作。2024年3月5日,ReelShort发布了一则互动帖文,邀请观众从三部提名剧集中选出自己最为喜爱的一部,观众纷纷响应,在评论区积极提名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剧集。在这一过程中,用户通过评论分享自己的想法,并与其他观众进行交流讨论,获得认同感和参与感,进一步增强了用户与微短剧间的情感连接。同时微短剧平台也借此更好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喜好,为内容创作提供了数据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内容的吸引力和共鸣感。可以看到,微短剧公司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的受众生态有利于强化与受众的联系,而且社交媒体用户的反馈能够迅速汇集并反作用于微短剧创作生态,为微短剧应用程序的优化和内容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有助于构建一个充满活力、持续进化的生态系统。

另外,海外社交平台上形成的中国微短剧社群更进一步强化了受众情感连接,通过强关系的构建帮助实现微短剧生态系统的价值扩展。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首次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即一

群主要通过网络彼此沟通、讨论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充分的感情,分享某种程度的信息与知识,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个人关系网络的社会集合体<sup>[24]</sup>。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纽带在群体和社区中的黏合性逐渐减弱<sup>[25]</sup>,以“共同趣味”为基石的趣缘群体却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并在虚拟社区中迅速聚集,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更新与重塑。在数字全球化时代,微短剧为受众开拓了以趣缘为纽带的沟通渠道,拥有共同观看兴趣与娱乐需求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彼此的感受和看法,从而建立起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虚拟社区。在“美国版百度贴吧”Reddit上,用户通过发帖、评论、点赞的方式对中国微短剧的情节内容进行讨论,分享自己喜欢的微短剧片单,共享微短剧观看资源。这种基于共同兴趣图谱的自发交流分享行为,使用户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和得到认可的成就感,进一步加强对社群的情感依恋。社群成员因情感共鸣、兴趣相投和价值认同而在线上聚集,通过信息交互实现的情感传播维系着社群的活跃与持续发展。随着成员与社群情感连接的不断加深,又进一步推动社群壮大,进而形成社群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社群组织的形成,能够帮助消除海外用户交往的时空障碍,促进海外观众的高互动和强关系链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实现微短剧生态系统的价值延伸。

综上所述,中国微短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海外成功构建了良性的受众生态,免费分享资源能够有效引流,微短剧公司主动构建的沟通平台进一步培养用户黏性和忠诚度,用户以“趣缘”为纽带自发形成的虚拟社群则进一步强化受众的凝聚力,完成传播生态的价值延伸,从而构建了活跃且持续进化的受众生态。

## 六、微短剧出海生态进化策略

2024年上半年出海短剧平台总流水已突破2.3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达到4亿美元<sup>[26]</sup>。业内人士则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sup>[27]</sup>。利用自身生态位优势,中国微短剧产业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与发展潜力。但作为一种新兴生态,微短剧海外传播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内容质量不够高、同质化趋势愈发明显、生态协同模式不够完善等诸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不

仅制约了微短剧的市场潜力,更对其未来长远发展产生隐患。为促进微短剧海外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改进与探索。

### 1. 强化内容供给,夯实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位竞争力

内容是影视作品传播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微短剧作为影视传播的一种新兴形式,其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主要依赖于内容的质量。当前,微短剧在海外传播中面临的生存竞争尤为激烈。从行业外部来看,一方面,需要应对 Netflix 等流媒体巨头的强势挑战,这些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丰富的资源积累和深厚的行业积淀,在影视制作领域具备显著优势;另一方面,短视频、播客等平台也在抢占碎片化消费时代“等待经济”的重要生态位,通过提供小体量内容满足观众的即时需求。从行业内部来看,资本、平台和专业制作方不断拥入,微短剧的制作运营逐渐规模化,对内容的要求不断提升,微短剧出海早期阶段出现的盗版、翻拍、AI 换脸等非正规做法已被行业竞争所淘汰。因此,面对外部竞争者的左右夹击和行业内部的强劲挑战,微短剧海外生态要想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根本出发,将提升内容质量、加大创新投入作为其核心战略。

从当前微短剧内容生态看,一个较明显的问题是不同文化区域差异化的体现还不够充分。中国出海微短剧的类型主要集中在面向女性观众的爱情题材。虽然同样是以爱情为主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内容偏好大相径庭。目前在东南亚市场,强制爱、契约婚姻等题材最受欢迎,这类题材中体现的东方文化中的“娇妻”“小白花”等常见设定却不符合欧美观众的女性观和爱情观,在欧美市场往往会“水土不服”。因此,微短剧的内容创作需要进一步突出“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策略,通过深入发掘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文化底蕴、审美习惯与情感需求,创作出更具本土特色、更贴近目标受众心理的作品,有效提升内容质量,增强微短剧海外传播效果。

微短剧内容生态另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过度追求“爽感”剧情对价值导向和内容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爽感”作为微短剧在短时间内产生强烈戏剧冲突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内容层面承袭了网络文学创作的基本逻辑,以确保观众能快速从中获得强烈的情感体验。然而,过度追求“爽感”、罔顾正确价值导向的急功近利式情节安排,往往会适得其反,对微短剧海外生态健康发展构成威胁,甚至会形成生态污染。目前,海外微短剧市场中已经出现了一

些价值观扭曲的劣质作品。例如,油管上一些关于婚姻故事的中国微短剧,里面有男主婚内虐待女主、女主与之离婚后二人又破镜重圆的情节。观众对这些情节往往不解和质疑,评论区中诸如“为什么虐待女人的男人没有被逮捕”“他难道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之类的留言,反映出观众对于传递错误价值观剧集的强烈反感。因此,要提升微短剧质量,必须加强内容把关,坚决不能让“三观”为“爽感”让路。对于涉及性别歧视、暴力虐待等错误价值导向的剧集,应实施严格审查,坚决清除此类劣质作品,同时应进一步建设微短剧生态的监测和调控系统,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洁净和安全。过度追求“爽感”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微短剧内容的严重同质化,会带来生态位的高度重叠,从而消耗观众资源。“霸道总裁爱上平凡少女”“被未婚夫抛弃后归来复仇”“契约婚姻却萌生爱意”等网络文学中常见的情节套路,在微短剧中被不同的外国演员演绎并投放到海外市场,虽然有些增添了“狼人”“吸血鬼”等西方元素,但其核心叙事逻辑和情节走向并没有太大变化。同质化内容的大复制,极易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不利于微短剧在海外的长期发展。

综上所述,微短剧的内容生态建设必须作为海外传播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抓手。就资源配置而言,应对内容创新加大投入倾斜力度,以国外受众可接受的文化阈值为限度进行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开发与创新传播,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积极文化因素,打造既具有文化底蕴又符合国际潮流的精品微短剧作品。尤其需要针对不同文化区域,发掘中华文化与该区域的文化结合点,进一步形成区域定制化的微短剧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鼓励和培养了解两国文化的内容创作者,建立此类内容的创作蓄水池,以保障微短剧海外传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源供给。

### 2. 以平台生态系统思维推动内容共创,实现内容的商业增值

平台生态系统强调跨产业的多元网络生态经济圈,生态主体不断寻找扩大相互支持的参与方,通过建立网络系统,吸引多种角色成员加入,最终实现生态系统的自我演化与成长。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发展也需要具有这样的思维,通过跨界跨产业融合推动内容共创并实现内容的商业增值。

第一,深度挖掘内容 IP 价值,推动微短剧跨物种内容生产能够给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源源不断注入活力。全媒体时代,长剧、微短剧、短视频、互动

剧、网文、游戏等多种内容类型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消解,共同构成了多元互补的文化生态网络。通过将IP作为文化生态中的核心资源,推动微短剧与网文、游戏、长剧等文化内容之间的深度融合,将构建出一个跨界IP共创的全新格局。这种共创模式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内容生产的壁垒,还能通过资源共享与互动反馈,进一步推动内容的创新与迭代,为微短剧产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进一步来说,还可通过在同一IP下进行以中华文化为内核的多维度内容生产创作,增强IP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打造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IP标识。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在全球化背景下传递中国价值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第二,探索“微短剧+”模式,进一步赋能微短剧内容拓展和创新。以平台生态系统思维进行产业联动能够大大促进内容共创,同时还能叠加商业生态从而实现内容增值,其中“微短剧+文旅”“微短剧+电商”等模式都可以积极尝试。2024年1月,国家广电总局提出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主题优秀微短剧,结合重大考古工程、取材非遗故事、围绕城市漫步线路、聚焦乡村振兴等。通过将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融入微短剧,出海微短剧可以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多元文化魅力,大大提升微短剧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当然,这样的产业联动也能够切实促进中国文旅资源的海外推广,为中国的文旅产业带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优化整体国际传播生态。除了“微短剧+文旅”,“微短剧+电商”的发展模式在国内也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路径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微短剧内容获得更多传播平台,内容的商业价值也得到拓展。例如,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都入局“微短剧+”生态,开始嵌入微短剧内容。2023年“双十一”前夕,淘宝定制了《惊奇物语》《贵妃驾到通通闪开》《红娘小仙要恋爱》等多部微短剧。在海外微短剧传播生态的进化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与跨境电商开展内容共创、资源共享、业态互补,实现跨平台联动,并形成微短剧和跨境电商的新模式。总而言之,“微短剧+”模式通过将微短剧与多个领域进行深度结合,为微短剧生态位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商业增值机会。未来,微短剧可以继续深化与国际文娱、体育、游戏等领域的跨界合作,在内容拓展创新的基础上延伸多维商业生态,既能够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体验,又能通过商业增值实现

微短剧海外传播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3.数智技术赋能微短剧国际传播生态进化

技术发展是媒介生态演变的核心动力,当今发展迅速的数智技术将进一步撬动微短剧国际传播的生态变革。技术赋能的微短剧将在生产制作、资源转化、多元主体交互、受众体验、传播方式等各方面催生多元创新,从而引发生态进化。探索数智技术赋能的微短剧发展新模式,将有利于中国微短剧企业在国际市场塑造独特的文化竞争优势,推动微短剧生态繁荣发展。

第一,积极推动发展迅速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运用于剧本开发与内容创作,这将有效降低制片成本、提升创作效率,帮助解决传统创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目前,作为微短剧行业先行者的快手平台已经意识到AIGC技术的潜力,积极与头部团队合作,联合制作了首部AIGC短剧《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为AIGC技术在微短剧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当前真正依靠AIGC技术进行全流程制作的作品还相对较少,对技术的应用仍处于探索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应用深入,未来微短剧行业还可以通过将AIGC技术融入剧本创作、角色设计、场景搭建等各个环节,为国际受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也会进一步激发新型的多主体内容共创模式,从而扩大中国微短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第二,通过各类数字技术的智能融合来进一步丰富拓展微短剧生态。在微短剧创作中综合运用4K高清技术、AI动画、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前沿技术,能够强化多视角叙事,增强微短剧的互动感和虚拟性,不仅可以为全球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元、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同时也会在技术生态层面进一步打破微短剧与游戏、互动剧、数字展览乃至游乐园的界限,形成全新的体验场景和数字消费形式。2023年8月,蓝色光标自创的首部博物馆题材虚拟短剧《步天歌》上线。剧中,虚拟人苏小妹化身元宇宙星官,围绕古代神秘星象图与一件件文物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宇宙冒险之旅,上演了虚拟现实版“星际穿越”。未来,微短剧可以进一步融合数智技术实现更具突破性的跨界创新,为国际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视觉盛宴和意想不到的消费体验。

#### 参考文献

[1]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网

- 络微短剧管理 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 (2022-12-27) [2024-07-16]. [http://www.nrta.gov.cn/art/2022/12/27/art\\_113\\_63062.html](http://www.nrta.gov.cn/art/2022/12/27/art_113_63062.html).
- [2] 胡毓靖. 中式霸总征服世界, 短剧出海谁能淘到真金? [EB/OL]. (2023-12-26) [2024-07-16].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585113.html>.
- [3] TANSLEY A G.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J]. *Ecology*, 1935(3):284-307.
- [4] 邵培仁.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 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135-144.
- [5] 柯艺. 媒介融合下的媒介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J]. *编辑学刊*, 2019(6):115-120.
- [6] 张昆. 传媒产业发展研究的生态学进路: 兼评《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 *新闻与写作*, 2019(11):61-64.
- [7] 董紫薇. 构建传媒生态圈: 全媒体时代的融合转型新路径[J]. *现代视听*, 2019(7):5-10.
- [8] 邵培仁. 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则[J]. *新闻与写作*, 2008(1):32-36.
- [9] ADNER R, KAPOOR 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3):306-333.
- [10] 韩韶君. 媒介环境学视阈下出版企业知识服务发展逻辑[J]. *中国出版*, 2019(12):37-40.
- [11] 王青. 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10-18.
- [12] 刘战伟, 包家兴, 刘蒙之. 摄像头下的亲人: 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J]. *新闻界*, 2023(12):52-65.
- [13]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99-120.
- [14] 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EB/OL]. (2024-02-27) [2024-07-16]. [http://literature.cass.cn/xjdt/202402/t20240227\\_5735047.shtml](http://literature.cass.cn/xjdt/202402/t20240227_5735047.shtml).
- [15] 张富丽. 从作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现状[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3(2):75-81.
- [16] 石晗旭. 中国“霸总”出海后, 好莱坞有点急了[EB/OL]. (2023-12-18) [2024-07-16]. <http://www.inewsweek.cn/finance/2023-12-18/20819.shtml>.
- [17] 叶光辉, 彭泽, 李松焯, 等. “能”与“势”: 生态学与物理学交叉视角下的跨学科知识交流动力模型研究[J]. *情报学报*, 2024(6):644-657.
- [18] 刘俊. 微短剧, 吸引人更要留住人[N]. *光明日报*, 2023-04-12(13).
- [19] 谢盼盼, 童笑雨. 文旅年终观察: 微短剧出海, 靠的是啥?[EB/OL]. (2023-12-29) [2024-07-16].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2023/12-29/10137500.shtml>.
- [20] 窦书祺, 赵永华. 全球本土化与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J]. *中国出版*, 2024(2):9-14.
- [21] 叶芳. 金砖银行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 基于互补性竞争的视角[J]. *亚太经济*, 2017(3):169-176.
- [22] 谢伟良. 相容性竞争与市场区隔[J]. *航天工业管理*, 1994(12):22-24.
- [23] MUÑIZ A M, O' GUINN T C. Brand community[J].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1(4):412-432.
- [24] 叶国萍. 虚拟学习社区的技术支撑及发展前景[J]. *中国电化教育*, 2008(12):108-111.
- [25] 罗自文. 网络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模式研究: 基于6个典型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4):101-111.
- [26] 点点数据. 2024年上半年中国短剧出海—市场洞察报告[EB/OL]. (2024-11-01) [2024-11-04]. <https://www.diandian.com/reports/QMeICpMB-bY-3ryIO90Z>.
- [27] 杨翔菲. 行业热议微短剧出海 预计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亿美元[EB/OL]. (2024-03-29) [2024-07-16]. <https://news.cnstock.com/news/bwxx-202403-5212608.htm>.

##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icro-drama: Ecologic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volution Strategy

Yan Yining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form of online cultural product, micro-drama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production cost, lightweight content, and niche dissemination.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form, micro-drama has entered the overseas market and successfully crossed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becoming a media product that can circulate fre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of Chinese micro-dramas from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t is shown tha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icro-dramas come from the logic of humanistic evolution,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provided by globalized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advantages constructed by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creens, and the ecological advantages of connecting users with oversea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construct an active audience ecology, etc.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ecology of micro-dramas still faces challeng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in three aspec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content, promoting the co-creation of content to achieve the added commercial value with the model of platform ecosystem, and empower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 words:** micro-drama; overseas dissemination; ecologic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volu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 沐紫

## 《中州学刊》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守正创新是学术研究根本任务之一,学术期刊作为最新科研成果和文化思想的重要发布平台和传播载体,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部署:“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45年来,《中州学刊》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成为发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州学刊》铸牢理论研究之本,拓展理论传播之维,推进学术争鸣,激发思想智慧,以兴盛文化为己任,自觉承担繁荣文化之重任。

### 《中州学刊》应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在学习宣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24年11月29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州学刊》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指导,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精心策划选题,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拓展学术研究之域,臻善体系构建之法,提炼概括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概念、学术范畴。要集中展示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 《中州学刊》应自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平台

哲学社会科学平台创新是实现社科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基础条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

《中州学刊》应紧扣时代发展需要,聚焦社会大问题,搭建作者大团队,形成高质量大成果的“新基建”,自觉成为构建学科协作、理论成果传播、开放合作的创新平台。引领学术创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和最前沿,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统筹全国优秀专家学者开展开放式、系统化、穿透性研究,深入跨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打造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平台,不断壮大哲学社会科学新质科研力。

### 《中州学刊》应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智慧的知识体系。

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的重要经验、成就、思想、观点等进行学科化整合、学理化阐释,系统提炼总结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构完整知识理论体系,以既往研究为基础,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融学术资源、学术交流、学术传播、学术创新于一体,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构筑开放包容的学术共同体,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执笔:李丽)

# 《中州学刊》2025年重点选题方向

## 政治与党建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数智时代国家治理的前沿问题研究
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4.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研究
5. 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
6.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 经济理论与实践

1. 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2. 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研究
4.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研究
5. 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 “三农”问题聚焦

1. 加强农业强国建设研究
2. 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研究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研究
4.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研究
5. 加强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研究

## 法学研究

1. 民法典实施过程中司法解释研究
2. 新质生产力法治保障研究
3. 数智时代算法法律规制研究
4. 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权属问题研究
5.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1. “第二个结合”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
2. 城乡融合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研究
3.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基本原理与价值导向研究
4. 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养老体系构建研究
5. 健康中国视域下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研究

6. 面向教育强国的教育转型发展与政策优化研究

## 伦理与道德

1. 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
2.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及其当代转化研究
3. 应用伦理与社会热点伦理问题研究
4. 数智时代的道德建设研究

## 哲学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研究
2. 易学道家研究
3. 宋明理学研究
4. 中国哲学中身体修养与心灵安顿问题研究
5. 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再阐释
6. 数智时代的中国哲学

## 历史与文化

1. 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2.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
3. 中国古代制度体系建设与制度实践研究
4. 中国古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5. 华夏文明研究

## 文学与艺术研究

1. 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 文论传统与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3. 文明互鉴与百年中国新文学研究
4. 算法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5. 新媒介文艺中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6.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表达研究

## 新闻与传播

1. 新时代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研究
3. 媒介文化与技术变革研究
4. 媒介深度融合下的乡村传播研究

# 中州学刊

(月刊 1979年创刊)

主管主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中州学刊》编辑部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邮政编码 451464  
电 话 0371-63836785  
网 址 <https://www.zzxk1979.cn>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河南省邮政发行局  
邮发代号 36-118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M82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075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1006/C  
国内定价 15.00元

投稿网址 <https://www.manuscripts.com.cn/zzxk>

各学科编辑室电子信箱:

政 治 zzxkzz@126.com  
经 济 zzxkjs@126.com  
法 学 zzxklaw@126.com  
社 会 zzxksh@126.com  
伦 理 zzxkll@126.com  
哲 学 zzxkzx@126.com  
历 史 zzxkls@126.com  
文 学 zzxkwxs@126.com  
新闻传播 zzxkbw@126.com

装帧设计: 韩青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微信公众号

ISSN 1003-0751



9 771003 075258